鄭振鐸文集

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鄭振鐸文集

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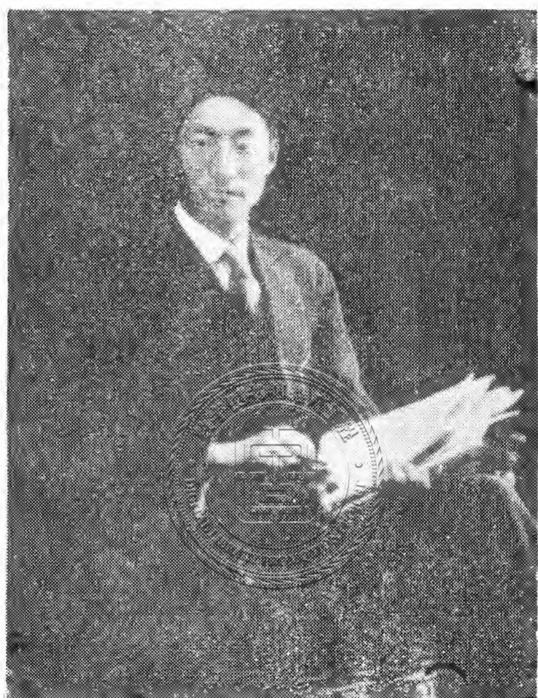


郑振铎文集（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8,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插页 4
198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19·3515　　定价 1.10元



作 者 像



印度尼西亚游记之一

记茂物的植物园和总统别墅

作者手迹



第三卷说明

本卷收辑了作者的大部分散文。

《西行书简》收散文十四篇，是用书信形式写的游记，写于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一九三七年六月作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编入文集，即据此版本。

《蛰居散记》收散文二十篇。大部分刊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间的上海《周报》上。一九五一年五月，由上海出版公司作为"文艺复兴丛书"之一出版。本卷所收，即据此版本。需要说明的是，原刊于《周报》的《散记》中《一个女间谍》等四篇，作者在结集出版时，未编入书中；现作为《补遗》，编入本卷。

《集外》收作者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八年间未曾编集的大部分散文。这些散文，大都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民主》和建国后的《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过。现按写作年代，分别编为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八年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两辑。

第 三 卷 目 录

西行书简

蛰居散记

集外

西 行 书 简

题　　记

这里刊出的十几封信，都是我在平绥路上旅行时沿途寄给君箴的。本来是私信，也有不少的私话，且都是随笔挥写，不加剪裁的东西，不大愿意发表出来。但友人们见到的，却都以为应该公之于众。有人天天在嚷着开发西北；西北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关于这一类的记载是极少。我这十几封给君箴的信，虽然对于西北社会的情形说得不多，且更偏重于古迹方面，却总有点足资未闻未见者的参考。我不愿说什么“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老话。但最近的将来，就将成为问题的中心的西北，其危急的情形，以及民间的疾苦，或可于此得到些消息吧，特别是关于西蒙一方面的事。故便趁着住在上海的十天，将它们整理一下，删去一部分的“私话”将它刊之于此！却并不曾增入什么。书简本是随笔挥写的东西，也许反因其为随笔挥写之故而反能不忸怩作态吧。即有些浅陋草率之处，也便索性的让它们“过而存之”了。

在平绥路上，这夏天旅行了两次，一次是七月间，到了平地泉，因路断而回。一次是八月间，由北平直赴绥远，再到百灵庙，包头等处。第七封信以前都是第一次旅行时所写的；第八封信以后却是第二次写的。

此行得友好们的帮助不少，特别是冰心、文藻夫妇。这趟旅

行，由他们发起，也由他们料理一切。我应该向他们俩和一切帮助我们的人，致恳切的谢意！

作　　者

二十三年九月八日

一　从清华园到宣化

别后，坐载重汽车向清华园车站出发。沿途道路太坏，颠簸得心跳身痛。因为坐得高，绿榆树枝，时时扑面打来，一不小心，不低头，便会被打得痛极。八时十二分，上平绥车，向西走，"渐入佳境"。左边是平原，麦田花畦，色彩方整若图案。右边，大山峙立，峰尖崚崚若齿，色极青翠。白云环绕半山，益增幻趣。绝似大幅工笔的青绿山水图。天阴，欲雨未雨。道旁大石巨崖棋布罗立，而小树散缀于岩间，益显其细弱可怜。沿途马缨花树最多，树尖即在车窗之下，绿衣红饰，楚楚有致。九时半，到南口。车停得很久。下去买了一筐桃子，总有一百多个，价仅二角。味极甜美。果贩们抢着叫卖，以脱手卖出为幸，据说获利极少。过南口，车即上山。溪水清洌，铮淙有声。过了几个山洞，山势险巇甚。在青龙桥站停了一会。又过山洞，经八达岭下，即入大平原。俨然换一天地。山势平衍若土阜，绿得可爱。长城如在车下。回顾八达岭一带，则山皆壁立，峻削不可攀援。长城蜿蜒卧于山顶，雉堞相望。山下则堡垒形的烽火台连绵不断。昔日的国防，是这样的设备得周密，今已一无所用了。长城一线已不能阻限敌人们铁骑的蹂躏了！

十一时四十五分到康庄。这是一个很大的车站，待运的货物堆积得极多。有许多山羊，装在牲畜车上，当是从西边运来的。十二时二十五分，过怀来，山势又险峻起来。山色黄绿相

间，斑斓若虎皮纹，白云若断若连的懒散地拥抱于山腰。太阳光从云隙中射下，一缕一缕的，映照山上，益显得彩色的幻变不居。

下午一时余，到土木堡。此地即明英宗被也先所俘处，侍臣及兵士们死难者极多。闻有大墓一，今已不知所在。有显忠祠一，祀死难诸臣的，今尚在堡内。我们下车，预备在此处停留数小时。堡离车站数里；在田垅间走着。进沛津门，即入堡。房屋构造，道路情形，已和"关内"不同。大街极窄小，满是泥泞，不堪下足，除小毛驴外，似无其他代步物。街下有"岁进士"和"选元"的匾额，初不知所指，后读题字，始知前者为"岁贡生"，后者为"选拔贡生"。商店很少，有所谓"孟尝君子之店"者，即为旅馆，门上又悬"好大豆腐"的招记，后又数见此招记。似居民食物主要品即为豆腐。到显忠祠，房屋破败不堪，明碑也鲜存者。此祠立于景泰间，至万历时焚于火，清初又毁于兵。康熙五十六年雷有乾等重建之。嘉庆间又加重修。祠后，辟屋祠文昌帝君，壁上画天聋，地哑像，乔模作态，幽默可喜。三时半，回到车站，四时又上车西去。六时二十分到下花园车站。这个地方，辽代的遗迹颇多，惜未及下车。鸡鸣山远峙于左，洋河浊浪滔滔，车即沿河而走。右有一峰孤耸，若废垒，四无依傍，拔地数十丈，色若焦煤。是一奇景。一路上都是稻田，大有江南的风光。六时五十五分到辛庄子。溯河而上，洋河之水，势极湍急，奔流而下，潺潺之声满耳。堤岸皆方石所筑，极齐整，间亦有已被冲刷坏了的。对山一带，自山腰以下，皆是黄色，风力吹积之痕迹，宛然可见。漠外的沙碛，第一次睹得一斑。山色本来是绿的；为了黄沙的烘托，觉得幽暗，更显出暗绿。柳树极多，极目皆是。

七时四十分到宣化。车停在车站，拟即在此过夜。城外有兵士甚多，正在筑土堡，据说是在盖建营房。夜间，风很大，虎虎

有声，不像是夏天。

八日，清晨即起身。遥望山腰，白云绵绵不绝，有若衣带环束者，有若炊烟上升者。半山黄沙，看得更清楚。七时半，坐人力车进城。入昌平门，门两旁有烧砖砌成之金刚神。城门上钉的是钟形之铁钉；极别致。城墙上有一石刻小孩作向下放便势；下有一猴，头顶一盘承之。据车夫说，从前每逢天将雨，盘上便有水渍。今已没有这效验了。穿城而过，出北门。北门的城楼，即有名之威远楼，明代所建，今尚未全颓。正对此楼，为镇虏台，台高四丈，远望极雄壮。旁有一小阜，名药王阁。我们走上去，无一人，屋内皆停棺木。狗吠声极凶猛。一老太婆在最高处出而问客。语声不可懂。她骨瘦如柴，说一声话，便要咳嗽几声。明白的是肺痨病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真所谓"与鬼为邻"的了。我心头上觉得有物梗塞，非常难过，便离开了她，向镇虏台走来。台下为龙王殿，台上有匾曰"眺远"。此台为嘉靖甲寅(一五五四年)所建，登之，可眺望全城。有明代碑记，凡"镇虏台"之"虏"字，皆已被铲去，殆是清代驻防军人所为。台下山旁，有洞穴二，初不知为何物，入其中，可容人坐立。车夫云："为一山西客民所居，今已弃之而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穴居。

过镇虏台，便望见恒山寺(一名北岳庙)。寺占一山巅，须过一小河始可达。山径已湮没，无路可上。行于乱石细草之间，尚不难走。前殿为安天殿，后殿为子孙娘娘庙。有顺治十年及乾隆甲午二碑。山石皆铁色。对河即为龙烟铁矿办事处。本有铁路支线一，因此矿停工，路亦被拆去。此矿规模极大，炼矿砂处，在北平之石境山。恒山寺下葡萄园极多，亦间有瓜田。平津一带所需之葡萄，皆由此处供给。又有天主堂的修道院一，建筑不久，式样似辅仁大学，当为同时所造的。院主为本国人吴君，在

内修道者，有五六十人，都是从远方来的。

回到城内，游城中央的镇朔楼，本为鼓楼，大鼓尚存，今改为民众教育馆，办事精神很好，图书有《万有文库》等，尚不少。其北为清远楼，尚是旧形，原为钟楼，崇阁三层，为明成化间御史秦纮所造，因上楼之门被锁上了，未能上去。清远楼正居城的中央，楼下通衢四达，似峨特式的建筑，全是圆拱式的。

甘霖桥东有朝玄观（亦作朝天观），有宣德九年杨荣撰及正统三年吴大节撰的碑记。楼阁虽已破败，而弘伟的规模犹在。

次到介春园（今名王家花园），园本清初王毅洲（墨庄）的藏书处，乾隆间为李氏所得。道光十年，始为守备王焕功所得，大加经营，为一邑名胜。鱼池花木，幽雅宜人，今也已衰败，半沦为葡萄园，闻年可出葡萄八千斤。园亭的建筑大有日本风，小巧玲珑。春时芍药极盛，今仅存数株耳。大树不少，正有两株绝大的，被斫伐去，斥卖给贾人。工匠丁丁的在挖掘树根。不禁有重读柴霍夫《樱桃园》剧之感。

次到弥陀寺。朝玄观的道士云："先有弥陀，后有宣化，不可不看。"但此寺今已改为第二师范，仅存明代的铜钟及大铜佛各一。其实，弥陀寺乃始建于元中书右丞相安童，元清皆曾重修。今碑文皆不见。铜佛高一丈八尺五寸，重四千余斤，为明宣德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比丘性杲真源募缘建造。校园中，有大葡萄树数株，远者已有六十余年。

次去参观一清真寺，脱鞋入殿。此地教徒约五千人，甚占势力。

宣化本为李克用的沙陀国城，余址今尚可辨，又有镇国府，为明武宗的行在，曾辇豹房珍宝及妇女实其中，称曰"家里"，今为女子师范学校。惜因时促，均未及游。

宣化城内用水，皆依靠洋河，全城皆有小沟渠，引水入城，饮用，洗濯，及灌溉葡萄园皆用此水。人工河道，规模之小，似当以此处为最。

二　张家口

由宣化到张家口，不过半小时；下午七时三十五分开车，八时便到。饭后，到日新池沐浴。临时买了一瓶消毒药水，店伙竟以为奇，不知如何用法。大街上很热闹，商店极多，虽比不上上海、天津，却有北平最热闹街道的气象。洋货铺及麻菇店最多；西路东路的麻菇，皆以此地为总汇。又有悬挂“批发”招记而无售卖何物之标帜的，听说，都是批发“特货”的店铺。

九日，从睡梦中为喇叭声所惊醒。一队队的军士，肩负铁铲，唱着军歌，出去作工。这时，天色刚亮，红霞满天，仅五点多钟。从车窗里远望，山势蜿蜒，狼烟台依山势的高下布置着。虽然都已颓败，但还可看出古代军事家的有计划的国防布置。

八时，从车站到大境门。这门是通口外的大道，很重要。路过清水河，河上有桥名清水桥，工程甚大。过桥后，有名西来顺的一家商店，同行者指着道：“这店便是批发‘特货’的一家。”一看果然是没有任何标识，只有店名及“批发”二字。

又经下堡，即昨夜走过的商业区。下堡又名旧城，明宣德四年所建。

出大境门，沿西沟而至元宝山，此地为汉蒙交易处。“半里许有地名马桥，由六月六日到九月十日止，每晨卖马牛羊者，集于此桥。”（白眉初《中国省区全志》第一册第二编六页。）商店皆用满、蒙、藏三种文字为店标。墙上又高标外国商店二家之名，

一为英商西密得，专收皮革，一为德商德华洋行，做外蒙的买卖，规模极大，成为中蒙贸易的专利的公司。他们有长途汽车不少，往来于张家口、库伦间。每年获利极巨。闻去年即挣了纯利四百余万元。途中牛车百数十辆，连绵不断。山边有水泉流出，在沙地中流着，牛马皆就之而饮。泉水的发源地，在一所极小的小庙下的岩中。前望山岭，回环拥抱，仅此一线峡涧，为交通的孔道。峰回路转，气象万千。但此处为大车路，不通汽车，到库伦去的汽车，要经万全。

大境门上有“大好河山”四字为高维嶽手笔。沿途稽查很严；每逢要摄影的地方，岗警必来要去名片并盘问几句。足见这地方在防守上地位的重要。实不能不这样防备的。

回车午餐，休息了一会，车上热度到华氏表九十八度。便坐车到公园，布置尚楚楚，动物笼中仅山兔及狼而已。次到赐儿山，山为张垣最有名的胜地，有汽车道，正在修理，可直达半山。山一名云泉山，上有云泉寺。寺为娘娘庙，顺治辛卯重修，求子者多祷于此，故香火很盛。殿下有二洞，一曰冰洞，终年皆冰，一曰水洞，冬日不冻。但入而观之，则水洞当此夏季，当然有水；而冰洞则干涸见底，不仅无冰，也不见有水。娘娘殿两旁有忠义宫及袁公亭。忠义宫祀关羽，袁公亭则祀清时粮厅袁某者。袁公亭最高爽，登览之顷，四山似皆在足下。整个张垣，历历可指。亭中，闻有某军官在避暑，阶上放着留声机一具；亭下小屋一间，贴着“小厨房”字样。

忠义宫中，满挂着仙佛的“照相”，阴影憧憧，鬼形可怖；闻民国十八九年间，扶乩之风最盛，此皆其所遗之痕迹。道人云：“近来已衰落了。”但观其陈列之物很整齐很新鲜，似还有人在开坛捣鬼。

园中有浊水一池，游人们多坐在池边纳凉；池中一无所有。公园四周，多树“格言画”牌，每牌画一个故事，表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大字的训条。西北军的传统的老信念也。

次到地藏寺，一进门，开殿门的人便给我们一个警告：“有汗的不要进去。”其实我们都已走得汗出。“为什么？”“洞里头冷，怕着凉。”进洞，确是很冷，和外面温度至少相差十五度。原来此殿是就山洞而造的。骤由太阳的炎光中走到这洞里，觉得很爽快。没有人肯听警告者的话。殿里很黑暗，柱上都盘着龙，不是彩画的，是泥和木塑成的，张牙舞爪，形状可怕，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这样的“龙柱”。旁有风神祠及仓神殿。仓神殿亦为扶乩之所，陈列的鬼影不少。风神祠惜因门锁闭，未得进去，不知风神果作何状。寺内有康熙、乾隆、嘉庆各时代的碑。一阵风来，天井中亭角的风铃铛铛作响，清脆可听。这声音，在南方似已不易听到了。

次到市圈，即所谓上堡（一名新堡）者是。堡修于明万历时，为对蒙交易之所。有万历四十四年汪道亨所作“新城来远堡题名记”，今尚存。殆为张垣最古的一碑。闻在中俄通商，库伦贸易未断之前，此处商业甚盛。还有医院一所。今则半成颓垣废瓦，空无居人，仅有军士数人看守耳。军士们作业甚勤，提筐倒土，执铲去泥，无役不作。即抬土时，亦开正步走。我们去时，正有兵士数人被罚跪于道旁。堡上最高处为关岳庙，规模甚大，其戏台乃在市圈广场之一边。庙中有“合圣佛坛”，亦为扶乩的地方。

次到旧堡，亦有城，甚大。有玉皇阁，在城边上，就城为庙，可望见全部商业地及四山。道人遥指道：“对山是宋主席新建的观音寺，还没有完工呢。”绿山之中，一大块的白茫茫的新斫的山

岩，即为其地。

归时，往怡安市场，大似北平头发胡同的旧货市，不过所售者非旧物耳。

张垣风光，和东南及冀鲁都不相同。我们到处所见皆为新鲜的事物，几乎是带着好奇的心去考察。这里没有旧的文化，没有象大同那样的惊人的古迹，甚至没有象宣化那样漂亮的建筑和楼牌。这里始终是一个商业的中心，从明代到民国初元都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发展着。但现在却形势全非了！那地方的险要是什么人都知道的。西北几省的存亡，几以此一要塞的保全与否为关键；甚至在远东的国际战争上，也是握着极重要的关键。目前的这样熙熙攘攘的景象，果能保持到几时呢？

车正从一所戏园边经过，悲壮凄凉的秦声正从园中透出。

三 大同

十日，五时即起身。六时二十分由张家口开车。过阳高时，本想下去游白登堡，因昨夜大雨滂沱，遍地泥泞，不能下足，只好打消此议。下午一时半到大同。

大同在六朝做过北魏的都城，历代也都是大邑重镇。遗留古迹极多。在平绥路线上是一个最有过去的光荣的地方。现在车道可通太原等处。将来同蒲路修竣，这个地方在军事和商业上占的地位更为重要。

过大同的人，没有一个不耳熟于云岗石窟之名。这是北魏时代的一个伟大的艺术的宝窟。我憧憬于兹者已有好多年。到大同的目的，大半在游云岗。但并不是说，城内便没有可逛的地方。大同的城内也到处都是古迹，都有伟大的建筑物和艺术品在着。在大同，便够你逛个十天八天，逛个心满意足，还使你流连徘徊，不忍即返。

在车站上听见人说，连日大雨倾盆，通云岗的汽车道已被水冲坏，交通中断。这话使我的游兴为之减去大半。其田、文藻到骑兵司令部去打听关于云岗道上的消息，并去借汽车。——到云岗虽不过三十里，汽车一小时余可达，坐骡车骑马却都很费事，故非去借汽车不可。过了许久，他们才回来，说赵司令承绶已赴云岗，他也因路断不能回来。现在正派工兵连夜赶修，大约明天这条路可以修好。

这样的在期待中，在车厢里过了半天，夜色苍茫，如豆的电灯光照得人影如鬼影似的，实在鼓不起上街的兴趣。到这陌生的地方，也不愿意夜游。便在车上闲谈，消遣过这半夜。

十一日六时起。九时左右，司令部的载重汽车来了。先游城内。云岗的修路消息还没有来，据说，要十二时前后方才知道确实的情形。颉刚游过大同数次，他独留在车上写信，不出去。

大同旧城外，有外郭三，除兵房外，无甚商店。但马路甚好，兵士时常的在修理。一进旧城，便是县政府的范围，那马路的崎岖不平，泥泞满涂，有过于北平人所称的"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我们坐在大汽车上颠簸得真够受。旧城的城楼，曾改建成西式的楼房，作为图书馆。后冯玉祥军围大同，图书馆为炮火所毁。至今未能恢复，一座破坏了的洋楼孤巍巍的耸立在城头，到是一个奇观。

到了阳和街东，便是九龙壁的所在。这是代王邸前的一道照壁。王邸已沦为民居，仅此照壁尚存。锁上了门，须叫看守者开门进去。那九条龙张牙舞爪的显得很活泼。琉璃砖瓦砌合的东西，光彩过于辉煌耀目，火辣辣的，一看便有非高品之感。但此壁琉璃砖上的彩色已剥落了不少，却觉得古色斑斓，恬暗幽静，没有一点火气，较之北海公园的那一座九龙壁来，这一座是够得上称做老前辈的了。在壁下徘徊了好久。壁的前面是一个小池。据看守人说，池里有水的时候，龙影映在水中，活象是真龙。又说，大小龙共计一千三百八十条。此数大约不确，连琉璃瓦片上的小龙计之，也不会到此巨数的。"九龙神迹"的一碑为乾隆重修时所立。又有嘉庆及民国十九年重修的二碑。门首有一碑，题云："奉旨传教修德立功为义殒躯杨司铎、雅各伯"，大约是拳匪时被杀者的纪念碑。

次游华严寺，这是大同城内最著名的梵刹。共有上寺下寺二所，相距甚近。当初香火盛时，或是相连的，后来寺址的一部分被侵占为民居，便隔成两地了。这是很可能的解释。上华严寺规模极大，现在虽然破坏不堪，典型犹在。旁院及后院皆夷为民居。大雄宝殿是保存得最好的一部分。终年锁上了门，可想见香火的冷落。找到了一个看守的和尚，方才开了门。此殿曾经驻过兵，被蹂躏得不堪。壁画尚完好。但都是金碧焕然，显为二三十年内所作的。有题记云："信心弟子画工董安"，又云："云中钟楼西街兴荣魁信心弟子画工董安"。这位董安，当是很近代的人。但画的佛像及布置的景色却浑朴异常，饶有古意。有好几个地方还可看出旧的未经修补涂饰的原来痕迹。大约董安只不过修补一下，加上些新鲜的颜色上去而已。原来署名的地方，一定是有古人署名的，却为他所涂却，僭写上了自己的名号了。此种壁画，当不至经过一次两次的涂饰。每经过一次的"装修"，必定会失去若干的"神韵"。凡董安所曾"装修"过的，细阅之，笔致皆极稚弱。仅存古作的躯壳耳。凡未经他的"装修"的，气魄皆很伟大，线条使色，都比较的老练，大胆。今日壁画的作家，仅存于西北一隅，而人皆视之为工匠，和土木工人等量齐观，所得也极微少，无怪他们的堕落。再过几年，恐怕连这类的"匠人"也不易找到了。北方的佛教势力实在是太微弱了，除了一年一度或数度的庙会之外，差不多终年是没有香火的。有香火的几个庙，不过是娘娘庙、城隍庙及关帝庙、玉皇庙的寥寥数座而已。为了生活的压迫，连宗教的崇拜也都专趋于与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神祇们身上，什么释迦如来之类，只好是关上大门喝西北风了。故北方的庙宇，差不多不容易养活多少个僧侣。象灵隐寺及普陀山诸寺之每寺往往住着数百千个和尚的简直是没有。这

有名的古刹华严寺，不过住着几个很穷苦的看守人而已，而其衣衫的破烂，殊有和这没落的古庙相依为命之概。北方的庙宇，听说，只有喇嘛庙还可以存在，每庙也常住着数百人。其经济的来源却是从蒙古王公们那方面供给的居多。然今日也渐渐的日见其衰颓了。

上华严寺的大殿上的佛像以及布置，都和江南及北平的不同。殿很大，共有九九八十一间。还是辽代的建筑，历经丧乱，巍然独存。佛像极庄严，至晚是金元时代的东西。供养佛前的花瓶，是石头造的。像后的焰光极繁缛绚丽，和永乐时代的木板雕刻的佛像有些相同。无疑的，木雕是从这实物上仿得的

"大雄宝殿"四字是宣德二年写的。又有"调御丈夫"一额，是万历戊午年马林所题。此外，便无更古的题记了。

走过一条街便是下华严寺。一走进寺门，觉得气魄没有上寺大，眼界没有上寺敞。但当小和尚们——这里还有几个和尚及沙弥，庙宇保存得也还好——把大殿的门打开了时，我们的眼光突为之一亮，立刻喊出了诧异和赞叹之声。啊！这里是一个宝藏，一个最伟大的塑像的宝藏！从不曾见过那末多的那末美丽的塑像拥挤在一起的。这里的佛像确有过于拥挤之感，也许是从别的地方搬运了些过来的吧。简直象个博物院。上寺给我们的是衰败没落的感觉，到这下寺却使我们感到走进一个保存古物的金库里去。上寺的佛像是庄严的，但这里的佛像，特别倚立着的几尊菩萨像，却是那样的美丽。那脸部，那眼睛，那耳朵，那双唇，那手指，那赤裸的双足，那婀娜的细腰，几乎无一处不是最美的制造品，最漂亮的范型。那倚立着的姿态，娇媚无比啊，不是和洛夫博物院的 Venus de Melo 有些相同么？那衣服的褶痕、线条，那一处不是柔和若最柔软的丝布的，不象是泥塑的，是

翩翩欲活的美人。地山曾经在北平地摊上买到过一尊木雕的小菩萨像，其姿势极为相同。当为同时代之物。大约还是辽代的原物吧？否则，说是金元之间的东西，是决无疑问的。在明代，便不见了那飞动，那婀娜的作风了。明的塑像往往是庄严有余，生动不足的。清代的作物，则只有呆板的形像，连庄严慈祥的表情也都谈不到了。眼前便有一个好例：在这宝库里，同时便有几尊清代的塑像杂于其间，是那样的猥琐可怜！

我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爬上了供桌，在佛像菩萨像之间，走着，相着，赞叹着。在殿前殿后转了好几个弯。要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的话，便住在这里一天两天三天都还不能看得饱足的。可惜天已正午，不能不走。走出这拥挤的宝殿时，还返顾了好几次！

殿内有"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为金天眷三年云中段子卿撰。原来这里是一个藏经殿。殿的四周，经阁尚存，但不知是否原物。打开了经阁看时，金代的藏经当然是不翼而飞了，但其中还藏着一部《正统藏》，残阙颇多，有的仅存经皮。赵城县广胜寺所藏的一部《金藏》或与这寺有些渊源关系吧。

回到车上，匆匆的吃了午饭。司令部的招待员不久便来，说云岗的汽车道已经修好了。我们便兴匆匆的又上了载重汽车。是带着那样的兴奋和期望走向我们的更伟大的佛教的宝藏云岗去！

在云岗预定至少要住两天。

四　云岗

云岗石窟的庄严伟大是我们所不能想象得出的。必须到了那个地方，流连徘徊了几天，几月，才能够给你以一个大略的美丽的轮廓。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着走着的看。你得仔细的去欣赏。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一口吞下去，永远的不会得到云岗的真相。云岗决不会在你一次两次的过访之时，便会把整个的面目对你显示出来的。每一个石窟，每一尊石像，每一个头部，每一个姿态，甚至每一条衣襞，每一部的火轮或图饰，都值得你仔细的流连观赏，仔细远观近察，仔细的分析研究。七十丈，六十丈的大佛，固然给你以弘伟的感觉，即小至一呎二呎，二吋三吋的人物，也并不给你以邈小不足观的缺憾。全部分的结构，固然可称是最大的一个雕刻的博物院，即就一洞、一方、一隅的气分而研究之，也足以得着温腻柔和，慈祥秀丽之感。他们各有一个完整的布局。合之固极繁赜富丽，分之亦能自成一个局面。

假若你能够了解，赞美希腊的雕刻，欣赏雅典处女庙的“浮雕”，假若你会在 Venus de Melo 像下，流连徘徊，不忍即去，看两次，三次，数十次而还不知满足者，我知道你一定能够在云岗徘徊个十天八天一月二月的。

见到了云岗，你就觉得对于下华严寺的那些美丽的塑像的赞叹，是少见多怪。到过云岗，再去看那些塑像，便会有些不足

之感——虽然并不会以他们为变得丑陋。

说来不信，云岗是离今一千五百年前的遗物呢；有一部分还完好如新，虽然有一部分已被风和水所侵蚀而失去原形，还有一部分是被斫下去盗卖了。

那末被自然力或奸人们所破坏的完整部分，还够得你赞叹欣赏的，且仍还使你有应接不暇之概。入了一个佛洞，你便有如走入宝山，如走到山阴，珍异之多，山川之秀，竟使你不知先拾那件好，先看那一方面好。

曾走入一个大些的佛洞，刚在那里仔细的看大佛的坐姿和面相，忽然有一个声音叫道：

“你看，那高壁上的侍佛是如何的美！”

刚刚回过头去，又有一个声音在叫道：

“那门柱上的金刚（？），有五个头的如何的显得力和威！还有那无名的鸟，躯体是这样的显得有劲！”

“快看，这边的小佛是那末恬美，座前的一匹马，没有头的，一双前腿跪在地上，那姿态是不曾在任何画上和雕刻上见到呢。”

“啊，啊，一个奇迹，那高高的壁上的一个女像，手执了水瓶的，还不活像是阿述利亚风的浮雕么？那扁圆的脸部简直是阿述帝国的浮雕的重现。”

这样的此赞彼叹，我怎样能应付得来呢！赵君执着摄影机更是忙碌不堪。

但贪婪的眼和贪婪的心是一点不知倦的；看了一处还要再看一处，看了一次，还要再看一次。

云岗石窟的开始雕刻，在公元四五三年（魏兴和二年）。那时，对于佛教的大迫害方才除去，主张灭佛法的崔浩已被族诛。

僧侣们又纷纷的在北朝主者的保护下活动着。这一年有高僧昙曜，来到这武周山的地方，开始掘洞雕像。曜所开的窟洞，只有五所。后来成了风气，便陆续的扩大地域，增多窟洞。佛像也愈雕愈多，愈雕愈细致。

《魏书·释老志》云："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陁、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师，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湖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及画像迹。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丈，次六十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又云："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均见卷一百十四）

又《续高僧传》云："元魏北台恒北石窟通乐寺沙门解昙曜传：释昙曜，未详何许人也。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统，绥辑僧众，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见存，未卒陈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贞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寇谦之，拜为天师，珍敬老氏，虔刘释种，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疠疾，方始开始。帝既心悔，诛夷崔氏。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访经典。毁法七载，三宝还兴。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以和平三年壬寅）。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

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卷一）

然这二书之所述，已可见开窟雕像的经过情形，不必更引他书。惟《续高僧传》所云：“栉比相连三十余里，”未免邻于夸大。武州山根本便没有绵延到三十余里之长。至多不过五六里长。还是《魏书·释老志》所述“开窟五所”的话，最可靠。但昙曜开辟了此山不久，此山便成了皇家崇佛的圣地。在元魏迁都之前，《魏书》屡纪皇帝临幸武州山石窟寺之事。

《魏书·显祖记》：“皇兴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公元四六七）以后又有七八次。

又《魏书·高祖记》：“太和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以后又有三次。

但也不仅皇家在那里开窟雕像；民间富人们和外国使者们也凑热闹的在那里你开一窟，我雕一像的相竞争。就连日所得的碑刻看来，西头的好几个洞，都是民间集资雕成的。这消息，足征各洞窟的雕刻所以作风不甚相同之故。因此，不久之后，武州山便成了极热闹的大佛场。

《水经注》“㶟水”条下注云：

“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

按《水经注》撰于后魏太和，去寺之建，不过四五十年，而已繁盛至此。所谓：“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决不是瞎赞。

《大清一统志》引《山西通志》："石窟十寺，在大同府治西三十里，元魏建，始神瑞，终正光，历百年而工始完。其寺，一同升，二灵光，三镇国，四护国，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内有元载所修石佛十二龛。"那十寺不知是哪一代的建筑。所谓元载云云，到底指的是元代呢，还指的是唐时宰相元载？或为元魏二字之误吧？云岗石刻的作风，完全是元魏的，并没有后代的作品参杂在内。则所谓元载一定是元魏之误。十寺云云，也不会是虚无之谈。正可和《水经注》的"山堂烟寺相望"的话相证。今日所见，石窟之下，是一片的平原，武州山的山上也是一片的平原，很像是人工所开辟的；则"十寺"的存在，无可怀疑。今所存者，仅一石窟寺，乃是清初所修的，石窟寺的最高处，和山顶相通的，另有一个古寺的遗构。惜通道已被堵塞，不能进去。又云岗别墅之东，破坏最甚的那所大窟，其窟壁上有石孔累累，都是明显的架梁支柱的遗迹。此窟结构最为弘伟。难道便是《魏书·释老志》所称"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的故址所在么？这是很有可能的。今尚见有极精美的两个石柱耸立在洞前。

经我们三日（十一日到十三日）的奔走周览，全部武州山石窟的形势，大略可知，武州山因其山脉的自然起讫，天然的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可自成一局面，中有山涧将他们隔绝开。如站在武州河的对岸望过去，那脉络的起讫是极为分明的。今人所游者大抵只为中部；西部也间有游者，东部则问津者最少。所谓东部，指的是，自云岗别墅以东的全部。东部包括的地域最广，惜破坏最甚，洞窟也较为零落。中部包括今日的云岗别墅、石窟寺、五佛洞，一直到碧霞宫为止。碧霞宫以西便算是西部了。中部自然是精华所在。西部虽也被古董贩者糟蹋得不

堪，却仍有极精美的雕刻物存在。

我们十一日下午一时二十分由大同车站动身，坐的仍是载重汽车。沿途道路，因为被水冲坏的太多，刚刚修好，仍多崎岖不平处。高坐在车上，被颠簸得头晕心跳。有时，猛然一跳，连坐椅都跳了起来。双手紧握着车上的铁条或边栏，不敢放松一下，弄得双臂痠痛不堪。沿武州河而行。中途憩观音堂。堂前有三龙壁，也是明代物。驻扎在堂内的一位营长，指点给我们看道："对山最高处便是马武塞，中有水井，相传是汉时马武做强盗时所占据的地方。惜中隔一水，山又太高，不能上去一游。"

三十华里的路，足足走了一个半钟头。渡过武州河两次，因汽车道是就河边而造的。第一次渡过河后，颉刚便叫道：

"云岗看见了！那山边有许多洞窟的就是。"

大家都很兴奋。但我只顾着坚握铁条，不遑探身外望，什么也没有见到；一半也因坐的地方不大好。

"看见佛字峪了，过了石窟寒泉了，"颉刚继续的指点道，他在三个月之前刚来过一次。

啊，啊，现在我也看见了，云岗全景展布我们之前。几个大佛的头和肩也可远远的见到。我的心是怦怦的急跳着。想望了许久的一千五百年前的艺术的宝窟，现在是要与它相见了！

三时到云岗。车停于石窟寺东邻的云岗别墅。这别墅是骑兵司令赵承绶氏建的。这时，他正在那里避暑。因为我们去，他今天便要回大同，让给我们住几天。这里，一切的新式设备俱全——除了电灯外。

这一天只是草草的一游。只到石窟寺（一作大佛寺）及五佛洞走走。别的地方都没有去。

登上了大佛寺的三层高楼，才和这寺内的一尊大佛的头部

相对。四周都是黄的红的蓝的彩色，都是细致的小佛像及佛饰。有点过于绚丽失真。这都是后人用泥彩修补的，修得很不好，特别是头部，没有一点是仿得像原形的。看来总觉得又稚弱又猥琐，毫没有原刻的高华生动的气势。这洞内几乎全部是彩画过的，有的原来未毁坏的，其真容也被掩却。想来装修不止一次。最后的一次是光绪十七年兴和王氏所修的。他"购买民院地点，装彩五佛洞，并修饰东西两楼，金装大佛金身。"不能不说与云岗有功，特别是购买民地，保存佛窟的一事。向西到五佛洞，也因被装修彩绘而大失原形。反是几个未被"装彩"过的小洞，还保全着高华古朴的态度。

游五佛洞时，有巡警跟随着。这个区域是属于他们管辖的；大佛寺的几个窟，便是属于寺僧管辖的。五佛洞西的几个窟，有居民，可负保管之责。再西的无人居的地方，便索性用泥土封闭了洞口，在洞外写道："内有手溜弹，游者小心！"（？）一类的话。其实没有，被封闭的无人看管的若干洞，也尽有好东西在那里。据巡长说，他们每夜都派人在外巡察。此地现已属于古物保管会管辖，故比较的不像从前那样容易被毁坏。

五佛洞西，有几尊大佛的头部，远远的可望见。很想立刻便去一游。但暮色渐渐的笼罩上来，像在这古代宝窟之前，挂上了一层纱帘。我们只好打断了游兴，回到云岗别墅。

武州山下，靠近西部，为云岗堡，一名下堡，堡门上有迎薰、怀远二额，为万历十四年所立。云岗山上还有一座土城屹立于上，那便是云岗堡的上堡。明代以大同为重镇，此二堡皆为边防兵的驻所。

晚餐后，在别墅的小亭上闲谈。东部的大佛窟，全在眼前。那两个立柱还朦朦胧胧的可见到。忽听得山下人家有击筑奏筝

及吹笛的声音；乐声呜呜、托托的，时断时续。我和颉刚及巨渊寻声而往。听说是娶亲。正在一个古洞的前面，庭际搭了一个小棚，有三个音乐家在吹打。贺客不少。亲娘盘膝的坐在炕上。

在这古窟宝洞之前，在这天黑星稀的时候，在当前便是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大佛，便是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人世浩劫的佛室，听得了这一声声的呜呜托托的乐调，这情怀是怎样可以分析呢？凄惋？眷恋？舒畅？忧郁？沈闷？啊，这飘荡着的轻纱似的无端的薄愁呀！啊，在罗马斗兽场见到黑衫党聚会，在埃及的金字塔下听到土人们作乐，在雅典处女庙的古址上见旅客们乘汽车而过，是矛盾？是调和？这永古不能分析的轻纱似的薄愁的情怀！

归来即睡。入睡了许久，中夜醒来，还听见那梆子的托托和笛声的呜呜。他们是彻夜的在奏乐。

十二日一早，我性急，便最先起身，迎着朝暾，独自向东部去周览各窟。沿着大道(这是骡车的道)向东直走，走过石窟寒泉，走过一道山涧，走过佛字峪。愈向东走，石窟愈少愈小。零零落落的简直无可称道。山涧边，半山上有几个古窟，攀登了上去一看，那些窟里是一无所有。直走到尽头处，然后再回头向西来，一窟一窟的细看。

最东的可称道的一窟，当从“左云交界处”的一个碑记的东边算起。这一窟并不大。仅存一坐佛，面西，一手上举，姿态尚好，但面部极模糊，盖为风霜雨露所侵剥的结果。

窟的前壁，向内的一部分，照例是保存得最好的，这个所在，非风势雨力所能侵及，但也一无所有，刀斧斲削之痕，宛然犹在。大约是古董贩子的窃盗的成绩。

由此向西，中隔一山涧，地势较低，即“左云交界处”。道旁零

零落落的，小佛窟不少。雕刻的小佛随处可见。一窟内有较大的立佛二，但极模糊。窟西，有一小窟，沙土满中，一破棺埋在那里，尸身的破蓝衣已被狗拖出棺外，很可怕。然此窟小佛像也有不少，窟外壁上有明人朱廷翰的题诗，字很大。由此往西，明人的题刻不少。但半皆字迹剥落，不堪卒读。在明代，此处或有一大庙，为入云岗的头门，故题壁皆萃集于此。

西首有二洞，上下相连，皆被泥土所堵塞，想其中必有较完好的佛像。一大窟，在其西邻，也已被堵塞，但从洞外罅隙处，可见其中彩色黝红，极为古艳，一望而知，是元魏时代所特有的鲜红色及绿色，经过了一千五百余年的风尘所侵所曝的结果，决不是后代的新的彩饰所能冒充得来的。徒在门外徘徊，不能入内。这里便是所谓"石窟寒泉"。有一道清泉，由被堵塞的窟旁涓涓的流出，流量极微。窟上有"云深处"及"山水清音"二石刻，大约也是明人的手笔。

西边有一洞，可入。洞中有一方形的立柱，高约八尺。一佛东向，一佛西向，又一佛西南向，皆模糊不清。西南向者且为泥土所修补的，形态全非。所雕立的、坐的、盘膝的小佛像甚多。但不是模糊，便是头部或连身部俱被盗去。

再西为碧霞洞(并非原名，疑亦明人所题)，窟门有六，规模不小。窟内一物无存，多斧凿痕，当然也是被盗的结果。自此以西，便没有石刻可见。颇疑自"左云交界处"向西到碧霞洞，原是以石窟寒泉那个大窟的中心的一组的石洞。在明代，大约这里是士人们来往最为繁密的地方，或窟下的平原上，本有一所大庙，可供士大夫往来住宿的。然今则成为云岗最寥落、最残破的一部分了。

碧霞洞以西，是另成一个局面的结构。那结构的规模的弘

伟，在云岗诸窟中，当为第一。数十丈的山壁上，凿有三层的佛像，每层的中间。皆有石孔，当然是支架梁木的所在。故这里，在从前至少是一所高在三层以上的大梵刹。颉刚说："这里便是刘孝标的译经台。"正中是一个大佛窟，窟前有二方形立柱，虽柱上雕刻皆已模糊不可辨识，那希腊风的人形雕柱的格局却是一看便知的。大窟的两旁，各有一窟，规模也殊不少。和这东西二窟相连的，更有数不清的小窟小龛。惜高处无法攀缘而上，只能周览最下层的一部分。

一进了正中的那个大窟，霉土之气便触鼻而来；还夹着不少鸽粪的特有的臭味。脱落的鸽翎，满地都是。有什么动物，咕咕咕的在低鸣着。拍拍的一扑着翼，成群的飞了出来，那都是野鸽。地上很潮湿，积满了古尘，泥屑和石屑。阴阴的，温度很低冷，如入了地下的古墓室。但一抬起头来，却见的是耀眼的伟大的雕刻物。正中是一尊大佛，总有六十多丈高，是坐像。旁有二尊菩萨的大像，侍立着。诸像腰部以下皆剥落不堪，连形态都不存。但上半身却仍是完好如新。那头部美妙庄严，赞之不尽。反较大佛寺、五佛洞诸大佛之曾经修补者为更真朴可爱。这是东部唯一的一尊大佛。但除此三大像外，这大窟中是空无所有，后壁及东西壁皆被风势及水力或人工所削平，连半点模糊的雕像的形状都看不到。壁上湿漉漉，一抹便是一手指的湿的细尘。窟口的向内的壁上，也平平的不存一物。惟一条条的极整齐的斧凿痕还很清显的在那里，一定是近十余年来的人工破坏的遗迹。

东边的一窟，其中也被破坏得无一物存在。地上堆积了不少的由壁上脱落下来的石块，被古尘沾满，和泥土成了同色，大约不是近数十年来之所为的。

西边的一窟，虽也破败不堪，却还有些浮雕可见到。副窟小

龛里，遗物还不少。这西窟的东壁为泥土所堵塞，西壁及南壁，浮雕尚有规模可见。窟顶上刻有“飞天”不少。那半裸体的在空中飞舞着的姿态，是除了希腊浮雕外，他处少见的，肉体的丰满柔和，手足腰支的曲线的圆融生动，都不是东方诸国的古石刻上所有的。我抬了头，站在那里，好久没有移开。有时，换了一个方向看去。但无论在那个方向看去，那美妙、圆融的姿态总是令人满意、赞赏的。

由此窟向西，可通另一窟，也是一个相连的副窟。我们可称它为西窟第二洞。洞中有三尊坐佛，皆盘膝而坐。这个布置，在诸窟中不多见。东壁的浮雕皆比较的完整。后壁及西壁则皆模糊不堪。

如果把这以大佛窟为中心的一组洞窟恢复起来，其弘伟是有过于其西邻的大佛寺的。可惜过于残破，要恢复也不可能。我疑心《魏书·释老志》上所说，皇兴中构的三级石佛图，其遗址便在此处。此地曾经住过人，近代建的窑式的穹形洞尚存数所。

由此向西，不多数步，便是一道山涧，或小山峡，隔开了云岗别墅和这大佛窟的相连。

从云岗别墅开始向西走，便是中部。

中部又可分为五个部分来说。

我依旧是独自一个人由云岗别墅继续的向西走；他们都已出发到西头去逛了。

第一部分是云岗别墅。别墅的原址是否为一大洞窟，抑系由平地填高了的，今已不能查考。但别墅之后，今尚有好几个石窟，窟内有一佛的，有二佛对坐的，俱被风霜侵蚀得不成形体。小雕像也几乎无存。但在那些洞窟中，还堆着不少烧泥的屋瓦和檐饰。显然的这别墅的原址，本是一座小庙。或竟是连合在大

佛寺中的一个东偏院。惜不及详问大佛寺的住持以究竟。那些佛窟，决不能独立成为一组，也当是大佛寺的大佛窟的东边的几个副窟。但为方便计，姑算它作中部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包括大佛寺内的两个大窟。这二窟的前面，各有一楼，高各三层，第三层上有游廊可相通达。三楼之上，更有最高的一层，仿佛另有梯级可通，却寻不到。前面已经说过，大约是较此楼更古的一个建筑物。

第一窟通称为大佛殿；殿前有咸丰辛酉重修碑，有不知年月满文碑，有同治十二年及光绪二年的满文碑。又有明万历间吴氏的一个刻石。无更古者。

入殿后，冷气飕飕由窟中出。和尚手执一把香燃点起来，为照看雕像之用。楼下一层很黑暗，非用火光，看不到什么。正中是一尊大佛，高约六十丈，身上都装了金。四壁浮雕，都被涂饰上新的彩色。且凡原像模糊不清，或已失去之处，皆一一以彩泥为之补塑。怪不调和的。第二层楼上，光线较好，壁上也多半都是彩泥的满像。站在这楼，正对大佛的胸部。到了三层楼上，方才和大佛的头部相对。大佛究竟还完好，故虽装了金，还不失其美妙慈祥的面姿。

第二窟俗称如来殿。窟中也极黑暗，结构和大佛殿大不相同。正中是一个方形立柱，每一面有一立佛，像支柱似的站着，柱上雕得极细。但有一佛，已毁，为彩泥所补塑。北壁为泉水所侵害，仅模糊可辨人形。东西壁尚完好，修补较少，较大佛殿稍存原形。登上了三楼，有一木桥可通那四方柱的第二层。这一层雕刻的是四尊坐佛，四边浮雕极多，皆是侍像及花饰，有极美者。这立方柱当是云岗最完好的最精致的一个。

第三部分包括所谓“弥勒殿”及佛籁洞的二窟；这二窟介于

大佛寺和五佛洞之间，几成了瓯脱之地，无人经管。弥勒殿前有额曰："西来第一山"，为顺治四年马国柱所题。那结构又自不同。正壁有二佛对坐着，像在谈经。其上层则为三尊佛像。其东西二壁各有八佛龛；每龛的帏饰，各有不同；都极生动可爱。有的是圆帏半悬，有的是绣带轻飘，无不柔软圆和，一点石刻的生硬之感也没有。顶壁的"飞天"及莲花最为完整。六朵莲花，以雕柱隔为六部。每一朵莲花，四周皆绕以正在飞行的半裸体的"飞天"，隔柱上也都雕刻着"飞天"。总有四十位飞天，那姿态却没有一个相同的；处处都是美，都是最圆融的曲线。那设计和雕工是世界上所不多觏的。更好的是这窟中的雕像，全为原形，未经后人涂饰。

佛籁洞在其西，破坏已甚。观其结构的形势，当和弥勒殿完全相同。惟无后殿，规模较小。正中的一佛，为后人用彩泥补塑的。原来，照其佛龛的布置及大小，当也是二佛对坐谈经的姿态。

此殿前面，本来有楼，已塌毁。窟门左右，一边有五头佛，一边有三头佛，都显出有威力和严肃的样子，似是把守门口的神道们，同时用来作支柱的。窟外壁上，有浮雕的痕迹甚多，惜剥落殆甚，极为模糊。以上二窟，似也为大佛洞的西首的副窟。

第四部分就是俗称的五佛洞；不知为什么这五佛洞保护得格外周密。有巡警室在其口外。游人入内，必有一警士随之而入。其实，这一部分被装修涂改得最利害，远不及弥勒殿和如来殿的天然秀丽。

说是五佛洞，其实却有六个大窟。最东的第一窟，分隔为三进。结构甚类大佛殿。正中有大佛一，高亦有五十余丈，尚完好。后壁低而潮湿，雕像毁败已甚。前窟的许多浮雕都被涂饰

得不成形状。但也有尚存原形的。

西为第二窟，结构略同前窟，大佛已毁去。到处都是新修新饰的色彩。惟高处的飞天及立佛尚有北魏的典型。

再西为第三窟，内部较小，结构同如来殿，中为一方形立柱，一方各雕着一佛，四壁皆新修新饰者，原有浮雕皆被彩泥填平，几乎是整个重画过。

再西为第四窟，较大，有两进，外进有四支塔形的支柱，极挺秀，尚未失原形。第二进则完全被涂饰改造过。疑其结构本同弥勒殿，正中的佛龛，原分上下二层，上层为三佛，下层为二坐佛。但今则上下二龛都仅坐着泥塑的二佛。以三佛及二佛的宽敞的地位。安置了一佛，自然要显得大而无当。再西为第五窟，结构同大佛殿。大佛高约五十丈，盘膝而坐。四壁多为新修饰的彩色泥像。

又西为第六窟。此窟内部已全毁，空无所有，故后人修补，亦不及之。仅窟门的内部，浮雕尚完好。西边即为一道泥墙，和寺外相隔绝。但此窟的外壁，小佛龛颇多，有几尊尚完整的佛像，那坐态的秀美，面姿的清俊，是诸窟内所罕见的。惜头都失去的太多。

再往西走，要出大佛寺，绕过五佛洞的外墙，才是中部的第五部分。这一部分的雕像我认为最美好，最崇高；却没有人加以保护，任其曝露于天空，任其夷为民居，任其给农民们作为存放稻草及农具之处所。其尚得保存到现在的样子，实在是侥幸之至。到这几个佛窟去，我们都得叩了农民们的大门进去。有时，主人不在家，便要费了大事。有一次，遇到一个病人，躺在床上起不来，没法开门，只好不进去，直等到第二次去，方才看到。

这一部分的第一大窟亦为一大佛洞，洞中有大佛一，高在六

十丈以上，远远的便可望见其肩部及头部。壁上的浮雕也有一部分可见到。洞门却被泥墙所堵塞，没法进去。此窟东边，有二小窟；最东一窟有二坐佛，对坐谈经，却败坏已甚。较近的一窟也被堵塞。隐隐约约的看见其中的彩色古艳的许多浮雕，心怦怦动，极力要设法进去一看而不可能。窟外数十丈的高壁上满雕着小佛像，不知其几千几百。功力之伟大，叹观止矣！

向西为第二大窟。这一窟，也在民居的屋后，保存得甚好。正中为一大坐佛，高亦在六十丈左右。两壁有二佛像，一立一坐。此二像的顶上，其"宝盖"却是雕成像戏院包厢似的。三壁的浮雕，也皆完好。

再西也为一大窟（第三窟）。正中一大佛为立像，高约七十丈，体貌庄严之至。袈裟半披在身上；而袈裟上却刻了无数的小佛像，像虽小而姿态却无粗率草陋者。两旁有四立佛。东壁的二立佛间，诸雕像都极隽好。特别是一个被袈裟而手执水瓶的一像，面貌极似阿述利亚人，袈裟上的红色，至今尚新艳无比。这一像似最可注意。

窟门口的西壁上，有刻石一方，题云："大茹茹……可登□□斯□□□鼓之□尝□□以资征福。谷浑□方妙□"每行约十字，共约二十余行，今可辨者不到二十字耳。然极重要。大茹茹即蠕蠕国。这在魏的历史上是极重要的一个发见。茹茹国竟到云冈来雕像求福，这可见此地在不久时候，便已成了东亚的一个圣地了。

再西为第四大窟。破坏最甚。一大佛盘膝而坐，暴露在天日中。左右有二大佛龛，尚有一二壁的浮雕还完好。因为此处光线较好，故游人们都在此大佛之下摄影。据说，此像最高，从顶至踵，有七十丈以上。

再西为第五大窟，亦有一大坐佛，高约六十丈。东西壁各有

一立佛。西壁的一佛已被毁去。

由此再往西走，便都是些小像小龛了；在那些小龛小像里，却不时的可发现极美丽的雕刻。各像坐的姿态，最为不同，有盘膝而坐者，有交膝而坐者，有一膝支于他膝上，而一手支颐而坐者。处处都是最好的雕像的陈列所。惜头部被窃者甚多，甚至有连整个小龛都被凿下的。

到了碧霞宫止，中部便告了段落。碧霞宫为嘉庆十年所修，两壁有壁画，是水墨的，画得很生动。

颇疑中部的第五部分的相连续的五个大窟，便是昙曜最初所开辟的五窟。五尊大佛像是曜时所雕刻的，其壁上及前后左右的浮雕及侍像，也许是当地官民及外国人所捐助的。也未必是一时所能立即完全雕刻好。每一个大窟，其经营必定是很费工夫的。无力的或力量小些的人民，便在窟外雕个小龛，或开辟一小窟，以求消灾获福。

西部是从碧霞宫以西直到武州山的尽西头处。山势渐渐的向西平衍下去，最西处，恰为武州河的一曲所拥抱着。

这一路向西走，共有二十多个洞窟，规模都不甚大。愈向西走，愈见龛小，且也愈见其零落，正和东部的东首相同。故以中部的第三部分，假设为昙曜最初所选择而开辟的五窟，是很有可能的。那地位恰在正中。

西部的二十余窟，被古董贩子斫去佛头不少。几个较好的佛窟，又都被堵塞住了，而以“内有手溜弹”来吓唬你。那些佛像，有原来的彩色尚完整存在者。坐佛的姿势，隽好者不少。立像的衣襞，有翩翩欲活的。在中段的地方，一连四个洞，俱被堵塞，而标曰“内有手溜弹”。西部从罅中望进去，那顶壁的色彩是那样的古艳可喜！

西邻为一大窟，土人说，内为一石塔。由外望之，顶壁的色彩也极隽美。再西有一佛龛，佛像已被风雨所侵剥，而龛上的悬帏却是细腻轻软若可以手揽取。

再西的各小窟及各龛则大都破败模糊，无足多述。

这样的匆匆的巡览了一遍，已经是过了一整天，连吃午饭的时间都忘记了。

把云岗诸石窟的大势综览了一下，如以中部的第五部分为中心，则今日的大佛寺，五佛洞和东部的大佛图的遗址，都是极弘大的另成段落的一部分。

高到五十丈至七十丈的大佛，或坐或立的，计东部有一尊，中部的大佛寺有一尊，五佛洞现存二尊（或当有三尊，一尊已毁）。连同中部的第五部分五尊，共只有九尊或十尊。《山西通志》所谓的十二龛及一说的所谓的二十尊，都是不可靠的。

这一夜终夜的憧憬于被堵塞的那几个大窟的内容。恰好，第二天，赵司令来到了别墅。我们和他商议打开洞门的事。他说："那很容易，吩咐他们打开就是了。"不料和看守的巡长一商量，却有许多的麻烦。非会同大同县的代表，古物保管会的代表及本地的村长、村副眼同打开，眼同封上不可。说了许久，巡长方允召集了村长村副去打开洞门，先打东部石窟寒泉的一洞。他们取了长梯，只折去最高的墙头的一段。高高的站在梯头向下望，实在看不清楚。跳又跳不下去。这洞内是一座石塔，塔的背后有佛像。因为忙乱了半天，还只开了一个洞，便只好放弃了打开西部各洞的计划，一半也因为打开了，负责任太大。

十三日的下午，一吃过饭，便到武州山的山顶上去闲逛。从云岗别墅的东首山路走上去，不一会便到了"云岗东岗龙王庙斗母宫"，其中空无人居。过此，走入山顶的大平原。这平原约

有数十顷大小，上有和尚的坟塔三座，一为万历时的，一为康熙时的，其一的铭志看不清了。有农人在那里种麦种菜，我们又向西走，进入云岗堡的上堡，堡里连一间破屋都没有，都夷为菜圃麦田，有一人裸了全身在耙地。望见远山上烽火台好几座绵延不断，前后相望。大概都是明代所建的。

再向西走，到了玉皇阁，那也是一个小庙，空无人居。由此庙向下走，下了山头，便是武州河边。“断岸千尺，江流有声”，正足以形容这个地方的景色。

下午四时，动身回大同，仍坐的载重汽车。大雨点已经开始落下。但不久便放晴。下了不过十多分钟的雨，不料沿途从山上奔流下来的雨水却成了滔滔的洪流，冲坏了好几处的大道。汽车勉强的冒险而过。

到了一个桥边，山洪都从桥面上冲下去，激水奔腾，气势极盛，成了一道浊流的大瀑布，哄哄哝哝之声，震撼得人心跳。被阻在那里，二十多分钟，这道瀑布方才势缓声低，汽车才得驶过。

没有经过这种情形的，简直想不到所谓“山洪暴发”的情形是如何的可怕。

过了观音堂，汽车本来是在干的河床上走的；这次却要在急水中走着了。

七月十三夜十二时半寄于大同

五　口泉镇

从云岗归来，天已将黑了，忙了半夜，才把那封信整理好寄上。——说整理，因为在云岗的几夜，已经陆续的写了不少。否则，任怎样在半夜里也写不出那封长信来的。

今天仍然起得很早。七时半，同其田、颉刚他们到城内一家较好的浴堂里沐浴。数日的汗垢和带来的一身的千余年的古尘，才为之一清。

下午二时，由车站拨出一部小机车，拖带我们的车，还有几辆别的车，开到口泉站。说是去参观口泉煤矿。我不曾到这种"黑暗地狱"的矿窟去过，很想考察那生活是怎样的过下去的。

不料昨日下午的半小时的大雨。竟把近口泉站的一座桥梁冲断了，火车没法过去，只好下了车，步行过桥。桥的那一边，已经停好一列小火车在候着。便换车到了口泉。由站到矿口，还要坐十几分钟的火车。

沿途煤块如山石的堆积在那里，个个工人脸上都是煤屑，罩上了一层黑色。还有好几列车的煤，停在站台边。一座洋房，很宽敞，便是晋北矿务公司。这公司商股不多，官股占四分之三以上。煤质极好，营业很发达。在公司里休息了一会。和工程师吕君及胡君谈得很久。他们二人都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胡君说，矿中工人，最多的时候有三千人。每天出煤量，最多时有二千吨。每天分三班工作；每班工作八小时，时间的分配是：

(一)上午六时到下午二时为一班。

(二)下午二时到下午十时为一班。

(三)下午十时到第二天上午六时为一班。

现在共有两个矿场;一个较小的在山中。较大的一场,每日出煤六七百吨。较小的一场,出煤一百吨。因为运输不能完全如意的关系,出产量不敢增加,销场因日煤竞争的关系,也稍受打击,现在和平绥路的联络,较前好得多。故煤块的运出,也较好。在这里,每吨价为二元五角;到了平津一带,加上运费等等,便非九元六角以上不可。

这公司成立于民国十八年。工人的工资,每天约为一角七分到二角六分。工头则每天为四角;大工头,每天约一元余,有的工人,不辞辛苦,竟有每天做两班的。换一句话,便是,每天要在矿内工作十六小时之多!但此地生活程度极低。山边土窟孔孔,皆工人自挖的住室;小米及油面,每元可购四十八斤左右。住和食的问题,比较的还容易解决。

正在说话,外面哗哗的下了大雨,不到二十分钟,雨便止了。但公司门外,人声忽然鼎沸,同时似闻千军万马奔腾而过的声音。走不到几步路,便是山涧,见涧中浊流汹涌,吼声如雷。历半小时而气势未弱。

在公司大厅中吃了午饭,就要下矿。这时已下午四时左右。他们取出了许多套蓝色的衣服给我们穿在身上,头上各戴一顶藤帽,每人一手执灯,一手执手杖。活像是个工头。——工人是穿得破烂多了。但藤帽和灯却是人人都有的。这灯并无灯罩。火焰露在外面。

"有危险么?"我见了这灯,吓得一跳,问道。

"从来不曾出过事;因为这矿是干矿,一点煤气都没有。决无

危险。”

我心里还栗栗的在危惧。

“如果在英国，不用保险灯入矿，是要被捉进监狱的。”其田道。

路上遇见一个童工，在那里闲逛，我问他道：

“你今天不做工么？”

“不做工。”

胡君道：“他自己休息一天。”

“每天你有多少工钱呢？”

“一天一毛钱！”

“在矿里做什么工作呢？”

“推煤车，搬东西。”

这时，已走到了升降机边。蒸气腾腾的由窟口冲出，机上是湿漉漉的。

“站好了，快要开机了。”管理升降的工人道。

呜呜的声响继之而来，升降机斗的一落，伸手不见五指，各人的灯光，如豆似的，照不见面目。黑漆漆的，如入了地狱。降下，降下，降下，仿佛无底洞似的；四壁都是黑的煤块；到处都是黑暗，黑暗，一片的黑暗。到了此地，也不知害怕了。索性任它降到底。只是升降机上面淅淅沥沥的滴了多少水，各人肩上身上都潮了一大片。

升降机降落得很慢。慢，慢，慢，更慢，更慢。然后突然的停止了。机门开启，说道，“到了！”

是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这里是离地面四百呎的地下。只靠着这升降机和人世间相联络。这机如果一旦出了毛病呢……那是不能想像的了！仿佛

没有第二个升降机的设备。

还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手执的灯光，只足供照路之用。路上是纵纵横横的铁索和路轨，还有许许多多的煤车停在那里。远处隆隆的，还有不少辆在推来。遇到狭些的路上，我们都是侧身而过。

因为矿质坚实，洞中通道，大半不用支柱。有的地方，低得非匐伏而进不可。如果猛不防，头颅便要和矿石相撞。我一路来，已撞了三次。如果不戴藤帽，则一定是头破血出了。

"气闷，气闷！"冰心叫道。

的确是气闷，胸中仿佛是窒塞不畅。但工人们在矿中过那八小时，乃至十六小时，天天都是这样过的，他们难道不感气闷吗？

地上是一洼一洼的水，一不小心便会溅得一足的黑水。头上是洒洒落落的水点，不时的像秋雨似的滴下。闷热极了。个个人出汗，我连内衣都湿透了。

"难道是矿里没有通风的设备么？"我问领导的一位技师道。

"原是有的，因为矿中还凉快，所以没有用。您看，这里的工人们都还穿着衣衫呢。山里面的那一矿，因为热，工人们都是一丝不挂。"

一处有电光射出。我们到了那里，如黑夜独行，见到了孤村农屋里的灯光一样的喜悦。这里是电机所在，管理升降机的机关。过此，又没有电灯了。

前面又有熊熊的火光，还有叮叮当当的打铁的声音。

"那是挖掘矿石的器具的临时修理处。"

闷塞在四百呎的地下穴，在数百千热度的高热的火炉边立着，蒸薰得人不能不焦躁。立刻的离开了。走了好远的一段路，才不感到其热。

在黑暗中又走了好久，总有半点多钟，才走到现在工作着的掘煤的地方。刚才所走的都是交通道。

有许多工人在不停的工作着，裸着上体的居多。一锹一锹的向煤壁上斫去，有松软的，立刻便一块块的落下，有坚硬的，便非挖了几个洞，放入火药去炸落它不可。那工作是万分的危险。但每天的工资至多还不到四毛钱！每天至少要在危险的地下四百呎的穴中八小时！

看来挖煤的工作还不难，我便向一个工人借得一柄鹤嘴锹，也向壁上挖掘了几分钟。双臂还不大吃力。但煤屑飞溅在脸上，有点痛。有一次，溅入口中，有一次则飞入眼皮里去，很不好受。只好放下锹，向他谢谢。

他只有两个眼白是白得发亮，一脸一身都是黑炭的黑。他朝我笑笑。我觉得很难过。

大家实在受不住那闷热，都催着快走回去。路上隆隆的车声在飞驶着。老远的便喊它停住，否则一定会撞在身上的。我们都走在路轨上。

到了升降机边，才轻松的叹了一口气。呜呜呜的，升降机向上升！四壁都是发亮的煤块。渐渐的有些亮光，快到地面了！更是松了心。

当我们走出了升降机时，恍如再履人世。

“假如这矿里过的生活是人的生活，那末，我们过的实在不是人的生活……”仿佛谁在叹道。

“九渊之下，更有九渊，”谁知道矛盾的人间是分隔着怎样的若干层的生活的阶级呢。

比较起来，我们能不说是罪人么？仍旧换了一次火车才回到大同。

七月十四夜铎寄

六　大同的再游

十五日十时余，坐人力车到南寺去。由云岗带来的疲倦，这时已完全肃清了。大家又都是兴致勃勃的。只留下文藻，他因事没有同去。为了坐怕了载重汽车，它是那样的咆吼着颠簸着走，故改坐人力车，果然舒服安逸得多。

穿过城，到了南门的城墙边，一个很大的广场，积水满之，水上都浮着绿垢。这广场的北首便是所谓南寺了。寺的气象较上华严寺尤为弘伟。大门的金刚神后面，立着几座石碑，完好如新，但碑座都已为尘土所埋没。一为皇统三年朱弁所作，大定十六年三纲寺主沙门惠蹰所立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一为明昌元年三纲寺沙门法晖所立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第一碑有云：“辽末以来，再罹锋烬，楼阁飞为埃坋，堂殿聚为瓦砾。前者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又有万历、崇祯、乾隆各代的重修的碑记。崇祯碑已渐折倒在地上。

乾隆五年的一碑云：“始于唐玄宗元年间，名之曰开元寺。……正统中更名善化寺。”是此寺凡三易名；在唐为开元寺，辽金为普恩寺，明为善化寺。南寺盖其俗称也。

大殿上，正座有佛像五尊，作风和上华严寺的略同，像后的火焰也极细致，殿的东西，各有十二立像，除四大金刚外，有菩萨像，有女像，菩萨像，有怒目的，有慈祥的，有欣喜的；女像则大都端庄美好；其中有鬼子母像，也并无凶狠之态。这二十四尊塑像

是无价的宝物：宋金时代的文臣武将，命妇闺秀的衣冠装束，几皆保存在这里。那服饰，和唐代的不同，和元以后的也不同。特别是，妇人们的穿戴，从头上直到脚下，无一不是考古者重要的资料。这些像，虽没有下华严寺的生动可爱，在古物学上的价值，反倒过之。当然未必件件衣物都和宋金时代的实物绝对无殊，却不会是象今日戏装似的不古不今。

大殿里也保存了一部分的壁画。东壁，后壁的画，都已被毁掉，厚厚的被涂上一层的红色石灰粉。西壁的画尚大致完好；殿门里面的两小堵的壁，也还保存了一部分。那些壁画，沾满了灰土，金碧皆失色。以手指用力拭擦去画像的冠上衣带上的尘垢，其金色也仍可焕然发光。所画拙重伟大，有的地方，较上华严寺的好多了。如果有被后人涂饰的话，则最后的一次涂饰，必不会在乾隆之后的。

这寺的大殿也是辽代的遗物。在中国的木建筑物里，恐怕没有更古于这寺和上下华严寺的了。虽数经焚劫，大殿却不曾烧毁。

大殿前有大钟亭一，钟为天顺五年"成都府化缘僧道中"所铸，言重"三千三百三十三斤"。很巧的，现在的住持，也是四川人。他极为穷苦，但信念至坚。双手都仅剩一指，其余八指皆被他自己斫下，用血写经，体貌清瘦，谈吐文雅，久于行脚，无远不至，殆真实的视世上的荣华富贵如行云流水者。

次到久胜楼；楼在城的中心酒楼巷，今改为德华春饭庄，又将"久"字用纸贴了，改写"长"字，变为长胜楼，相传此地即为明武宗时李凤姐卖酒的地方。为世人所艳称的"游龙戏凤"一幕喜剧，就是在这个地方表演的。说来，仿佛是凿凿有据。凤姐实有其人。今居庸关的山上，尚有凤姐墓。据说，她入关时见了"塔

座”上雕刻的金刚像的狞恶之状，一惊而亡，故即葬于关上。相传的《梅龙镇》一戏，本为弋阳腔，也许在明代便已有之。乾隆时，唐英改之为崑剧。清末，则凡为皮黄班，便无不会演《梅龙镇》的了。

次到天主庙，庙靠近东门边，贺渭南君向人打听了来，说是辽萧太后梳装台遗址，即在庙内。但遍觅不获。庙祀昊天大帝；旁有三皇殿，为扶乩之所。又祀所谓“万仙领袖孙祖师”。

庙前有五龙壁一座，规模较九龙壁为小。在这个地方，照壁之使用塑龙的彩色玻璃砖，竟成了一种风尚。

仍坐人力车，出东门，访曹福祠。曹福为一个忠心的老仆人，他和他的主人的小姐，因避祸逃到小姐未婚夫家里去。一路上受尽了风波，虎狼之险。走到这个地方，天空下了一场大雪，走不动路，他老人家便僵死在雪中。土人为之立祠塑像。今皮黄戏中有《南天门》一出，演的便是其事。

将到曹福祠时，得过玉河。但人力车过不去。冰心他们坐了一辆驴车过去。我们找了几个人背过水。水流极湍急，目为之眩，伏在驮者的背上，不敢动，仿佛便要倒下来。水声哗哗满耳。好容易渡了过去，才松了一口气。

此庙本名玄都观，正殿下的一所小祠，祀的便是曹福。福像塑得很有精神。壁上皆画福的故事，和戏里所演的颇同，当是从戏中故事取得的。

庙的基地为一高台，有雉堞似的东西，环于四周。似为就一堡垒而改建的，我们在墙头上走了一周。有人指点道，西边的一个大村落，便是平城古城的所在地。汉，刘邦被匈奴围困了七日，后用陈平计，始得解围，即为其地。

归途，将往玉河边，看镇河铁牛，因车夫走错了路，在泥泞中

跋涉了半天，终于没有去成，只好回家。

下午偕文藻同至南寺。因我们归时，向文藻艳称南寺塑像壁画之美，他的游兴为之动。同时，我也还想再去仔细的瞻仰一番，便伴了他再去一次。

第二次的巡览，只有更炽盛了我的赞叹之念。太阳淡淡的照在墙上，大殿内外，寂无人声。仅我们二人，并住持而三耳；孤影零落的照在地上，显得格外凄凉。两廊皆只剩下破瓦颓垣。

出庙门时，见有几个无赖子，蹲在那折断了的崇祯碑石旁，以碑为桌，赌棋子为戏，赌兴正浓。

预定今夜十一时开车赴丰镇，十二时可到，但那时，我们想都已熟睡了。

十五日夜

七　从丰镇到平地泉

十六日，五时起身遇见老同学郑秉璋君，在此地为站长。他昨夜恰轮着夜班，彻夜未睡，然今天九时左右，仍咯着我们，出去游览。丰镇无甚名胜，岐王山的闹鸡台及长城的得胜口因离站太远，未去游。此地连人力车都没有。步行过镇，沿途所见，与大同完全不同。大同是一个很热闹的城市，古代文化的遗迹又多，很可以留连忘返。这里却一点令人可游的地方都没有。目的是走向镇的东北隅的灵岩寺。几乎是穿过全镇。过平康里，为妓女集居之处。文庙已改成民众教育馆，但大殿仍保存，柱下的础石，作虎头状，很别致。又过城隍庙，庙前高柱林立，柱顶多饰以花形，不知作何用。在张家口大境门外的一庙，仅见二柱，初以为系旗杆，这里却多至数十，殆为信心的男女们所许愿树立者欤？

庙前广场上，百货陈列，最触目惊心者为鸦片烟灯枪，及盛烟膏之罐，大批的在发售。几乎无摊无此物；粮食摊子反倒相形见绌。同行者有购烟灯归来作纪念的。但我不愿意见到它，心里有什么在刺痛！

沿途，烟铺甚多，有专售烟膏的，也有附带吃烟室的；茶食铺兼营此业者不少。旅馆之中，更不用说了。我们走进一家小茶食店，他们的门前也挂着竹篾做的笊篱式的东西作为标识，上贴写着“净水清烟”“君子自重”的红字条。店伙们正在烟榻旁做麻

花。一个顾客则躺在榻上洋洋自得的在吞吐烟霞，旁若无人。此人不过三十岁左右。“你们自己也吃烟么？”我问一个店伙道。

“不，不，我们那里吃得起。”

又走过一家出售烟膏的大店，店前贴着大红纸条，写道“新收乳膏上市”。

“新烟卖多少钱一两呢？”

“大约二毛钱一钱。”店伙道。他取出许多红绿透明洋纸包的烟膏道：“一包是二十枚，够抽一次的。”

我们才知道穷人们吃烟是不能论两计钱的，只有零星的买一包吃一顿的。

过市梢头，渐渐现出荒凉气象。远见山上有一庙独占一峰顶，势甚壮，我们知道即灵岩寺了。

灵岩寺从山麓到山顶凡九十九级，依山筑寺，眺望得很远。庙的下层为牛王庙，供的是马王，牛王。只是泥塑的牛马本形而已。这天恰是忠义社（毡毹业的同业会社）借此开会祭神，正中供一临时牌位是：

“供奉毡毹古佛神位”

人众来得很热闹。最上一层，有小屋数间，屋门被锁上，写的是“大仙祠”。从张家口以西，几乎无地无此祠。祠中供的总是一老一少的穿着清代袍褂的人物，且讳言狐狸。其信仰在民间是极强固的。

在最高处远望，为山所阻，市集是看不见的，仅见远山起伏，皆若培塿，不高，也不秀峭。秉璋指道：“前面是薛刚山，传说，薛刚逃难时，尝避追兵于此山。”此山也是四无依傍的土阜。中隔一河。因有曹福祠过河的经验，故不欲往游。

“听说，这一带罂粟花极盛，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问道。

“那一片白色的不是么？”

远望一片白花，若白毡毯似的一方方的铺在地上，都是烟田。

这时正是开始收割的时候。

“车站附近也有。”

下午，午睡得很久。五时许，天气很凉快，我们都去看罂粟花及收烟的情形。离站南里余，即到处都是烟田，有粉红色的，有大红色的，有红中带白的，惟以白色者为最多。故远望都成白色。花极美丽，结实累累，形若无花果。收烟者执一小刀，一小筒，小刀为特制的，在每一实上，割了一道。过了一会，实上便有乳白色的膏液流出。收烟者以手指刮下，抹入筒口，这便是烟膏了。每一果实，可割三四次以上。农人们工作得很忙。

“你们自己吃烟么？”我们又以这个问题问之。

“我们那里吃得起！”

看他们的脸色，很壮健，确乎不像是吃烟的。其中大部分都是短工，从远地赶着这收烟时节来作工的。

夜里，车开到平地泉。

十七日，七时起床。在车站上，知道前几天的大雨，已把卓资山以西的铁路都冲坏了，正在修理，不能去。绥远主席傅作义的专车，也已在此地等候了好几天。冲坏的地方很多。听说，少则五日，久则半月，始可修复。我们觉得在车上老等着是无益的，所以想逛完平地泉便先回家。这封信到了家时，人也许已经跟着到了。

九时，傅作义君来谈，因同人中，有几位是曾经有人介绍给他的。当路局方面打电报托他照料时，他曾经来电欢迎过。他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军人，以守涿州的一役知名。很想做一点事。

其田问他关于烟税的问题，有过很公开的谈话。他说：绥远省的军政费，收支略可相抵，快用不到烟税。烟税所入，年约一百万元，都用在建设及整理金融方面。现在绥远金融已无问题，皆由烟税方面收入的款去整顿。所以烟税的废除，在省府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只要中央下令禁止，便可奉命照办。惟中央现在已有了三年禁绝之令，现正设法，从禁吸下手，逐渐肃清。如不禁吸，则此地不种，他省的烟土必乘隙而入，绥晋的金融必大感困难。这话也许有一部分的理由。听说绥远的种烟，也是晋绥经济统制政策之一。绥晋二省吸烟的极多；如不自种自给，结果是很危险的。同时，白面、红丸之毒最甚，不得已而求其次，吃鸦片的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法。山西某氏有"鸦片救国论"的宣布，大约其立论的根据便在于此。但饮鸩止渴，决非谋国者的正当手段，剜肉补疮，更是狂人的举动。不必求其代替物，只应谋根本禁绝之道。但这是整个中国的大问题。

二时许，游老鸦嘴（一名老虎山），山势极平衍。青草如毡，履之柔软无声。有方广数丈的岩石，突出一隅，即所谓老鸦嘴也。岩上有一小庙，一乞丐住于中。登峰顶四望，平野如砥，一目无垠，一阵风过，麦浪起伏不定，大似一舟漂泊大海中所见的景象。

"平地泉"的名称，确是名副其实。塞外风光，至此已见一斑，天上鸦鸽轻飞，微云黏天，凉风徐来，太阳暖而无威，山坡上牛羊数匹，恬然的在吃草。一个牧人，骑在无鞍马上，在坡下放马奔跑，驰骤往来，无不如意。马尾和骑士的衣衫，皆向后拂拂吹动，是一幅绝好的平原试马图。我为之神往者久之。山上掘有战壕及炮座，延绵得很长；闻为晋军去年防冯时所掘。

冯玉祥曾在此驻军过；今日平地泉的许多马路，还是冯军遗

留下的德政。但街道上苍蝇极多，成群的在人前飞舞。听说，从前此地本来无蝇。冯军来后，马匹过多，蝇也繁殖起来。

路过一打蛋厂，入内参观，规模颇大。有女工数十人，正在破蛋，分离蛋黄、蛋白。蛋黄蒸成粉状；蛋白则制成微黄色的结晶片。仅此一厂，闻每日可打蛋三万个，每年可获利三四万元。车站上正停着装满了制成的蛋的一车，要由天津运到海外去。惜厂中设备，尚未臻完美。如对空气，日光等设备完全，再安上了纱窗纱门，则成效一定可以更好的。

傍晚，在离车站不远的怀远门外散步。“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这诗句正描写着此时此地的景象。牛群，羊群过去了，又有一大群的马匹，被赶入城内。太阳刚要西沈，人影长长的被映在地上。天边的云，拥挤在地平线上，由金黄色而紫、而青、而灰，幻变无穷。原野上是无垠的平，晚风是那样的柔和。车辙痕划在草原上，像几条黑影躺在那里。这是西行以来最愉快的一个黄昏。古人所谓“心旷神怡”之境，今已领略到了。拟于夜间归平，我们后天便可见面了。

十七日夜

八　归绥的四“召”

这次是直接挂车到绥远的，中途并不停顿。所要游览的鸡鸣山及居庸关，都只好待之归来的时候了。八日八时许由清华园开车。九日十时十分到绥远省城。沿途无可述者。惟经过白塔车站时，可望见白塔巍然屹立。此塔为辽金时所建，中藏《华严经》万卷。清初尚可登览。张鹏翮《漠北日记》云：“七级，高二十丈，莲花为台砌，人物斗拱，较天宁寺塔更巍然。内藏篆书《华严经》万卷，拾级而上，可以登顶。嵌金世宗时阅经人姓名，俱汉字。”今则塔已颓败，不可登。《华严经》殆也已散失，无存的了。

正午，到城南古丰轩吃饭，闻此轩已历时二百余年；有烙甜馅饼的大铁锅，重至八百余斤。下午，将行装搬下车，到绥远公医院暂住。傅作义氏来谈得很久。他就住在邻宅。

十日，上午八时，乘汽车到城内各“召”游览。

锡拉图召（一作舍利图召）在城南，为绥远城内最整洁的一庙。听说，财产最多，尚可养活不少喇嘛。故不现出颓败的样子。还有一座庙，在召河附近，是这里的大喇嘛夏天的避暑所在。

此召，寺额名延寿寺。大殿分前后二部。前部完全是西藏式的“经堂”，为喇嘛们唪经的地方，柱八，皆方形，硃红色，又有阁楼。堂的正中，有大座椅，是活佛讲经处。今日尚有破碎的“哈达”不少方抛在那里。三壁都画着壁画，除特殊的藏佛数像外，余皆和内地的壁画不殊，大体皆画释迦佛的生平。

后部是“佛堂”，供着五尊佛。三壁都是藏经的高柜。

殿后，有楼，似为从前藏经的地方。但现在是空着，正中供观音，东边供关羽。

我问看庙的人说，这庙什么时候造的？说是明朝。

我也很疑心是明代的古庙。“经堂”的一部却是后来添造的。它和后半部的建筑是那样的不调和。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式样的汉藏合璧的建筑。

十时，到小召，即崇福寺，蒙名巴甲召。“巴甲”就是“小”的意思。规模很弘伟，并不小。清圣祖西征时，曾驻跸在此“召”。今有纪功碑在着。

碑云：城南旧有古刹，喇嘛拖音作而新之，奏请寺额，因赐名崇福寺。经堂及佛殿的结构，和锡拉图召相同。此“召”原由古刹改造，可证实我的“经堂”为后来新增的一说。

经堂的柱，圆形，亦作硃红色，亦有楼围绕之。

寺甚颓败。盖布施日少，喇嘛不能生活，都去而他之。

寺内藏有圣祖的甲胄一副，也是他西征时留置在寺里的。

寺门口有小学校一所，额悬“归绥县第二代用小学校”。书声琅琅。我们进去参观。教师不在校。学生数十人，所读皆《百家姓》，《三字经》，《四书》，《左传》等老书。但墙上贴着他们的窗课，除了五七言诗之外，大体都是应用的文字，象“家书”，“合同”等等。这当是很有用处的练习。这些“私塾”，其作用大约全在于此。正是应了小市民的这个需要而存在着的。

次到“五塔召”。即慈灯寺，在小召东南。颓败更甚。管“召”者为鸦片瘾极大的人，慢吞吞走来开门。大殿无甚可观。一般人所要参观的，都是那所谓“五塔”的。塔基，围十丈。上有五塔，皆建以炼砖。花纹雕刻极纤美。我们由黑漆漆的洞中，走了

上去。可望见后街的平康里。砖上尚附有金彩，但大部分则均已剥落。寺建于雍正五年，故亦名“新寺”。

次到“大召”，额题“古无量寺”，周围占地四亩余。门口又悬“九边第一泉”额。泉在寺前百余步，今名玉泉井。寺的收入极少，故将前殿租给了商贩，辟作共和市场。大类北平的隆福寺，苏州的玄妙观。

大殿里的菩萨立像，都是细腰的，甚类大同的辽代之作，但身材太直，太板，没有下华严寺的菩萨像的美丽，其制作或在元明间吧。大佛像后，有铜制的小喜欢佛一尊，视为神秘，须执灯去看。像为狞恶的喜欢佛，足踏一牛，牛下则为一女。

这所庙宇，经堂和佛殿的不融合的痕迹，分得最清楚，“经堂”极显明的，可见出其为后建的。佛殿的前檐，有一半是成了经堂的屋顶；被挤塞在那里，怪不调和的。后面的楼阁，也出租于商人们。一灯荧然，有人正在那里吃鸦片烟。

这时，已经十二时多了。赶快的上了汽车，赴阎伟氏的召宴。

下午三时，到民政厅，观西太后出生处。今有亭，名懿览。四围花木甚多，较政府为胜。

次到第一师范，观公主府。府虽改为学校，遗物及匾额有存者。康熙写的，有“静宜堂”一额；公主自写的，有“静定长春”一额。西边有一小屋，中尚存公主的神牌，上书“公主千岁千千岁”，及佛幡佛经等。闻佛经即为公主生时所诵念的。公主为圣祖的姑母，康熙间，下嫁给额驸策伦敦笃。土人称她为黑蚌公主。关于她的传说很多。她的后人尚多；到现在，每年还派人来祭供一次。

归时，灯火已零星的闪耀着。

睡得很早；明天一早，便要动身到百灵庙。

八月十日九时发

九　百灵庙之一

十一日清早，便起床。天色刚刚发白。汽车说定了五点钟由公医院开行。但枉自等了许久，等到六点钟车才到。有一位沈君，是班禅的无线电台长，他也要和我们同到百灵庙去。

同车的，还有一位翻译，是绥远省政府派来招呼一切的。这次要没有傅作义氏的殷勤的招待，百灵庙之行，是不会成功的。车辆是他借给的，还有卫士五人，也是他派来保卫途中安全的。

车经绥远旧城，迎向大青山驶去。不久，便进入大青山脉，沿着山涧而走，这是一条干的河床。乱石细砂，随地梗道。砂下细流四伏，车辙一过，即成一道小河，涓涓清流，溢出辙迹之外。我们高坐在大汽车上，兴致很好，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朝阳的光线是那末柔和的晒着。那长长的路，充满了奇异的未知的事物，继续的展开于我们的面前。

走了两小时，仍顺了山涧，爬上了蜈蚣坝。这坝是绥远到蒙古的必经的大道口。路很宽阔，且也不甚峻峭，数车可以并行。但为减轻车载及预防危险，我们都下车步行。到了山顶，汽车也来了。再上了车，下山而走。下山的路途较短，更没有什么危险。据翻译者说。这条山道上，从前是常出危险的。往来车马拥挤在山道上，在冬日，常有冻死的，摔死的。西北军驻此时，才由李鸣钟的队伍，打开山岩，把道路放宽，方才化险为夷，不曾出过事。这几年来，此道久未修治，也便渐渐的崎岖不平了。但规

模犹在，修理自易。本来山口有路捐局，征收往来车捐。最近因废除苛捐杂税的关系，把这捐也免除了。

下了坝，仍是顺了山涧走。好久好久，才出了这条无水的涧，也便是把大青山抛在背后了。我们现在是走在山后。颉刚说苏谚有"阴山背后"一语，意即为："某事可以不再作理会了。"可见前人对于这条阴山山脉是被视作畏途很少人肯来的。

但当我们坐了载重汽车，横越过这条山脉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一个荒芜的地方。也许比较南方的丛山之间还显得热闹，有生气。时时有农人们的屋舍可见。——但有人说，到了冬天，他们便向南移动。不怎么高峻的山坡和山头，平铺着嫩绿的不知名的小草，无穷无尽的展开着，展开着，很象极大的一幅绿色地毯，缀以不知名的红、黄、紫、白色的野花，显得那末样的娇艳。露不出半块骨突的酱色岩来。有时，一大片的紫花，盛开着，望着象地毯上的一条阔的镶边。

在山坡上有不少已开垦的耕地。种植着莽麦、油麦、小麦以及罂粟。莽麦青青，小麦已黄，油麦是开着淡白色的小花，罂粟是一片的红或白，远远的望着，一方块青，一方块黄，一方块白，整齐的间隔的排列着，大似一幅极弘丽的图案画。

十一时，到武川县。我们借着县署吃午饭。县长席君很殷勤的招待着。所谓县署，只是土屋数进，尚系向当地商人租来的。据说，每月的署中开支，仅六百元。但每年的收入却至少在十万元以上。其中烟税占了七万元左右。

赵巨渊君忽觉头晕腹痛，吐泄不止。我们疑心他得了霍乱，异常的着急。想把他先送回绥远。又请驻军的医军官来诊断。等到断定不是霍乱而只是急性肠炎时，我们方才放心。这时，大雨忽倾盆而下，数小时不止。我们自幸不曾在中途遇到。天色

渐渐的暗了下来。这天的行程是决不能继续的了。席县长让出他自己的那间住房，给我们住。但我们人太多。任怎样也拥挤不开。我和文藻其田到附近去找住所，上了平顶山。夕阳还未全下。进了一个小学校，闲房不少，却没有一个人，门户也都洞开，窗纸破碎的拖挂着，临风簌簌作响。这里是不能住，附近有县党部，那边却收拾得很干净，又是这一县最好的瓦房。我们找到委员们，说明借宿之意时，他们毫不犹预的答应了；且是那样的殷殷的招呼着。冰心、洁琼、文藻、宣泽和我五个人便都搬到党部来住。烹着苦茶，一匙匙的加了糖，在喝着，闲谈着，一点也不觉得是在异乡。这所房子是由娘娘庙改造的，故地方很宽敞。据县长说，每年党部的费用，约在一万元左右。但他们的工作，似很紧张，且有条理，几个委员都是很年青，很精明的。

这一夜睡得很好。第二天清早，便听见门外的军号声。仿佛党部的人员们都已经起来。这天(十二日)是星期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早起。等到我们起床时，他们都已经由门外归来。原来是赴北门外的“朝会”的，天天都得赴会，县长，驻军的团长以及地方办事人员们，都得去。这是实行新生活运动的条规之一。

九时半，我们上了汽车，出县城北门，继续的向百灵庙走。沿途所经俱为草原。我们是开始领略到蒙古的景色了，风劲草平，牛羊成群的在漫行着。地上有许多的不知名的黄花，紫花，红花。又有雉鸡草，一簇簇的傲慢的高出于蒿莱及牧草之群中，据说，凡雉鸡草所生的地方，便适宜于耕种。

不时的有黄斑色的鸟类，在草丛里，拍拍的飞了起来。翻译说，那小的是“叫天子”，大的是“百灵鸟”。在天空里飞着时，鸣声清婉而脆爽，异常的悦耳。北平市上所见的百灵鸟，便产在这些

地方。大草虫为车声所惊，也展开红色网翼而飞过，双翼嗤嗤嗤的作声。那响声也是我们初次听闻到的。又有灰黄色的小动物，在草地上极快的窜逃着过去，不像是山兔。翻译说，那是山鼠。一切都是塞外的风光。我们几如孔子的入周庙，每事必问。充满了新崭崭的见与闻。虽是长途的旅行，却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十一时，到保商团本部，颉刚、洁琼他们，下去参观了一会。这保商团是商民们组织的，大半都是骑兵，召募蒙人来充当，很精悍。这一途的商货，都由他们负责保护安全。

十二时，过招河，到了段履庄。这里只有一家大宅院，是一个大百货商店，名鸿记，自造油，酒，粉，面，交易做得极大。有伙计二百余人。掌柜人的住宅，极为清洁。屋顶上晒着不少米面，那都是贩运给蒙人食用的。在那里略进饼干，喝了些热水，便是草草的一顿午餐。

由鸿记上车，走了两点多钟，所见无异于前。但牛群羊群渐渐的多了，又见到些马群和骆驼群，这是招河之东的草原上所未遇的。最有趣的，是，居然遇见了成群的黄羊(野羊)，总有三四百只，在山坡上立着。为车的摩托声所惊，立在最近的几只，没命的奔逃着去；那迅奔的姿态，伶俐的四只细腿的起落，极为美丽。翻译说，野羊是很难遇到的。遇者多主吉祥。三时，阴云突在车的前后升起。"快有雨来了，"翻译说。果然，大滴的雨点，由疏而密的落下。扯好了盖篷，大家都蛰伏在篷下，怪闷气的。车子闯过了那堆黑云，太阳光又明亮亮的晒着。而这时，远远的已见前面群山起伏，拥在车前。翻译指道："那一带便是乱七八糟山——这怪名字是他自己杜撰的，他后来说——这山的缺口，便是九龙口，我们由南口进去。在这四山的包围之中的，便是百灵庙。"我们登时都兴奋起来，眼巴巴的望着前面。前面还只是乱

山堆拥着，望不见什么。

三时半，进了山口，有穿着满服的几个骑士们，见了汽车来，立刻策马随车奔驰了一会，仿佛在侦察车中究竟载的何等人物似的。那骋驰的利落，自如，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好景。跟了一会，便勒住马，回到山口去。

而这时，翻译忽然叫道："百灵庙能望见了！"一簇的白屋，间以土红色的墙堵；屋顶上有许多美丽的金色的瓶形饰物，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

我们的车，在一个"包"前停下。这"包"装饰得很讲究，地毯都是很豪华的。原来是客厅。其组成，系先用许多交叉着的木棒，围成穹圆形，然后，外裹以白毡，也有裹上好几层的，内部悬以花布或红色毡，地上都铺垫了几层的毡。上为主座。中置矮案，案下为沙土一方，预备随时把垃圾倾在其中。隔若干日打扫一次。居者坐卧皆在地毡上。每一包，大者可住十余人，我们自己带有行军床。铺设了起来，又另成一式样。占了两包，每包住四人或五人，很觉得舒畅。比局促在河东商店的厢屋里好得多了。大家都充溢着新奇的趣味。

七时，天色忽暗，一阵很大的雹雨突然的袭来。小小的雹粒，在草地上迸跳着，如珠走玉盘似的利落。但包内却绝不进水。

雨后夕阳如新浴似的，格外鲜洁的照在绿山上，光色娇艳之至！天空是那末蔚蓝。两条虹霓，在东方的天空，打了两个大半圈，彩色可分别得很清晰。那彩圈，没有一点含糊，没有一点断裂。这是我们在雨后的北平和南方所罕见的；根本上，我们便不曾置身于那末广阔无垠的平原上过。

天色渐渐的黑了，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仅包内一灯荧然

而已。

不久便去睡。包外，不时的有马匹嘶鸣的声音传入。犬声连续不断的在此呼彼应的吠着，真有点像豹的呼叫。听说，蒙古的牧犬是很狞恶的。确比口内的犬看来壮硕得多。但在车上颠簸了大半天，觉得倦极，一会儿便酣酣的睡着。

半夜醒来，犬声犹在狂吠不已。啊，这草原上的第一夜，被包裹于这大自然的黑裳里，静聆着这汪汪的咆叫，那情怀确有点异样的凄清。

今天五点多钟便起，还是为犬吠声所扰醒。趁着大家都还在睡，便急急的写这信给你。

写毕时，太阳光已经晒遍地上。预备要吃早餐，不多说了。

八月十三日晚八时发

十　百灵庙之二

昨天，早餐后，一个人出去散步。在北面的一带山地上漫游着。山势都不高峻，山坡平衍之至，看不见一点岩石。足下是软滑滑的，一点履声都没有。那草原上的绿草简直便是一床极细厚的地毡，踏在上面，温适极了。太阳光一点都不热。山底下便是矮伯格河环之而流。

中途遇见保安处的军事教官刘建华君，随走随谈，谈得很久。他是东蒙人，参加过好几次的抗日战。这可伤心的往事，不能不令人想起来便悲愤交集。

上午往游百灵庙。百灵庙，汉名广福寺，占地极广；凡有大小佛殿及经堂十一座；大小的喇嘛住所一百数十处，共有六百余间屋，可容得下三千余众。但现在住着的，不过数百人。

庙为康熙时所建，圣祖西征，曾在这里住得很久。民国三年时，张治曾驻此，曾经过一次大战，庙全被焚毁，现在的庙，是民国十年后重建的。规模遂远逊于前。

正殿及白塔，正对着庙前的突出的一峰，这峰名女儿山。相传，康熙怕女儿山要产生真命天子，便特建此庙以镇压之。

殿门上有梵符，符傍，注着汉字云："凡在此符下经过一次者，得消除千百世之罪孽。"前殿之经堂，正中为班禅驻此时诵经处。四周皆壁画，气韵还好，当出于大同、张家口的画人手笔。画皆释迦故事；惟有数尊喜欢佛，较异于他处。后殿为供佛之所。

如来像的下方，别有头戴黄尖帽，身披黄袍的大小坐像数尊。其面貌和一般的佛像大异，鼻扁，额平，颧骨突出，极肖蒙人。初以为蒙佛，问了翻译，才知道是黄教祖师的真容。这位宗教改革家，在西藏史上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殿的东隅，置一金色的柱形物。分三层，为宇宙的象征。下层为地，作圆形；中层为水，亦圆形而有波浪纹；上层为天，作楼阁层叠状。水的四面，有二伞形及日，月二形。此亦藏物。

出正殿，又进几个佛殿去参观，规模有大小，而结构无殊。便也懒得去遍历十一殿了。

出庙，在山坡上散步。太阳光渐渐的猛烈起来，有点夏天的气候了。山顶有一白色石堆，插有木干无数，成为斗形。木干上悬挂着许多彩色的绸布，上有经文。此种石堆，名为“鄂博”，本为各旗分界之用，同时也成了祀神之所。我们坐在这“鄂博”的阴影下闲谈着。赵君说起蒙古所以定阴历三月二十一日为大祭成吉思汗日者，非为他的生忌死忌，而是他的一个特殊的战胜纪念日。是日为黑道日，本不利于出兵。但他每在黄道日出兵必败，特选这个黑道日出兵，遂获大胜。后人遂定这个奇特的日子为大祭日。

不觉的，太阳已经在天的正中了。我们赶快的向“包”而走回。饭后，午睡了一会。“包”内闷热甚，大有住在沙漠上的意味。

夜间，赵君请了两个奏乐的人来。因为只有两个人，故只能奏两种乐器。一吹笛，一拉胡琴。奏的音调，极似《梅花三弄》，但他们说，是古调，名《阿四六》。这种音调，我疑心确是由蒙古传到内地来的。次换用胡琴和马头琴合奏。马头琴是件很奇特的乐器。蒙名“胡尔”或“尚尔”。弦以马尾制成，饰以马首

形。相传系成吉思汗西征时所制的。每一弹之，马群皆静立而听。马头琴声宏浊悲壮，间以胡琴的尖烈的咿哑声，很觉得音韵旋徊动人，虽然不知道奏的是什么曲。最后，是马头琴的独奏。极慷慨激昂，抑扬顿挫之至，没有一个人不为之感动的。奏毕，争问曲名，并求重奏一次。他们说，这曲名“托伦托”，为成吉思汗西征时制。奏乐者去后，余兴未尽，又由韩君他们唱“托伦托”曲及情歌《美的花》。歌唱出来的《托伦托》曲较在乐器上奏的尤为壮烈，确具骑士在大平原上仰天长歌的情怀。《美的花》则若泣若诉，郁而不伸。反复的悲叹其情人的被夺他嫁。但叹息声里，也带着慷慨的气概，不那末靡靡自卑。

“包”内客人们散去时，已经午夜。盘膝坐得腰疼，走出“包”外，全身舒直了一下。夜仍是黑漆漆的，伸手不见掌，但天空却灿灿烂烂的缀着满空的星斗。银河横亘于半天，成一半圆形，恰与地平线相接。此奇景，不到此，不能见到。

十二时睡。相约明早到康熙营子去，又要去考察一般蒙人所住的“包”。

明日午后，尚约定看赛马会和“摔交”。

十四日上午自百灵庙发

十一　百灵庙之三

前昨二日由百灵庙寄上一信。此二信皆系由邮差骑马递送；每两天一班；每班须走三天才到绥远。故此二信也许较这封信还要迟到几天呢！

百灵庙地方，很可留恋。昨日（十四日）上午，七时方才起床，夜间睡得很熟，九时左右，乘汽车到康熙营子。相传该处为康熙征准格尔时的驻所。今尚留有遗迹，且有宝座。但遍觅宝座不见。四周大石重叠，果似营门。疑为附会之辞；因大石皆是天生，不大象人工所堆成。营子内，山势平衍，香草之味极烈，大约皆是蒿艾之属。草虫唧唧而鸣，声较低于北平之"叫哥哥"，其翼膀也较短。红翼的蚱蜢不断的嗤嗤的飞过。蒙古鹰成群的在山顶的蓝天上打旋。后山下有孤树二三株，挺立于水边。一个人独坐于最高的山上，实在舍不得便走开。可惜大家都在远处催促着，只得走了。香草之味尚浓浓的留在鼻中。

离开康熙营子，循汽车路去找蒙人住的蒙古包。走了好久，方才看见几个包。大约总是两个包成为一家。有山西老头儿，骑骡到各包索账。态度极迂缓从容。我们去访问一家。这家有二包，男人已经出外，仅有老母及妻在家，尚有一个汉人的孩子，是雇来看牛的。这家不过是中下之家，但有牛三十余匹羊百余只，包内也甚整洁。锅内有牛奶一大锅，食物架上堆满了奶皮，奶豆腐。火炉旁有一小火，长明不熄。由译人传语，知其老母为

七十五岁，妻为二十五六岁，男人为三十余岁。已结婚二三年，尚未有子女。被雇之幼童年约九、十龄，每日工资一角。老妇人背已驼，但精神尚健壮。其媳颇静好，语声甚低，手中正在作活计；闻为其婆所穿之衣。说话时，含羞低头，且仅简单的回答着。大约都是说“不知道”之类。有问，往往由其婆代答。我们要为他们摄影，但坚持不肯出包，等到我们出包上车时，他们又立在包前看。

下午，到河东商家去访问，河东有买卖十余家，主伙皆山西大同人，专做蒙古买卖。又有无线电台及邮局等机关。最老的商店有一二百年者；最大的一家集义公也有四五十年的历史，每年可赚纯利四五千元，其资本则仅千元。盖蒙古贸易，向不用钱，皆以货易货。商人以布匹，茶，糖等必需品卖给他们。到了第二年秋天，他们则以牛羊马匹偿还之，商人们可以获得往返的两重的利息，故获利颇丰，然近年竞争亦甚烈。有商号十余家，二三人，四五人一组的行商，也有一百余组，来往各包做买卖。每组所做，有多至数百十个包者。因地面辽阔之故，他们多以骆驼，马匹，骡子等代步及运货。亦有蒙人上商号去做买卖的。我们在河东，即见二蒙人执一狐皮来兜销，要价八元，然无人问津。

无线电台为政委会的，新由北平军分会运去，可通南京、北平、绥远及德王府等处。台长关君为东北大学毕业生。

二时，沿了百灵河，向山后走去，择一僻地，洗足擦身。水极清冽，沙更细软。跣足步行水中，很觉舒适。游鱼极多，见人皆乱窜而去。鱼极小，水中也无人钓鱼，故生殖至多。也有蛙，形体较小于内地。三时回。

十五日上午五时，即起床，天色尚未大亮。早餐后，太阳始出。六时半，开车。来送行的人仍不少。各有依依不舍之情意。

车将出九龙口，回望百灵庙，犹觉恋恋。庙顶的金色，照耀在初阳里，和庙墙的白色相映，觉分外的显得可爱，其美丽远胜于近睹。

有一喇嘛着红色衣，牵一白马，在绿色草原上走着，颜色是那样的鲜明。

途中遇见灰鹤成群，这和黄羊，同为罕见的动物。张君取出手枪，放了一响，灰鹤纷纷惊飞，飞态很美。其他马群，牛羊群及成群之骆驼则所遇不止一次，有一次，总有百来匹马见了车来，在车前飞奔而去，是那样的脱羁而逃。较赛马尤为天然可爱。

汽车道旁，有二蒙古包，是一家，有羊圈，已稍见汉化。此家有二女，皆未嫁，少女极姣美，头戴银圈，镶以红绿色的宝石珊瑚等，双辫悬前，缨络满缀于上，面色红白相融，是内地所罕见之健美的女子。我们徘徊了一回，即复上车。十一时，经过召河，绕道到普会寺，即绥远锡拉图召大喇嘛的避暑地。寺额为乾隆所写。寺凡三层，皆藏式，仅屋檐参以汉式。寺内结构和大召，小召等相同，也是经堂在前，佛殿在后。寺旁有二院落，极整洁，一院有高树二株。窗户皆用蓝色及绿色，而间以金色的圆圈及卍字等为饰。很别致。一旁厅悬有画马二幅，很古，似为郎世宁笔。惜门已锁上，不能进去参观。下午二时，过武川路，和县长及县党部诸君周旋了一会，即别。四时左右，过蜈蚣坝，车颠簸甚。五时半始到达公医院。计坐了十一小时的汽车，殆为生平最长途的汽车旅行。尚不觉甚倦。饭后，到旧城春华池沐浴，身体大为舒适。今夜当可有一觉好睡。

现已十二时，不再写了，明天还要早起到昭君墓。

六月十五日，夜十二时，写于绥远公医院

十二 昭君墓

早晨刚给你一信，现在又要给你写信了。

上午九时半早餐后，出发游昭君墓。墓在绥远城南二十里。希白、雷小姐他们都骑马去。我因为没有骑过马，只好坐轿车。车很干净，三面皆为黑色的纱窗。但道路崎岖不平，车轴又无弹簧，身体颠簸得利害。双手紧握着车窗或车门，不敢一刻疏忽。一疏忽，不是头被撞痛，便是手臂或腿部嘭的一声，被撞在车门上。有时，猛烈一撞，心胆俱裂，百骸若散。好在车轮很高，相距亦阔，还不至演出覆车的危险。有马队四人，带了手提机关枪，来保护我们；因为前日城内出过抢案。骡夫走得很慢，骑马的人不时的休息下来等着我们。十时三刻，才到小黑河。水不深，还不到尺。十一时一刻，到民丰渠。浊流湍急，不测深浅，渡河时，人人皆惴惴危惧。一个从者的马匹倒了下去，骑者浑身俱湿。幸渠身不大宽，河水也至多只有两尺多深。大家都不曾再出危险。骡车也安稳的渡过。据说，春时，汽车可达。此时水深，除马及骡车外，无法渡过。十一时三刻到昭君墓。墓甚高，据说有二十丈，周围数十亩。土色特黑，草色青翠，多半是香蒿，高及人腰，香味极烈。墓前列碑七八座，最古者为道光十一年长白升演所书之“汉明妃冢”及他的碑阴的题诗。次有道光十三年长白，珠澜的碑。次有戊申年耆英的碑。此外皆民国时代的新碑。民国十二年立的马福祥的墓碑云：《辽史地理志》：“丰州下则曰青

冢，即王昭君墓。据此则昭君墓之在丰州，已无疑义。又考清初张文端《使俄行程录》云：归城化南直书有青冢，冢前石虎双列，白石狮子仅存其一，光莹精工，必中国所制，以赐明妃者也。又有绿琉璃瓦砾狼藉，似享殿遗址。”民国十九年冯曦的一碑，最为重要：

“岁庚午，清明后十日，海礁李公召集军政各长议定植树冢右。始掘土获梵文经卷，随风湮灭。既而石虎，木柱现，而零星璃瓦，碧苔叠篆，犹不可更仆数。知古人于冢有实右大招提在。”

冯氏所推测的大致很对，张氏所云，享殿遗址，必是大招提的遗址无疑。“中国所制，以赐明妃者也，”语尤无根。惟清初已破败至此，则此遗址至晚必为辽金时代的遗物。惜未获碑文，无从断定。但此冢孤耸于平原上，势颇险峻，如果不是古代一个了望台，则也许是一个古墓。至于是否昭君之墓，则不可知了。他日也许能够发掘一次以定之。此望台或古墓的时代当较右有的庙宇为古。石虎一只，今尚倒在田陇间，极粗朴，似非名贵之物。昭君墓，包头附近尚有一座（闻西陲更有一座）。依常理推之，汉时绥归，尚为中土，明妃决不会葬在这个地方的。但青冢之说，唐人的《王昭君变文》里已提及之，有“青冢寂辽，多经岁月”的话。元人马致远有《沈黑水》明妃《青冢恨》，《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一剧，黑水青冢，皆见于此。冢南的大黑河殆即所谓黑水，（《元曲选》说白中，指黑水为黑龙江万无是理。）其后明人的《和戎记》，《青冢记》诸传奇也都坐实青冢之说。究竟有此富于诗意的古址，留人凭吊，也殊不恶。休息了一会，即登冢上。仅有小路，沿山边而上，宽仅容足，一边即为壁立数丈的空际。“一失足成千古恨”，走时，很小心。半山有极小的大仙祠一所。据说，中为一洞，甚深。从前游人们常从大仙借碗汲水喝，今已不能借到了，

闻之，为之一笑。冢上白土披离，似为雨冲刷的结果。仅有此方丈之地不生草。四边仍为黑土及绿草。南望，即大黑河，今已枯浅。北望大青山脉，绵延不断，为归绥的天然屏障。西北方即归绥的新旧城所在。太阳光很猛烈。徘徊了一会，方下山。在碑阴喝水，吃轻便的午饭。我先坐骡车走。骡夫说，青冢一日有三变，一变似馒头，再变为盖碗，第三变则他已忘记了。骡夫为一老头儿，他说，现年五十六岁，十余岁时已业此，至今已四十余年了。他慨叹的道："前清的生意好做，民国时是远不如前了。洋车抢了不少生意去。"他似对一切新事物都抱不愤。有自行车经过，骡为所惊。他便咒诅不已。他又说："这车已经三天不开张了。"我问他："是你自己的车么？"他说："不，我替人赶的；买卖实在不好做。每月薪水二元，吃东家的，有时，客人们赐个一毛五分的。东家一天得费五毛钱养车。净赔。卖了也没人要。从前有七八百辆，如今只存二百九十多辆了。"他脸上满是烟容。我问他："你吃烟么？"他点点头。"一个月两块钱的工钱，如何够吃烟？"他道："对付着来。"

骡车在入城的道上，因骡惊，踢翻了一个水果担子。他道："不要紧，我赔，我赔。"结果赔了一毛钱。他似毫不容心的，还是笑着。水果贩子还要不依。我阻止了他。骡夫却始从容而迂缓。若不动心的。等到回到公医院，我给了三毛钱的赏钱。

"是给我的么？"他有点惊诧。

"给你做赏钱。"

他现了笑容，谢了又谢，显出感激的样子。

这可爱的人呀！世事在他看来，是怎样简朴而无容思虑。

回望昭君墓，仅见如三角台形似的一堆绿色土阜。同行的王副官说，这青冢，冬天草枯时，也并不显出土色，远望仍是

青的。

这一天实在是太辛苦了。为了这末一个土阜或古墓，实在不值得写这封信。但又不能不对你诉苦。双腿为了支配的不得当，或盘膝，或伸直，直被颠播得走路都抬不起来，软软的好像大病方愈。

最后，还有一件事要说。到昭君墓去的途中，见有不少德政碑。又有禧神庙一所，在路右，已破烂不堪，为乞丐们所占据。然在门外望之，神像虽已不存，而两壁的壁画颇佳，皆清代衣冠，作迎亲送亲的喜祥之进行队，是壁画中所仅见者。

八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发

十三　包头

十七日晨五时起床，六时半到绥远车站，预备向包头走。因二次车迟到的缘故，等到八时半方才开车。车沿大青山脉而走。山色黑绿斑斓若虎皮纹，太阳照射其上格外的现出复杂的彩色。和康庄附近的山色正相同。远远的望见浊流一线，和田野的积水之清莹，白洁者正相映照。这浊流便是黄河。到磴口，可望见民生渠。十二时，到包头，周站长及七十师派来招待的参谋吴泽君都到车上来谈，吴君极有风趣，好说笑话。一时半坐车到城内新生活改进社，找段承泽君，段君为此地实业界的巨子，他主持电灯面粉公司，能用新的方法，垦辟荒地至数百顷。他购地时每亩价仅四角，今已值价至数十倍。他试验种水稻，两年以来，已有成绩，但决不种烟（种烟出息最好）。惜他不在家。遂到东门外转龙藏去，这寺是此地的一个很好的风景，占住了一个小山顶。水泉由寺中流出，全城饮水，半赖于此。由长工而成佃户，由佃户而成自耕农。要做到由自养到自卫，由自卫到自治的理想。自养的计划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自卫的计划是寓兵于农，变兵为农。最高的理想，则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本节制资本的主张，田产不许买卖及抵押。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农牧林工商"业的自给。有百货商店，性质略同于合作社。这实"世外桃源"的新村，任君他自己也颇怀疑能否独在"浊世"中存在。但他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俄，既能做到自养自给的地位，则新

村似也可以办到不受外来影响的地位，新村运动向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同志的组合，今此新村却带些官办性质，至少和当地政府是合作的。其主张很值得讨论。却也不妨有此一种试验。九时半回到火车上，倦甚，即睡。

十八日，五时半即醒。天空半为淡云所蔽，日影微露，大有雨意。六时三刻，坐汽车出发到五当召。途中很不好走。沙地过软，车轮易陷于其中。雨点已落，由小而大淅沥不已，大有江南春天的气候。到了一个山峡中，车路已坏，不易走上。停了好久。我到瓜田中散步了一会。仍无办法，只好归来，打消了到五当召去的计划。因倦甚，一倒头便睡到正午。明日拟游民生渠，麦达召等处。

十八日自包头寄

十四　民生渠及其他

到包头后，给过你一封信，想已经收到了。这两天在包头，这一无文化、古迹的所在，觉得很气闷。包头城很大，依山筑城为西北三大镇之一；后升为县。冯玉祥驻军于此的时代，很有建设的计划；他想更建一外城区分商业区、住宅区、农业区等等。外城筑不及半，他便失败了。今尚存废基。包头为西路商业中心，水路交通有黄河可通宁夏，陆路则由五原，临河可达青海等地。实西陲一要地，今商业尚发达，铁路运费，每年可得八十余万到一百余万元。虽历经冯孙军事及十八年的大旱灾，损失极大，但这几年来，休生养息之后，已渐渐的恢复元气了。东南各地实业家，有志投业于此者，也大有人在。吴泽君来，谈及此地的风土人情。他觉得鸦片烟是一大患，男女也为了吃烟而往往流入为娼为盗之途。十八年旱灾时，绥远妇女们被卖到山西、河北一带者近二十七万人左右。山西商人在此，以百元可得一妻并附带的有一子一女，立刻能够成一家庭。

十九日，七时起，天色阴沉沉的，像要下雨。精神很不好，也像天色似的，阴沉沉的。因为出来了已经十几天。所收获的实在不多。本想到五原，因坐汽车须走一天，太远，且道路多有被雨水冲坏的，只好放弃了那计划。急想回家，但也不能走。不久，天又下起牛毛细雨来，活像江南的清明时节。连日吃得过多，泻了几次。雨停时，到段氏所办的河北新村去。新村尚未着

手。正在招集河北灾民，到这里来移垦。村南，靠近一海子，段君招集几个朝鲜农人在试验种水稻。如果成功，那影响是很大的。

中途遇见一大群的驴子，那也是很罕见的。

将近新村时汽车停住了；泥湿轮滑，无论怎样都开不动。只好步行而往。村中荒地尚多，未尽开辟。水稻因堤低，去年即为水所湮没，收成未及十五，今年情形略好，但也仍在试验中，没有确定的成功的希望。但此村，地势实在好。海子近在咫尺，取水极为方便，灌溉之利，是不成问题的。段君说，当他购地时，每亩仅给洋四角；因系咸地，无人肯要。这几年经他经营之后，农人们肯出七八元的租钱向他租来种鸦片。他不欲种烟，故不曾租出。

次到南海子。汽车也在途中陷于泥中，不得已而折回。

下午三时，挂车到磴口，拟参观民生渠。下车时遇见徐百川君，他是从前复旦的学生，现在渠口黄河水利委员会做工程师，他说大道已被水所湮没，但他今早另发现了一条小路可走，他领了我们走，不久便到渠口。黄河的水，很平稳的在流着，一道小河，正阻在我们之前。那道清流奔入黄河，在这里激成几圈漩涡。我们在漩涡之前下了船，渡过对岸，便是民生渠的渠口了。此渠落成时，宣传得厉害。但到今日尚未收灌溉之利。当时勇于救灾民，以工代账，草草落成，设计很有疏忽处。但并不是完全无用。经整理后，仍可成为一道很好的渠道。渠口用铁闸闭住，河水今不能入。渠底长出疏疏的几株红蓼花，临风摇曳着。附近即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办公处，专为测量黄河水量及含沙量的，徐君即主其事，他怕土匪，不敢住在屋内。他说，冬天，河冻时，河西大批土匪即过河劫掠，无物不取。会中看守人，曾有

数人被抛入黄河。有一人则被掳过数次。割烟季节，土匪绝迹，皆去做工去了。但这季节一过，他们又猖獗起来。目的是在抢烟。也无法剿除他们。他们并不以匪为业；他们是农民。只是穷不聊生而出此。连几角钱也是要的。兵来则是良民，兵去则为匪。无法可防。怪不得车站上是城堞式的建筑。他本住在磴口镇上，因镇上驻兵他去，他只得搬到车站来住。他的太太是北平工学院的毕业生，现在也在这里。这种不避艰难的工作，我们的大学生们是开始“身临其境”了。他仍陪送我们上车站。石磴站是不能过夜的，故依然要开回包头。过渡时，遇见渔船一只载了两束油麦。据说，把油麦沉到黄河底鲤鱼便来吃，渔人把那束油麦提了起来，鲤鱼也便遂之而上钩了。此地鲤鱼价极廉，鲫鱼几乎无人吃。

六时半回到包头。

二十日上午六时其田等到南海子去调查。我没有去。此地已是过去的黄河埠头了；今已移至离铁路线较近的二里半及王大汉营子。

十一时半，开车到公积坂，参观天主教的村落八达盖村。我因倦，仍未同去。天色仍是灰色。不久，又落下牛毛雨来。他们坐了骡车去。下午五时回。据说，居民共千余人，自卫能力很好。有自营电灯厂及无线电台，男皆健壮有业，女皆天足。在村外住者便都是缠足的女子了。村中有幼稚园，有男女学校。主持者为比利时的牧师夫妇。为什么这种奇特的“宗教社会”会在西北一带存在呢？为什么农人们住在那圈子里的会比较得有生气呢？为什么村外的人见了，并不羡慕而要求加入呢？这其间，必有很重要的秘密在着。非实地加以深切的调查不可。读教会的报告是不足信的。下午五时三十三分。由公积坂开车赴麦达

召。拟定明日游麦达召。

在麦达召过夜，警卫得很严密，以防万一。本想在隆县住下，因水大，要看的地方都不能通，故便放弃了。

这是西行的最后的一封信了，因为明天游麦达召后，便返回北平，我们不久便可相见。

最后，还要说几句忘了说的话：赴磴口时，沿途风景极好，北面是大青山，天然的一面大屏障，南边是黄河，一条柔带似的，随了我们走。中间是麦田，虽涨满了水，收成还不至无望，路上有许多背了包袱的农民们在走着。他们都是赶到西头去做短工的，连几毛钱的车费也没有，只好步行而去。那耐苦求食的精神，足以表现出真正的中国人的本色。

立在黄河岸边，望见大青山的山腰，有屋宇很多，徐君遥指道，"那便是沙尔沁召。"

"关于这召有一段神话呢，"他又道，"从前，不知在什么时候，当汉蒙争疆的时候，约定以一箭所到的地方为二族的交界处。说是一个汉人，一射直射到这个地方。所以大青山便成两族的分界，而沙尔沁召便是建筑起来纪念这一箭所射到的那个地方的。"

二十日夜十时在麦达召站发

跋

将最后一封信投邮时，牛毛似的细雨，已一变而成潺潺的大雨了。我们很害怕，麦达召之游，将因雨而中止。车停在站上，电灯如豆的黄，不能做什么事，只好聚而闲谈。窗外是淅淅沥沥的滴个不住。大有“秋风秋雨愁杀人”的感觉。没有一个人有好兴致的，大家都皱着眉，不说什么。我最早动了归心。其田、希白也都有了此意，却不肯说出。文藻、冰心最有责任心，坚持着必须将全部游程完成后，方可回去。一场闲话，无结果而散。只好把身子包裹在被里，一切都听之自然。午夜醒来，窗外还是淅淅沥沥的滴个不住。风声撼窗，托托作响。睁了眼，醒了好久。恍若身在江南，卧在乌篷船上，听着春雨，百无聊赖。

天明时，雨更大了；风挟着雨点，猛猛的扑面打来。麦达召之行，只好在一场会议之后，真实的被打消了。

二十一日十二时半，开车向东走。到了绥远，才知道卓资山那个地方又出了事；轨道又为山洪所冲坏，火车不能过去。

站上的人说，“早上开的特别快车，也还停在那里呢。”

我心里很着急，难道也要象上次似的，火车道要中断个半个多月么？我们难道竟被陷在这里，象陷在泥淖里一样么？

我仿佛有个预警：这次的停延，一定不止是一天两天的玩意儿。转瞬间，已是八月底了，跟着便要开学了。而我还要到上海走一趟呢。如何支配得开那时间呢？

在车站停着；踌躇着，徘徊着，无可为计，归心如箭。

雨点逐渐的稀疏下来，风也不刮了。特别快车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开了出去。

二十二日的大清早，我们的车，又由归绥站蠕蠕的向东开去。张宜泽君，我们前后三十多天的同伴，因有公务不能不和我们告别而去。殊有恋恋不舍之意。

别了，绥远城，和绥远城的友人们！他们所给予我们的种种好意的招待，是我们所很难忘记的。

这里的文化，虽然湮没了七百年；但在六七百年之前，这里却并不是没有文化之区。金、元乃至汉、唐的文化，在这里是有被发现的可能的。大青山脉的一带召庙不少，有的是很古老的。在其间难保不有什么宝贵的古代遗物与遗迹。白塔已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关于金代文化的遗物了。在民生渠那里，远远的望着大青山上，黑森森的丛林里，还可望得见有几所弘伟的召庙在着呢。麦达召也是一所很古的庙宇。名称虽外化，而实质里却泯灭不了汉化的踪迹。将更有机会给我们仔细的去探访的吧。

火车隆隆的走着，我在计算着自己的行程。“明天便可以到清华园了吧？”

我忙着在整理行装。其田因为有事，也急于回家；他也在整理着皮包。

车停靠在旗下营站。雨又飘飘潇潇的在开始落下。

“卓资山的一段已经修理好了，”车站上的人道：“特别快车已经在昨天开过去。不过，昨天晚上的一阵山洪，又把前面的一段轨道冲坏了，差点没出事。”

段长李振先君，我的老同学，也在这里。他正在这里考察轨道损坏的程度。

“昨天夜里十二时左右，司徒工程师坐了电压车从平地泉来探道，连车带人全都落在水里，差点没陷在水里。”他说。

“看样子什么时候才能通车呢?”我很着急的问道。

“只冲坏了几百丈路，还容易修理。正在两头赶修。不出三五日，也许可以修好，但愿不再下大雨。”

“这一二日内有别的方法可通过么?”

“等我想想法看。也许可以盘渡；旅客们走了一段路，然后上了那边的车。但这办法得请示总局。”

呆呆的等候了一天，还没有得到允许“盘渡”的消息。

终日在狭狭的车上踌躇着，徘徊着，干着急，没有办法。

这车站是个很小的站，一无地方可去。

站长手执一张电报，跑了来。

“有办法了么?”

“没有办法，总局不答应‘盘渡’。尽三天里可修理好，只要天不下雨，”站长摇摇头道，他是一个道地的广东人，因为整夜的不睡，眼白里都现着红筋。

“有把握准能在三天里修理好么?”

“那可说不定。”

我益发的着急；在站台上来回的走着，什么事也不能做。如果再等个十天八天，则我的南归的计划，便要全盘的被打消了。

一会儿又跑上车，书也看不下去。

隆隆的又开了一列火车来。那是上庐山受训练的军官们的专车。也停在这里，没法前进。

又是一天过去了。雨已经不下。晚上仿佛还有些月亮。但也暗澹得很，浮云仍然浮泛在整个天空。

第二天早晨，李君跑下来，说道：“今天谁要走，有办法。不

过辛苦些。有兵车一列，从绥远开来，要‘盘渡’过去，那边有空车皮来接。到平地泉便可坐特别快车了。”

说好是我们三个人同走，其田、希白和我。但后来他们畏难而止。我却再不能忍耐下去了。“还是趁着能走的时候走吧。”我想道。

毫不踌躇的匆匆的整理了一个手提箱带走，其余的行李，全部搁在原车上，托他们带回。

上了军官们的专车。文藻却把我的铺盖也送了来，怕路上冷，这专车直开到轨道冲断处，不久，兵车也来了。乱哄哄的人，还有不少马匹和行囊。

缺口处有二里多路。象难民似的，我肩着铺盖，手执小提箱，在劳劳苦苦的走着，雇不到人来搬运。

好容易走到缺口的那边；那边的空车皮却还不曾来。从早上十时等起，直到下午三时。

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这个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落店的；只有修路工人们及工程师们在这里有暂时的工作处。

整整的饿了大半天，却也不觉得苦。

李君赶了来，说道，“怕兵车上太辛苦，你可以坐了司徒总工程师的电压车到平地泉。”

但电压车却老等不来。火车也竟无消息。

军官和大兵们渐渐的口有怨言。不知是谁发起，把军用电话搭上了铁路电线上，老向前一站，三道营站，要车皮。

又不知是谁强坐了人力推的工程车，到三道营去。中途正遇见工程师的电压车，便强押了来，预备军官们先坐了走。

正在乱纷纷的打着麻烦时，空车也来了。全是货车。闷车是没有窗户的，闷得可怕，敞车又是没有遮蔽的，下雨没处躲。

在乱纷纷的人堆里，我肩负铺盖卷子，怀抱着手提箱，挤上了一个闷车。

一个铁路工人跑来向我招呼道，“司徒工程师说，请你坐了电压车同走，他也正要回到平地泉。”

我又很艰难的挤了下来，回到缺口处。这时，电压车是空着，没人抢用了。

“等火车开了，我们便走，”司徒工程师道。

所谓电压车，是无遮蔽的一个使用汽油的马托车，车轮置于轨道上。可坐三四人，一个司机的坐在前面。走得快时，可比得上很快的火车。

我坐在这电压车的箱盖上，简单的行李则放在车尾。牛毛雨又飘飘潇潇的在落下，拉上了大衣的领子，有点冷，雨点被风吹打在脸上，觉得凉凉的。

好容易，到了四点钟，火车才开走。我们也跟着开走了。

雨点渐渐的大起来，打在脸上有点痛。车开得愈快，雨点扑打得更有力。眼镜的玻璃片上，全都是水滴，朦朦胧胧的看不清前面，用手巾揩干了。不久又得取下来揩。

司徒君沿途指点着险要的工程，说是，“不改道怕不成。前天夜里据报告说，轨道离河水还有一百多尺。不料，一会儿工夫，轨道便被冲断了。”

河水沸沸扬扬的在滚跳在翻腾的奔流下去，山洪的余势尤在。泥岸整百尺的跌落在水里。形势是危险极了。前面火车走在弯曲处，我们眼见着那铺在松泥上的铁路，因不胜重量而弯沉了下去。车过后，才平复如常。

“也不是绝对的没有办法，不过，经济不足，总不能做坚固些的堤防和其他工程。”

沿途泥土全是可可粉似的酱黑色。临河的一边有的地方已现裂痕，仿佛摇摇将坠。铁路边的堤防被破坏得很利害。整座的桥梁都被冲断。

“今年已经移道过两次了，这是第三次。离河岸已有二百多尺远，不料仍被水力所冲毁。”

山势很平衍，都是沃肥的黑土。

前面是三道营站，火车停了下来，我们的电压车却乘机越过这趟车，飞快的向前走。

雨点还是不停，大衣领子全都湿了，裤腿上也湿透了一大块。然而精神仍健旺。一路上渐入佳境。那“佳山水”是坐在铁闷车或玻璃窗里所绝对的见不到的。我绝对的不懊悔着这一趟辛苦的旅行。

不曾吃一点什么，但不觉得饿。连水也不想喝。

电压车飞似的在轨道上跑；雨点一滴滴的扑打在脸上，怪痛的。

然而气象壮伟的山水，把我的整个心都拥抱着了。我不暇顾及谈话，不暇顾及衣裤的潮湿，我忘了一切，只见到那沐在微风细雨里的壮伟异常的大青山。

这一带的山脉，和绥远附近的平衍，凡庸，而多土者完全不同。全是屹立百丈的峭壁；高不可攀，形状幽险古怪，岩面作酱黑色。许多不知名的野草短树，杂生于岩罅。那绿色被酱黑色一衬托，却显得那样的苍老幽峭；那酱黑色被绿色一点缀，却又显得那样的茜隽而有生趣。阴暗的天色，更增益了它们的神秘和古雅。

一重重的山，一叠叠的岭；越过了一道，又是一道；转过了一山，又是一山；转弯抹角的地方，尤有“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妙处。

一道峭壁仿佛正指着路，却又被抛在后面：一面悬岩，仿佛正要经过其下，却又从傍转了过去。

高岩上时有古洞的罅口可见；有时还见有绝细的一道樵径，引入洞口。这洞里是初民之所居的么？

一株两株的青松，孤耸在山的绝顶；从下望之，异常的矮小，有若细草似的。

黄浊的河流，至此，水势已弱，有时可见，如黄缎带似的绕围在山腰，有时则隐而不见。

电压车在轨道上飞快的奔向前去；经过福生庄站，经过卓资山站，经过马盖图站。

向北平去的快车，正停靠在卓资山站。我一疏忽，竟不曾由此上火车。据说到平地泉时，这趟列车便也将到了，还可以赶得上。

从这里向东，是往上爬。山色还是那末幽峭古怪。天色却渐渐的昏暗了下来。雨还不曾停止。

快到十八台站时，有一段轨道，却为水和泥土所淹没。泥总有二尺多深。电压车的铁轮陷在泥中没法转动。

我们望得见前面的红灯。只好下车，在山上步行。要找站上人来推车入站。停在轨道上是万分危险的。

天色朦朦胧胧的，初还可辨道，后竟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又没有灯，司徒君和我，没有第三人，在山岭上这样的跋涉着。全都是泥泞和蒿草。那泥又格外的富于粘性。走不了几步，便粘得一靴底的泥，厚重得抬不起足来。非停下来用手取去了泥块不可。

好不容易，才进了站台。象死人似的坐在站长室的藤椅上。连喝了四五杯热茶。腿酸得厉害。

电压车也进站来。

“就在这里等火车吧，”我对司徒君道。他点点头。实在不能再坐电压车前进了。

过了好久，火车才来。同道的军官们已都挤上了这一列车。车上黑得可以，只有黄黄的一盏煤油灯。

我在二等车里占了一个坐位，打开了铺盖，勉强的坐着。身上湿的地方不少，也只好将就着对付过去。

司徒君在平地泉下了车。这一车，便全都是军官们了；也有带了勤务兵来的。秩序倒很好。

不知怎样，在半醒半睡的状态里，便对付过这一夜。

足底下还是湿的，黑皮鞋变成黄色。裤脚管也半沾着黄色的泥水，怪狼狈的。

第二天的八时，才到很龌龊的三等饭车里得到些熟的面食。

这一天，情绪很恶劣，老在看《桃花扇》。坐在对面的一个军官却很熟悉于这部传奇。他也很慨叹于《争坐》，《移防》的几出。

“现在的情形也还不是那个样子！”

可惜忘记了和他通姓名。我们谈得很高兴。

车过张家口，听说查出无主的烟土一大包，那是一个烟贩子欲放在军官车上混过去的。却被一个军官所发见，举发了出来。

下午七时许，车到清华园。天色已经快黑了。

从清华园到成府，沿途也泥泞不堪。“北京连下了两三天大雨呢，”车夫道。

走进了家门，格外觉得亲切而安心似的。

过了两天，正在我快要动身到上海时，文藻他们也回来了。

“我们真替你担心呢，怕路上太辛苦！”文藻道。

“辛苦到是实在的；还整整的饿了二十四小时呢。然而却见

到你们从不曾见到的绝好的景色。”我道。

实在的，到今日，这辛苦的归程的印象还不曾淡下去。便书之以为跋。

二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追记

蛰居散记

新　　序

这部《蛰居散记》的大部分是登载于上海的《周报》上的。当刚刚胜利的时候，我还是相当天真的只看到一面，虽然在写着的时候，已不断的受到压迫。我明白美帝国主义者的本质，也明白蒋匪帮的一贯的卖国行为，但我那时候还未能完全确切的看出蒋介石匪帮是美帝的代理人。一方面深诛痛恶着日本帝国主义者，描绘着八年来自己身受的痛苦，一方面却不能及时的觉醒到美帝的更为险恶与凶狠的心肠。这是值得自己深切的反省的。警觉性不够强，同时，研究问题也不够深入。且为一时的虚伪的"胜利"和很单纯的爱国主义所冲动，在那时候，恐怕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天真无邪"的。我们不断的受到蒋匪帮的迫害，例如删改文字，没收出版物，恐吓出版家等等，还总以为这只是蒋匪帮的罪恶，并不曾更深一层的去看透美帝指挥操纵的内幕。到了蒋匪帮大规模的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美帝不断的送军火、送接济给他们，方才开始确切的认识到美帝的真面目。在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可以发表言论的机关了。我感到痛苦，感到苦闷，感到自己过去的浅薄。这可见单有热情与正义感是绝对不够的！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指导，必定会把问题或事实看成很单纯了的。现在把这部小书，重行整理了一下，印了出来，作为曝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凶残与压迫的记录的一部分，且作为痛定思痛的纪念。同时，读者们应该更进一步的明白帝国

主义者的侵略是如何的凶险与可怕，不由得不激起爱祖国的热情。作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状，同时也正是控诉美帝正在扶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状！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我们不能不以全力来反抗美帝的侵略！

谢谢刘哲民先生和高季琳先生，他们替我做了一部分整理的工作，且使这部小书能够有机会出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郑振铎

自　　序

胜利！胜利！胜利！

我们在水深火热的沦陷区里，度日如岁，天天盼着胜利的到来，简直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忍受着人类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们吞声饮泣的睁眼看着狼虎的择肥而啮，狐兔的横行，群鬼的跳梁；我们被密密的网罗覆罩着；我们的朋友们里，有的杀身成仁，为常山舌，为文氏头，以热血写了不朽的可泣可歌的故事；有的被捕受刑，历尽了非人道的酷暴的待遇，幸而未死，然已疮痍满身，永生不愈；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受着不可言说的压迫与恐怖，日在饥饿线上挣扎着；言之痛心，闻者酸鼻。

然而别一方面却是荒淫，奢靡，快乐无度；无耻与丧心病狂者流，统治了一切。敌人与勾结敌人之奸官、奸商，莫不致富万万，乃至数十百万万；人民求食所谓“文化粉”（北方以豆渣、花生壳、高粱、黍米等合磨为粉，称之为“文化粉”）而不可得，而彼等则食必珍羞，日掷百万而无吝；人民在黑暗中摸索着，而彼等则灯火辉煌，俾夜作昼；人民出无车，而彼等则汽车如虎，街头疾驰；人民住无室，而彼等则高楼巨厦，三宅四院而尚嫌不足；人民妻离子散，而彼等则娇妻艳妾，左拥右抱；人民衣裳褴褛，鞋穿袜破，而彼等则冠戴堂皇，靴光如漆。极度的荒淫无耻与极度的受压迫的呻吟，作着极鲜明的黑与白的对照，是地狱相，是鬼趣图。

而现在，胜利终于到来了！

但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时期，一个悠久的“八年”的黑暗时期里，如果能有一部详细的记载，作为“千秋龟鉴”，实胜于徒然的歌颂胜利的欢呼。

我从“八·一三”事变后，便过了好几次的流离迁徙的生活；从“一二·八”后，便蛰居于一小楼上，杜绝人事往来。虽受着不少次的虚惊，幸而未作“楚囚”，未受刑迫。胜利的欢呼，使我从冬蛰里苏生。我没有受害，没有入狱，竟也没有饥饿而死，不可不谓为一个“奇迹”！我在这里以十万分恳挚的敬意，致谢于许多帮助我隐匿着，生活着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好意与有勇气的担当，我也许早已遭逢了不幸。

劫后余生，痛定思痛，把这几年来目睹耳闻的事实，写了下来，成为这本《蛰居散记》，也许可以使将来的史家们有些参考罢。是为序。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一　暮影笼罩了一切

“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有低低的饮泣声。

但不是绝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坚定的抵抗与牺牲的开始。

苏州河畔的人渐渐的散去。灰红色的火焰还可了望得到。

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

是群鬼出现，百怪跳梁的时候。

没有月，没有星，天上没有一点的光亮。黑暗渐渐的统治了一切。

我带着异样的心，铅似的重，钢似的硬，急忙忙的赶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毁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许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准备着随时离开家。先把日记和有关的文稿托人寄存到一位朋友家里去。

小箴已经有些懂事，总是依恋在身边。睡在摇篮里的倍倍，却还是懵懵懂懂的。看望着他们，心里浮上了一缕凄楚之感。生活也许立刻便要发生问题。

但挺直着身体，仰着头，豫想着许多最坏的结果，坚定的作着应付的打算。

下午，文化界救亡协会有重要的决议，成为分散的地下的工作机关。《救亡日报》停刊了。一部分的友人们开始向内地或香港撤退。他们开始称上海为“孤岛”。但我一时还不想离开这“孤岛”。

夜里，我手提着一个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里去借住。温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间的暖热可爱。在这样彷徨若无所归的一个时间，格外的觉到“人”的同情的伟大与“人间”的可爱可恋。个个人都是可亲的，无机心的，兄弟般的友爱着，互助着，照顾着。他们忘记了将临的危险与恐怖，只是热忱的容留着，招待着，只有比平时更亲切，更关心。

白天，依然到学校里授课，没有一分钟停顿过讲授。学生们在炸弹落在附近时，都镇定着坐着听讲；教授们在炸声轰隆，门窗格格作响时，曾因听不见语声而暂时停讲半分数秒，但炸声一息，便又开讲下去。这时，师生们也格外的亲近了；互相关心着安全。他们谈说着我们的“马其诺防线”的可靠，信任着我们的军官与士兵。种种的谣传都象冰在火上似的消融无踪。可爱的青年们是坚定的。没有凄惋，没有悲伤；只是坚定的走着应走的路。有的，走了；从军或随军做着宣传的工作。不走的，更热心的在做着功课，或做着地下的工作。他们不知恐怖，不怕艰苦，虽然恐怖与艰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教员休息室里的议论比较复杂，但没有一句“必败论”的见解听得到。

后来，“马其诺防线”的防守，证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杀在进行。“马当”的防线也被冲破了。但一般人都还没有悲观。“信仰”维持着“最后胜利”的希望。“民族意识”坚定着抵抗与牺牲的决心。

同时，狐兔与魍魉们却更横行着。“大道市政府”成立，“维

新政府”成立。暗杀与逮捕，时时发生。“苏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恶魔的世界。“过桥”是一个最耻辱的名辞。

汉奸们渐渐的在“孤岛”似的桥南活动着，被杀与杀人。有一个记者，被杀了之后，头颅公开的挂在电杆上示众。有许多人不知怎样的失了踪。

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动摇了。

学生们常常来告密，某某教员有问题，某某人很可疑。但我还天真的不信赖这些“谣言”。在整个民族作着生死决战的时期，难道知识分子还会动摇变节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盲猜”与“瞎想”。

但事实证明了他们情报的真确不假。

有一个早上，与董修甲相遇，我在骂汉奸，他也附和着。但第二天，他便不来上课了。再过了几天，在报上知道他已做了伪官。

张素民也总是每天见面，每天附和着我的意见，但不久，也便消声匿迹，之后，也便公开的做了什么“官”了。

还有一个张某，和陈柱，同受伪方的津贴，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陈柱（这个满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东西）“走马上任”，张某被友人且劝且迫的到了香港发表“自首文”时，我也才觉得自己是被骗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与对于知识分子的过分看重啊！

学生里面也出现“奸党”。好在他们都是“走马上任”去的，不屑在学校里活动；也不敢公开的宣传什么，或有什么危害。他们总不免有些“内愧”。学校里面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

虽然是两迁三迁的，校址天天的缩小，但精神却很好；很亲切、很温暖、很愉快。

青年们还在举行“座谈会”什么的。也出版了些文艺刊物；还做着民众文艺的运动，办着平民夜校。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带着些警觉性。可爱与骄傲，信仰与决心，交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青年们活动的趋向。

我还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时候也到古书店里去跑跑。偶然的也挟了一包书回来。借榻的小室里，书又渐渐的多起来。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只是十分小心的警觉着戒备着。

有一天到了中国书店，那乱糟糟的情形依样如旧。但伙计们告诉我：日本人来过了，要搜查《救亡日报》的人；但一无所得。《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所以他们没有觉察到。搜查时，汪馥泉恰好在那里。日本人问他是谁。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发长长的，长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计。”也真象一个古书店的伙计，才得幸免。以后，那一批“合订本”便由汪馥泉运到香港去。敌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国书店过。亏得那一天我没有在那里。

还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的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一个购书的人。这人走了后，我向伙计们说道：“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为了慎重，又到汉口路各肆嘱咐过。

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虽然不时的有人去问他们。

隔了一个多月，好象没有什么意外的事会发生，我才再住到家里去。

夜一刻刻的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里坚定的守着岗位，做着地下的工作；多数的人则守着信仰在等待天亮。极少数的人在做着丧心病狂的为虎作伥的事。

这战争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识”；也使民族败类毕现其原形。

二　悼胡咏骐先生

我和咏骐先生的相识，不过三年左右。上海战役失败之后，上海的情形，紧张、混乱。友人们撤退的，躲避的纷纷不绝。在其间，也有许多若橡树似的，屹立于暴风雨之中而坚定不动的，咏骐先生即是其中之一。他稳定的站在危难、艰苦、恐怖、纷扰的环境中，象一个巨人似的；在他的巨影之下，许多人赖以安定，不惧。他执了一盏光明四射的灯笼，在茫茫黑夜里，引导着许多人向前走。他的勇敢、冷静与明晰分毫的理论，增加了同伴者无穷的勇气。

他不是一位孳孳为利的普通商人。他看得远，见得广，想得透彻。他知道一个商人在这国难时期应尽的责任是什么。他的一切措施，一切行动，都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题的。他从事商业近二十年，但他的经济情形也仅足够一家温饱而已。而对于爱国事业，则无不竭力帮助着；比千万百万富翁所尽的力量更多，更大！

他主持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他的看法，是把"人寿保险事业"作为"社会事业"之一的；并不为了营利。他应用了最科学的方法，经营"人寿保险"事业；有许多设施，足为后来人最好的楷模。

有一次，他和我谈起：公司的投资，以投于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业为主。购买外汇，垄断米粮布匹及其他日用品的都是民族的罪人。他的公司绝对的不愿做这种事。他和我商量，要把

一部分资金从事于保存民族文化。我尽力的赞成他，说：我愿以全心全意的帮助他做这件事。可惜商谈后不久，他便一病不起，再没有机会做这件事。这实在是民族文化之一大损失！也是他有志未遂的事的一端！

他待友笃信。对于穷的文化人——文化人没有不穷的——尤其愿意用种种方法来帮助。有时，得到帮助的人竟不知道是他的力量。

他有信仰，他有理想，他有远见。他见到最后胜利的不远；他信仰我民族的必有光明远大的前途。他鞠躬尽瘁于兹；虽病已深，体已弱，虽已弥留在病榻上，也还念念不忘于兹！

一个火种遗留下来，可以传之不熄。他便是这不熄的火种。

他虽死，但他的巨影还荫覆着无数的未死者们。他虽赍志以死，不及见最后胜利的完成；但未死者们一念及他的忠笃的大无畏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便增加了无穷的勇气。

他虽死，但他的精神不死，我们悼念他；但我们一念到他，便应想到要完成他未完成的遗志，未完成的工作与他的未实现的信仰与理想！

他这埋伏下来的火种，这精神，是永远不熄的！

三　记刘张二先生的被刺

在洪水横流，天地变色的上海，友人们首先遇难的是刘湛恩、张似旭二先生。

在那个时候，伪“维新政府”还没有成立，只有一个牛鬼蛇神的“大道市政府”，在鬼鬼祟祟的帮助着敌人干着谋杀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地下的组织，包括了比较上层的爱国分子：有实业家、有银行家、有保险业者、有青年会的干事、有航运公司的人、有书店老板、有报馆记者、有著作家、有海关上的职员、有会计师、有大学教授等等，每星期有一个秘密的集会。在三四年间很做了些事。在这个团体之外，还有一个专门做对外宣传的机关，“国际问题研究会”，刘湛恩和胡愈之二先生是其中的主干，温宗尧也在这会里。他们在国际上很发生了些作用。

湛恩先生是慷慨激昂惯了的，在这会里，说的话最多，做的事也最多。当时不知道温宗尧已经变了，已经变做一个敌人的走狗，还引他为同志而推心置腹的对待他。但在伪“维新政府”将出现的前夕，湛恩先生听见人言籍籍的说温宗尧也是参与“维新”组织的一人，他素来心直口快，便正言厉色的质问着他。温宗尧绝口的否认着。他倒相信了温宗尧的话。不料这一次的会却是最后的一个会。过不了几天，温宗尧终于现出他的汉奸面目，湛恩先生也遇刺成仁。“国际问题研究会”遂以解散。

友人们都相信湛恩先生的死，是温宗尧所主使或告密的。

象湛恩先生那样的嫉恶如仇，无所顾忌的人，敌人也许早已列在黑单上；不过这一次的事，更促成其早日发动而已。

湛恩先生他自己恐怕也已经发觉了“危险”；他预备要离开上海。他这时正担任着沪江大学的校长职务。为了他的慷慨与无畏，沪江大学里举办了不少附属的机关，成为上海一般热忱的青年“向往”的中心，他一死这些附属的机关便都烟消云散或“迁地为良”了。

如今想起湛恩先生成仁的情形还宛然在目。

有一天，我在薄暮的时候，夹着皮包，到沪江大学的一个附属机关去教课。在圆明园路的转角上，遇到了湛恩先生从对面走来。

我们立谈了一会。我问他道：“你的汽车呢？”

他道：“已经出卖了；预备就要走。”

我道：“你走了，事情怎么办呢？”

他道：“都已经交代妥当了；随时可以走。”

“感觉到有什么迫切的危险么？”

他点点头。我们黯然的握手久久而别。

这一别便不再相见！

第二天上午，我坐了双层的公共汽车往东边去。经过了静安寺路大华路口，有人问道：“早上有一个在这个地方被打死的么？”卖票的答道：“对的，我的那趟车刚好经过这一站，亲眼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凶手朝北逃。听说后来已被捉住。”

在这时，这种恐怖的暗杀事件已成了“司空见惯”的把戏，所以大家也变成不大好奇。我却纳闷着：这死的到底是一个仁人志士呢，还是一个汉奸？

傍晚，晚报出版，封面上赫然的用大字载着：“沪江大学校长

刘湛恩遇刺”的消息，说是，湛恩先生上午九时，在大华路口等公共汽车，一个凶手从后边跑过去，对他开了一枪，立即转身逃去。但逃到爱文义路附近，终于被路人和巡捕逮捕了。这凶手不肯说出主使的人来。

我执着报纸的手因愤激而微微的抖着。友人们里第一个为国牺牲的人；第一个死于自己人的手里的人！我不能相信：竟会有人替敌人来暗杀爱国之士的！

也许是我的“幼稚”吧，我从来不曾想到过，也从来不会相信，会有人肯替敌人做事的；——除了本来是不足齿于人类的伪“大道市政府”的一批“流氓”们。上海人至少是会采取消极的不合作主义的。难道还会有什么丧心病狂的替敌人奔走效劳么？后来知道虹口方面的公共汽车恢复了，招考女卖票员，居然有人去投考，居然考取了，已在车上卖票。我总以为这是不可想象的“怪事”。难道她们会有面目与车上乘客天天见面么？想不到竟会有人更进一步的替敌人来谋杀我们自己的仁人志士！

我伤心！我失望！我悲哀！我郁郁闷闷的感到心头上有一个瘤结，化不开，消不去！我不仅仅伤心湛恩先生的死，不仅仅悲哀一个同道的伟大的人物的凋谢，我是对于整个民族的融铸为一体的抗敌的信念有些因失望而不能十分坚持了！——当然后来一件件的事实，证明我这个“信念”也许有些太“幼稚”。

“如果湛恩先生不卖去汽车，也许可以不至那末容易被刺中吧？”我心里想着。

但后来知道，警务人员曾从凶手身上搜出一张小条子，上面有几个数字。问他，不肯说是指的什么东西或有什么意义。经过一番调查，才明白那几个数字乃是湛恩先生汽车的号码。可见敌人处心积虑，欲置湛恩先生于死地者为时已久。即坐了汽

车，也是不能避免的。所可憾者，湛恩先生的到香港的船位本已定好，过两天便可以脱出险地；不料他们发动得那末快！这位同道的伟大的人物便这样的“成仁”而死！

湛恩先生死后不久，复有张似旭先生的被刺事件发生。

似旭先生是经常的在上面所说的那个地下的爱国团体出席的。他虽然是英文《大美晚报》的记者，却是一个强烈的正义感的爱国者。在国际宣传上，他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从湛恩先生被刺后，他的踪迹便相当的秘密。

我有时在跑马厅北首的一家德国咖啡馆里喝茶；那个地方人很少，尤不易碰见相识的人；窗外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眼界很宽很爽。

似旭先生便在这个咖啡馆里被刺死的。

一天下午，他在那里喝茶，不知是不是曾约会了人，突然的有一个凶手走上楼，向他开了一枪。他倒在椅上死去。凶手下楼逃走，谁也不敢追他。但在门口，被一个捷克青年遇到了，抱住了不放，他又开了一枪，把那位见义勇为的异国人也打死了。

我从此不再踏进这家咖啡馆；有一种异样的伤感与悲愤抓住了我，使我不再有喝午茶的闲情逸致。

我也从此不忍常坐于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从东走，在车窗上，可以望得见大华路口湛恩先生成仁的地方，也要经过那家咖啡馆，似旭先生的被刺的所在，处处触目伤心！岂止是“车过腹痛”而已！

湛恩、似旭二先生死后，我们的国际宣传的工作便松懈得多了，但那个地下工作的团体还是健在着，还继续的活动了三四年，一点也不曾退却，不曾忽略过一件小事或大事。集合了那末方面广大而复杂的人物在一起，经常的开着会，做着不少的事

业，却始终不曾为敌人和敌人的走狗们所发觉，所注意，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团体的分子的健全和机构的严密。也不能不相信：那一边虽然有少数的“为虎作伥”的汉奸们在跳梁，但最大多数的人民，却是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永远不死的前仆后继的精神的朋友！

四 “野有饿殍”

乞丐到处都有，而上海尤多。职业的乞丐是有组织的，收入相当可观，决不会饿死。非职业的乞丐，象黄包车夫的家属，女人孩子们，偶然作着这一行“生意”，找些意外的收入，那也是决不会挨饿的。但从“八·一三”抗战以后，乞丐的数量一天天的增多，许多非职业的乞丐也都变成了职业的。尽有向来饱食暖衣的人也沦入了乞丐群中。他们竞争得异常激烈，而肯“布施”的人却是那样的少——一天天的少下去。原因是“施舍者”群自己也多半陷在“朝不保夕”的情形之下，如何能够再施舍别人呢。

日本人向世界夸口说，北平的乞丐已经肃清了，市容很整洁。但从北平来的人告诉我们：乞丐在那城市里根本不能生存；有乞的，没有舍的。沦入乞丐群的人，不到几天，或十几天便都饿死了。

上海的情形也是如此。“饿殍”在一天天的增加。

中产阶级在战前吃惯杜米饭的，渐渐的改吃洋籼米，改吃面粉制品，改吃杂粮。本来是两餐吃饭，一餐吃粥的，渐渐的改作两餐粥一餐饭了。改作两餐小米粥或绿豆粥，红豆粥之类，一餐面“疙瘩”，或面条子，或南瓜饼之类了。敌人“以战养战”，把江南产米区的米，香糯雪白的米，全都囊括而去。剩下的，小部分喂养着汉奸，极小部分才轮到老百姓头上。老百姓吃的是他们所不屑吃的碎米，发了臭的腐米，一半杂了糠粉的极坏的籼米，

后来，爽爽快快的便连米粒儿也不见，除非用大价钱在黑市上搜求。

农人们自己吃不到自己种的米，应该吃米的老百姓们吃不到向来吃惯了的米，这米，一粒粒，一颗颗，雪白肥大的，全都经由汉奸们的手，堆到敌人的仓库里去。

有一天，我在霞飞路的一家商店窗口，见到一大批宣传画片，有几幅题着“满洲——东亚的谷仓”的，表现着满车满地的一袋袋的粮食，愤怒使我的脸涨红，我的双眼圆睁着，我想大声疾呼道：不错，“满洲”是谷仓，可惜在那里的人，种稻的人却全都吃不到米粮，只有那批侵略者才有份大量的恣意的享用着。

听说，在那边，中国人是不许吃米的；即做着汉奸也不成。家有藏米的人都偷偷的吃着。儿童们上学，日本教师们突然的问道：你们昨天吃的什么东西？有的说杂粮，也有的说白米饭。第二天，说吃白米饭的儿童的家里却被抄家了，把藏的白米全都车了去，还把主人带了去治罪。从此以后，某家的人如果要吃大米饭，——这当然是万分之一中的“幸运者”——便遣开了或摒除了儿童们才吃。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汉奸到一个日本人家里吃饭；喝醉了酒，在火车上呕吐了。被发现在呕吐物里有白米饭粒，立即把他逮捕了，追问下去，连那请客的日本人也受了处分。白米饭在东北三省是不许中国人吃的，虽然种稻的是中国人！

在北平，南京的伪组织里，也规定着那一等官吏吃那一种米。例如特任官可吃特号杜米，二三等的职员只好吃二等米之类。老百姓们呢，根本不配有米吃！说是实行配给制度，其实配给米的影子是难得见到的。

上海人的生活也不得好。所以，向来乞丐们在家家后门口

可以拿得到的残羹剩饭，渐渐的肯施舍的人少了，渐渐的成为绝无仅有的了。一家人家难得吃一顿饭，那里还会有东西剩下，就是剩下一碗半碗饭的，也都要留着自己吃，如何舍得布施呢。

上海的乞丐一天天的多，失业的人川流不息的加入这一群里，但也随"生"随灭。他们活不了多久。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他们突然的减少，多半是很快的便饿死。

饿肚子的人有多少痛苦，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所不会了解的。但每天听着街头"饿杀哉"那惨绝人寰的声音，谁的心头不荡着一股怨气，一腔悲愤，一缕沉重的郁恨！这是我们的敌人驱赶他们到这条"饿杀"的路上去的。

"战前"的乞丐呼喊求乞的声音是宏亮实大的，有种种的诉说，种种的哀婉之辞，种种的特别的专门的求乞的"术语"。但在这些时候，他们，饿了几天肚子的人，实在喊叫不出什么乞怜求悯的话了，只有声短而促，仿佛气息仅存的"饿杀哉！"一句话了。

我看见一个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脸上剩下一对骨碌碌的无神的大眼睛，脸色是青白的，双腿抖着，挣扎的在扶墙摸壁的走着，口里低低的喊道"饿杀哉！饿杀哉！"我不忍闻的急走过去，我没有力量帮助他。就在那一天，或第二三天，那战抖着的双腿一定会支持不住而倒了下去的，成为一个无名的"饿殍"，战争所产生的"饿殍"。

这样的"饿殍"天天在街头发见，天天在不断的倒毙下去。

我硬了心肠走开去，转避了眼睛不敢去看他们，但我咬紧了牙关：这笔帐是要算在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侵略者的头上的。

五　鹈鹕与鱼

夕阳的柔红光，照在周围十余里的一个湖泽上，没有什么风，湖面上绿油油的象一面镜似的平滑。一望无垠的稻田。垂柳松杉，到处点缀着安静的景物。有几只渔舟，在湖上淀泊着。渔人安闲的坐在舵尾，悠然的在吸着板烟。船头上站立着一排士兵似的鹈鹕，灰黑色的，喉下有一大囊鼓突出来。渔人不知怎样的发了一个命令，这些水鸟们便都扑扑的钻没入水面以下去了。

湖面被冲荡成一圈圈的粼粼小波。夕阳光跟随着这些小波浪在跳跃。

鹈鹕们陆续的钻出水来，上了船。渔人忙着把鹈鹕们喉囊里吞装着的鱼，一只只的用手捏压出来。

鹈鹕们睁着眼望着。

平野上炊烟四起，袅袅的升上晚天。

渔人拣着若干尾小鱼，逐一的抛给鹈鹕们吃，一口便咽了下去。

提起了桨，渔人划着小舟归去。湖面上刺着一条水痕。鹈鹕们士兵似的齐整的站立在船头。

天色逐渐暗了下去。湖面又平静如恒。

这是一幅很静美的画面，富于诗意；诗人和画家都要想捉住的题材。

但隐藏在这静美的画面之下的，却是一个惨酷可怖的争斗，

生与死的争斗。

在湖水里生活着的大鱼小鱼们看来，渔人和鹈鹕们都是敌人，都是蹂躏他们，致他们于死的敌人。

但在鹈鹕们看来，究竟有什么感想呢？

鹈鹕们为渔人所喂养，发挥着他们捕捉鱼儿的天性，为渔人干着这种可怖的杀鱼的事业。他们自己所得的却是那末微小的酬报！

当他们兴高采烈的钻没入水面以下时，他们只知道捕捉、吞食，越多越好。他们曾经想到过：钻出水面，上了船头时，他们所捕捉、所吞食的鱼儿们依然要给渔人所逐一捏压出来，自己丝毫不能享用的么？

他们要是想到过，只是作为渔人的捕鱼的工具，而自己不能享用时，恐怕他们便不会那末兴高采烈的在捕捉在吞食罢。

渔人却悠然的坐在船梢，安闲的抽着板烟，等待着鹈鹕们为他捕捉鱼儿。一切的摆布、结果，都是他事前所预计着的。难道是"运命"在播弄着的么，渔人总是在"收着渔人之利"的；鹈鹕们天生的要为渔人而捕捉、吞食鱼儿；鱼儿们呢，仿佛只有被捕捉、被吞食的份儿，不管享用的是鹈鹕们或是渔人。

在人间，在沦陷区里，也正演奏着鹈鹕们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把戏。

当上海在暮影笼罩下，蝙蝠们开始在乱飞，狐兔们渐渐的由洞穴里爬了出来时，敌人的特工人员（后来是"七十六号"里的东西），便象夏天的臭虫似的，从板缝里钻出来找"血"喝。

他们先拣肥的，有油的，多血的人来吮、来咬、来吃。手法很简单：捉了去，先是敲打一顿，乱踢一顿，——掌颊更是极平常的事——或者吊打一顿，然后对方的家属托人出来说情。破费了

若干千万，喂得他们满意了，然后才有被释放的可能。其间也有清寒的志士们只好挺身牺牲。但不花钱的人恐怕很少。

某君为了私事从香港到上海来，被他们捕捉住，作为重庆的间谍看待。囚禁了好久才放了出来。他对我说：先要用皮鞭抽打，那尖长的鞭梢，内里藏的是钢丝，抽一下，便深陷在肉里去；抽了开去时，留下的是一条鲜血痕。稍不小心，便得受一掌、一拳、一脚。说时，他拉开裤脚管给我看，大腿上一大块伤痕，那是敌人用皮靴狠踢的结果。他不说明如何得释，但恐怕不会是很容易的。

那些敌人的爪牙们，把志士们乃至无数无辜的老百姓们捕捉着、吞食着。且偷、且骗、且抢、且夺的，把他们的血吮着、吸着、喝着。

爪牙们被喂得饱饱的，肥头肥脑的，享受着有生以来未曾享受过的“好福好禄”。所有出没于灯红酒绿的场所，坐着汽车疾驰过街的，大都是这些东西。

有一个坏蛋中的最坏的东西，名为吴世宝的，出身于保镖或汽车夫之流，从不名一钱的一个街头无赖，不到几时，洋房有了，而且不止一所；汽车有了，而且也不止一辆；美妾也有了，而且也不止一个。有一个传说，说他的洗澡盆是用银子打成的，金子熔铸的食具以及其他用具，不知有多少。

他享受着较桀纣还要舒适奢靡的生活。

金子和其他的财货一天天的多了，更多了，堆积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其数。都是从无辜无告的人那里榨取偷夺而来的。

怨毒之气一天天的深；有无数的流言怪语在传播着。

群众们侧目而视，重足而立；吴世宝这三个字，成为最恐怖的“毒物”的代名辞。

他的主人（敌人），觉察到民怨沸腾到无可压制的时候，便一举手的把他逮捕了，送到监狱里去。他的财产一件件的被吐了出来。——不知到底吐出了多少。等到敌人，他的主人觉得满意了，而且说情的人也渐渐多了，才把他释放出来。但在临释的时候，却嗾使猘狗咬断了他的咽喉。他被护送到苏州养伤，在受尽了痛苦之后，方才死去。

这是一个最可怖的鹈鹕的下场。

敌人博得"惩"恶的好名，平熄了一部分无知的民众的怨毒的怒火，同时却获得了吴世宝积恶所得的无数掳获物，不必自己去搜括。

这样的效法喂养鹈鹕的渔人的办法，最为恶毒不过。安享着无数的资产，自己却不必动一手，举一足。

鹈鹕们一个个的上场，一个个的下台。一时意气昂昂，一时却又垂头丧气。

然而没有一个狐兔或臭虫视此为前车之鉴的。他们依然的在搜括、在捕捉、在吞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却是为了他们的主人。

他们和鹈鹕们同样的没有头脑，没有灵魂，没有思想。他们一个个走上了同样的没落的路，陷落在同一的悲惨的运命里。然而一个个却都踊跃的向坟墓走去，不徘徊，不停步，也不回头。

六　汉奸是怎样造成的

我为了暨大招生的事，到过香港一趟，住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因为教育部驻港办事处附设在蔚蓝书店里，我不得不常常到那边去，有时为了收寄信件，有时为了有事要接头。

这时在蔚蓝书店里办公的，有林柏生、梅思平、朱朴之、樊仲云几个人。除了林柏生，其他的人都很熟悉。

他们天天在蔚蓝书店会面，没有什么公可办，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发发牢骚，骂骂人，成了习惯。他们都是自命为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仿佛国家亏待了他们什么的。虽然他们各有"使命"在香港，但好象都未能满其所欲。抗战正在"白热"的时候，然而他们不谈那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自己的切身的事。

有一天，他们谈起，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谈相的人很高明，他们都曾找他相过，说的话很灵验。

"你何妨也去试试看呢？"

我摇摇头，并不去答理他们。"不疑何卜！"

再有一天，一位朋友，在某军里服务的，经过香港。他说，会相面。于是，他们这一批人，个个都要他相相。

他们说的什么"眉毛运"、"鼻头运"等等，我一句也听不懂。

他说，某某人近五十岁正走运，应该可以发达，某某人便大为高兴。

他说，某某人现正"走"着某某运，他也十分的有兴头。

“你为什么不也来相一下呢？”又是一次的邀请。

我实在觉得厌恶极了！我忍耐不住，便正颜厉色的说道：“为什么要算什么命，看什么相呢？我们国家民族正在与敌人作生死战的时候，我们的运命与国家的运命是分不开的。国家胜利了，我们的运命当然是不会坏的；万一不幸抗战失败了，我们还会有什么好运可走呢？”

他们默默的不作一声。

我自觉做了一次傻事。为什么要对他们讲这种大道理呢？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着卖国的勾当，所以才会那样的“患得患失”。要是知道一点风声，也许把“话”还要说得凶些。

过了几天，李圣五到旅馆里找我。谈了一会，他也是满肚子的牢骚，把那些执政的人说得一文不值。那时，他也正在失意的时代，方由外交部某官“下台”，重进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

伪组织在南京“成立”的时候，那一批失意的“官僚”，便都到了南京来，走马上任，过其“官瘾”。

我到这时候，方才恍然大悟，明白他们所以要不时的“求神告佛”，“看相问卜”的原因。

因之，我也顿时恍然大悟，凡是患得患失，时时要求神告佛，看相问卜的，到底那是些什么人。

官僚政治，在中国已是根深柢固，不易拔除，象是一座大洪炉。凡投到这大洪炉里的，不问是什么顽铁，无不立被炼成“绕指柔”的精钢；除非他本是一颗金刚钻一类的人物，才不会“同流合污”。要是曾一日为官，似乎终身便带些官脸、官气、官味。据说，曾经做过“总长”的人，这个头衔便终身不会除脱开去。有一

位素来可敬的学者，不幸"出山"过一次，便被人称为"总长""总长"的直到于死。听人说，他自己也并不以此称号为怍。

林、梅、李诸逆，都是曾经尝过"官"趣的。所以一旦下野或"还我初服"，便有些不甘寂寞，静极思动起来，无时无刻，都想要重行登台。此路走不通，便要走他路；大道走不通，便要走小路；此处不留人，便别求留人处。他们所追求的是个人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以及居室、姬妾、饮食等等的享用。

这样的"官僚们"，天天都在寻找"知己"，寻找"用我者"，寻找他们的主子。只要主子肯垂青到他们，置之左右，饵以高官厚禄，便会鞠躬尽瘁，为其所用，那主子是何等样人，他们却不想去问一下的。

得意时恣意享受，失意时求神问卜，便是他们生成的"面相"。一日无"君"，便觉得栖栖惶惶，寝食难安。国家民族的存亡，老百姓们的生死，饥馑，与他们根本痛痒无关。他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宁愿做汉奸，受万人唾骂，受万世唾骂，却不肯寂寞自安。

这便是汉奸之所以造成的原因，也便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深厚的流毒所聚之结果。

官僚主义不从根铲尽，汉奸是永远不会绝迹人间的！

七　最后一课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的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作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

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的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的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的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沈着；象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象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

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的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徬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那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象钢铁铸成似的坚固，象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末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的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

八 烧书记

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最彻底的烧书，最彻底的愚民之计，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设立大学而只开设些职业、工艺学校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烧书的事，无代无之。有的烧历史文献，以泯篡夺之迹；有的烧佛教、道教的书，以谋宗教上的统一；有的烧淫秽的书，以维持道德的纯洁。近三百年，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全毁”、“抽毁”书目，不禁凛然生畏；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窒塞难堪！

“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大约是教科书之类居多。我想，我的书

能否捡得到一二张烧焦了的呢？——那时，我已经知道开明书店被烧的情形——当然，这想头是很可笑的。就捡得到了又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徒增忉怛与愤激么？

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还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敌兵占领了旧租界后，那情形却大是不同了。

我们听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还听到无数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惨事。

许多人心里都很着急起来，特别是有“书”的人家。他们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有好几个友人，天天对书发愁。

“这部书会有问题么？”

“这个杂志留下来不要紧么？”

“到底是什么该留的，什么不该留的？”

“被搜到了，有什么麻烦没有？”

个个人在互相的询问着，打听着。但有谁能够说明那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那些东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时正忙于烧毁往来有关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硬了心肠在烧。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通里冒出来，烧焦了的纸片，飞扬到四邻，连天井里也有了不少。

心头象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但为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进壁炉里去。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罢？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觉得很懊悔，不该把它们烧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杀，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

整整的烧了三天。我翻箱倒箧的搜查着，捧了出来，动员孩子们在撕在烧。

“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罢。”孩子在恳求着。

我难过极了！我也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只好摇摇头，说道：“烧了罢，下回去买好一点的画给你。”

在这时候，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在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

我没法回答他们，领了他们到壁炉边去。

“你自己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罢。”

这一场烧书的大劫，想起来还有余栗与余憾！

不烧，不是至今还无恙么？

但谁能料得到呢？

把它们设法寄藏到别的地方去罢。

但为什么要“移祸”呢？这是我所绝对不肯做的事。

这是我不能不狠心动手烧的一个原因。

但也实在有些人把自认为“不安全”的书寄藏到别人家里

去的。

这还是出于自动的烧，究竟自动烧书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违碍”的书报还储藏在许多人家里。有许多人不肯烧，不想烧，也有人不知道烧，甚至有人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件事。

过了不久，敌人的文化统制的手腕加强了。他们通过了保甲的组织，挨户按家的通知，说：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毁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

同时，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不知运向何方，也不知它们的运命如何。

这一次烧书的规模大极了！差不多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他们不耐烦呈缴出去，只有出于烧之一途。最近若干年来的报纸、杂志遭劫最甚。有许多人索性把报纸、杂志全都烧毁了，免得惹起什么麻烦。

外间谣传说，连包东西的报纸，上面有了什么抗日的记载，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旧报纸连包东西的资格也被取销了。

最可怜的是，有的朋友已经到了内地去，他们的书籍还藏在家里，或寄存在某友处。家里的人到处打听，问要紧不要紧，甚至去问保甲处的人。他们当然说要紧的，甚至还加上些恫吓的话。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把什么书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是有字的，无不投到了火炉里去。

记得清初三令五申的搜求“禁书”的时候，有许多藏书家的后人，为了省得惹祸，也是将全部古书整批的烧了去。

这个书劫，实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这样纷扰了近一个多月，始终不曾见敌伪方面有什么正式的文告。又有人说，这是出于误会，日本人方面并没有这个意思。

于是烧书的火渐渐的又灭了、冷了、终至不再有人提起这件事。

不烧的人，忘了烧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这类抗日文献的人，当然也有。

许多抗日文献还保存得不少。象《文汇年刊》之类，我家里便还保存着，忘记了烧。

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但愿这种书劫，以后不再有！

九 “封锁线”内外

“生”与“死”，刻划得象黑白画似的明显清晰的同在着：这一边熙熙攘攘，语笑欢哗，那一边凄凉冷落，道无行人；这一边是生气勃勃，那一边是死趣沉沉；这一边灯火通明，摊肆林立，那一边家家闭户，街灯孤照；这一边是现实的人间，活泼的世界，那一边却是“别有天地”的“黄泉”似的地狱了。

“生”与“死”，面对面的站立着，从来没有那末相近，那末面对面的同时出现过。

他们之间相隔的不过是一堵墙，一道门，甚至不过一条麻绳，或几只竹架，或一道竹篱笆。惨痛绝伦的故事就在那一堵墙，一道门，或一条麻绳的一边演出；而别一边却在旁观着，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这封锁线，在上海，有大小圈之分；大的一圈包括四郊在内，小的一圈包括旧公共租界及旧法租界。临时的更小的封锁线却时时的在建立着，也不时的被撤除。

我没有进出过那大小两封锁线。听说，进出口的地方，都有敌兵在站岗，经过的人一定要对他脱帽行礼。无故的被扣留，不许通过，无故的被殴辱，被掌颊，拳打，脚踢，被枪柄击，甚至，被刺刀杀死的事，时时发生。有一次，一个大雪天，一个归家的旅人，偷偷的越过竹篱笆。当夜，不曾被发觉。第二天，巡逻的敌兵经过，跟循着雪地上的足迹，到了他家，把这人捉住，不问情由

的当场斩首，悬在竹篱笆上示众。

米贩子被阻止，被枪杀的故事，听到的更多。一个车夫告诉我：他经过封锁线时，眼见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负着一小袋米，被敌兵把米袋夺下，很随便的把刺刀戳进这童子的肚上。惨叫不绝。没有一个人敢回头看一眼。后来，这半死的童子被抛进附近的一条小河里去了。

更惨的是，被刺刀杀而未死的人，一直被抛在地上，任他喊叫着多少天才死去。没有一个人敢去救，敢去问一声讯。

南市某一个地方被封锁，经过了好久的时间才开放。封锁线内，饿死了不少人。但没有一个人敢于越线而逃出。有人向线内抛进馒首一类的食物，但也不能救活多少人。默默的被拦在"死亡线"内；默默的受饥饿而死。这不可思量的可怕的耐受苦难与厄运的精神啊！

为了一件小小的盗劫案或私人暗杀案，也往往造成敌人把上海最繁华地带封锁了十天八天的。大新公司至先施公司的一段，便这样的被封锁了不止二次三次。有种种最残酷、最恐怖的传说流行着。

多少人不知怎样的便失踪了；多少人便无缘无故的被饿死在街衢间了！

我亲自看见一幕蒲石路被封锁的情形。

在一个夜间，有一个住在那个地方的伪军军官被暗杀。这个事件一发生，那一带立刻便被封锁。出事的地点的四周都用一根麻绳拦住。居民们总有十万人以上被阻止不能进出。访友进去的，无端的不能归去了；出外办事的人，无端的到了街口，不得其门而入。最惨的是：小贩们和人力车夫们，只好在冷清清的街上徘徊着，徬徨无措，茫然的睁着大眼睛，望着封锁线外，一筹

莫展。最后，还被赶到小弄里去。那恐怖失神的一双双眼睛，简直象牵到屠场去的牛群。我不敢多看，也不能多想象。我只有满腔的愤怒。

这种封锁，平常总在十天左右便开放。开放的条件据说是若干百万的私赂。

临时的封锁，自二三小时至半天左右的，成了“司空见惯”的把戏。

有一天，我到三马路的一家古书铺去。已可望见铺门了，突然的叫笛乱吹，一队敌人的宪兵和警察署的汉奸们，把住了路的两头，不许街上的任何一个人走动。古书铺里的人向我招手，我想冲过街去，但被命令站住了。汉奸们令街上的人排成了两排，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各把市民证执在手上。敌兵荷枪站在那里监视着。汉奸们把一个个的人检查，盘问着。挟着包袱或什么的，都一一的被检察过。发现了几个没有带市民证的，把他们另外提到一边去。开始严厉的盘诘。

“市民证忘记了带出来。”

拍，拍，拍的一连串的挨了嘴巴，或用脚来乱踢一顿。

一个人略带崛强的态度，受打得格外利害。一下下掌颊的响声，使站在那一边的我，捏紧了拳头，涨红了脸；心脏中的血都要直喷出来。假如我执有一支枪啊！……

我永不会忘记，那个穿着黑色短衣裤的家伙或东西，喂得胖胖的，他的肥硕的手掌，打人打得最凶，那“助纣为虐”的东西，实在比敌人还要可恶可恨十倍！

好容易审诘完毕，又是一声长长的叫笛一响，那一批东西向北走，又向别的地域干着同样的把戏去了。

被封锁住的人们，吐了一口长气，如释重负。

我走进那家古书铺，双手还因受刺激而发抖着。

这样的情形，天天有得遇到。

早上出外做事的人，带着自己的生命和运命同走，不知晚上究竟能不能回家。等到踏进了自己家门口，才确切的知道，这一夜算是他自己的了。

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谁的生命会有保障呢？

这样的封锁线，天天不同的在变换着。谁也不能料到，今天在封锁线外的，明天或后天会不会被圈划进封锁线内去，默默的受苦受难，默默的受饥饿而死去。

在敌人的后方，生命的主权是不握在自己手里的。随时随地，最可怖的运命便会降临到他的，和他的一家的身上。

"生"和"死"，那间隔是如此的相近啊！

十　坠楼人

太阳和暖的晒在街上。行人熙来攘往，街车疾驰而过，一片的大都市的清晨的热闹的气象。仿佛谁都不知道这个大都市曾经经过了一番绝大的变动。

唯一看得出来的变化是，一所红砖的大房子，曾经在门口悬挂着星条旗的，如今换上了两面绝巨的旭日旗，旗的一角，几要拖在地面上。有一个敌兵荷枪立在门口守望着。行人们都远远的绕到对街走过。

离开这房子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大厦，向来是许多字号行庄在那里办公，进进出出的人不少。但近来忽然的减少起来。进进出出的别是一批人物。时时有土黄色的军用车停在前面。

穿海军装和陆军服的官兵们不断的在那里进进出出。谁也不知道那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关；谁也不曾到里面去过，虽然那里面有许多人从前是很熟悉的。

正在清晨，行人车辆都很热闹的时候，突然的有一团彩霞似的东西，从那所大厦上面的一个窗口倒掷了下来，很笨重的落在水门汀的行人道上。桃红色的鲜血飞溅了一地．那落下来的却是一个人。当时便昏倒，不呻吟一声的死了去。这是一个妙龄的女郎，穿着得很华丽，一身最时髦的装束，处处都可以看得出她是十分的雍容华贵。

群众们拥了上去看。但过了几分钟，敌兵们便走了来，把他

们驱散。谁也不知道这坠楼人是谁家的眷属，为了什么事而坠楼，或她的坠楼是被推落的还是出于自杀的。

当时在那一带办公的人们，目睹着这幕悲剧，曾纷纷藉藉的传说着。但过了几天，他们便都忘记了这事，也不再有什么人提起她来。

在报纸上找不出那一段消息和故事来。

这惨绝人寰的故事，和其他更惨酷的故事，都是同样的出于野兽般的敌兵们的手所表演着的。

这位妙龄女郎，听说是姓贝，一个大商人的儿媳妇。她有一个保管箱在一家外商银行里。

当敌兵占领了租界后，他们出了布告，要每个保管箱的主人都要到各外商银行里，会同他们开箱查验箱内的东西。

这位女郎带了钥匙到银行里去。她的保管箱里，多的是金饰和钻石之类，但没有一点违禁之物。

那个监视她的"兽"类，却动了心，为了物，也为了人，便不问情由的将她带到了那座大厦里去，将她囚禁于某一个房间里。

不知是一天或两天或仅半天，也不知她曾经遭遇到什么样的待遇，总之，她感觉到绝望和恐惧，便趁着监守者的一时疏忽，奋身从窗口跳到楼下自尽了。

这位有烈性的妇人，应该是受褒扬的，却没没无闻的不曾有人提起过。——这比绿珠还惨痛的一个故事，一个兽性的敌人所创造成功的悲剧，一个国家在抗战中受屠杀、伤害的人物的壮烈的牺牲。

这血仇，这牺牲，是应该由我们来报复的。

如果有什么"胜利勋章"的话，那勋章是应该首先献给一大批的死难者们的，而她也是其中之一。

十一　从“轧”米到“踏”米

江南人的食粮以稻米为主。“八·一三”后，米粮的问题，一天天的严重起来。其初，海运还通，西贡米，暹罗米还不断的运来。所以，江南的米粮虽大部分已为敌军所控制，所征用，而人民们多半改食洋米，也还勉强可以敷衍下去。其时米价大约二十元左右一担。但平民们已有亟亟不可终日之势。“工部局”开始发售平价米。平民们天一亮便等候在米店的门口，排了队，在“轧”米。除了排队上火车之外，这“轧”米的行列，可以说是最“长”，最齐整的了。穿制服的人，“轧”米有优先权。他们可以后到而先购，毋须排队。平民们都有些侧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

有些维持“秩序”的人，拿粉笔在每个排队的人的衣服上写上了号码。其初是男女混杂的，后来，分成了男女两队。每一家米店门前，每一队的号码有编到一千几百号的。有的小贩子，“轧”到了米，再去转卖。一天可以“轧”到好几次米，便集起来到里弄里去叫卖。以此为生的人很不少。

后来，主持平卖的人觉得这方法不好，流弊太多，小贩子可以得到米，而正当的籴米的人却反而挤不上去，便变更了方法，不写号码，而将每一个购过米的人的手指上，染了一种不易褪色的紫墨水。这一天，已染了紫色的人便不得再购第二次米。

但这方法也行了不久。“工部局”所储的米，根本不能维持

得很久。洋米的来源也渐渐的困难起来。米价飞跃到八十余元一担。

"轧"米的队伍更长了。常常的排到了一两条街。有的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坐在地上。有的带了干粮来吃。小贩们也常在旁边叫卖着大饼、油条一类的充饥物。开头，"轧"米的人，以贫苦者为多，以后，渐有衣衫齐整的人加入。他们的表情，焦急、不耐、忍辱、等候、麻木、激动，无所不有，但都充分的表示着无可奈何的忍受。为了太挤了，有的被挤得气都喘不过来。为了要"活"，什么痛苦都得忍受下去。有执鞭子或竹棒的人在旁，稍一不慎，或硬"轧"进队伍去，便被打了出去。有的，在说明理由，有的，只好忍气吞声而去。强有力的人，有时中途插了进去，后边的人便大嚷起来，制止着；秩序顿时乱了起来。为了一升米，或两升米，为了一天的粮食，他们不能不忍受了一切从未经过的"忍耐""等候"与"侮辱"。

米价更涨了。一升米的平售价值，也一天天的不同起来。然而较之黑市价格还是便宜得多，所以"轧"米的行列，更加多，更加长。

有办法的人会向米店里一担两担的买。然已不能明目张胆的运送着了。在黑夜里，从米店的后门，运出了不少的米。但也有纠纷，时有被群众阻止住了，不许运出。

最大的问题是"食"，是米粮。无办法的人求能一天天的"轧"得一升半升的米，已为满足；有办法的人储藏了十担百担的米，便可安坐无忧。平民们食着百元一担，或十元一升的米时，有办法的人所食的还是八元十元一担的米。

有许多"轧"米的悲惨的故事在流传着。因为"轧"不到米，全家挨饿了几天，不得不悬梁自尽的有之。因为"轧"米而家里

无人照料，失了窃，或走失了儿女的有之。因为“轧”米而不能去教书，或办事，结果是失了业的，也有之。携男带女的去“轧”米，结果还是空手而回。将旧衣服去当了钱，去“轧”米，结果，那仅有的养命的钱，却在排队拥挤中为弄手所窃去。

大多数的人家，米缸都是空的，米是放在钵里，罐里或瓶里，却不会放在缸里的。数米为饭的时候已经到了。有的人在计数着，一合米到底有几粒。他们用各种方法来延长“米”的食用的次数。有的搀合了各种的豆类，蚕豆、红豆、绿豆、黄豆，有的与山薯或土豆合煮。吃“饭”的人一天天的少了。能够吃粥的，粥上浮有多半的米粒的，已是少数的人家了。

如果有画家把这一时期的“轧米图”绘了出来，准比《流民图》还要动人，还要凄惨。那一张张不同的憔悴的面容，正象征着经历了许多年代的痛苦与屈辱的中国人民们的整个生活的面容。

到了后来，“工部局”的储粮空了，同时，敌人们的压力也更大，更甚了，便借着实行“配给制度”的诱惑力，开始调查户口，编制“保甲”；百数十年来向来乱丝无绪的“租界”的户口，竟被他们整理得有条有理。

所谓“配给制度”，便是按着户口，发给“配给证”，凭证可以购买白米及其他杂粮和日用品。开头，倒还有些白米配给出来。渐渐的米的“质”“江河日下”了；渐渐的米的“量”也一天天的少下去了；渐渐的用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白米了。米的“质”变成了“糠”多“米”少，变成了泥沙多，米质有臭味，不能入口，变成了空谷多于米粒。这些，都是日本人所不能入口，所不欲入口的，所以很慷慨的分了一部分出来。至于我们所生产的香糯的白米呢，那是敌人们的军粮，老百姓们是没有份吃到的。

有几个汉奸，勾结了管理军粮的敌人们，窃出了若干白米或军粮，在黑市上卖了出来。上海人总有半年以上，能够在黑市上买得到真正的白米或杜米。那不能不归功于那些汉奸们的作弊之功——从老虎嘴里偷下了一小部分的肥肉出来。后来，这事被他们发现了，两个汉奸，侯大椿和胡政，便被他们枪决。从此以后，白米或杜米，在市面上便更少见到了。“一二·八”珍珠港事变以后，海运完全断绝了，连日本本土的白米也要“江南”地方来供给，白米的来源，便更加艰难，稀少起来。

上海区的人民们，如果有力量，不愿吃杂粮或少吃杂粮的，只好求之于少数的米贩子，那便是所谓“踏”米的人们。“踏”米的人，不过是一个代表的名辞，指的便是那批用自行车偷偷的从敌人的封锁线上，载运了少数米粮过来的人。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做着这种黑市交易。其他妇孺们和老年的人们也常常带了些米粮来卖。身上穿了特制的“背身”，“背身”前后面都有的，其中便储藏着白米，很机警的偷过了敌人的“检问所”。——其实，还是用金钱来买“过”的居多。他们常常的发生“麻烦”；最轻的处罚是将食米充公。封锁线的边缘上常见有许多的“没收”的白米堆积着。有的是“没收”后还被“打”，被“罚跪”。遇到敌人们不高兴的时候，便用刺刀来戳毙他们。如此遭害的人很不少。友人程及君曾绘了一幅《踏米图》，那幅图是活生生的一幅表现得很真切的凄惨的水彩画，是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的烙印。

为了食米的输入一天天的艰难起来，敌人们的搜括，一天天的加强加多起来，米价便发狂的飞涨着。从伪币一千元两千元一担，到四千元，八千元一担。后来便是一万元，五万元的狂跳着。最后，竟狂跳到一百万元左右一担；最高峰曾经到过二百万

一担的关口。平民们简直没有吃到“白米”的福气。连所谓“二号米”，“三号米”也难得到口。许多人都被迫改食杂粮，从面粉到蚕豆、山薯，只要是能够充饥的东西，没有不被一般人搜寻着。饭店里也奉命不许出卖白米饭；有的改用面食；有的改用所谓“麦饭”。白米成了最奢侈的、最珍贵的东西。“配给制度”也在无形中停顿了。——从半个月配给一次，到一个月两个月配给一次，直到了“无形停顿”为止。

食粮缺乏的威胁，不仅使一般平民们感受到，即有力食用白米者们也都感受到了。肉和鱼和蔬菜还有得见到，白米却都到了敌人们的“仓库”里去了。前些时，听说烟台的人请客，食米要自己随身带去。江南产米区的人们，这时也有同样的情形。历史上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皇帝，遇到荒年，饥民遍野，他提议说，“何不吃肉糜？”这时，倒的确有这样的“事实”了。吃肉糜易，吃白米饭却难。

假如胜利不在八月里到来的话，在冬天，饿死的人一定要成坑成谷的。然而江南产米区并不是没有米。米都被堆藏在敌人的仓库里，一包包，一袋袋堆积如山，任其红腐下去。他们还将米煮成了“饭”，做成了罐头，一罐罐的堆积着，以备第二年，第三年的军粮。

什么都被掠夺，但食粮却是他们主要的掠夺的目的物。我尝经过几个大厦，那里面的住户都已被赶了出去，无数的卡车，堆载着白米，往这些大厦里搬运进去。雪白香糯的米粒，漏得满地，这不是白米！然而沦陷区的人民们是分润不到一粒的！德国人对占领地的许多欧洲人说，“德国人是不会饿死的；你们不种田，不生产，饿死的是你们；最后饿死的才是德国人。”这话好不可怕！日本人虽然没有公开的说这句话，然而他们实实

在在是这样做着的。

假如天不亮，我们是要首先饿死了的！

好不可怕的一场噩梦！

十二　韬奋的最后

韬奋的身体很衰弱，但他的精神却是无比的踔厉。他自香港撤退，历尽了苦辛，方才到了广东东江一带地区。在那里住了一时，还想向内地走。但听到一种不利于他的消息，只好改道到别的地方去。天苍苍，地茫茫，自由的祖国，难道竟摈绝着他这样一位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的子孙么？

他在这个时候，开始感觉到耳内作痛，头颅的一边，也在隐隐作痛。但并不以为严重。医生们都看不出这是什么病。

他要写文章，但一在提笔思索，便觉头痛欲裂。这时候，他方才着急起来，急于要到一个医诊方便的地方就医。于是间关奔驰，从浙东悄悄的到了上海。为了敌人们对于他是那样的注意，他便不得不十分的谨慎小心。知道他的行踪的人极少。

他改换了一个姓名，买到了市民证，在上海某一个医院里就医。为了安全与秘密，后来又迁徙了一二个医院。

他的病情一天天的坏。整个脑壳都在作痛，痛得要炸裂开来，痛得他终日夜不绝的呻吟着。鼻孔里老淌着脓液。他不能安睡，也不能起坐。

医生断定他患的脑癌，一个可怕的绝症。在现在的医学上，还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夫人跟随在他身边。医生告诉她：他至多不能活到二星期。但他在病苦稍闲的时候，还在计划着以后的工作。他十分焦急的在等候他的

病的离体。他觉得祖国还十分的需要着他，还在急迫的呼唤着他。他不能放下他的担子。

有一个短时期，他竟觉得自己仿佛好了些。他能够起坐，能够谈话，甚至能够看报。医生也惊奇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病理上被判定了死刑和死期的人怎么还会继续的活下去，而且仿佛有倾向于痊愈的可能，医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时期，他谈了很多话，拟定了很周到的计划。但他也想到，万一死了时，他将怎样指示他的家属们和同伴们。他要他的一位友人写下了他的遗嘱。但他却是绝对的不愿意死。他要活下去，活下去为祖国而工作。他想用现代的医学，使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

他有句很沉痛的话，道："我刚刚看见了真理，刚刚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难道便这样的死了么？"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真实的需要生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祖国。

他的精神的力量，使他的绝症支持了半年之久。

到了最后，病状蔓延到了喉头。他咽不下任何食物，连流汁的东西也困难。只好天天打葡萄糖针，以延续他的生命。

他不能坐起来。他不断的呻吟着。整个头颅，象在火焰上烤，象用钢锯在解锯，象用斧子在劈，用大棒在敲打，那痛苦是超出于人类所能忍受的。他的话开始有些模糊不清。然而他还想活下去。他还想，他总不至于这样的死去的。

他的夫人自己动手为他打安眠药的针，几乎不断的连续的打。打了针，他才可以睡一会。暂时从剧痛中解放出来。刚醒过来的时候，精神比较好，还能够说几句话。但隔了几分钟，一阵阵的剧痛又来袭击着他了。

他的几个朋友觉到最后的时间快要到来，便设法找到我蛰居的地方，要我去看望他 我这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在上海和他的病情。

我们到了一条冷僻的街上，一所很清静的小医院，走了进去。静悄悄的一点声息都没有。自己可以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

我们推开病室的门，他夫人正悄悄的坐在一张椅上，见我们进来，点点头，悄悄的说道："正打完针，睡着了呢。"

"昨夜的情形怎样？"

"同前两天相差不了多少。"

"今早打过几回针？"

"已经打了三次了。"

这种针本来不能多打，然而他却依靠着这针来减轻他的痛楚，医生们决不肯这样连续的替他打的，所以只好由他夫人自己动手了。

我带着沉重的心，走近病床。从纱帐外望进去，已经不大认识，躺在那里的便是郁奋他自己了。因为好久不剃，胡须已经很长，面容瘦削苍白得可怕。胸部简直一点肉都没有，隔着医院特用的白单被，根根肋骨都隆起着。双腿瘦小得象两根小木棒。他闭着双眼，呼吸还相当匀和。

我不敢说一句话，静静的在等候他的醒来。

小桌上的大鹏钟在的嗒的嗒的一秒一秒的走着。

窗外是一片灰色的光，一个阴天，没有太阳，也没有雨，也没有风。小麻雀在唧唧的叫着，好象只有它们在享受着生命。

等了很久，我觉得等了很久，郁奋在转侧了，呻吟了，脓水不断的从鼻孔中流出。他夫人用棉花拭乾了它。他睁开了眼，眼光还是有神的。他看到了我，微弱的说道："这些时过得还好

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挣扎出来的。

我说,"没有什么,只是躲藏着不出来。"

他大睁了眼睛还要说什么,可是痛楚来了,他咬着牙,一阵阵的痉挛,终于爆出了叫喊。

"你好好的养着病吧,不要多说话了。"我忍住了我要问他说的话,那么多要说的话。连忙离开了他的床前,怕增加他的痛楚。

"替我打针吧,"他呻吟的说道。

他夫人只好又替他打了一针。

于是隔了一会,他又闭上了眼沉沉睡去。

病房里恢复了沉寂。

我有许多话都倒咽了下去,他也许也有许多话想说而未说。我静静的望着他,在数着他的呼吸,不忍离开。一离开了,谁知道是不是便永别了呢?

"我们走吧,"那位朋友说,我才矍然的从沈思中醒来。我们向他夫人悄悄说声再会,轻轻的掩上了门,退了出来。

"恐怕不会有希望的了。"我道。

"但他是那末样想活下去呢!"那个朋友道。

我恨着现代的医学者为什么至今还不曾发明一种治癌症的医方,我怨着为什么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设法治愈了他的这个绝症。

我祷求着,但愿有一个神迹出现,能使这个祖国的斗士转危为安。

隔了十多天没有什么消息。我没有能再去探望他,恐怕由我身上带给他麻烦。

有一天,那位朋友又来了,说道:"韬奋昨天晚上已经故世了!今天下午在上海殡仪馆大殓。"

我震动了一下，好几秒钟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低了头，默默的为他志哀。

固然我晓得他要死，然而我感觉他不会死，不应该死。

他为了祖国，用尽了力量，要活下去，然而他那绝症却不容许多活若干时候。

他是那样的不甘心的死去！

我从来没有看见象他那样的和死神搏斗得那末利害的人。医生们断定了一二星期死去的人，然而他却继续的活了半年。直到最后，他还想活着，还想活着为祖国而工作！

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毅力！忍受着半年的为人类所不能忍受的苦，日以继夜的忍受着，呻吟着，只希望赶快愈好，只愿着有一天能够愈好，能够为祖国做事。

然而他斗不过死神！抱着无穷的遗憾而死去！

他仍用他的假名入殓，用他的假名下葬，生怕敌人们的觉察。后来，韬奋死的消息，辗转的从内地传出；却始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是死在上海的。敌人们努力的追寻着邹韬奋的线索，不问生的或是死的，然而他们在这里却失败了！他们的爪牙永远伸不进爱国者们的门缝里去！他们始终迷惘着邹韬奋的生死和所在地的问题。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成群的携着鲜花到韬奋墓地上凭吊了！凭吊着这位至死还不甘就死的爱祖国的斗士！

十三　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

在昏雾的敌伪统治之下，具有正义感与民族意识的人士们有几个能够“苟全性命”的呢？陆蠡的死，最可痛心。他把那些敌人们当作“有理性”的“人”看待，结果却发现他们原来是一群兽，于是便殉难而亡。

其他不知名的死难者们更不知有多少。我们应该建立一座“无名英雄墓”来作永久的追念。

至于遭难被囚，幸而不死者，则在朋友们里，非常的多。有一天，在一位朋友的宴会上，在座的人，十个之中，有八个遭过难，受过敌伪的酷刑毒打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是幸免入狱受苦的人。

我自己不知怎样竟会逃过此厄；大半是要感谢遭难的朋友们的爱护，宁愿自己吃尽了苦，却绝对的不肯攀引出自己的同伴们出来。这种精神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假如说，我们这一次抗战的胜利不完全是幸致的话，那末，主要的致胜之因，要归功到这种“不屈”的烈士的，或民族的英勇的精神的。

上海撤守后，首先遭难的有王伍本君。王君是国立暨南大学的学生。不知什么缘故，敌人竟到校来捕捉他。他攀住扶梯不肯走，但终于被强力拖抱而去。至今不知下落。校方曾向警局告警，但敌人取出证件，证明王君是日籍的台湾人，他们乐得袖手旁观。后来听说，王君的被捕，是为了逃避兵役。祝福这位

反战的英雄，不忘祖国的壮士，但愿他至今还无恙的生存着，能够目睹台湾之重入祖国的怀抱！

第二个遭难的是吴中修先生。他是暨大的训育主任，一位最正直无私的君子人。伪方屡次的要强迫他加入伪组织，他都严辞拒绝之。有一次，他步行到校办公，校门口有一部黑色的汽车停在那里。旁边有几个彪形大汉，一见他来，便捉住了他，要强拖他进汽车。他竭力的抵抗着，挣扎着，竟得挣脱了他们的捉捕，逃进校门。这时，围观的闲人们已经聚得很多，他们只好开了汽车逃去。据说，当时幸而他们未带手枪，否则，中修先生一定不会幸免的。

"一二·八"后，许广平女士是朋友们中最早遭难被捕的。她和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民众团体有很深的关系。但她咬紧了牙根，不吐露丝毫的消息给他们。她自己吃尽了苦，然而却保全了整个团体和无数的朋友们。——我也是其中的一人——她出狱后，双腿已不良于行，头发白了许多。她是怎样的拚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同伴们！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女战士和女英雄！

夏丏尊先生无端的在一个清晨被捕了。他临走时，说："通知老板一声吧。"

敌人们立刻追着问老板是谁，于是章雪村先生也因之连带的陷入魔手了。

他们虽没有受刑，然而天天的审问、盘查是很不好受的。

雪村先生出狱后，曾示我以狱中所作数诗；其一云："日食三餐不费钱，七时早起十时眠。一瓯香饭抟云子，半钵新茶泼雨前。汤泛琼波红滟滟，盐霏玉屑碧芊芊。煤荒米歉何须急，如入桃源别有天。"其二云："一日几回频点呼，噎凄尼散哈栖枯。低

眉敛座菩提相，伸手抢羹饿鬼图。运动憧憧灯走马，睡眠簇簇罐藏鱼。剑光落处山君震，虎子兼差摄唾壶。”其三云：“执戈无力效前驱，报国空文触网罟。要为乾坤扶正气，枉将口舌折侏儒。囚龙锻凤只常事，屠狗卖浆有丈夫。惭愧平生沟壑志，南冠亏上白头颅。”

他们出狱后，告诉我们说，经过这十多天的“非人生活”后，简直什么苦都可以吃得消。粗茶淡饭的生涯，不啻是人间天堂。

和他们同时“进去”的有好几十个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师们。听说他们吃了不少苦，不久，也都被释放了。

友人赵景深的夫人李女士也因友人的牵连而被捕了去。

杜纪堂先生的夫人赵女士，因为内地寄了一封信给杜先生，信壳上写了她的姓名，因此也被捕。她是笃信基督教的，在狱中默念天主，心里倒很宁静。她被威胁，被劝诱，但绝对的不肯说出杜先生的所在。杜先生得脱于难，连忙避到内地去。

柯灵先生很早的被敌伪所注意。敌人们常常找他谈话，但想利用他的线索，追究很多人。他不泄漏任何的事与人。有一天，我在一家茶室里和他遇到了。我向他招呼着，但他暗中使一个眼色，我连忙的坐了下去，不作理会。原来他的隔座便有一个敌人的密探在着。最后，敌人们对他绝望了，便捕了去，用了种种的酷刑，要他招说。他紧闭着嘴，什么也不说。出来后，他告诉友人们说，受刑不住时，心无杂念，只拚一死；除了“妈呀”的喊着外，别无他话。

李健吾、孔另境先生和杨绛女士们都曾被捕，也都曾吃苦，但他们也都没有使同伴们牵连的被捕。敌人们迫胁着要他们开名单，他们所开的却都是绝不相干的人。

冯宾符先生“进去”了不止一次。每次都很有幸的被盘问后

便放出。最后一次，他们把他拖到一个池塘边上；池塘里放着蛇、蜈蚣，等等的毒虫，水有一人多深。他们说，他如果不招，便要掷进这池塘里去。他坐在地上，他们用足踢，用手推。但他在草地上滚了开去，终得幸免于此难。后来，被释放后，总有一两个月，他的精神，还是惊恐不安，举止还是失常。

还有个朋友，无故被捕了去，经过一个月，被放了出来，头上的发通通的变白了，我几乎不认识他。

这些朋友们，遭了难，吃了苦，为了救全同伴们，宁愿自己牺牲；有多少的同伴们因此得以保全无恙；这精神是如何的伟大！

这些遭难的朋友们，只是我所知道的遭难人们中的最少数的人们；大多数的青年人们吃的苦也许更深，受的刑也许更酷更惨，然而为了祖国，他们忍受了一切。

多少人是失了踪，死了，多少人是变成残废了。

然而祖国终于是得救了！

十四　记吴瞿安先生

我们对于终身尽瘁于教育事业，志不旁骛，心无杂虑的人，应该特别的致敬意。自中国教育制度改革以来，这样诚笃忠恳的教员们，所在多有，但更多的却是借了做教员为“登龙之术”，为阶梯，为过渡，为暂时的安身之地，一有机会，便飞了开去。吴瞿安先生是一位终身尽瘁于教育事业的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岗位。他从二十七岁(宣统二年)任职于存古学堂起始，在南京第四师范教了一年，在上海民立中学教了四年，在北京大学教了六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了近五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两校兼教了两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了七年，直至民国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起来后，始避寇西迁，不复以舌耕为业。他自汉口转寓湘潭，再迁桂林，转至昆明，于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卒于云南大姚县李族屯，年五十六。没有多少人象他那样的专心一志于教育事业的。他教了二十五年的书，把一生的精力全都用在教书上面。他所教的东西乃是前人所不曾注意到的。他专心一志的教词、教曲，而于曲，尤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他的门生弟子满天下。现在在各大学教词曲的人，有许多都是受过他的熏陶的。

教词的人，在北方有刘毓盘先生；教曲的人却更少了。在三十年前，曲是绝学。王国维先生写过《宋元戏曲史》，写过《曲录》，但他不曾教过曲。他是研究“曲史”的，对于“曲律”一类的学问，

似乎并不曾注意过。瞿安先生却兼长于"曲史"与"曲律"。他自己会唱"曲"，会谱"曲"。在今日，能谱"曲"的人恐怕要成为"广陵散"了。

二十多年前，我还不曾和瞿安先生相识，有一次，和几位朋友游天平山，前面有一只船，在缓缓的荡着，有一个人和着笛声在唱曲。唱得高亢而又圆润。一位朋友道："瞿安先生在前面船上呢。""是他在唱么？""是的。"因为我们这只船也是缓缓的荡着的，始终没有追上，所以我们没有见面。

后来，我到南京去访"曲"，才拜访瞿安先生。我们谈得很起劲。又一次，我到苏州去找他，在他书房里翻书，见到了不少异书好曲。他从来不吝惜任何秘本。他很殷勤的取出一部部的明刊传奇来。我有点应接不暇。我们一同喝着黄酒，越谈越起劲。他胸中一点城府也没有，爽直而恳挚。说到后来，深以这"绝学"无后继者为忧。他说道："我几个孩子，都不是研究曲子的。"言下仿佛"深有憾焉"似的。但我后来知道，他有一位世兄，也是会唱曲的。有人说他会使酒骂座。这不尽然。他喝了酒，牢骚更多是实在的。但并没有"狂书生"的习气。我们说起董康刻的《咏怀堂四种曲》。他说，"原本在我这里呢，董刻妄改妄增的地方不少。我一定要发其覆。"原本很模糊，是很后印的本子了，所以董刻本便大加改动。我很高兴瞿安先生能够加以纠正。可惜他后来始终没有动笔。这本子不知乱后尚在人间否。此志一定要有人完成他才好。

我向他借了好多明刊本传奇照了相，还借了他的一批《周宪王杂剧》的原刻序跋，这些序跋他印《奢摩他室曲丛》时还没有得到，所以不曾印入，他都慨然的允诺了。如果没有他这一批序跋，我对于《周宪王杂剧》的研究是不会完成的。

“一·二八”倭变时，他的《奢摩他室曲丛》三四集虽已印好，却全部毁失，连带的把他待印的若干珍贵曲本也都烧掉。这不是金钱所能赔偿的。事后他给我一封信道：“曲者不祥之物也。”可以说是“伤感”之至了！然而他并不灰心。有好曲，他还是要收罗。他见到我的唐英《古柏堂传奇》和《青楼韵语》都借了去钞。他的曲子还保存得不少。他仍然在中央大学教他的词曲。他在这时期，为我的《清人杂剧二集》写了一篇序。

我们并没有见过多少次面，但彼此的心是相印的。不仅对于我，对于一切同道者，他都如此。他把所藏的善本曲子，一无隐匿的公开给他的学生们。友人任中敏、卢冀野二先生都是研究“曲子”的，得他的助力尤多。中敏在北大，冀野在中大，都是听他的课的。有许多教授们，特别是在北方的，都有一套“杀手锏”，绝对的不肯教给学生们。但瞿安先生却坦白无私，不知道这一套法术。他帮助他们研究，供给他们以他全部的藏书，还替他们改词改曲。他没有一点秘密，没有一点保留。这不使许多把“学问”当作私产，把珍奇的“资料”当作“独得之秘”而不肯公开的人感到羞愧么？假如没有瞿安先生那末热忱的提倡与供给资料，所谓“曲学”，特别是关于“曲律”的一部分，恐怕真要成为“绝学”了。王静安先生走的是“曲史”一条路，但因为藏曲不多，所见亦少，故于明清戏曲史便没有什么大贡献。他的《曲录》是一部黎明期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完美无疵的目录。至于瞿安先生则对于此二代的戏曲及散曲，搜罗至广；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次才被发现的。经过他加以选择与研讨之后，泥沙和珠玉方才分别了开来。我们研究戏曲和散曲，往往因为不精曲律，只知注意到文辞和思想方面，但瞿安先生则同时注意到他们的合“律”与否。因之，他的批评便更为严刻而深邃。

他的藏书，除曲子以外，还有不少明版书。他榜其书斋曰百嘉室，意欲集合一百种明嘉靖刊本于此室；但似乎因为力量不够，一百种的嘉靖刊本始终没有足额。当他西迁时，随身携带了好几箱的书去，其中当然以曲子书为最多。其余的书都还藏在苏寓。经此大劫，好象还不曾散失。在滇的书，则已由他的学生们在清理编目。这一批宝藏是瞿安先生一生精力之所聚，最好能够集中在一处，由国家加以保存，庋藏在某一国立图书馆，或北京大学或中央大学图书馆中，特别的设一纪念室（或即名为"百嘉室"吧）以作瞿安先生的永久的纪念。这个提议，我想他的朋友们和学生们一定会赞成而力促其实现的。已印的《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和第二集，仅不过是瞿安先生所藏的精本的一小部分。其他重要的资料还很多；一旦公开了，对于研究曲子的人，一定是很有作用的。而于瞿安先生一生坦白无私，不以资料为己有的精神，也更能够发挥而光大之。

瞿安先生早年曾写了不少剧本；杂剧有《暖香楼》，写《板桥杂记》所载姜如须与李十娘事；《落茵记》，写一女学生堕落的事；《无价宝》，为祝秉纲题黄荛圃《鱼玄机诗思图》而作，"末麈觞咏，不过陈藏家故实"而已；《惆怅爨》为《四声猿》型的北曲，凡五折，演四个故事，一为《香山老放出杨枝妓》，二为《湖州守乾作风月司》（二折），三为《高子勉题情国香曲》，四为《陆务观寄怨钗凤词》，《轩亭秋》，记秋瑾被杀事，仅见楔子一套。传奇有《苌弘血》（未见传本），写戊戌政变事；《风洞山》，写明末瞿忠宣尽节事；《东海记》，写孝女殉姑被诛事；《双泪碑》，写江柳侬事；《绿窗怨记》，为一言情之作。又有《白团扇》及《义士记》，俱未见传本。后又将《暖香楼》改写，易名为《湘真阁》，曾见伶人演唱，但在中年以后，他却不曾有过什么新作。

他的剧本有一个特色，便是鼓吹民族主义，大都写于清末，为那时候的民族革命者作鼓吹宣传之用，象《长弘血》，《暖香楼》，《轩亭秋》和《风洞山》，全都是的。他尽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个革命者的任务。这与他的慷慨激昂的性情很相合的。凡是一个性情真挚，坦白的人，殆无不是走在时代之前或与时代一同迈步前进的。虽他所用的工具是南北曲，是不大能够演奏的昆腔，然而他是尽了他的一分责任的。

他的《霜厓曲录》，《霜厓词录》及《霜厓诗录》，也多慷慨激昂之作。

他很早的便写了一部《词余讲义》和《顾曲尘谈》及《奢摩他室曲话》。后来又写了《词学通论》，《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ABC》，《南北词简谱》诸书。而于《南北词简谱》用力尤深。他所选编的书则有《古今名剧选》，《曲选》及《奢摩他室曲丛》初二集。对于曲史的研究，曲律的探讨，资料的传布，他都尽了很大的心力。从前鄞县姚梅伯（燮）也对曲子很用心，曾作了一部《今乐考证》，选了一部《新乐府选》但总没有他那末于曲子的各方面无不接触到，而且无不精研深究的。

他讳梅，字瞿安，（瞿一作臞或癯）一字灵鳷，号霜厓，吴县人。（原为长洲县学诸生，民国后长洲并入吴县。）清末，尝两应江南乡试，不中，即弃去。一游河南，入河道曹某幕，不久，也就南归。自此，便以教学为终生的事业。

十五　记复社

敌人们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其社址何在。敌人们用尽种种方法，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

复社在敌伪统治的初期，活跃于上海的一个比较自由的小圈子里，做了不少文化工作，最主要的一个工作，便是出版《鲁迅全集》。

复社是一个纯粹的为读者们而设立的一个出版机关，并没有很多的资本。社员凡二十人，各阶层的人都有。那时，社费每人是五十元；二十个人，共一千元。就拿这一千元作为基础，出版了一部《鲁迅全集》。

当初，几个朋友所以要办复社的原因，目的所在，就是为了要出版《鲁迅全集》。这提议，发动于胡愈之先生。那时候，整个上海的出版界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根本不想出版什么书。象《鲁迅全集》，也许有几家肯承印，肯出版，但在条件上也不容易谈得好。

"还是我们自己来出版吧，"留在上海的几位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人这样的想着。

先来组织一个出版机关，这机关便是复社。

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并不轻松。以景宋夫人为中心，搜辑了许多已刊、未刊的鲁迅先生的著作，加以整理，钞写，编排次序，

然后付印。许多朋友，自动的来参加校对的工作。煌煌廿巨册的大著，校对的事，实在很不容易。王任叔先生在这一方面和编辑方面，所负的责任最多。但假如没有许多热情的帮助，他也是“单丝不成线”的。

印刷的经费呢？资本只有一千元，还不够排印一本。复社开了社员大会，议决，先售预约。直接与读者们接触，不经过“书店”的手。记得那时的定价是：每部八元五角。我们发动了好些人，在各方面征求预约者。同时，为了补救印刷费的不足，另印一部分“纪念本”，定价每部五十元及一百元，纪念本的预定者也很不少。

居然，这煌煌廿巨册的《鲁迅全集》，象奇迹似的，在上海，在敌伪环伺侦察之下，完成出版的工作了！纪念本印得十分的考究。普通本也还不坏。主持印刷发行的是张宗麟先生，他也是专心一意的在埋头苦干着。

最可感动的是，处处都可遇到热情的帮助与自动的代为宣传，代为预约，代为校对。众力易于成事，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工作，虽发动于复社，虽为复社所主持，而其成功，复社实不敢独居。这是联合了各阶层的“开明”的“正直”的力量才能完成之的。

而复社的本身，虽然只有二十个社员，而且决不公布其组织与社员们的名单，而在当时，这二十位社员的本身，便也代表了“自由上海”的各阶层“开明”的与“正直”的力量。

复社还做了些其他的出版事业。她不以牟利为目的，所以基础并不稳固，营业也不能开展。所可喜悦的，便是这一股力量，这一股联合起来的力量。谁都呈献点什么，谁都愿意为“社”而工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复社里可以说表现得最

充分。

这二十个社员，虽然不常常聚会，但团结得象铁一样的坚固。没有一个人对外说起过这社是怎样组织的。关于这社的内容，这是第一次的“披露”。

敌人们疑神疑鬼了很久，侦察了很久，但复社是一个铁桶似的组织，一点缝儿也被他们找不到。经营了近四年，却没有出过一会乱子。可见爱护她的人之多，也可见她的组织的严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社的社员们留在上海的已经很少了。这少数的人开了一次会，决定，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复社的存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便立即作着种种解散的工作。存书与纸版都有很妥善的处置办法。复社起来的时候，象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海涛跳拥，声势极盛；但在这时候，结束了时，也立即烟消云散，声息俱绝。

敌人们和敌人的爪牙们虽曾用了全力来追寻复社的踪迹，但象奇迹似的起来，也象奇迹似的消失了去，他们简直无从捕风捉影起。

景宋夫人的被捕，受尽了苦，但不曾吐露过关于复社的片语只言。她保全了许多的朋友们。

后来，听到不少关于敌人们和敌人的爪牙们怎样怎样的寻踪觅迹的在追找复社和复社的主持人的消息。也有不少人因复社的关系被捕过。但都没有吐露过关于复社的一丝一毫的事。冯宾符先生也是社员之一，他被捕过，且被传讯了不止五六次，但他们却始终不知道他与复社有关。

文化生活社的陆蠡先生被捕时，听说也曾向他追究过复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说出来呢？

一直到了敌人的屈膝为止，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

案卷，恐怕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吧。

其实，复社并不神秘。复社是公开的一个出版机关。复社与各方面接触的时候很多。知道复社的组织内幕的人很不少。但在各方面的维护之下，复社却很安全。

凡是敌人们所要破坏的，追寻的，必定要为绝大多数同情者们所维护，所保全的。复社便是一个例子。敌人们的力量永远是接触不到这无形的同情的绝大堡垒的。

复社的社员们，除了胡咏骐先生已经亡故了之外，都还健在；虽然散在天南地北，但都还不懈的为人民，为民主而工作。这个不牟利的人民的出版机关，复社，生长于最大多数的人民的同情的维护之中的，将来必会继续存在而且发展的。她虽停顿了一时，但并没有死亡。她将更努力的为最大多数的人民们服务。她的任务并没有终了。

人民需要这样的一个不牟利的出版组织。

读者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不牟利的为读者们服务的组织。

十六　“废纸”劫

收集故纸废书之风，发端于数载之前，至去岁而大盛，至今春而益烈，迨春夏之交，则臻于全盛之境矣。初仅收及废报及期刊，作为所谓还魂纸之原料。继则渐殃及所谓违碍书，终则无书不收，无书不可投入纸商之大熔炉中矣。初仅负贩叫卖者为之，继则有一二小肆亦为之。后以利之溥而易获也，若修绠堂、修文堂、来青阁、上海旧书商店诸大古书肆亦为之矣。初仅收拾本肆中难销之书，残阙之本，论担称斤以售出，继则爪牙四布，搜括及于沪杭沪宁二铁路线之周围矣，又进而罗织至平津二市矣。于是舍正业而不为，日孳孳于惟废纸破书之是务。予尝数经来青阁、修文堂及上海旧书商店之门，其所堆积者，无非造纸之原料也。有教科书、有圣经、有杂志、有大部涩销之古书、有西书、有讲义，自洋装皮脊之过时百科全书、年鉴、人名录，以至石印之《十一朝东华录》，《经策通纂》，《九朝圣训》，以及铅印之《图书集成》残本，无不被囊括以去。每过肆，语价时，肆主人必曰：此书论斤时，亦须值若干若干，或曰：此书之值较论斤称出为尤廉，或曰：此书如不能售，必将召纸商来，论斤称付之。此或是实情实事。肆主人如急于求售，与其售之于难遇难求之购书者，诚不如贬值些许，售之于纸商之为愈也。商人重利，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岂有蝇蚋嗅得腥膻而不飞集者！于是古书之论值，除善本、孤本外，必以纸张之轻重黄白为别。轻者黄者廉，而重者白者昂，其为何等

书则不问也。其不能即售者，则即举而付之纸商，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书之可留应留与否则亦不问也。尝过市，有中国书店旧存古书七十余扎，凡五千余本，正欲招纸商来称斤去。予尝见其目，多普通古书，且都为有用者，若江刻《五十唐人小集》，《两浙輶轩录》，《杨升庵全集》，《十国春秋》，《水道提纲》，《艺海珠尘》等书，都凡七八百种。此类书而胥欲付之大熔炉中，诚可谓丧心病狂之至者矣！肆主人云：如欲留，则应立即决定，便可不至使之成废纸矣。予力劝其留售，肆主人不顾也。曰：至多留下二十许种市上好销者，余皆无用。并且指且言曰：某也不能销，某也无人顾问，不如论斤秤出之得利多而速也。予愕然无言。至他肆屡以此数十扎书为言，力劝其收下。彼辈皆不顾，皆以不值得，不易售为言。自晨至午，无成议，而某肆主急如星火，必欲速售去。予乃毅然曰：归予得之可也！遂以六千金付之，而救得此七八百种书。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属有天幸，数日后，有友复济以数千金，乃得免于室人交谪，乃得免于不举火。每顾此一堆书，辄欣然以为乐，若救得若干古人之精魄也。且此类事为予所未知者多矣。即知之，然予力有限，岂又能尽救之乎？戚戚于心，何时可已！每在乱书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实类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澜于既倒者复有谁人乎？惄然忧之，愤懑积中。尝遇某人，曰：家有清时外务部石印大本《图书集成》一部，欲售之，而无应者。以今日纸价论之，若作废纸称去，亦可得二万余金也。予俯而不答。呜呼，人间何世，浩劫未艾！今而后，若求得一普通古书，价廉帙巨，而尚为纸商大熔炉劫火未及者，恐戛乎其难矣。今而后，若搜集清代普通刊本，晚清石印、铅印本书，恐必将不易易矣。兵燹固可惧，然未

必处处皆遭劫也，穷乡僻壤，必尚有未遭兵燹之处，通都大邑亦必尚有未遇浩劫之地。禁毁诚可痛，然亦未必网罗至尽也；千密一疏，必有漏网者在；有心人不在少数，疏忽无知者，尤不可胜计；此皆鲁壁也。而今则大利所在，竭泽而渔，凡兵燹所不及，禁毁所未烬者，胥一举而尽之。凡家有破书数架，故纸一篓者，负贩辈必百计出之。不必论何种书也；不必视书之完阙也；不必选剔书之破蛀与否也。无须泾泾议价，更无须专家之摩挲审定，但以大称一，论担称之足矣。于是千秋万世之名著，乃与朝生暮死之早报等类齐观矣；于是一切断烂朝报，乃偕精心结构之钜作同作废纸入熔炉矣。文献之浩劫，盖莫甚于今日也！目击心伤，回天无力。惨痛之甚，几有不忍过市之感。彼堆积于市门者何物也？非已去硬面之西书，即重重叠叠之故纸旧书。剥肤敲脑，无所不至。（精明之贾，每截下一书空白之天头，以为旧纸，供修书之用。余谥之曰敲脑。）予但能指而叹曰：造孽，造孽！而市人辈则嬉笑自若，充耳不闻也。经此大劫，大江南北以及冀鲁一带之文献乃垂垂尽矣！伤哉！

这是去年秋天我所写札记中的一部分。《周报》索《蛰居散记》续稿，不及改写，遂以此付之。于体例上殊不相类也。

十七 售书记

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余。
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士礼居。
展向晴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
莫言自有屠龙技，剩作天涯稗贩徒。

以上是一个旧友的售书诗，这个旧友和我常在古书店里见到。从前，大家都买书，不免带点争夺的情形，彼此有些猜忌，劫中，我卖书，他也卖书，见了面，大家未免常常叹气，谈着从来不会上口的柴米油盐的问题。他先卖石印书，自印的书，然后卖明清刊本的书。后来，便不常在古书店见到他了。大约书已卖得差不多，不是改行做别的事，便是守在家里不出门。关于他，有种种的传说。我心里很难过，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再提起，这是一位在这个大时代里最可惜、惨酷的牺牲者。但写下他抄给我的这首诗时，我不能不黯然！

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那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

何的喜悦；也有永远配不全的，但就是那残帙也很可珍重，古宫的断垣残刻，不是也足以令人留连忘返么？那一本书虽是薄帙，却是孤本单行，极不易得；那一部书虽是同光间刊本，却很不多见；那一本书虽已收入某丛书中，这本却是单刻本，与丛书本异同甚多；那一部书见于禁书目录，虽为陋书，亦自可贵。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钜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虽绝不巧取豪夺，却自有其争斗与购取之阅历。差不多每一本，每一部书于得之之时都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作用。为什么舍彼取此，为什么前弃今取，在自己个人的经验上，也各自有其理由。譬如，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部明刊蓝印本《清明集》和一部道光刊本"小四梦"，价各百金，我那时候倾囊只有此数，那末，还是购"小四梦"吧。因为我弄中国戏曲史，"小四梦"是必收之书。然而在版本上，或在藏书家的眼光看来，那《清明集》，一部极罕见的古法律书，却是如何的珍奇啊！从前，我不大收清代的文集，但后来觉得有用，便又开始大量收购了。从前，对于词集有偏嗜，有见必收，后来，兴趣淡了些，便于无意中失收了不少好词集。凡此种种，皆寄托着个人的感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谁更会想得到，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得，好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么？我从来不肯好好的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的时候，卖书的要先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了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能不割售。摩挲着，仔细的翻看着，有时又摘抄了要用的几节几段，终于舍不得，不愿意把它上目录。但经过了一会，究

竟非卖钱不可，便又狠了狠心，把它写上。在劫中，象这样的“编目”，不止三两次了。特别在最近的两年中，光景更见困难了，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书”的主意，天天在忙于编目。假如天还不亮的话，我的出售书目又要从事编写了。总是先去其易得者，例如《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之类。《四部丛刊》，连二三编，我在前年，只卖了伪币四万元，百衲本《廿四史》，只卖了伪币一万元。谁想得到，在今年今日，要想再得到一部，便非花了整年的薪水还不够么？只好从此不作收藏这一类大部书的念头了。最伤心的是，一部石印本《学海类编》，我不时要翻查，好几次书友们见到了，总要怂恿我出卖，我实在舍不得。但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然而如今再求得一部，却也已非易了。其后，卖了一大批明本书，再后来，又卖了八百多种清代文集，最后，又卖了好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及其他杂书。大凡可卖的，几乎都已卖尽了！所万万舍不得割弃的是若干目录书，词曲书，小说书和版画书。最后一批，拟目要去的便是一批版画书。天幸胜利来得恰如其时，方才保全了这一批万万舍不得去的东西。否则，再拖长了一年半载，恐怕连什么也都要售光了。但我虽然舍不得与书相别，而每当困难的时光，总要打它的主意，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它！如果把积“书”当作了囤货——有些暴发户实在有如此的想头，而且也实在如此的做，听说，有一个人，所囤积的《四部丛刊》便有廿余部——那末，售去倒也没有什么伤心。不幸，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

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的在编目，在出售；不断的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望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到了今天，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好；凡是要用一部书，自己已经售了去的，想到书店里去再买一部，一问价，只好叹口气，现在的书已经不是我辈所能购致的了。这又是用手去剥创疤的一个刺激。索性狠了心，不进书店，也决心不再去买什么书了。书兴阑珊，于今为最。但书生结习，扫荡不易，也许不久还会发什么收书的雅兴罢。

但究竟不能不感谢"书"，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假如没有"书"，我简直只有饿死的一条路走！

十八　我的邻居们

我刚刚从汶林路的一个朋友家里，迁居到现在住的地方时，觉得很高兴；因为有了两个房间，一作卧室，一作书室，显得宽敞得多了；二则，我的一部分的书籍，已经先行运到这里，可读可看的东西，顿时多了几十倍，有如贫儿暴富；不象在汶林路那里，全部的书，只有两只藤做的书架，而且还放不满。这个地方是上海最清静的住宅区。四周围都是蔬圃，时时可见农人们翻土、下肥、播种；种的是麦子、珍珠米、麻、棉、菠菜、卷心菜以至花生等等。有许多树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时候，柳絮在满天飞舞，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一下雨，处处都是蛙鸣。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鸟声仿佛在喧闹。推开了窗，满眼的绿色。一大片的窗是朝南的，一大片的窗是朝东的；太阳光很早的便可以晒到。冬天不生火也不大嫌冷。我的书桌，放在南窗下面，总有整整的半天，是晒在太阳光下的。有时，看书看得久了，眼睛有点发花发黑。读倦了的时候，出去走走，总在田地上走，异常的冷僻，不怕遇见什么熟人。我很满足，很高兴的住着。

正门正对着一家巨厦的后门。那时，那所巨厦还空无人居，不知是谁的。四面的墙，特别的高，墙上装着铁丝网，且还通了电。究竟是谁住在那里呢？我常常在纳罕着。但也懒得去问人。

有一天早上，房东同我说，“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好么？”

我和他们，还有几个孩子，一同进了那家的后门。管门人和我的房东有点认识，所以听任我们进去。一所英国的乡村别墅式的房子，外墙都用粗石砌成，但现在已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花园很大，也是英国式的，但也已部分的被改成日本式的。花草不少；还有一个小池塘，无水，颇显得小巧玲珑，但在小假山上却安置了好些廉价的磁鹅之类的东西，一望即知其为“暴发户”之作风。

盆栽的紫藤，生气旺盛，最为我所喜，但可知也是日本式的东西。

正宅里布置得很富丽堂皇，但总觉得“新”，有一股无形的“触目”与触鼻的油漆气味。

“这到底是谁的住宅呢？”我忍不住的问道，孩子们正在草地上玩，不肯走。

房东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是周佛海的新居，去年向英国人买下的，装修的费用，倒比买房的钱花得还多。”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能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九、十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恨得我牙痒痒的，但实在无奈此恶邻何！

更可恨的是，他们搬进了，便要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我们也被调查了一顿。

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的在做菜烧汤，烟突里的煤烟，常常飞扑到我书桌上来。拂了又拂，终是烟灰不绝。弄得我不敢开窗。我现在不能不懊悔择邻的不谨慎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起来后，我的环境更坏了。四周围

的英美人住宅都空了起来，他们全都进了集中营。隔了几时，许多日本人又搬了进来。他们男人大都是穿军装的。还有保甲的组织，防空的练习，吵闹得附近人家，个个不安。

在防空的时候，他们干涉邻居异常的凶狠，时时有被打的。有时，我晚上回家，曾被他们用电筒光狠狠的照射着过。

有一天，厨房的灯光忘了关，也被他们狠狠的敲门打窗的骂了一顿过。

一个早晨，太阳光很好，出去走走，恰遇他们在练习空防。路被阻塞不通，只好再回过来。

说到通路，那又是一个厄运。本来有一条通路，可以直达大道，到电车站很近便。自从周佛海搬来后，便常常被阻塞。日本人搬来后，索性的用铁丝网堵死了。我上电车站，总要绕了一个大圈，多花上十分钟的走路工夫。

胜利以后，铁丝网不知被谁拆去了。我以为从此可以走大道了。不料又有什么军队驻扎在小路上看守着，不许人走过。交涉了几回也没用。只好仍旧吃亏，改绕大圈子走。

和敌伪的人物无心的做了邻居，想不到也会有那末多的痛苦和麻烦。

十九　秋夜吟

幸亏找到了小石。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整个夏天我以面包和凉开水作为午餐；等太阳下去，才就从那蛰居小楼的蒸烤中溜出来，嘘一口气，兜着圈子，走冷僻的路到他家里，用我们的话，“吃一顿正式的饭。”

小石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在教室里发问最多，先生们一不小心，就要受窘。但这次在忧患中遇见，他却变得那么沉默寡言了。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到内地去，也不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任务，当然不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庙弄，绝对不问我如今住在什么地方。

我突然的找到他了，突然每晚到他家里吃饭了，然而这仿佛是平常不过的事，早已如此，一点不突然。料理饮食的也是小石一位朋友的老太太，我们共同享用着正正式式的刚煮好的饭，还有汤，——那位老太太在午间从不为自己弄汤菜，那是太奢侈了。——在那里，我有一种安全的感觉。直到有一次我在这“晚宴”上偶然缺席，第二天去时看到他们的脸上是怎样从焦虑中得到解放，才知道他们是如何理解我的不安全。那位老太太手里提着铲刀，迎着我说：“嗳呀，郑先生，您下次不来吃饭最好打电话来关照一声啊，我们还当您怎么了呢。”

然而小石连这个也不说。

于是只好轮到我找一点话，在吃过晚饭之后，什么版画，元

曲，变文，老庄哲学，都拿来乱谈一顿，自己听听很象是在上文学史之类，有点可笑。

于是我们就去遛马路。

有时同着二房东的胖女孩，有时拉着后楼的小姐L，大家心里舒舒坦坦的出去“走风凉”，小石是喜欢魏晋风的，就名之谓“行散”。

遛着遛着也成为日课，一直到光脚踏屐的清脆叩声渐渐冷落下来，后门口乘风凉的人们都缩进屋里去了，我们行散的兴致依然不减。

秋天的黄昏比夏天的更好，暮霭象轻纱似的一层一层笼罩上来，迷迷糊糊的雾气被凉风吹散。夜了，反觉得亮了些，天蓝的清清净净，撑得高高的，嵌出晶莹皎洁的月亮，真是濯心涤神，非但忘却追捕，躲避，恐怖，愤怒，直要把思维上腾到国家世界以外去。

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谈性灵，谈人类的命运，争辩月之美是圆时还是缺时，是微云轻抹还是万里无垠。……

小石的住所朝南再朝南。是徐家汇路，临着一条河，河南大都是空地和田，没有房子遮着，天空更畅得开，我们从打浦桥顺着河沿往下走往下走，把一道土堆算城墙，又一幢黑魆魆的房屋算童话里的堡垒，听听河水是不是在流。

走得微倦，便靠在河边一株横倒的树干上，大家都不谈话。

可是一阵风吹过来了，夹着河水污浊的气味，薰得我们站起来。这条河在白天原是不可向迩的。“夜只是遮盖，现实到底是现实，不能化朽腐为神奇！”小石叹了口气。

觉着有点凉，我随手取起了放在树干上的外衣，想穿。“嗄！”L叫了起来：“有毛毛虫，”外衣上附着两只毛虫呢，连忙抖拍了

下去。大家一阵忙，皮肤起着栗，好象有虫在爬。

“不要神经过敏了，听，叫哥哥在叫呢。”

“不，那是纺织娘。”

“那里，那一定是铜管娘。”

“什么铜管娘，昆虫学里没有的名字。”

其实谁也没有研究过昆虫学。热心的争论起来了，把毛毛虫的不快就此抖掉。

“听，那边更多呢，”“那边更多呢。”

一路倾听过去，忽然有一个孩子的声音叫：

“在这里了。”

那是一个穿了睡衣裤的小孩，手里执着小竹笼，一条辫子梢上还系着红线，一条辫子已经散了，大概是睡了听见叫哥哥叫的热闹又爬起来的。

“你不要动，等我捉，”铁丝网那边的丛莽中有一个男人在捉，看样子很是外行，拿了盒火柴，一根根划着。

秋虫的声音到处都是，可是去捉呢，又象在这里，又象在那里，孩子怕铁丝网刺他，又急着捉不到，直叫。

小石也钻进丛莽里去了。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也停下来，放好了车，取下了车上的电石灯，也加入去捉了。

这人可是个惯家，捉了一会，他说，“不行，这样，你拿着灯，我们来捉，”原来的男人很听话的赶快把灯接过来，很合拍的照亮着。

果然，不一会，骑自行车的人就捉到了一只，大家钻出来，孩子喜欢得直跳。

骑自行车的人大大的手里夹着叫哥哥，因为感觉到大家欣

赏他的成功而害羞，怯怯的说道："给谁呢？给谁呢？"

原来在捉的男人就推给小石说："先给他吧，他不会捉的。"孩子也说："给你吧，我们还好再捉。"

小石被这亲热的退让和赠予弄得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走开去，说："那里，那里，我原不想要，我是帮你们捉的，"想想自己又不会捉，又改说："我不过凑凑热闹。"

我们也说："小妹妹别客气了，把它放在笼子里吧，看跳掉了。"

那个孩子才欢欢喜喜感谢地要了，男人和骑自行车的又钻进丛莽中去。

小石一边走，一边笑，一边咕噜，"我又不是小孩子。推给我做什么。"

L 说："人家当你比那个小孩还小啦。这又有什么可脸红的呢。"

于是小石就辩了："月亮光底下看得出脸红脸白么。"

其实我们大家都饫饮这善良的温情而陶然了。

走得很远，回过头去，还看得见丛莽里一闪一闪亮着自行车的摩电灯。

附　录

忆愈之

愈之姓胡氏，名学愚，上虞人，是一个苦学出身的学者。曾经相信过无政府主义，提倡过世界语，创导过写别字运动。他身材矮小，组织的能力却极强。我们在二十几年里，没有间断过一天的友谊。我们还同事过七八年，几乎天天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脸红耳赤的情形发生，他永远是心平气和的，永远是和蔼明朗的，只除了一次，他曾经受过极深刻的刺激，态度变得异常的激昂而愤慨。

那一次是清党的事件刚发生，他走过宝山路，足下踏着一堆的红血，竹篱笆旁，发现了好些被杀的尸身。他气促息急的跑到了商报馆，立刻便草拟致几位党国元老的代电。这是他从“编辑室”的生活转变到政治活动的开始，也是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实际行动者的开始。

他从巴黎经由莫斯科回国，使他思想变动了不少。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似较秋白的《赤都心史》尤得读者的赞颂。

我在北平教书的时候，他在上海正和宋庆龄杨杏佛诸位从事于济难会的工作。他始终站在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暴力，反对杀戮。

“九·一八”事件后，他成了最热忱的抗日家。他主编着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使这古老的定期刊物放射出异常焕烂的光

彩。然终于不为那古老的出版家所容，他不得不辞职以去。

他为开明书店主持《月报》的编辑，这是中国杂志界的一个创格的刊物。

他为生活书店创办《世界知识》，尽了不少介绍国际新闻和常识的功能。这杂志的性质，也是空前未有的。

他决定着《文学》的创刊，《太白》的出版，《中华公论》的编辑，《文学季刊》和《世界文库》的发行。最生气蓬勃的生活书店的一段历史乃是愈之所一手造成的。

《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也是他所一力主持着的，在那样人力物力缺乏的时候，但他的毅力却战胜了一切，使这二十巨册的煌煌大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

伟大悲壮的鲁迅葬礼的举行，也是他在策动着的。

他团结了许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做着救国运动，这运动的人物们在上海曾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直到“十二月八号”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才解体。

他组织了许多有力的刊物与团体，但从来不把持着他们；他总是“功成身退”的。除了几个最亲密的友朋们以外，外边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是那些刊物和团体的真正发动者和主持者。

他的眼光是那样的远大，他的见解是那样的明晰，他的思想是那样的澈底，他的心胸是那样的博大，人家被包罗在内而往往尚不自知。

他宽恕，他忠厚恳挚，对于一切同道的人，他从来没有一句“违言”，没有一点不满的批评。但他却坚定忠贞，从来不肯退让一步，从来不曾放弃过他自己所笃信的主张和立场，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在朋友们里，能够象他那样的伟大而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恐怕只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可以相提并论罢。

我从来不大预问外事，也最怕开会，但自从见到愈之把银行界的人物和百货公司的主持人也拉来开会以后，我不能不受感动，不能不把自己从“隐居”生活里跳出来了。

“八·一三”的淞沪战争失败以后，他便撤退到内地去。我们见面的机会少得多了。但他在上海一带所留下的影响还是极大。

我们在香港再见到几次。他那时又在那一带组织着很多，很重要的事业，象文化供应社便是其一。这个通讯社在国际宣传上有了很大的效果。

自此以后，我们便不再相见了。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和沈兹九，陈嘉庚都在新加坡。那时他正有计划的想在南洋一带发展一部分的事业。新加坡陷落后，对于他的安全，我和许多朋友们都特别的牵念着。有过种种不同的传说。

过了一年，他忽来了一张明片（当然是用的假姓名），说他是平安着。这使我们十分的兴奋和安慰。

日本投降的时候，从内地来的消息，说愈之已经在南洋病故。我不肯相信这悲惨的恶耗。象愈之那样的人，我总相信他是不会便这样的死去的。但消息渐渐的被证实了。听说《中学生》曾经出版过一个纪念他的专号。

难道愈之果真这样的便死去了么？我还是不能相信，不肯相信！

在无数的殉难死亡的朋友们里，没有比愈之的失去，更使我伤心，难受的了！

温和敦厚，信仰坚定的愈之，如果失去了，将是国家怎样大的损失呢？有多少的建国的工作正在等候着他来组织，来专心

一志的干着！他如果失去了，对于这些工作的事业，将有怎样大的影响呢？

我还是不相信他的病故的消息。但愿这只是“海外东坡”般的误传！

我祈祷着愈之的安健！为我们的国家也为许多的朋友们！

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写

关于愈之病故的误传，当时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但此文发表时，已证明是“海外东坡”之谣。现并录于此，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

补　遗

一　一个女间谍

我读着马黛赫她的传记，如读着福尔摩斯最精采的探案，如读着孙悟空的历险的故事；神往于她的冒险、闪避、隐伏、刺探、组织的技巧，她的出生入死，履险如夷的胆气。她的倾城一笑，笑得使闻者骨酥，受者忘死。她仪态万方的出现于血腥扑鼻的地方，在最紧张、最危险的当儿，救全了，或者陷害了几千几百乃至几万个健儿；她救全了，或者陷害了一城乃至一国的生命的安全。她如女神似的，不是维娜丝，却是狄爱娜，在柔若无骨，艳如桃李的绝代风姿里，却隐藏着一颗精钢铸就的心。她是摩登伽女，是鱼篮观音。谁知道她的娇声颤笑里是一声叱咤呢还是婉妮的柔情？谁知道她的轻盈的步履里，跳的是萨坦的舞曲呢还是人间的欢愉？谁知道她的迷阳城惑下蔡的一个娇好无比的人儿，想的是倾心的爱恋呢，还是在转着恶毒的念头？

这样的间谍的生活，在旁观者读来果然是眉飞色扬的，但在身当其冲的人，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线上进进出出的，好象走钢丝的女卖艺者一样，偶然的一个疏忽，便会从高空上摔了下来，就此了结了她的一生？

当更阑人静的时候，幽绿的灯光，照着倚在光滑柔暖的枕衾的人，舞倦了的，或半醺着的，身和心都感着劳瘁，这人是她，将有怎样的感触呢？轻荡着的柔情，强烈的厌恶，莫名的疲倦，异常的凄清，将交织着啮咬着她罢。

但只有一个最强大的热情，一颗爱祖国的心，把那些闲愁闲

恨全都扫荡了开去。她一切是为了祖国；为了祖国，她不惜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不惜牺牲色相；为了祖国，她不惜忍受着一切的厌恨与痛苦；为了祖国，她不惜佯羞假笑，假意儿伴着她所最厌恶的人；为了祖国，她不惜任何的迁就与委屈。

这爱祖国的心，便是那一颗不可动摇的精钢铸就的心，足够抵抗得住一切的诱惑和痛苦。

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女间谍的活跃决不会逊于第一次大战，而活跃的范围却更为广大。

我国的女间谍们的故事，时时有得听到，说得是那末神出鬼没，然而后来却证实都是些子虚乌有之谈。

我所遇到的却是一个真实的女间谍，一件真实的悲惨的故事。

有一个青年友人，行为很整饬，但在一个时期，人家传说他常和一个女友在一处。这女友的行为相当的“浪漫”，时时的出入于歌坛舞榭，且也时时的和敌人及汉奸们相交往。

我曾经劝告过他。他只是笑笑，不否认也不承认。我不便多问什么。

有一天，在霞飞路上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他和一个女友在一处，谈得很起劲。我只和他点头招呼。他介绍着道：“这位是陈女士。”我们互相微颔了一下。

这位陈女士身材适中，面型丰满；穿得衣服并不怎样刺眼，素朴，但显得华贵；头发并不卷烫，朝后梳了一个髻，干净利落。纯然是一位少奶奶型的人物，并不象一个“浪漫”的女子。

隔了一个多月，他跑来告诉我道：“你见过的那位陈女士已经殉难死了！”

我吓得一跳，问道：“为了什么呢？”

"她是一位女间谍，"他道，"曾经刺探到不少敌人和汉奸们的消息和行动。她的父亲是一位法院里的检察官，她的母亲是一位日本人。她的日本话说得很好。因此，好久就已混入汉奸群中工作着。最近几个月，她常常警觉到有人跟随着她，注意或监视着她。她觉得有危险。有一夜，她在一个跳舞的地方，发现她的手提包失踪了。隔了一会，她舞罢回到座上时，又发现手提包已经放在原处。检点了一下，没有短少什么。但她知道这手提包一定曾被严密的检查过。她把这事告诉我，说，也许会有什么危险吧。但神色很镇定，一点也没有退避或躲藏的意思。照常的生活着，照常的刺侦着。"

"后来怎样的被破获的呢？"

"我知道她被捕的消息已在她殉难之后。这是另一位做工作的人告诉我的。她计划着要刺杀丁默邨，那个'七十六号'的主人。在一个清晨，丁伴她到一家百货公司去购物。壮士们已经埋伏好在那里。丁富有警觉性，也许，也竟已准备好，一进门，便溜了出来，来不及放一枪。为了到这个地方去的事，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因之，她的嫌疑极重。她被捕了，经过了残酷的刑讯之后，她便从容就义了。"

他说完了话，默默的为这位女英雄志哀，我也默默的在哀悼着仅见一面的这位爱国的女间谍！

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

可惜他不久就避到内地去，至今还未回来，竟没有机会问他陈女士的名字。

女间谍的生活不是玫瑰色的，却是多刺而艰苦异常的。但为了祖国，她头也不回的走上了死亡线上。

二　记陈三才

象晴天的一个霹雳似的，朋友们传说着陈三才先生被捕的消息。没有理由使我们相信：陈先生会遭逢这个不幸的。虽然在那个时候，个个沦陷在敌人后方的人，生命的安全随时会发生危险，但象他那样的人，似乎最不容易有什么"牵惹"。

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留学生，出身于清华学校，做了好几年的北极公司经理，和通惠机器公司董事。他是那样的和现在的政治隔绝。谁也不能明白，这一次他怎么会被牵涉到"政治"漩涡里去的？

他被捕后，不到三个月，便被汉奸杀死；就义的地点是南京，雨花台。

汉奸们那末公开的宣布杀人，恐怕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们向来惯用的鬼鬼祟祟的暗杀手段，为什么这一次会这样的"大张旗鼓"呢？如果没有什么深仇大怨，他们怎么敢下这个辣手呢？

在陈先生就义后，才有人传说，他是负着重要的地下工作的使命的。他计划着一个锄除汪逆精卫的布置。可惜布置未就，他的计划，却被汉奸的特务们所发现了。

他在监狱里，曾寄出好几封信。在就义的前两天写给他家属的一封长信，可以说是最后的一封，也可以说是他的遗嘱。原信是英文，他的家属曾把它译出。

“在沪六日，可谓最苦。备尝悬吊及各种肉刑。而廿四小时后之处置，尤为严厉。住所，食物，绝非人情所能忍受。

“迁移后的待遇，确是好得多。生活很有规则，也合卫生。不啻又恢复了我的学校生活。不过这里的学生待遇，是有等级的，分了头、二、三三等。……我侥幸作了头等生，事实上我和其他四位还作了特等生，有机会和教授先生们谈话，并享几种为其他头等生所不许的特权，譬方可以公开吸烟，而别人只能背地吸。

“我的健康的确有进步。照起镜子来，显然我的气色比前好，眼睛也比较的有光。在我自己可以说比初来时还年轻了几岁，也未可知。这次南京短期旅行，于我益处很多，身体上的改进，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是内心的进步。长日的闲暇，迫我静心思索，对于过去生活，感觉无限空虚。这种反省，固然在一年前就已开始，可是直到最近，才深切领悟真理的全部。约近一年以前，决意创造我的新生命，那正是我去香港之后。因为在那次旅行，得到机会遇见多年阔别的老朋友，给我新的刺激。我可以清清楚楚把那些朋友，分为两派。一派只图自己享乐，其他一派则生活有一定的目标，并且不辞劳作，以求达到目的。前一派人，以外貌观之，无忧、无虑、快乐、友善。但是他们的友善，总不免于虚伪。他们服装讲究，出入华贵之门，固然常为纨袴子弟所称羡，但是他们的生命同岁月，不知所谓地流荡过去，毫无成就。后一派人，外貌看来严肃，缺少生气，可是一旦得到他们的友谊，就会持久不变。他们虽深藏不露，而识见极稳定。这一派人似乎不及前一派那些人聪明，但是有毅力，终会很稳健的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当第一派人向下坠落的时候，后一派人不停的向前努力；这不用智者就会知道在生命竞走上是谁占先。我识别了这两派不同的人，却在表面上保持着同样的友谊。……不待我认清自己，众人早已这样认定，一直认定我是一个轻浮，没有思想的留学生，只知道寻欢、作乐，不肯埋头苦干。噫，何种的认识，何种的觉悟！

“我的朋友不见得全是错误。他们的判断，该是对的。我该是属于第一派。仅仅这次在香港，我才发觉我不情愿属于第一派。只有改

变我的生活方式。也许你已经留心到，我正在努力改变，不饮酒，不吸烟，对于赌博，也是尽量减少。渐渐避免同我从前那样生活方式的朋友们来往——使我大为惊奇的，自从和这一些人疏远以后，我往来的朋友，简直没剩下几个。我素以为自己朋友很多，这一来，我的虚荣心不免受了重大的打击。也正可以证实，我的朋友大半都是属于这一流，而我自己也不能除外。既经觉悟，我不必太懊丧枉费了多年的时力来结交这些朋友。从新开始还不为晚啊！

"最近两月，我得到反省的机会。思想的结晶，坚定我前者的决心。而这一次的特点是加上了道德的信念。我自信过去的生活，自私而无用。同时，我相信，将来惟一的幸福是建立在为他人服务的生活上。我差不多费了十三年的工夫来了解：一个人的幸福不在乎自已有所得，而在乎为别人服务。我愿上帝赐我恩惠，使我死心踏地有坚决的信心。"

他的转变，在这信里，写的是那末恳挚而真切。香港之行，使他与爱国者们之间取得了密切的联络。他的地下工作大约便在那时开始的。他有很好的社会关系，和很好的工作掩护。汉奸们决不会怀疑到他的。所以他的初期工作，大约相当成功。但不久，终于被出卖了。他对于出卖他的人，竟也宽恕着：

"希望我的性灵也能到得改善。《新约》我已读了好几遍，也学会祈祷。虽然我还没有成一个真实信徒，至少已经接近基督的教义。比方说，我已经能抑制自己不去仇恨这次演成事变的人们，反而怜悯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如果有罪，将来自有公正的处罚。我是什么人，怎配来裁判？一切的事，许都是上帝的旨意。如果南京之行，于我不利，正因为我过去生活的放荡而有应得之责罚。反而言之，若此行于我有利，那就许是上帝的旨意。无论如何，我都无怨尤。"

这已是"仁人"的用心了。志士和仁人原是分别不开的。他

的见道之言，证实了这次的中日之战，虽然显现了自私自利的卑鄙无耻的汉奸们的面目，同时也觉醒了无数的青年们，放弃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而从事于祖国的解放战争。战争使我们分别出，黑与白，邪与正，忠与奸来。战争使社会的“渣滓”们沉沦了下去，而使清新的分子浮现了出来。虽然那些清新的分子们被牺牲，被杀害了不少，而留下来的却都是建国之宝。可惜的是，陈三才先生却永远不能参预这个建国的大业了！

三才先生名定达，江苏昆山人，生于清光绪念八年，殉难于民二十九年十月二日，年三十九。

三　记平祖仁与英茵

平祖仁先生是国立暨南大学的毕业生，曾在暨大服务过。我和他同过事，但不大熟识。他不久便转到政界里去。“八・一三”以后，他做了某区的专员，但在上海做工作，行踪很秘密。

有一次，被敌人侦知他的住所，派了好几个人去暗杀他。他从外面回家，刚下汽车，便听见枪声几响。他机警异常，立即躲到汽车后面。刺客们还是追了过来。他连忙匍伏到汽车底下去。街上的人们挤着看热闹。刺客们逃走了。他从容从车盘下面爬了出来，扣门进去，一点也不曾受伤。

从此，他更加小心起来，进出都十分的戒备着。许多人劝他赶快离开上海。但他总不肯走开去，甘愿冒着万险，一直的住下去，直到他被伪方所逮捕为止。

他被捕后，囚禁在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那个魔穴里。听说敌伪的人物们，其初是威胁，其后是利诱。他不为所动，反以好言劝伪方人物弃暗投明。最后，他们不得不用“刑讯”来追取口供。他们想从他口里得到若干秘密组织和其活动的线索。他受尽了人类所能忍受的体刑，甚至他的浓密的头发，也被刑者一根根，一把把连根的生生的拔下来；满头是血淋淋的……但他始终傲态如常，不曾泄露过一句机密的话，一点秘要的消息。

当他被捕进去的时候，许多和他一同做工作的人们，或和他有任何联系的人们都异常的恐慌着，生怕“变出非常”，有被牵连

进去的可能。然而迟之又久，他们却都还很平安。平祖仁先生以自己的大无畏的勇气，挺身受刑，来保全他们。不曾有一个人因他的缘故遭到不幸。

许多人至今还很感激着他！

他们无可奈何他，只好把他扣在囚牢的角落里，长久的囚禁着，不再加理会。

但在这长期的囚禁中，他却在同囚者中发生了作用。他公开的劝说他们——那些囚犯有的是鸦片贩卖者，走私者，窃盗，但也有志士们在内——指示他们以应走之路，且把他们组织起来。

这组织被他们发觉了，他们现在知道，他不仅不能为他们所用，且是那末“危险”的一个人物，留下来总是一个祸根。于是，在一个清晨，平祖仁先生和另一志士及两个强盗一同被提出枪杀了。

他就义的时候，很从容、安详。

伪组织的公开宣布杀人，在陈三才先生被杀之外，这是第二次。

他的尸身由家属领了出来，但贫至无以为殓。他的朋友和同道没法子出面帮助他，因为汉奸们正要追寻着这一个线索而一网打尽他们。英茵，一个话剧和电影的女演员，出来为他料理后事。英茵非常懂得他的环境和他所往来的人物，却一个也不去找他们，她聪明地不使她成为一根线索，她只为他向她自己的影圈子里去募集若干款子，作为是她自己借用的。

她所筹借到的钱，不仅把他葬事办好，还留下一部分供给他的家属的以后的生活费用。

而英茵，她把关于他的一切善后的事务料理清楚后，独自一个人在一个旅馆房间里，仰药自杀了。

第二天晨报上大字刊载着英茵自杀的消息，却没有说出她为什么要自杀的原因。

这一出真实的悲剧，可以写成伟大的戏曲或叙事诗的，我却只是这样潦草的画出一个糊涂的轮廓。渲染和描写的工作是有待于将来的小说家、戏剧家或诗人的。故事太真实了，时间太接近，人物太熟悉了，有时反不易有想象的描绘。

四　惜周作人

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郑孝胥"走马上任"去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惋惜；陈柱暗中受津贴，结果不得不明目张胆的公开出来，我们也一点不为之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已经不在我们的阵伍中，这种人的失去，对于我们的文坛是丝毫不足轻重的。陈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马君武先生一见便抛在一边，说道："这些东西，不焚何待！"郑孝胥的《海藏楼诗》也不是"今人"之物；一个日本人到了他的海藏楼，一见，便诧叹道："穷的诗人住了这样的大宅，我倒也愿意做一个穷诗人呢。"那样无病呻吟的东西，本来不会有什么真的灵魂的。

周作人却和他们不同了。周作人是在五四时代长成起来的。他倡导"人的文学"，译过不少的俄国小说，他的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他的诗和散文，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小河》，至今还有人在吟味着。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虽然他后来已经是显得落伍了，但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鲁迅先生是很爱护他的，尽管他们俩晚年失和，但鲁迅先生口中从来没有一句责难他的话。"知弟莫若兄。"鲁迅先生十分

的知道他的癖气和性格。倒是周作人常常有批评鲁迅先生的话。他常向我说起，鲁迅怎样怎样的。但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他的话。鲁迅是怎样的真挚而爽直，而他则含蓄而多疑，貌为冲淡，而实则热中；号称“居士”，而实则心悬“魏阙”。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张性灵，后来却一变而为什么大东亚文学会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他的过去的成就，却仍不能不令人恋恋。

所以，周作人的失去，我们实在觉得十分的惋惜，十分的痛心！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了！

周作人怎样会失去的呢？

我在“七·七”以前，离开北平的时候，曾经和他谈过一次话，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这时，抗战救国的空气十分的浓厚。我劝他，有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平。他不以为然。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我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的迫进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加抵抗么？他没有响。后来我们便谈他事了。

“七·七”以后，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们都十分的关心着他。许多人都劝他南下。他说，他怕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所以不能来。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托辞。其实，他是恋恋于北平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的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

茅盾他们在汉口的时候，曾经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有过联名的表示。但在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曾“伪”。绍虞有过一封信给我，说，下学期燕京大学已正式的聘请他为教授，他也已经答应下来了。绝对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根据这封信，曾经为他辩白过。我们是怎样的爱惜着他！生怕他会动摇，会附逆，所以一听到他已肯就聘燕大，便会那样的高兴！

但他毕竟附了逆！燕大的聘书他也退回去了。其近因，是为了阴历元旦的时候，有几个青年人去找他，向他开了几枪，枪子为大衣纽扣所抵住，并没有穿进，所以他便幸免了。一个车夫替了他死去。

然而实际的原因恐并不是如此。那一场"暗杀"并不能促使他背叛祖国。世间那有如此的"一不做，二不休"之人呢？其远因必定是另有所在的。"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陆军力量的巨大。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从了。同时，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他在那个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日本帝国要如此崩溃，世界会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钱稻孙，另一个背叛祖国的人，曾对一个伪立北京大学的教员——那一个人不愿用真实的姓名，要求改用一个假名字应聘，生怕将来政府回来了，会有问题——说道："你以为会这样的么？我从来没有作此想过！"因为他们是那末坚定的相信"中国的运命"，所以他们才敢于做汉奸。这恐怕又是汉奸的产生的原因之一。

周作人也便是这末想，而成为一个汉奸的。

即在他做了汉奸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也还不能忘情于他。适之先生和尹默先生好象都曾苦劝过他，而风举先生和我，也常在想着，怎样才能使他脱离了那个汉奸的圈子呢？

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

集　　外

第　一　辑

（1923—1948）

欢迎太戈尔

我在梦中见到一座城，全地球上的一切其他城市，都不能攻胜他；

我梦见这城是一座新的朋友的城。

没有东西比健全的爱更伟大，它导引着一切。

它无时无刻不在这座城的人民的动作上容貌上，及言语上表现出来。

惠特曼(Whitman)

太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快要东来了。在这本杂志放在读者手中或书桌上时，他也许已经到了中国。

我可以预想得到：当太戈尔穿了他的印度的朴质的长袍，由经了远航而疲倦的船上，登到中国的岸上时，我们一定会热烈的崇拜的张开爱恋的两臂，跑去欢迎他；当他由挂满了青翠的松枝的门口，走到铺满了新从枝头撷下的美丽的花的讲坛上，当他振着他沈着而美丽的语声，作恳挚的讲演时，我们一定会狂拍着两掌，坐着，立着，甚至于站到窗台上，或立在窗外，带着热忱与敬意，在那里倾听，心里注满了新的愉快与新的激动。

诚然的，我们应该如此的欢迎他；然而我们的这种欢迎，似乎还不能表达我们对于他的崇敬，恋慕与感激之心的百一。

我们不欢迎残民以逞，以红血白骨筑凯旋门的凯萨，这是应该让愚妄的人去欢迎的；我们不欢迎终日以计算金钱为游戏的

富豪，不欢迎食祖先的余赐的帝王或皇子，这是应该让卑鄙的人去欢迎的；我们不欢迎庸碌的乘机会而获享大名的外交家，政治家及其他的人，这是应该让无知的，或狡猾而有作用的人去欢迎的。

我们所欢迎的乃是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的人，乃是我们的亲爱的兄弟，我们的知识上与灵魂上的同路的旅伴。

世界上使我们值得去欢迎的恐怕还不到几十个人。太戈尔便是这值得欢迎的最少数的人中的最应该使我们带着热烈的心情去欢迎的一个人！

他是给我们以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路中向前走的，是我们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

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这座诗的灵的乐园，是如日光一般，无往而不在的，是容纳一切阶级，一切人类的；只要谁是愿意，他便可以自由的受欢迎的进内。在这座灵的乐园里，有许多白衣的诗的天使在住着。我们愉悦时，他们则和着我们歌唱；我们忧郁时，他们则柔和的安慰着我们；爱者被他的情人所弃，悲泣如不欲生，他们则向他唱道，"你弃了我，自己走去了。我想我应该因你而悲伤，把你的孤寂的影像放在我的心上，织在一首金的歌里。但是，唉，我真不幸，时间不幸，时间是太短促了。青春一年一年的消磨了；春天是逃走了；脆弱的花是无谓的凋谢了，聪明的人警告我说，人生不过是荷叶上的一滴露水。难道我不管这一切，而只注视那以她的背向我的人么？那是很鲁笨的，因为时间是短促的。"当他听见这个歌声，他的悲思渐渐的如秋云似的融消了，他抹去了他的眼泪，向新的路走去；母亲失了她的孩子，镇日的坐

在那里下泪，她们则向她唱出这样的一个歌来："当清寂的黎明，你在暗中，伸出双臂，要抱你睡在床上的孩子时，我要说道，'孩子不在那里呀！'——母亲，我走了。我要变成一股清风，抚摸着你，我要变成水中的小波，当你浴时把你吻了又吻。大风之夜，当雨点在树叶中淅沥时，你在床上，会听见我的微语，当电光从开着的窗口闪进你的屋里时，我的笑声也偕了他一同闪进了。如果你醒着躺在床上，想着你的孩子到了深夜，我便要从星里向你唱道，'睡呀母亲，睡呀。'我要坐在照澈各处的月光上，偷到你的床上，乘你睡着时，躺在你的胸上。我要变成一个梦儿，从你眼皮的小孔中，钻到你睡眠的深处；当你醒起来吃惊的四顾时，我便如闪耀的萤火，熠熠的向暗中飞去了。当普耶大祭日。邻家的孩子们来屋里游玩时，我便要融化在笛声里，镇日在你心头震荡。亲爱的阿姨带了普耶礼来，问道，'我的孩子在那里呢，姊姊？'母亲，你要柔声的告诉她道，'他呀，他现在是在我的瞳人里，他现在是在我的身体里，在我的灵魂里。'"她听了这个歌，她的愁怀便可宽解了许多，如被初日所照的晨雾一样，渐渐的收敛起来了；我们怀疑，伊们便能为我们指示出一条信仰大路来；我们失望，她们便能为我们重燃起希望的火炬来。总之，无论我们怎样的在这世界被损害，被压抑，如一到这诗的灵的乐园里，则无有不受到沁入心底的慰安，无有不从死的灰中再燃着生命的青春的光明来的。

我们对于这个乐园的伟大创造者，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现在的世界，正如一个狭小而黑暗的小室。什么人都受物质主义的黑雾笼罩着，什么人都被这"现实"的小室紧紧的幽闭着。这小室里面是可怖的沈闷，干枯与无聊。在里面的人，除了费他

的时力，费他的生命在计算着金钱，在筹思着互相剥夺之策，在喧扰的在暗中互相争辩着嘲骂着如盲目者似的以外，便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生的幸福都没有享到了。太戈尔则如一个最伟大的发见者一样，为这些人类发见了灵的亚美利亚，指示他们以更好的美丽的人的生活；他如一线绚烂而纯白的曙光，从这暗室的天窗里射进来，使他们得互相看见他们自己，看见他们的周围情境，看见一切事物的内在的真相。虽然有许多人，久在暗中生活，见了这光，便不能忍受的紧闭了两眼，甚且诅骂着，然而大多数肯睁了眼四顾的，却已惊喜得欲狂起来。这光把室内四周的美画和宏丽的陈设都照出来，把人类的内在的心都照出来。

"光，我的光，充满世界的光，吻于眼帘的光，悦我心曲的光！

"呵，可爱的光，这光在我生命的中心跳舞；可爱的光，这光击我爱情的弦便鸣，天开朗了，风四远的吹，笑声满于地上了。"

《吉檀迦利》之五十七。

他们现在是明白世界，明白人生了。

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发见者，这个能说出世界与人生的真相者，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西方乃至全个世界，都被卷在血红的云与嫉妒的旋风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党派，都以愤怒的眼互视着，都在粗声高唱着报仇的歌，都在发狂似的随了铁的声，枪的声而跳舞着。他们贪婪无厌，如毒龙之张了大嘴，互相吞咬，他们似乎要吞尽了人类，吞尽了世界；许多壮美的人为此而死，许多爱和平的人

被其牺牲，许多宏丽的房宇为之崩毁，许多珠玉似的喷泉，为之乾竭，许多绿的草染了血而变色，许多荫蔽千亩的森林被枪火烧得枯焦。太戈尔则如一个伟人似的，立在喜马拉雅山之巅，立在阿尔卑斯山之巅，在静谧绚烂的旭光中，以他的迅雷似的语声，为他们宣传和平的福音，爱的福音。他的生命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到他们当中去，使他们愉悦而沉默”。他立在他们黑漆漆的心中，把他的“和善的眼光堕在他们上面，如那黄昏的善爱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

世界的清晨，已在黑暗的东方之后等待着了。和平之神已将鼓翼飞来了。

他在祈祷，他在赞颂，他在等候。他的歌声虽有时而沈寂，而他的歌却仍将在未来者的活泼泼的心中唱将出来的，他的使命也终将能完成的。

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传道者又应该怎样的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崇慕，我们的敬爱之诚呢？

他现在是来了，是捧了这满握的美丽的赠品来了！他将把他的诗的灵的乐园带来给我们，他将使我们在黑漆漆的室中，得见一线的光明，得见世界与人生的真相，他将为我们宣传和平的福音。

我们将如何的喜悦，将如何热烈的欢迎他呢？

任我们怎样的欢迎他，似乎都不能表示我们对于他的崇慕与敬爱之心的百一。

> “我醒起来，在清晨得到他的信。
>
> “当夜间渐渐的万籁无声，群星次第出现时，我要把这封信摊放在我的膝上，沉默的坐着。

“萧萧的绿叶会向我高声的读它，潺潺的溪流，会为我吟诵着它，而七个智慧星，也将在天上对我把它歌唱出来。”

《采果集》之四。

这是太戈尔他自己歌咏上帝的诗章之一，而我们现在也似乎有这种感想。我们表面上的热烈的欢迎，所不能表白的愉快与崇拜与恋慕，在这时是可以充分的表白出来。

他的伟大是无所不在的；而他的情思则惟我们在对着熠熠的繁星，潺潺的流水，或偃卧于绿荫上的绿草上，荡舟于群山四围的清溪里，或郁闷的坐在车中，惊骇的中夜静听着窗外奔腾呼号的大风雨时才能完全领会到。

我们应不仅为表面上的热烈的欢迎！

（原载一九二三年九月十日《小说月报》十四卷第九期）

街血洗去后

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了！那日的下午五时，我坐车至大庆里，到一家书铺里去看看有什么“线装书”好买。车子刚到浙江路南京路口，便觉得道路上的情形与往日绝不同。电车是照样的开行着，汽车，人力车也川流似的驶走着，两旁商店照样的开着门欢迎顾客。行人道上拥挤着人群与往日一切相同。然而总觉得有一种绝不相同的气象在！人人都停立在那里，好象被什么大惊骇吓得痴呆了。由眼睛中读得出有的人是带着大恐怖的情绪，有的人是带着疑问而不意的惊恐。我呢，自然也是疑问而惊恐着。车子走在南京路，看见两旁站着许多气概凛然，态度凶横的英捕与不穿制服而带着枪械的英人，有的横立在路中，好象有什么严重的警备。是火灾，是什么大盗警罢，我这样的想着。市政厅与云南路口一带，戒备得尤严。情形更不对了。有好几家店铺是闭上了铁门。驻足而观的人更多。车子停在大庆里口。平素深夜绝不关闭的里门，现在也闭上一扇。我问车夫，什么事发生了？他说，打杀人，打杀人！我也不能细问，便下车进了里门，到那一家熟悉的书铺里去。我见他们的店伙，都拥在靠近西藏路的里门口看什么东西。我也挤出去一看，什么也没有，只是街上的人绝多，多带着惊恐未定或疑问而惊奇的神色。我明白必有什么空前的大事发生。

奔进书铺，去问铺主，我的一个朋友。什么事？什么事？我问道。他道："学生闹事，不得了！不得了！巡捕开排枪，打杀了几十个学生。"这如一个震天动地的大霹雷，使我惊吓得好一会不能开口。我如在梦中。这也许是在做梦罢！南京路，开排枪，杀死学生，这几件事怎么会联结在一处的?！我绝不相信，绝不相信！我的朋友接说道："早晨，已有许多学生被捕入巡捕房了。下午一时许，他们在先施公司之前，集合大队讲演。白旗满街飘扬着，车马都不能通行。巡捕捉去了好些学生，路人与其余的学生，都跟了被捕的学生走。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拥挤在老闸捕房之前。于是巡捕开枪了！"我于是才知道这居然是真实的大事变，不是梦，绝不是梦，我全身似为愤怒的火所烧灼着。我叫道："就是学生讲演，也不至于被杀死呀！！！南京路，南京路，怎么会放起排枪来！"也不顾得我的朋友，只当他是捕头，在严厉的质问着。"我们且出去看看罢。"于是我们走在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在车上所见的。有一家店铺，正在打扫破玻璃。"这定是被流弹打碎的，"我想着。街道上是依然的灰色，并不见有什么血迹。"血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都被冲洗去了。"要不是群众如此的惊骇而拥挤着，我几乎不能相信一点三十分钟之前，在这里正演着一出大残杀的活剧！再走下去，行人渐少，看不出什么紧张的空气，只有几个人靠在店柜上惊奇的偶语着。

夜，我又与一位前辈同到南京路去。灯火闪耀的明亮着，语声，笑声，笙歌声，依然的。店门大张的，顾客陆续进出，依然的。要不是老闸捕房门口戒备森严，要不是巡捕骑在马上，手执着鞭，跑上行人道，在驱打人，我绝不相信下午是有空前大残杀事件发生。转了一弯，看见宁波同乡会前拥挤着许多人。我们一

惊，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怀着戒备心走近一看，原来是南方大学平民学校在那里开游艺会！

（原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文学周报》第一七九期）

止水的下层

"难道你们不怕么？天天在放枪，而你们就住在这里，为什么不想搬家？去年，我记得你们住在西门，两方作战，还在黄渡，而你们的家已经搬到租界上来了。"

南京路放了排枪之后的许多天，我向一个住在新世界与老闸捕房之间的大庆里中的友人这样的说。

"不，不，这次不比上一次。这次不必搬。他们放枪不是对我们放的。我们是买卖人，决不会无故被他们打扰的。所以我们安心住在这里不搬。"他这样的答道，脸上安舒的含着微笑，仿佛我提的问题是多事。几个伙计静静的听着，什么表示也没有。

我愤慨的说道："请你看看五卅的死伤单，死的到底是学生多还是路人多？你不记得六月二日新世界门前的机关枪么？可惜没有向南放……"他脸上只是浮泛着微笑；显然的，这微笑是杂着"不信"，"不足道"，"放心"的几种复杂的心理。我这时真的动了火，也不再往下说了，只在肚里暗暗的叹了一口大气。

某一日，有一位朋友新从乡下来。他是一位狂热的"爱国者"。我第一句话便问他道："你在乡村里宣传的结果如何？"他摇摇头，凄然的沈默着。隔了一刻，他叹道："不必谈，不必谈。总之，我是灰心了。"

"怎么样的情形，谈谈也不妨。"

"我初回本乡时，他们对于这次的事还是一无所知的。你知

道，乡间的几千家门户，认字的是没有几个的，而且报纸也永没有输进来过。我把这次的大残杀案大略的告诉过他们。什么惊奇之情也引不起。只有几个少年脸上罩着淡薄的同情。一个老人说道：'杀了这几个人算得什么事！长毛时才可怕呢！我那时还不过四岁，自己也不知怎样会逃得这难。唉，大难，劫运！'他说时，摇摇头，脸上有些自满的神色，因为他已表白出他自己经验的丰富了。我当时很愤急的大声的说：'这一次再不争，我们大家便都要做亡国奴了！'他们惊诧的相顾，——大略是为我的愤态所惊——不久，便四散走开了，什么表示也没有。

"'亡了国，还不是一样的种田！听说外国人比中国的兵同官还好些呢。'

"'管他国亡不亡，我们有得田种就是了。'

"这是零零落落的从他们嘴里说出的。他们对我都有些怫然，也带着敬避之意，至少总以我为'多事'，或'好生事'，因此，我在那里实在住不下，只得又出来了。"

默然的，凄楚的，我们相对着。

我们的民众是一泓止水，能被风雨所掀动的只是浮面的一层，底下的呢，永远是死的，寂静的，任怎样也鼓荡不动他们。他们一丝一毫的反抗思想和前进意志都没有。"现在"是最好的，是不必变动。就处在最逆境之下，他们也能如驯羊，如耕牛似的忍耐的生活着。至多只能发出几句追羡古代仁德的叹声。在今日是追想着袁世凯，前清皇帝，在清代是追想着唐宋，在唐宋追想着汉魏。……象这样乐天任命的民族，我们将如之何呢？

他们又是最自私的，最现实的，眼光只能射到最近的一道圜线。你们如果不去打扰他们的田园，不去多征他们的租税，不去把他们现在的和平之梦打破，他们是什么事也不管的。革命党

入了城，袁世凯做了皇帝，张勋在北京复辟，蔡松坡在云南起义，段祺瑞又出来做执政，这些事他们都是不管的，至多不过好奇的慨叹几声而已。至于加税和在他们乡土掘墓造路之类的事，他们却非反抗不可了。他们最怕的是多事，是变更旧状，以及把他们的钱取去了。他们的抵抗也不是有什么大力量的，但打毁一二个前进者的家宅是有余的。或竟执刀枪以自御，也许偶然有之，但如果压迫的力量加大时，他们立刻便会屈伏，或者是逃亡，或者是引颈受戮，决不会有积极的反抗思想的。这在异族统治中国时，或帝王朝代改革时，都可以看得出。尤其在我们民族受异族统治时，这种精神表现得最充量。

当中国民族在受辽金人的压迫时，在受蒙古民族的压迫时，在受满洲民族的压迫时，或在现代，受条顿民族等的压迫时，无往而不是如驯羊耕牛之忍耐的屈伏，受戮受鞭而不敢反抗的。自然未尝没有倡义师的人。然只是少数。全体的民众是不受鼓动的。虽然也时时有“严中外之防”（以前“严夷夏之防”）的呼声发出，然发这呼声的仍不过是几个在士人阶级的人，全体的民众是不会应和的。他们对于所谓“夷”，所谓“内外”，其初是漠然，到了他们的武器侵略到田园之边界时，也有些憎恶，再进一步，他们的刀架在民众的颈时，却只有屈伏，供驱使，相安无事。

这种情形在什么“正史”“编年”上是没有叙述的，但在许多笔记上，却有极详细的记载，赤裸裸的把我们止水似的民众的精神都表现出来了。宋南渡时的好些笔记，宋元之交的好些笔记，明清之交的好些笔记，都很可以供我们编辑外族的压迫史一书的最好资料。记载八国联军入京，以及鸦片战役等等的事的，也有不少笔记。搜集这些著作，倒是一件很重要，很有趣的事。

近来偶然看了《七峰遗编》（在《虞阳说苑》中，叙清兵入常熟

事)及《出围城记》(在《晨风阁丛书》中，叙英兵入镇江事)，益觉得中国民族之对待外来的侵略民族，时代虽不同，而其态度是一样的。大部分是逃避，是屈伏，是挂顺民旗，门上贴了“大英保护”；小部分是自杀，殉节，——上吊，投池——再一小部分则为敌探，乘风打劫。到了征服者在入城张贴停止杀戮抢略的告谕时，民众却蜂拥的回家，实行受大清，大英的保护，开始向异族歌功颂德了。此后，他们便仍旧“理乱不知，黜陟不闻”的，过着他们的和平的生活梦。

时代飞鸟似的过去，我们的民众，始终是这样的民众。

唉！止水的下层，止水的下层！我们将如之何？

也许有人要说，这便是中国民族所以能经历无数的年代而尚继续的滋生蔓延的生存着的原因。然而这样的生，实不如无生！

根柢不稳固，便什么华丽的屋都将建筑得不好。我希望在止水的上层的讲到什么主义，什么政治理想之前，先要注意到这止水的下层。

(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六日《文学周报》第一八九期)

西方人所见的东方

有一部分的西方人，其所见的东方，完全是从马哥孛罗(MarcoPolo)以来便戴上了的特制有色眼镜中所见到的东方。东方是绚丽的，是弘伟的，是金碧辉煌的，是遍地皆黄金的，是神秘的，是朦胧的，是亚拉伯式的神庙，花彩细碎而华美，是土尔其式的皇宫，殿苑幽伟而深沈，是蒙古族式的生活，飘忽而雄俊，是日本式的美人，娇巧而玲珑，是中国式的皇家，堂上一呼，堂下百喏，……总之，东方是有异于他们的西方的，是另一种的生活，另一种的人物，另一种的境界；总之，在他们看来，东方是充满了神秘的异邦的趣味的。

更有一部分的西方人，其所见的东方，则完全是从深入内地，强打着本地乡谈的传教士们传袭下来的。这样的东方，恰与上述的理想的神秘的东方相反。他们所见的东方是贫穷的，是残疾满地的，是饥荒无穷尽之时的，是男的拖了小辫，女的裹了小足的，是蠢愚的，是无知无识的，是不知学问书本为何物的，是待救的可怜虫，是下等的生物般的人民，是被至高无上的一种高压力所制伏着的，是怯弱若童子的，是残酷如饥狼的，同时又是狡欺如狐兔的……总之，东方是有异于他们的西方的，是另一种的生活，另一种的人物，另一种的境界；总之，在他们看来，东方是充满了待救的饥饿与穷困的。

更有一部分人是渗合了以上两种的东方观。而自创了一种

的西方式的东方，美国电影中的中国人不是洗衣服的便是做厨子的，一遇见了惊吓，他们的辫子便会直竖起来，真应了“惊辫指天”——与“怒发冲冠”相对——的一句话。雨果在巴黎他自己住宅饭厅板壁上所雕饰的中国人，乃是他自己在餐盘上饰图中所见的中国人，有的在跳舞，有的在翻滚斗，有的在板凳上竖蜻蜓，有的在饱餐着面前的精馔，而他们的衣服是特有的西方式的中国装，他们的胡子是特有的向下挂的八字须。连安徒生的童话中的中国人，也是如此的，向下的八字须，小辫子，红顶花翎，黄马褂，马蹄袖，粉底高靴，杀人是举起了明亮亮的马刀的，当街脱下衣便可以一五一十的打板子。在伦敦 Oxford Circus 左近的小戏园中变戏法的冒充中国人，便完全是被装在这个型式之中的。穿了黄色绣花短衣，——马褂——粉底靴，辫子盘在额上，见人便拱拱手，举止慢钝而脸目没有表情。全个伦敦的人真都会相信这位冒牌者乃真是一位现代的远东的大国民。从前曾见过一位孔子，头戴红顶的凉帽，身穿长袍马褂，上唇仍是两劈的向下的八字须。又曾见过一位翎顶辉煌的孔子，立在两三排西书橱的前面。又曾见过一位后羿，身穿着对襟密扣的兵勇制服，骑在大鸟身上，在射着太阳。又曾见过一个报上将注着武则天三大字的女像当作了养蚕的始祖嫘祖。John Macy 的《世界文学故事》将一位穿着中国上古的衣冠的不知是老子或是孔子的老头子当作了 Buddha。象这样的错误，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而今仍还在继续着。怪不得他们一见了太虚法师剃光了头发，衣披着袈裟，陈焕章博士“首加玄冠，身被深衣，手执楷木雕成之如意”，便不禁万人空巷的来看见所未见的特殊的中国人物了！

离开东方这样的远，而竟大言无惭的在谈着中国、日本、波

斯，自不免要闹出无数的笑柄来了。总之他们无以为东方乃是诡异的东方，乃是神秘的东方，乃是穷苦无告的东方，却无一个人是真正懂得东方的本相的——除了那一批顾问，外交官，与当小侦探的新闻记者刺探得中国政界的秘密又真又快之外——东方，实在离开他们太远了，东方实在是被他们裹在一层自己制造的浓雾之中了！

底下更引两则的小错处，以博大众的一笑。这两则都是从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伦敦出版的«The Sphere»上录下来的，第一段载在第一百三十四页，第二段载在第一百四十六页。

第一则的标题是《孙逸仙的坟》(The Tomb of Sun yat-sen)文中附了一幅“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之像，却不料即在此处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孙中山先生的相片，流传于世界各处者无虑数千万幅，或者这位记者曾经走过Great Russell Street的几家旧书铺门口的，曾经见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本《三民主义》其中附有中山先生像的插图的一部书陈列在窗口的，或者«The Sphere»的记者曾到过伦敦西区的Godge Street中国国民党伦敦支部，便可以知道孙中山的仪容，与这个铜板图中的孙中山先生是相差得如何的远了！

据熟悉中国时事的朋友们说，这铜板图中的人物乃是陈炯明君也。将炮击观音山的陈大哥而讹作了中华民国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岂不是一件太不可恕的谬误么？

第二则的记载是叙述北平的盗陵案的，其中附有许多的插图，毛病也恰恰出在插图之中。在一幅图里，注有一段文字，他们竟以康熙皇帝的四十八妻的陵墓为“近于上海”，这真未免太可怪了！原来清帝东陵的所在，是北平左近的遵化县界内，“近于北平”这句话是可以说的。不料他们却说道：“近于上海！”这

是那里来的地理观念呢？如果东陵可以说“近于上海”，则伦敦也可以说是近于莫斯科了，巴黎也可以说是近于科平哈京了，罗马也可以说是近于柏林了，旧金山也可以说是近于纽约了，上海也可以说是近于北平了……我不知«The Sphere»的记者得到了通信社所供给的这些幅插图时，为何不问问清楚，再下注释呢？

《The Sphere》的记者们原不足责，他们也不过是无量数的对于东方向持谬见的人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象这一类的谬误，常看西方出版物的，一定可以常常的见到的。也许已相见成熟悉，无足以为奇的了。总之，东方实在离开西方太远了，太远了！

黑土的俄罗斯，欧洲人向来也是离他们很远很远的，然而自从屠格涅甫定居于巴黎之后，欧洲人陆续的译出了他们的——托尔斯泰、屠格涅甫、杜思退益夫斯基诸人的——小说之后，自从他们读过了那些掘发黑土之秘密的小说之后，神秘可怖的俄罗斯，却成为他们的最熟悉的友人之一了。几时，几时，我们方有这样的作品介绍到西方人那里去呢？介绍了《聊斋志异》与《今古奇观》是一无所用的，介绍了《杨贵妃传》，也是一无所用的，仅仅几位华侨式的老留学生在做着剧本，传记之类，也更是不能掘发现代中国的真相出来的。能够掘发出东方的神秘的，只有深入于现代东方的生活中，知道现代东方的内在的精神的东方人！

据我所知象这样的东方人的作品，已有人在那里译述着了。但望十几年之后，西方人所见的东方，因了这些大作品的介绍，能一革去了从前的谬误。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西方人正在渴欲明白东方的秘密呢，只在我们的深能知道现代东方的灵魂者的努力而已！

（原载一九二九年一月《小说月报》二十卷第一期）

记黄小泉先生

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黄小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受过他教诲的学生们没有一个能够忘记了他。

他并不是一位出奇的人物；他没有赫赫之名；他不曾留下什么有名的著作，他不曾建立下什么令年青人眉飞色舞的功勋。他只是一位小学教员，一位最没有野心的忠实的小学教员。他一生以教人为职业。他教导出不少位的很好的学生。他们都跑出他的前面，跟着时代走去，或被时代拖了走去。但他留在那里，永远的继续的在教诲，在勤勤恳恳的做他的本分的事业。他做了五年，做了十年，做了二十年的小学教员，心无旁骛，志不他迁，直到他儿子炎甫承继了他的事业之后，他方才歇下他的担子，去从事一件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工作。

他是一位最好的公民。他尽了他所应尽的最大的责任；不曾一天躲过懒，不曾想到过变更他的途程。——虽然在这二十年间尽有别的机会给他向比较轻松些，舒服些的路上走去。他只是不息不倦的教诲着，教诲着，教诲着。

小学校便是他的家庭之外的唯一的工作与游息之所。他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连烟酒也都不入口。

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厂主，在他从绑票匪的铁腕之下脱逃出来的时候，有人问他道："你为什么会不顾生死的脱逃出来呢？"

他答道："我知道我会得救。我生平不曾做过一件亏心的

事，从工厂出来便到礼拜堂；从家里出来便到工厂。我知道上帝会保佑我的。”

小泉先生的工厂，便是他的学校，而他的礼拜堂也便是他的学校。他是确确实实的不曾到过第三个地方去：从家里出来便到学校，从学校出来便到家里。

他在家里是一位最好的父亲。他当然不是一位公子少爷，他父亲不曾为他留下多少遗产。也许只有一所三四间屋的瓦房——我已经记不清了，说不定这所瓦房还是租来的。他的薪水的收入是很微小的。但他的家庭生活很快活。他的儿子炎甫从少是在他的“父亲兼任教师”的教育之下长大的。炎甫进了中学，可以自力研究了，他才放手。但到了炎甫在中学毕业之后，却因为经济的困难，没有希望升学，只好也在家乡做着小学教员。炎甫的收入极小，对于他的帮助当然是不多。这几十年间，他们的一家，这样的在不充裕的生活里度过。

但他们很快活。父子之间，老是象朋友似的在讨论着什么，在互相帮助着什么。炎甫结了婚。他的妻是我少时候很熟悉的一位游伴。她在他们家里觉得很舒服。他们从不曾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争执。

小泉先生在学校里，对于一般小学生的态度，也便是象对待他自己的儿子炎甫一样；不当他们是被教诲的学生们，不以他们为知识不充足的小人们；他只当他们是朋友，最密切亲近的朋友。他极善诱导启发，出之以至诚，发之于心坎。我从不曾看见他对于小学生有过疾言厉色的责备。有什么学生犯下了过错，他总是和蔼的在劝告，在絮谈，在闲话。

没有一个学生怕他，但没有一个学生不敬爱他。

他做了二十年的高等小学校的教员，校长。他自己原是科

举出身。对于新式的教育却努力的不断的在学习，在研究，在讨论。在内地，看报的人很少，读杂志的人更少；我记得他却定阅了一份《教育杂志》(？) 这当然给他以不少的新的资料与教导法。

他是一位教国文的教师。所谓国文，本来是最难教授的东西；清末到民国六七年间的高等小学的国文，尤其是困难中之困难。不能放弃了旧的四书五经，同时又必须应用到新的教科书。教高小学生以《左传》《孟子》和《古文观止》之类是“对牛弹琴”之举。但小泉先生却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材料。

我在别一个小学校里，国文教员拖长了声音，板正了脸孔，教我读《古文观止》。我至今还恨这部无聊的选本！

但小泉先生教我念《左传》，他用的是新的方法，我却很感到趣味。

仿佛是，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从了小泉先生念书。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

高小毕业后，预备考中学。曾和炎甫等几个同学，在一所庙宇里补习国文。教员也便是小泉先生。在那时候，我的国文，进步得最快。我第一次学习着作文。我永远不能忘记了那时候的快乐的生活。

到进了中学校，那国文教师又在板正了脸孔，拖长了声音在念《古文观止》！求小泉先生时代那末活泼善诱的国文教师是终于不可得了！

所以，受教的日子虽不很多，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了他。

他和我家有世谊，我和炎甫又是很好的同学，所以，虽离开了他的学校，他还不断的在教诲我。

假如我对于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

我永远不能忘记了他，永远不能忘记了他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的态度——虽然离开了他已经有十几年，而现在是永不能有再见到他的机会了。

但他的声音笑貌在我还鲜明如昨日！

二三年七月九日在张家口车上

（原载一九三四年九月《太白》创刊号）

北　　平

你若是在春天到北平，第一个印象也许便会给你以十分的不愉快。你从前门东车站或西车站下了火车，出了站门，踏上了北平的灰黑的土地上时，一阵大风刮来，刮得你不能不向后倒退几步；那风卷起了一团的泥沙；你一不小心便会迷了双眼，怪难受的；而嘴里吹进了几粒细沙在牙齿间萨拉萨拉的作响。耳朵壳里，眼缝边，黑马褂或西服外套上，立刻便都积了一层黄灰色的沙垢。你到了家，或到了旅店，得仔细的洗涤了一顿，才会觉得清爽些。

“这鬼地方！那末大的风，那末多的灰尘！”你也许会很不高兴的诅咒的说。

风整天整夜的虎虎的在刮，火炉的铅皮烟通，纸的窗户，都在乒乒乓乓的相碰着，也许会闹得你半夜睡不着。第二天清早，一睁开眼，呵，满窗的黄金色，你满心高兴，以为这是太阳光，你今天将可以得一个畅快的游览了。然而风声还在虎虎的怒吼着。擦擦眼，拥被坐在床上，你便要立刻懊丧起来。那黄澄澄的，错疑作太阳光的，却正是漫天漫地的吹刮着的黄沙！风声吼吼的还不曾歇气。你也许会懊悔来这一趟。

但到了下午，或到了第三天，风渐渐的平静起来。太阳光真实的黄亮亮的晒在墙头，晒进窗里。那份温暖和平的气息儿，立刻便会鼓动了你向外面跑跑的心思。鸟声细碎的在鸣叫着，大

约是小麻雀儿的唧唧声居多。——碰巧，院子里有一株杏花或桃花，正涵着苞，浓红色的一朵朵，将放未放。枣树的叶子正在努力的向外崛起。——北平的枣树是那末多，几乎家家天井里都有个一株两株的。柳树的柔枝儿已经是透露出嫩嫩的黄色来。只有硕大的榆树上，却还是乌黑的秃枝，一点什么春的消息都没有。

你开了房门，到院子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啊，好新鲜的空气，仿佛在那里面便挟带着生命力似的。不由得不使你神清气爽。太阳光好不可爱。天上干干净净的没半朵浮云，俨然是"南方秋天"的样子。你得知道，北平当晴天的时候，永远的那一份儿"天高气爽"的晴明的劲儿，四季皆然，不独春日如此。

太阳光晒得你有点暖得发慌。"关不住了！"你准会在心底偷偷的叫着。

你便准得应了这自然之招呼而走到街上。

但你得留意，即使你是阔人，衣袋里有充足的金洋银洋，你也不应摆阔，坐汽车。被关在汽车的玻璃窗里，你便成了如同被蓄养在玻璃缸的金鱼似的无生气的生物了。你将一点也享受不到什么。汽车那末飞快的冲跑过去，仿佛是去赶什么重要的会议。可是你是来游玩，不是来赶会。汽车会把一切自然的美景都推到你的后面去。你不能吟味，你不能停留，你不能称心称意的欣赏。这正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的勾当。你不会蠢到如此的。

北平不接受那末摆阔的阔客。汽车客是永远不会见到北平的真面目的。北平是个"游览区"。天然的不欢迎"走车看花"——比走马看花还杀风景的勾当——的人物。

那末，你得坐"洋车"——但得注意：如果你是南人，叫一声黄包车，准保个个车夫都不理会你，那是一种侮辱，他们以为。

(黄包，北音近于王八。)或酸溜溜的招呼道："人力车，"他们也不会明白的。如果叫道："胶皮，"他们便知道你是从天津来的，准得多抬些价。或索性洋气十足的，叫道，"力克夏，"他们便也懂，但却只能以"毛"为单位的给车价了。

"洋车"是北平最主要的交通物。价廉而稳妥，不快不慢，恰到好处。但走到大街上，如果遇见一位漂亮的姑娘或一位洋人在前面车上，碰巧，你的车夫也是一位年轻力健的小伙子，他们赛起车来，那可有点危险。

干脆，走路，倒也不坏。近来北平的路政很好，除了冷街小巷，没有要人、洋人住的地方，还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之外，其余冲要之区，确可散步。

出了巷口，向皇城方面走，你便将渐入佳景的。黄金色的琉璃瓦在太阳光里发亮光，土红色的墙，怪有意思的围着那"特别区"。入了天安门内，你便立刻有应接不暇之感。如果你是聪明的，在这里，你必得跳下车来，散步的走着。那两支白石盘龙的华表，屹立在中间，恰好烘托着那一长排的白石栏杆和三座白石拱桥，表现出很调和的华贵而苍老的气象来，活象一位年老有德、饱历世故、火气全消的学士大夫，没有丝毫的火辣辣的暴发户的讨厌样儿。春冰方解，一池不浅不溢的春水，碧油油的可当一面镜子照。正中的一座拱桥的三个桥洞，映在水面，恰好是一个完全的圆形。

你过了桥，向北走。那厚厚的门洞也是怪可爱的(夏天是乘风凉最好的地方)。午门之前，杂草丛生，正如一位不加粉黛的村姑，自有一种风趣。那左右两排小屋，仿佛将要开出口来，告诉你以明清的若干次的政变，和若干大臣、大将雍雍锵锵的随驾而出入。这里也有两支白色的华表，颜色显得黄些，更觉得苍老

而古雅。无论你向东走，或向西走，——你可以暂时不必向北进端门，那是历史博物馆的入门处，要购票的。——你可以见到很可愉悦的景色。出了一道门，沿了灰色的宫墙根，向西北走，或向东北走，你便可以见到护城河里的水是那末绿得可爱。太庙或中山公园后面的柏树林是那末苍苍郁郁的，有如见到深山古墓。和你同道走着的，有许多走得比你还慢，还没有目的的人物；他们穿了大袖的过时的衣服，足上登着古式的鞋，手上托着一只鸟笼，或臂上栖着一只被长链锁住的鸟，懒懒散散的在那里走着。有时也可遇到带着一群小哈叭狗的人，有气势的在赶着路。但你如果到了东华门或西华门而折回去时，你将见他们也并不曾往前走，他们也和你一样的折了回去。他们是在这特殊幽静的水边遛跶着的！遛跶，是北平人生活的主要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在这同一的水边，城墙下，遛跶整个半天，天天如此，年年如此，除了刮大风，下大雪，天气过于寒冷的时候。你将永远猜想不出，他们是怎样过活的。你也许在幻想着，他们必定是没落的公子王孙，也许你便因此凄怆的怀念着他们的过去的豪华和今日的沦落。

拍的一声响，惊得你一大跳，那是一个牧人，赶了一群羊走过，长长的牧鞭打在地上的声音。接着，一辆一九三四年式的汽车呜呜的飞驰而过。你的胡思乱想为之撕得粉碎。——但你得知道，你的凄怆的情感是落了空。那些臂鸟驱狗的人物，不一定是没落的王孙，他们多半是以驯养鸟狗为生活的商人们。

你再进了那座门，向南走。仍走到天安门内。这一次，你得继续的向南走。大石板地，没有车马的经过，前面的高大的城楼，作为你的目标。左右全都是高及人头的灌木林子。在这时候，黄色的迎春花正在盛开，一片的喧闹的春意。红刺梅也在含

苞。晚开的花树，枝头也都有了绿色。在这灌木林子里，你也许可以徘徊个几个小时。在红刺梅盛开的时候，连你的脸色和衣彩也都会映上红色的笑影。散步在那白色的阔而长的大石道，便是一种愉快。心胸阔大而无思虑。昨天的积闷，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你将不再对北平有什么诅咒。你将开始发生留恋。

你向南走，直走到前门大街的边沿上，可望见东西交民巷口的木牌坊，可望见你下车来的东车站或西车站，还可望见屹立在前面的很弘伟的一座大牌楼。乱纷纷的人和车，马和货物；有最新式的汽车，也有最古老的大车，简直是最大的一个运输物的展览会。

你站了一会，觉得看腻了，两腿也有点发酸了，你便可以向前走了几步，极廉价的雇到一辆洋车，在中山公园口放下。

这公园是北平很特殊的一个中心。有过一个时期，当北海还不曾开放的时候，她是北平唯一的社交的集中点。在那里，你可以见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当然无产者是不在内，他们是被几分大洋的门票摈在园外的。你在那里坐了一会，立刻便可以招致了许多熟人。你不必家家拜访或邀致，他们自然会来。当海棠盛开时，牡丹，芍药盛开时，菊花盛开时的黄昏，那里是最热闹的上市的当儿。茶座全塞满了人，几乎没有一点空地。一桌人刚站了起来，立刻便会有候补的挤了上去。老板在笑，伙计们也在笑。他们的收入是如春花似的繁多。直到菊花谢后，方才渐渐的冷落了下来。

你坐在茶座上，舒适的把身体堆放在藤椅里，太阳光满晒在身上，棉衣的背上，有些热起来。前后左右，都有人在走动，在高谈，在低语。坛上的牡丹花，一朵朵总有大碗粗细。说是赏花，其实，眼光也是东溜西溜的。有时，目无所瞩，心无所思的，可以

懒懒的呆在那里，整整的呆个大半天。

一阵和风吹来，遍地白色的柳絮在团团的乱转，渐转成一个球形，被推到墙角。而漫天飞舞着的棉状的小块，常常扑到你面上，强塞进你的鼻孔。

如果你在清晨来这里，你将见到有几堆的人，老少肥瘦俱齐，在大树下空地上练习打太极拳。这运动常常邀引了患肺痨者去参加，而因此更促短了他们的寿命。而这时，这公园里也便是肺痨病者们最活动的时候。瘦得骨立的中年人们，倚着杖，蹒跚的在走着，——说是呼吸新鲜空气——走了几步，往往咳得伸不起腰来，有时，喀的一声，吐了一大块浓痰在地上。为了这，你也许再不敢到这园来。然而，一到了下午，这园里却仍是拥挤着人。谁也不曾想到天天清晨所演的那悲剧。

园后的大柏树林子，也够受糟蹋的。茶烟和瓜子壳，熏得碧绿的柏树叶子都有点显出枯黄色来，那林子的寿命，大约也不会很长久。

和中山公园的热闹相陪衬的是隔不几十步的太庙的冷落。不知为了什么，去太庙的人到底少。只有年轻的情人们，偶尔一对两对的避人到此密谈。也间有不喜追逐在热闹之后的人，在这清静点的地方散步。这里的柏树林，因为被关闭了数百年之后，而新被开放之故，还很顽健似的，巢在树上的“灰鹤”也还不曾搬家他去。

太庙所陈列的清代各帝的祭殿和寝宫，未见者将以为是如何的辉煌显赫，如何的富丽堂皇，其实，却不值一看。一色黄缎绣花的被褥衣垫，并没有什么足令人羡慕。每张供桌上所列的木雕的杯碗及烛盘等等，还不如豪富人家的祖先堂的讲究。从前读一明人笔记，说，到明孝陵参观上供，见所供者不过冬瓜汤

等等极淡薄贱价的菜。这里在皇帝还在宫中时，祭供时，想也不过如此。是帝王和平民，不仅在坟墓里同为枯骨，即所馨享的也不过如此如此而已。

你在第二天可以到北城去游览一趟，那一边值得看的东西很不少。后门左近有国子监，钟楼及鼓楼。钟鼓楼每县都有之，但这里，却显得异常的弘伟。国子监，为从前最高的学府，那里边，藏有石鼓——但现在这著名的石鼓却已南迁了。由后门向西走，有十刹海；相传《红楼梦》所描写的大观园就在十刹海附近。这海是平民的夏天的娱乐场。海北，有规模极大的冰窖一区。海的面积，全都是稻田和荷花荡。（北平人的养荷花是一业，和种水稻一样。）夏天，荷花盛开时，确很可观。倚在会贤堂的楼栏上，望着骤雨打在荷盖上，那喷人的荷香和刹刹的细碎的响声，在别处是闻不到、听不到的。如果在芦席棚搭的茶座上听着，虽显得更亲切些，却往往棚顶漏水，而水点落在芦席上，那声音也怪难听的，有喧宾夺主之感。最佳的是夏已过去，枯荷满海，十刹海的闹市已经收场，那时，如果再到会贤堂楼上，倚栏听雨，便的确不含糊的有"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妙，不过，北平秋天少雨，这境界颇不易逢。

十刹海的对面，便是北海的后门。由这里进北海，向东走，经过澄心斋、松坡图书馆、仿膳、五龙亭，一直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好。惟惜五龙亭等处，夏天人太闹。极乐世界已破坏得不堪，没有一尊佛像能保得不断脰折臂的。而北海之饶有古趣者，也只有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游人是最少进去的。如果由后面向南走，你便可以走到北海董事会等处，那里也是开放的，有茶座，却极冷落。在五龙亭坐船，渡过海——冬天是坐了冰船滑过去——便是一个圆岛，四面皆水，以一桥和大门相通。

岛的中央，高耸着白塔。依山势的高下，随意布置着假山、庙宇、游廊、小室，那曲折的工程很足供我们作半日游。

如果，在晴天，倚在漪澜堂前的白石栏干上，静观着一泓平静不波的湖水，受着太阳光，闪闪的反射着金光出来，湖面上偶然泛着几只游艇，飞过几只鹭鸶，惊起一串的呷呷的野鸭，都足够使你留恋个若干时候。但冬天，那是最坏的时候了，这场面上将辟为冰场，红男绿女们在那里奔走驰驶，叫闹不堪。你如果已失去了少年的心，你如果爱清静，爱独游，爱默想，这场面上你最好是不必出现。

出了北海的前门，向西走，便是金鳌玉蝀桥。这座白石的大桥，隔断了中南海和北海。北海的白日，如画的映在水面上，而中海的万善殿的全景，也很清晰的可看到。中南海本亦为公园，今则又成了“禁地”。只有东部的一个小地方，所谓万善殿的，是开放着。这殿很小，游人也极冷落，房室却布置得很好。龙王堂的一长排，都是新塑的泥像，很庸俗可厌。但你要是一位细心的人，你便可在一个殿旁的小室里，发见了倚在墙角无人顾问的两尊木雕的菩萨像。那形态面貌，无一处不美，确是辽金时代的遗物；然一尊则双臂俱折，一尊则胆部只剩了半边。谁还注意到他们呢？报纸上却在鼓吹着龙王堂的神像的塑得有精神，为明代的遗物。却不知那是民国三四年间的新物！仍由中南海的后门走出，那斜对过便是北平图书馆，这绿琉璃瓦的新屋，建筑费在一百四十万以上，每年的购书费则不及此数之十二。旧书是并合了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及他处所藏的，新书则多以庚款购入。在中国可称是最大的图书馆。馆外的花园，邻于北海者，亦以白色栏杆围隔之；惟为廉价之水门汀所制成，非真正的白石也。

由北平图书馆再过金鳌玉蝀桥，向东走，则为故宫博物院。

由神武门入院，处处觉得寥寂如古庙，一点生气都没有。想来，在还是“帝王家”的时代，虽聚居了几千宫女、太监们在内，而男旷女怨，也必是“戾气”冲天的。所藏古物，重要者都已南迁，游人们因之也寥落得多。

神武门的对门是景山。山上有五座亭，除当中最高的一亭外，多被破坏。东边的山脚，是崇祯自杀处。春天草绿时，远望景山，如铺了一层绿色的绣毡，异常的清嫩可爱。你如果站在最高处，向南望去，宫城全部，俱可收在眼底。而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无线电台，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三条胡同的协和医院都因怪不调和而被你所注意。而其余的千家万户则全都隐藏在万绿丛中，看不见一瓦片，一屋顶，仿佛全城便是一片绿色的海。不到这里，你无论如何不会想象得到北平城内的树木是如何的繁密；大家小户，那一家天井不有些绿色呢。你如站在北面望下时，则钟鼓楼及后门也全都耸然可见。

三大殿和古物陈列所总得耗费你一天的工夫。从西华门或从东华门入，均可。古物陈列所因为古物运走的太多，现在只开放武英殿，然仍有小少好东西。仅李公麟的《击壤图》便足够消磨你半天。那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没精神的，姿态各不相同，却不曾有一懈笔。

三大殿虽空无所有，却弘伟异常。在殿廊上，下望白石的“丹墀”，不能不令你想到那过去的充满了神秘气象的“朝廷”和叔孙通定下的“朝仪”的如何能够维持着常在的神秘的尊严性。你如果富于幻想，闭了眼，也许还可以如见那静穆而紧张的随班朝见的文武百官们的精灵的往来。这里有很舒适的茶座。坐在这里，望着一列一列的雕镂着云头的白石栏杆和雕刻得极细致的陛道，是那末样的富于富丽而明朗的美。

你还得费一二天的工夫去游南城。出了前门，便是商业区和会馆区。从前汉人是不许住在内城的，故这南城或外城，便成了很重要的繁盛区域。但现在是一天天的冷落了。却还有几个著名的名胜所在，足供你的留连、徘徊。西边有陶然亭，西边有夕照寺、拈花寺和万柳堂。从前都是文士们雅集之地，如今也都败坏不堪，成为工人们编麻索、织丝线之地。所谓万柳也都不存一株。只有陶然亭还齐整些。不过，你游过了内城的北海、太庙、中山公园，到了这些地方，除了感到“野趣”之外，他便全无所得的了。你或将为汉人们抱屈；在二十几年前，他们还都只能局促于此一隅。而内城的一切名胜之地，他们是全被摈斥在外的。别看清人诗集里所歌咏的是那末美好，他们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呢！

而现在，被摈斥于内城诸名胜之外的，还不依然是几十百万人么？

南城的娱乐场所，以天桥为中心。这个地方倒是平民的聚集之所；一切民间的玩意儿，一切廉价的旧货物，这里都有。

先农坛和天坛也是极弘伟的建筑。天坛的工程尤为浩大而艰巨。全是圆形的；一层层的白石栏杆，白石阶级，无数的参天的大柏树，包围着一座圆形的祭天的圣坛。坛殿的建筑，是圆的，四围的阶级和栏杆也都是圆的。这和三大殿的方整，恰好成一最有趣的对照。在这里，在大树林下徘徊着，你也便将勾引起难堪的怀古的情绪的。

这些，都只是游览的经历。你如果要在北平多住些时候，你便要更深刻的领略到北平的生活了。那生活是舒适、缓慢、吟味、享受，却绝对的不紧张。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么？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丁当丁当的大颈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那些大动物的眼里，表现的是那末和平而宽容，负重而忍

辱的性情。这便是北平生活的象征。

和这些弘伟的建筑，舒适的生活相对照的，你不要忘记掉，还有地下的黑暗的生活呢。你如果有一个机会，走进一所“杂合院”里，你便可见到十几家老少男女紧挤在一小院落里住着的情形：孩子们在泥地上爬，妇女们是脸多菜色，终日含怒抱怨着，不时的，有咳嗽的声音从屋里透出。空气是恶劣极了；你如不是此中人，你便将不能作半日留。这些“杂合院”便是劳工、车夫们的居宅。有人说，北平生活舒服，第一件是房屋宽敞，院落深沉，多得阳光和空气。但那是中产以上的人物的话。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人口，是住着龌龊的“杂合院”里的，你得明白。

更有甚的，在北城和南城的僻巷里，听说，有好些人家，其生活的艰苦较住“杂合院”者为尤甚，常有一家数口合穿一条裤或一衣的。他们在地下挖了一个洞。有一人穿了衣裤出外了，家中裸体的几人便站在其中。洞里铺着稻草或破报纸，藉以取暖。这是什么生活呢！

年年冬天，必定有许多无衣无食的人，冻死在道上。年年冬天，必定有好几个施粥厂开办起来。来就食的，都是些可怕的窘苦的人们。然也竟有因为无衣而不能到粥厂来就吃的！

“九渊之下，更有九渊。”北平的表面，虽是冷落破败下去，尚未减都市之繁华。而其里面，却想不到是那样的破烂、痛苦、黑暗。

终日徘徊于三海公园乃至天桥的，不是罪人是什么！而你，游览的过客，你见了这，将有动于中，而怏怏的逃脱出这古城呢，还是想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类的话呢？

二三年十一月三日写

（原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学生》第五十号）

永在的温情

纪念鲁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点钟，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 Evening Post，被这样的一个标题：

“中国的高尔基今晨五时去世”惊骇得一跳。连忙读了下来，这惊骇变成了事实：果然是鲁迅先生去世了！

这消息象闷雷似的，当头打了下来，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恶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鲁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间歇的发着热，但热度并不甚高。一年以来，始终不曾好好的恢复过；但也从不曾好好的休息过。半年以来，情形尤显得不好。缠绵在病榻上者总有三四个月。朋友们都劝他转地疗养。他自己也有此意。前一个月，听说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诉我。双十节那一天还遇见他在 Isis 看 Dobrovsky；中国木刻画展览会，他也曾去参观。总以为他是渐渐的复原了，能够出来走走了。谁又想得到这可怕的恶耗竟这样突然的来呢？

刚在前几天，他还有信给我，说起一部书出版的事；还附带的说，想早日看见《十竹斋笺谱》的刻成。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回信。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恶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我一夜不曾好好的安心的睡。

第二天赶到万国殡仪馆，站在他遗像的面前，久久的走不开。再一看，他的遗体正在像下，在鲜花的包围里。面貌还是那末清癯而带些严肃，但双眼却永远的闭上了！

我要哭出来，大声的哭，但我那时竟流不出眼泪，泪水为悲戚所灼干了。我站在那里，久久的走不开。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样突然的便离我们而远远的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谊的温情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的谈下去。在那里面你便可以发见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启明先生一样，他是最可谈，最能谈的朋友，你可以坐在他客厅里，他那间书室（兼卧室）里，坐上半天，不觉得一点拘束，一点不舒服。什么话都谈。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末有力。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末正确。你有什么怀疑，不安，由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鼓起你的勇气。

失去了这样的一位温情的朋友，就个人讲，将是怎样的一个损失呢？

他最勤于写作，也最鼓励人写作。他会不惮烦的几天几夜的在替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创作，校正译稿。其仔细和小心远过于一位私淑的教师。

他曾和我谈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来请求他改。他仔仔细细的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

"现在做事真难极了!"他慨叹的说道。对于人的不易对付，和做事之难，他这几年来时时的深切的感到。

但他并不灰心，仍然的在做着吃力不讨好的改削创作，校正译稿的事，挣扎着病躯，深夜里，仔仔细细的为不相识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这样的温情的指导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将怎样的令人感到不可补赎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的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永远拿不出东西来，象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的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诛痛恶的在责骂。

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年，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的做。

"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那样的清楚的心境，我们都是同样的深切的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末快的便逝去，还留下要做的许多事没有来得及做——但，后死者却要继续他的事业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见是在同爱罗先诃到北平去的时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戴着黑色呢帽，陪着爱罗先诃到女师大的大礼堂里去。我们匆匆的谈了几句话。因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边来，在北平竟不曾再见一次面。

后来，他自己说，他那件黑色的夹外套，到如今还有时着在身上。

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曾不时的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说起稿子的事，别的话也没有什么。

最早使我笼罩在他温热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讨论到“三言”问题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完全象盲人骑瞎马，乱闯乱摸，一点凭藉都没有，只是节省着日用，以浅浅的薪入购书，而即以所购入之零零落落的破书，作为研究的资源。那时候实在贫乏得，肤浅得可笑，偶尔得到一部原板的《隋唐演义》却以为是了不得的奇遇，至于“三言”之类的书，却是连梦魂里也不曾读到。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写信问他《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及《喻世名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的便来了，附来的是他抄录的一张《醒世恒言》的全目。——这张目录我至今还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里。他说，《喻世》，《警世》，他也没有见到。《醒世恒言》他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里藏有全书。所以他便借了来。抄下目录寄给我。

当时，我对于这个有力的帮助，说不出应该怎样的感激才好。这目录供给了我好几次的应用。

后来，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又写信问他有没有此书。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我那时实在眼光小得可怜，几曾见过几部明版附插图的平话集？见了这《西湖二集》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

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苦的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

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慄，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痠痛的右臂。但只有这一集可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的赠与。——只有这一部书！

现在这部《西湖二集》也还在堆在我最宝爱的几十部明版书的中间，看了它便要泫然泪下。这可爱的直率的真挚的友情，这不意中的难得的帮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头的温情是永在的！——这温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后，他到过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热烈的欢迎。但过了几天，便悄悄的走了。他原是去探望他母亲的病去的。我竟来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时，他便和我谈起在北平的所获。

“木刻画如今是末路了，但还保存在笺纸上。不过，也难说，保全得不会久，”他深思的说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笺纸来给我看，都是在北平时所购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纸店所出的笺纸，搜罗了一下，用好纸刷印个几十部，作为笺谱，倒是一件好事。”他说道。

过了一会，他又道：“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这里不能做这事。”

我心里很跃动，正想说，“那末，我来做吧。”而他慢吞吞的续说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费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将这责任担负了下来，但说明搜辑而得的笺纸，由他负选择之责。我相信他的选择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后，我一包一包的将购得的笺样送到上海，经他选择后，再一包一包的寄回。

中间，我曾因事把这工作停顿了二三个月。他来信说，“这事我们得赶快做，否则，要来不及做，或轮不到我们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之下，那六巨册的美丽的《北平笺谱》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来，带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斋笺谱》四册，顺便的送到他家里给他看。

这部谱，刻得极精致，是明末版画里最高的收获。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祯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传得极少。

“这部书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议道；那时，我为《北平笺谱》的成功所鼓励，勇气有余。

“好的，好的，不过要赶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无比，所耗也不资，几乎不是我们的力量所及。第一册已出版了，第二册也刻好待印；而鲁迅先生却等不及见到第三册以下的刻成了！

对于美好的东西，似乎他都喜爱。我曾经有过一个意思，要集合六朝造像及墓志的花纹刻为一书。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诉我说，他所藏的六朝造像的拓本也不少，如今还在陆续的买。

他是最能分别得出美与丑，永远的不朽与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为神奇，而詹詹自喜，向青年们施以毒害的宣传之外，他对于古代的遗产，决不歧视，反而抱着过分的喜爱。

他曾经告诉过我，他并不反对袁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气的，这在他文集里便可见。他所厌弃，所斥责的乃是只见中郎的一面，而恣意鼓吹着的人物。

京平刚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最大的鼓励。他感激得几乎哭出来。但想不到鲁迅竟这样的突然的过去了！

第三天，我在万国殡仪馆门口遇见他；他的嘴唇在颤动，眼圈在红。

从万国公墓归来后，他给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经分裂。我从到达公墓时，就失去了约束自己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声。先生，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的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他并没有去。他的温情永在我的心头——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写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七卷第五期)

鲁迅先生并不偏狭

鲁迅先生并不偏狭，如一般不认识，不深知他的人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他的心胸是最广阔的。对于文艺，他尤其抱着最宽大的精神，最正确的见解。

有些批评者称鲁迅先生为中国的高尔基。这句话并不令人抗议——虽然在相隔四个月之间相继逝去的他们，性格、工作未必完全相同。

在鼓励，奖进青年作家们这一方面，鲁迅先生和高尔基具有极相同的热忱。对于这一点，有许多的青年作家们，说起来便要流涕的追念着！

在宽大正确的文艺见解上，鲁迅先生和高尔基尤为无殊。自从高尔基回到了俄国之后，俄国的文坛方才一洗革命初期的排斥"非革命"的作品的态度。在高尔基指导之下，俄国成立了世界文学研究会一类的组织，大规模的在介绍古典的和西欧的文学。被托尔斯泰所斥责的莎士比亚，居然也重新被认识了。俄国本土的旧作品也大量的重印着。许多重要作家，象托尔斯泰的未发表的遗著，都陆续的由国家的力量替他们出版。

鲁迅先生对于文艺，其趣味也是极广泛的。他以同样的喜爱的态度，来对待《死魂灵百图》，《凯绥·柯勒惠支版画》，以及《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陈老莲画博古牌》；他以同样的热忱来介绍爱罗先诃的童话，阿志巴绥夫的小说；来整理中国小

说，来辑录唐传奇和古小说。他是收藏六朝造像最丰富的收藏家之一。他还收藏着最丰富的近代的版画。

他对一切好的，美的东西，都是喜爱的。他决不有意的排斥某一时代或一个地方或国度的美好的东西。

对于友朋或青年们，他也尽了他的最大的忍耐和温情。他知道许多人的弱点，他明明看出他们的缺点的所在，但他并不严峻的指斥他们。他知道凡是一个人决不会没有一点疵瑕的。

他对于和他往来的人们往往表示着过度的热心，以此往往的上当。但他并不灰心。他的信是由一家书店转的，但他还代青年们负转信之责；他的稿费都不是自己去取的，但他也还往往受人之托，去做支取稿费一类的麻烦的事。他天天要写稿，译稿，他有许多的工夫要做；但他仍然是热忱的为青年人看稿，覆信指示他们的前途。即在病榻上，他还天天替一位故去的朋友在校对遗著，一个字一个字的细校着。

他一直忙碌到死，不曾舒畅的安心的休息过一天。

他每顿喝不多的酒；纸烟到是不离口的，但吸的只是《美丽牌》一类的比较廉价的。此外，他似乎是别无所好了，除了买书。他的钱都用来帮助他所不认识或认识的，应该或需要帮助的朋友了。同时还自费出版些永远是亏本生意的版画集。

但他对文艺并不是一味的宽容；对人，也并不是一味的姑息。

他的爱憎是最分明，最痛快的表现着的。

他爱一切为大众而工作着的人；他爱精致的好文章，好木刻画；他爱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作品。

但他憎的是浮滑少年，是宣传“谬种”的人物，是鬼祟的阴谋者，是抱着一二部自己一知半解的古书，却以为“天下之美尽在

于此矣”的可笑之人。

故他不反对袁中郎，却反对提倡或学习袁中郎者。他喜爱一切的有希望的青年，却厌恶良心已经腐烂了的鬼祟的人物。

他是最热烈的人；满腔的义愤，满腔的热情，他永远不曾“老”，也从不曾自以为“老”过。

从他坚定的徐缓的谈话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不可摇撼的巨人。

疾风会吹倒劲草，但吹不折凌霄的孤松。

他的身体虽已埋掉，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的笼罩在后来的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人们的身上和心上。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写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中流》一卷第五期）

忆冲锋的老战士鲁迅先生

在一个战壕里，有无数的新入伍的兵士从后方补充进去，他们没有过战争的经验，他们是要犯“上场昏”的。前后左右都是步枪声、机关枪声，红光一闪的是大炮的飞过，轰炸弹，炮弹炸裂起来，大地仿佛在跳动，泥土飞溅得天高，又一阵泥雨似的洒落下来。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几个老于战阵的老战士们在慰藉他们，在指导他们，在鼓励他们，他们一定会吓得后逃的。许多许多的新兵都依仗着老战士的行动为标的，仿佛在黑暗中依仗着明灯行路一样。

在这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的时候，我们的依仗着民族的老战士们的地方格外多，格外切。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救亡队伍里新群众们的标的与指导。老战士们会指示出好的战术，最有力的救亡方案的。

鲁迅先生是我们民族老战士们里最英勇，最爱打冲锋，最喜指示青年们的一位。假如他在今年这个时候还活在世上的话，我们的救亡阵线，我们的青年的新兵，我们的文坛上的工作，将增加多少的活跃呢！然而在今年的这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的时候，我们的打冲锋的老战士鲁迅先生却永远的被“自然”消失去了，他的跃马挺戈向前杀敌的英勇的姿态了！我们不再听到他的亲切的呐喊，我们不再见到他的严肃而感人的指示！我们不再能够依仗着他的明灯而前进！我们不再能够见到他的

瘦削的被裹在黑呢大衣里的身躯，而跟着他坚定的步伐在往前走！我们在正最需要他，最要倚重他的时候，他却在前此的一年，为“自然”残酷的从我们的队伍里夺去了！

我们在这位老战士的周年忌辰的今天，我们将怎样的怅惘与悼恨呢！

然而，我们在静默的悼念着时，我们仿佛还见到他被裹在黑呢大衣里的瘦削身躯，在以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我们仿佛还听见他的亲切的呐喊去鼓励着新入伍兵的杀敌的勇气。这使我们增加了无限的杀敌的勇气！

冲，冲！向前杀敌啊，救亡的阵伍！我们要以我们的老战士的永远不衰退的勇敢为标的！

万国公墓的绿草，虽经了秋雨，还是绿油油的吧。炮声在我们的周围炸裂的作响。还能够容许我们到墓头致悼敬，作默祷么？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烽火（呐喊）》第九期）

失 书 记

二十多年来，因为研究的需要和个人的偏嗜，收购了不少古书。一部部的从书店里挟在腋下带回来，都觉得是有用的。但一到了家，翻阅了一下，因为不是立即用到的，便往往将它向书箱里或书橱顶上一塞。有时，简直是好几年不曾再翻阅过。书一天天的堆积得多了。书箱由十二只而二十余只，而五十余只，而至一百余只。不放在箱子里的书还有不少。因为研究的复杂，搜罗材料的求全求备，差不多不弃瓦石和沙砾。其实在瓦石和沙砾里，往往可以发现些珠玉和黄金出来。十年前，得到不少的弹词、宝卷、鼓词和平津到潮汕的小唱本。那些小唱本一批批的购入，或由友人们的赠贻，竟积至二万余册之多。“一·二八”之役，我在东宝兴路的寓所沦入日人之手。一切书籍都不曾取出。书箱被用刀斧斫开的不少。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均丧失无遗。惟古书还保存得很多。三月间，将各余存的书全部迁出。那时，我不在上海。高梦旦先生和家叔莲蕃先生曾费了许多的力量去设法搬运。许多的书箱都杂乱的堆在高宅大厅上。过了半年，方托人清钞一份目录。除仍留一部分存于高宅外，大多数都转送到开明书店图书馆寄存。四五年来，我因为自己在北平，除了应用的书随身带去者外，全都没有移动。在北平，又陆续的购到几十箱的古书，其中尤以明版的小说及戏曲为

多。前年夏天南旋时，又全都随身带了下来。幸免于和那个古城同陷沦亡。但有一部分借给友人们的书，却一时顾不及取回了。二年以来因为寓所湫狭，竟不能将寄存之书取储家中。“八·一三”战事起后，虹口又沦为战区。开明书店图书馆全部被毁于火。我的大多数的古书，未被毁于“一·二八”之役者，竟同时尽毁于此役。所失者凡八十余箱，近二千种，一万数千册的书。其中有元版的书数部，明版的书二三百部；应用的书，象许多近代的丛书所失尤多。最可惜的是，积二十年之力所收集的关于《诗经》及《文选》的书十余箱竟全部烬于一旦。在欧洲收集到的许多书（多半是关于艺术的及考古学的），也全都失去了。尚有清人的手稿数部，不曾刊行者也同归于尽！不能无介介于心；总觉得有些对不起古人！连日闸北被敌机大肆轰炸，纸灰竟时时飘飞到小园中来。纸灰上的字迹还明显的可辨。这又是什么人家的文库被毁失了！在今日抗战开始之后，象这样的文化上的损失，除了万分惋惜之外，是不会比无数人民的性命财产的牺牲更令人沈痛和切齿的。而无数前敌将士们正在喋血杀敌，为国作战，我们这些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北平图书馆的所藏，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乃至无数私家的宝藏之图籍还不是全都沦亡了么？我们这些损失又算得了什么？但我所深有感者，乃在没有国防的国家根本上谈不上“文化”的建设。没有武力的保卫，文化的建设是最容易受摧残的。阿速帝国的文库还不是被深埋在地下么？宋之内府所藏图籍，还不是被捆载而北么？希腊、罗马的艺术还不是被野蛮民族所摧毁而十不存一么？无数文人学士们的呕尽心血的著作曾不足当野蛮的侵略者的一焚！这是古今一致，万方同慨的事！要保全“文化”，必须要建立最巩固的国防！失者已矣！“文化”人将怎么保卫文化呢？当必

知所以自处矣！无国防，即无文化！炮火大作，屋基为之震动。偷闲重写“失书”的目录为一卷。作《失书记》，附于后。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记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烽火》第九期）

悼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先生死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了；但静静的想着时，我们仿佛还都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

他住在沦陷区里，生活紧张而困苦，没有一天不在愁叹着。是悲天？是悯人？

胜利到来的时候，他曾经很天真的高兴了几天。我们相见时，大家都说道，“好了，好了，”个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泯没了愁闷，耀着一层光彩。他也同样的说道：“好了，好了！”

然而很快的，便又陷入愁闷之中。他比我们敏感，他似乎失望，愁闷得更迅快些。

他曾经很高兴的写过几篇文章；很提出些正面的主张出来。但过了一会，便又沉默下去，一半是为了身体逐渐衰弱的关系。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的压迫和统制。他最富于正义感。看不惯一切的腐败、贪污的现象。他自己曾经说道：“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又道：“记得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入床内；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刻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产时，不敢走入产房，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均见《平屋杂文》）

这便是他的性格。他表面上很恬淡，其实，心是热的；他仿

佛无所褒贬，其实，心里是泾渭分得极清的。在他淡淡的谈话里，往往包含着深刻的意义。他反对中国人传统的调和与折衷的心理。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早衰者，不仅在身体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有一篇《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甚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得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

在《早老者的忏悔》里，他又说道：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劲，只得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到疲劳，甚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以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这是他的悲哀，但他的并不因此而消极，正和他的不因寂寞而厌世一样。他常常愤慨，常常叹息，常常悲愁。他的愤慨、叹息、悲愁，正是他的入世处。他爱世、爱人、尤爱“执着”的有所为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为的人。他爱年轻人；他讨厌权威，讨厌做作、虚伪的人。他没有机心；表里如一。他藏不住话，有什么便说什么。所以大家都称他“老孩子”。他的天真无邪之处，的确够得上称为一个“孩子”的。

他从来不提防什么人。他爱护一切的朋友，常常担心他们的安全与困苦。我在抗战时逃避在外，他见了面，便问道：“没

有什么么?”我在卖书过活，他又异常关切的问道:“不太穷困么?卖掉了可以过一个时期吧。”

“又要卖书了么?”他见我在抄书目时问道。

我点点头:向来不作乞怜相，装作满不在乎的神气，有点倔强，也有点傲然，但见到他的皱着眉头，同情的叹气时，我几乎也要叹出气来。

他很远的挤上了电车到办公的地方来，从来不肯坐头等，总是挤在拖车里。我告诉他，拖车太颠太挤，何妨坐头等，他总是不改变态度，天天挤，挤不上，再等下一部;有时等了好几部还挤不上。到了办公的地方，总是叹了一口气后才坐下。

“丏翁老了，”朋友们在背后都这末说。我们有点替他发愁，看他显著的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他的营养是那末坏，家里的饭菜不好，吃米饭的时候很少;到了办公的地方时，也只是以一块面包当作午餐。那时候，我们也都吃着烘山芋、面包、小馒头或羌饼之类作午餐，但总想有点牛肉、鸡蛋之类伴着吃，他却从来没有过;偶然是涂些果酱上去，已经算是很奢侈了。我们有时高兴上小酒馆去喝酒，去邀他，他总是不去。

在沦陷时代，他曾经被敌人的宪兵捉去过。据说，有他的照相，也有关于他的记录。他在宪兵队里，虽没有被打，上电刑或灌水之类，但睡在水门汀上，吃着冷饭，他的身体因此益发坏下去。敌人们大概也为他的天真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待他很不坏。比别人自由些，只有半个月便被放了出来。

他说，日本宪兵曾经问起了我，“你有见到郑某某吗?”他撒了谎，说道，“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其实，在那时期，我们差不多天天见到的。他是那末爱护着他的朋友!

他回家后，显得更憔悴了;不久，便病倒。我们见到他，他也

只是叹气，慢吞吞的说着经过，并不因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而特别觉得愤怒。他永远是悲天悯人的。——连他自己也在内。

在晚年，他有时觉得很起劲，为开明书店计划着出版辞典；同时发愿要译《南藏》。他担任的是《佛本生经》（«Jataka»）的翻译，已经译成了若干，有一本仿佛已经出版了。我有一部英译本的《Jataka》，他要借去做参考，我答应了他，可惜我不能回家，托人去找，遍找不到。等到我能够回家，而且找到《Jataka》时。他已经用不到这部书了。我见到它，心里便觉得很难过，仿佛做了一件不可补偿的事。

他很耿直，虽然表面上是很随和。他所厌恨的事，隔了多少年，也还不曾忘记。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他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代的浙江教育厅长，他便有点不奈烦，叨叨的说着从前的故事。我们都觉得窘，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

他是爱憎分明的！

他从事于教育很久，多半在中学里教书。他的对待学生们从来不采取严肃的督责的态度。他只是恳挚的诱导着他们。

> ……我入学之后，常听到同学们谈起夏先生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我记得最牢，感动得最深的，是说夏先生最初在一师兼任舍监的时候，有些不好的同学，晚上熄灯，点名之后，偷出校门，在外面荒唐到深夜才回来；夏先生查到之后，并不加任何责罚，只是恳切的劝导，如果一次两次仍不见效；于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着他，无论怎样夜深都守候着他，守候着了，夏先生对他仍旧不加任何责罚，只是苦口婆心，更加恳切地劝导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总要使得犯过者真心悔过，彻底觉悟而后已。
>
> ——许志行：《不堪回首悼先生》。

他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创办人之一，立达的几位教师对于学

生们所应用的也全是这种恳挚的感化的态度。他在国立暨南大学做过国文系主任，因为不能和学校当局意见相同，不久，便辞职不干。此后，便一直过着编译的生活，有时，也教教中学。学生们对于他，印象都非常深刻，都敬爱着他。

他对于语文教学，有湛深的研究。他和刘薰宇合编过一本《文章作法》，和叶绍钧合编过《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及《文心》，也象做国文教师时的样子，细心而恳切的谈着作文的心诀。他自己作文很小心，一字不肯苟且；阅读别人的文章时，也很小心，很慎重，一字不肯放过。从前，《中学生》杂志有过“文章病院”一栏，批评着时人的文章，有发必中；便是他在那里主持着的；他自己也动笔写了几篇东西。

古人说“文如其人”。我们读他的文章，确有此感。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每每劝他编成集子。《平屋杂文》一本，便是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子。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的写来，但是骨子里很丰腴。虽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读了后，也猜得出是他写的。在那里，言之有物；是那末深切的混和着他自己的思想和态度。

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正和他为人的朴素一样。他并不堆砌，只是平平的说着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然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不诚实的话，字斟句酌，决不急就。在文章上讲，是“盛水不漏”，无懈可击的。

他的身体是病态的胖肥，但到了最后的半年，显得瘦了，气色很灰阘。营养不良，恐怕是他致病的最大原因。心境的忧郁，也有一部分的因素在内。友人们都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在这样一团糟的情形之下，“合时宜”的都是些何等人物，可想而知。怎能怪丏尊的牢骚太多呢！

想到这里，便仿佛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在耳边响着。他的忧郁的脸、病态的身体，仿佛还在我们的眼前出现。然而他是去了！永远的去了！那悲天悯人的语调是再也听不到了！

如今是，那末需要由叹息、悲愤里站起来干的人，他如不死，可能会站起来干的。这是超出于友情以外的一个更大的损失。

（原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文艺复兴》一卷第五期）

不朽的故事

——为“七·七节”纪念抗战中亡故的作家们而作

祖国陷在烽火中，无数的人民们在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流着血，流着汗。作家们也并不例外，他们在以笔、以口、以纸、以歌唱来参加这个神圣的抗战。他们有的肩上扛支枪，排在士兵的队伍里；他们有的从这条前线到那条前线，巡回着为军士们服务；他们有的深入敌人的后方，做着反奸反敌的工作。他们鼓励着群众，慰劳着士兵；他们歌咏壮烈的故事；他们叙写争斗的经过；他们讽刺着不上劲的人物；他们责难着发国难财的东西。他们并不躲在安全的后方。他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在写作，在讲演，在演剧。他们不再静静的在明窗净几之下享受着作家的安闲的生活。他们过着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生活，贫病交迫，而从不愁叹。祖国需要着他们。他们应了祖国的呼唤而走出书室以外来了。

光荣属于祖国！

光荣属于为祖国而争斗的作家们！

在这光荣的神圣的争斗中，我们的作家们，有的阵亡了，有的在前线病故了，有的为工作过劳，为贫、为病而死去。

活着的作家们正在作着更艰巨的和平建国的工作；他们并没有因了胜利而松懈了自己。但哀悼着在中途逝去，而没能见到胜利的同伴们。

把生命交给祖国的作家们是不朽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其不朽的故事。

永远的光荣应该属于他们这些永远搁下了笔的作家们!

今当抗战胜利的第一次"七·七节";在这个伟大的节日,我们哀悼这些不朽的作家们,同时要告慰他们:活着的作家们是多末努力的继续的做着他们所要做而未能做的工作:为民主、自由,为和平建国而奋斗。

祖国永远需要着作家们;

作家们将永远的为祖国而工作着。

逝去的不朽的作家们将见到:活着的同伴们是如何的不懈不怯的向前走去。

这是在哀悼之余而可以告慰于他们的。

(原载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文艺复兴》一卷第六期)

悼许地山先生

许地山先生在抗战中逝世于香港。我那时正在上海蛰居，竟不能说什么话哀悼他。——但心里是那末沉痛凄楚着。我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位风趣横逸的好友。他是我学生时代的好友之一，真挚而有益的友谊，继续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的死为止。

人到中年便哀多而乐少。想起半生以来的许多友人们的遭遇与死亡，往往悲从中来，怅惘无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纸窗，卧听狂风大吼，身世之感，油然而生。而最不能忘的，是许地山先生和谢六逸先生，六逸先生也是在抗战中逝去的。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宝兴西里，他们俩都和我同住着，我那时还没有结婚，过着刻板似的编辑生活，六逸在教书，地山则新从北方来。每到傍晚，便相聚而谈，或外出喝酒。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常常买了一瓶葡萄酒来，去了瓶塞，一口气嘈嘟嘟的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面小酒店里喝得大醉归来，他们俩好不容易的把我扶上电车，扶进家门口。一到门口，我见有一张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里，便不由自主的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来，却睡在床上。原来他们俩好不容易的又设法把我抬上楼，替我脱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点知觉也没有了。一想起这两位挚友都已辞世，再见不到他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语声，心里便凄楚欲绝。为什么“悲哀”这东西老跟着人跑呢？为什么跑到后来，竟越跟越紧呢？

地山到北平燕京大学念书。他家境不见得好。他的费用是由闽南某一个教会负担的。他曾经在南洋教过几年书。他在我们

这一群未经世故人情磨炼的年轻人里，天然是一个老大哥。他对我们说了许多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他有好些书，西文的、中文的，满满的排了两个书架。这是我所最为羡慕的。我那时还在省下车钱来买杂志的时代，书是一本也买不起的。我要看书，总是向人借。有一天傍晚，太阳光还晒在西墙，我到地山宿舍里去。在书架上翻出了一本日本翻版的《太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站在窗边，外面还亮着。窗外是一个水池，池里有些翠绿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的响着。

“你喜欢太戈尔的诗么？”

我点点头，这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诗，也是第一次读到。

他便和我谈起太戈尔的生平和他的诗来。他说道，“我正在译他的《吉檀迦利》呢。”随在抽屉里把他的译稿给我看。他是用古诗译的，很晦涩。

“你喜欢的还是《新月集》吧。”便在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这便是《新月集》，”他道，“送给你；你可以选着几首来译。”

我喜悦的带了这本书回家。这是我译太戈尔诗的开始。后来，我虽然把英文本的《太戈尔集》，陆续的全都买了来，可是得书时的喜悦，却总没有那时候所感到的深切。

我到了上海，他介绍他的二哥敦谷给我。敦谷是在日本学画的，一位孤芳自赏的画家，与人落落寡合，所以，不很得意。我编《儿童世界》时，便请他为我作插图。第一年的《儿童世界》，所有的插图全出于他的手。后来，我不编这周刊了，他便也辞职不干。他受不住别的人的指挥什么的，他只是为了友情而工作着。

地山有五个兄弟，都是真实的君子人。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父亲在台湾做官。在那里有很多的地产。当台湾被日本占去

时，曾经宣告过，留在台湾的，仍可以保全财产，但离开了的，却要把财产全部没收。他父亲招集了五个兄弟们来，问他们谁愿意留在台湾，承受那些财产，但他们全都不愿意。他们一家便这样的舍弃了全部资产，回到了祖国。因此，他们变得很穷。兄弟们都不能不很早的各谋生计。

他父亲是邱逢甲的好友，一位仁人志士，在台湾独立时代，尽了很多的力量，写着不少慷慨激昂的诗。地山后来在北平印出了一本诗集。他有一次游台湾，带了几十本诗集去，预备送给他的好些父执，但在海关上，被日本人全部没收了。他们不允许这诗集流入台湾。

地山结婚得很早。生有一个女孩子后，他的夫人便亡故。她葬在静安寺的坟场里。地山常常一清早便出去，独自到了那坟地上，在她坟前，默默的站着，不时的带着鲜花去。过了很久，他方才续弦，又生了几个儿女。

他在燕大毕业后，他们要叫他到美国去留学，但他却到了牛津。他学的是比较宗教学。在牛津毕业后，他便回到燕大教书。他写了不少关于宗教的著作；他写着一部《道教史》，可惜不曾全部完成。他编过一部《大藏经引得》。这些，都是扛鼎之作，别的人不肯费大力从事的。

茅盾和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他写了好些小说，象《换巢鸾凤》之类，风格异常的别致。他又写了一本《无从投递的邮件》，那是真实的一部伟大的书，可惜知道的人不多。

最后，他到香港大学教书，在那里住了好几年，直到他死。他在港大，主持中文讲座，地位很高，是在“绅士”之列的。在法律上有什么中文解释上的争执，都要由他来下判断。他在这时期，帮助了很多朋友们。他提倡中文拉丁化运动，他写了好些论

文，这些，都是他从前所不曾从事过的。他得到广大的青年们的拥护。他常常参加座谈会，常常出去讲演。他素来有心脏病，但病状并不显著，他自己也并不留意静养。

有一天，他开会后回家，觉得很疲倦，汗出得很多，体力支持不住，便移到山中休养着。便在午夜，病情太坏，没等到天亮，他便死了。正当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正当他为祖国努力奋斗的时候，病魔却夺了他去。这损失是属于国家民族的，这悲伤是属于全国国民们的。

他在香港，我个人也受过他不少帮助。我为国家买了很多的善本书，为了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经和别的人商量过，他们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却立刻答应了下来。所以，三千多部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寄到港大图书馆，由他收下的。这些书，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虽然在日本人陷香港时曾被他们全部取走，而现在又在日本发现，全部要取回来，但那时如果仍放在上海，其命运恐怕要更劣于此。——也许要散失了，被抢得无影无踪了。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不仅我个人感激他而已！

他名赞堃，写小说的时候，常用落华生的笔名。“不见落华生么？花不美丽，但结的实却用处很大，很有益”，当我问他取这笔名之意时，他答道。

他的一生都是有益于人的；见到他便是一种愉快。他胸中没有城府。他喜欢谈话。他的话都是很有风趣的，很愉快的。老舍和他都是健谈的。他们俩曾经站在伦敦的街头，谈个三四个钟点，把别的约会都忘掉。我们聚谈的时候，也往往消磨掉整个黄昏，整个晚上而忘记了时间。

他喜欢做人家所不做的事。他收集了不少小古董，因为他

没有多余的钱买珍贵的古物。他在北平时，常常到后门去搜集别人所不注意的东西。他有一尊元朝的木雕像，绝为隽秀，又有元代的壁画碎片几方，古朴有力。他曾经搜罗了不少“压胜钱”，预备做一部压胜钱谱，抗战后，不知这些宝物是否还保存无恙。他要研究中国服装史，这工作到今日还没有人做。为了要知道“纽扣”的起源，他细心的在查古画像，古雕刻和其他许多有关的资料。他买到了不少摊头上鲜有人过问的“喜神像”，还得到很多玻璃的画片。这些，都是与这工作有关的。可惜牵于他故，牵于财力、时力，这伟大的工作，竟不能完成。

我为中国版画史的时候，他很鼓励我。可惜这工作只做了一半，也困于财力而未能完工。我终要将这工作完成的，然而地山却永远见不到他的全部了！

他心境似乎一直很愉快，对人总是很高兴的样子。我没有见他疾言厉色过；即遇怫意的事，他似乎也没有生过气。然而当神圣的抗战一开始，他便挺身出来，献身给祖国，为抗战做着应该做的工作。

抗战使这位在研究室中静静的工作着的学者，变为一位勇猛的斗士。

他的死亡，使香港方面的抗战阵容失色了。他没有见到胜利而死，这不幸岂仅是他个人的而已！

他如果还健在，他一定会更勇猛的为和平建国，民主自由而工作着的。

失去了他，不仅是失去了一位真挚而有益的好友，而且是，失去了一位最坚贞，最有见地，最勇敢的同道的人。我的哀悼实在不仅是个人的友情的感伤！

（原载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文艺复兴》一卷第六期）

耿济之先生传

耿济之先生，名匡，字孟邕，上海市人。他生于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在上海读毕了中学，后因为他父亲在北平做事，就到北平去上学。入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先生同学，瞿先生比他低一班。他在学校里，学业成绩总是比别人好。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和瞿先生都是俄专的代表。曾应北平青年会之请，与许地山、瞿菊农、瞿秋白、郑振铎几个人，编辑《新社会》周刊，销行甚广，远至四川、南洋各地。后《新社会》被当局封闭，改出《人道》月刊，仅出一期，又因经济困难而夭折。他在这时候对于俄国文学开始感到很浓厚的兴趣，着手翻译托尔斯太的《家庭幸福》。这是他从事于翻译工作的发端。后来陆续的译出《托尔斯太短篇小说集》(与瞿秋白先生合译)，及几部俄国戏曲，又译托尔斯太的大著《复活》。中华民国八年，他于俄专毕业后，即在外交部服务。二十四岁，与钱女士结婚。婚后不久，被派往苏联，任赤塔中国领事馆随习领事。在赤塔三年，译了不少的俄国小说。后调往伊尔库次克中国领事馆，任副领事，并代理领事。仍在从事于翻译。他在西比利亚，一住便是好几年，实在有些腻烦了。无一个可谈的人，也很少有忙迫的时候，除了替几个侨民们办理些琐屑的事务。在伊尔库次克二年，又调往列宁格拉特，任副领事。这时候，他方才到了苏联的中心，增加了不少见识。但不久，他的心脏病开始发现了。一年之

后，不得不请假回国休养。在国内，他还是不停的做着翻译的工作。他对于俄国文学实有深切的爱好，所以随便在那里也不曾放弃了他的介绍的热忱。在国内休息了一年后，又被派往赤塔中国领事馆，任领事。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便是在这个时候译成的。在西比利亚一住又是四年。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只得请假回国。半年后，蒋廷黻氏任苏联大使，约他一同到苏联去。他在大使馆里做秘书。为了他的文学的修养和翻译的努力，莫斯科的人士们知道他的很多。但他生性不善交际，且又沉默寡言，故没有多大的活动。这时候，他译的东西最少，大概是因为大使馆里的工作很忙之故。蒋氏回国后，他代理过大使几个月。后来，被调到海参崴，做总领事。这时候正在中日战争开始的时期，他的工作是十分忙碌的。忙迫的事务使他血压一天天的高了。医生劝告他必须长期休养。他也因为在国外太久了，想回国看看，便向外交部请假。过了好久，上了好几次的辞呈，方才得到允许。这时，东三省已经不能走了。他便转道到欧洲，从意大利坐船回国。到了上海，政府已经迁都到重庆去。他休息了一个月，便赴香港，欲由广州到重庆。但在香港，他的心脏病复发了，情形很严重，绝对不能作长途的旅行。只好再回到上海住着。在上海沦陷的几年里，他杜门索居，轻易不见人，所常常过从的，只是有限的几位老朋友们。他用耿孟邕的名字，避免了敌伪爪牙的查询与麻烦。但也曾有过敌人到他家里去，查问翻译俄国文学的耿济之。他很技巧的对付过去了。但每天生活在敌人的刀光枪影之下，总觉得不安心，经常的郁郁不欢。屡次的想走，都没有走成。他的家庭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他没有别的工作做，只是镇天的埋头翻译。替良友出版公司译了杜思陀益夫斯基的《兄弟们》，又替开明书店译了《白痴》和高尔基

的小说。他是完全依靠翻译为生了。每天至少得译个三四千字。过度辛劳的工作，使他一天天的更衰弱下去。后来，又替生活书店译高尔基的著作，还计划着动手编辑一部《中俄字典》。这部字典后来也已动手，写了一部分。但生计还是难于维持。不断的须斥卖些东西来补助。家里到了数米为炊的时候，常常以面、珍珠米和豆当饭吃。而他精神上的痛苦，比物质的痛苦更甚。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敌人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兴奋异常，夜不成眠，以为从此以后，总可以有好日子过了。但他已和外交界失去了联络。胜利后，他还是孤寂的住在上海。两个月后，他方才得到张嘉璈氏的电召，飞到重庆去。十月十日，随张氏飞到东北，任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之职。这工作很繁琐，决不是他所能应付得来的。然而，他不能不做下去。但他的生活还是那么清苦。薄俸所入，并不能解决他的生计。仅仅过了两三个月，他又动念要继续从事翻译的工作。从前在做外交官时代，他的翻译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现在的翻译却不能不为稻粱谋了。想不到胜利之后，他的穷困并没有减除，而且更有加甚。白天里在理事会里对付着繁琐的事务，晚上，在灯下，又要执笔译书。在这双重的工作的压迫下，他的血压又高起来。勉强的支持了一年，在去年冬天，便不能不请假回家来休养。在上海住了一个月，找不到别的事，只好又回沈阳。他接洽了几家书店，携了好些参考书去，仍预备翻译些俄国小说，并继续编辑《中俄字典》。在三十六年三月二日下午三时，他突患急性脑溢血症，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二十分钟后，即长逝人世。享年仅五十岁。遗下四个女儿，静芬、宁芬、美芬、敏芬，和一个男孩子肃。最大的女儿静芬已经出嫁育子了。男孩子还只有十二岁。他一生苦作，两袖清风；文士的生涯便是这样的凄凉的么？然而，他遗下的许

多部不朽的译作，却使他永远的活着。他的遗属和友人们正谋出版他的全集。全集的刊行，不仅为了纪念他，在中国文艺界也会有极大的影响的。他活在友人们的心里，他也活在他的读者们的心里！

（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文艺春秋》四卷第四期）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

这几年，连续的丧失了许多好友。地山的死，使我痛苦最甚。我们正在做着一件事，他帮了我许多的忙。而他的死，几乎使那件事付托无人。而想起了三十年前在他铠甲厂宿舍里的纵谈，应和着窗前流水的淙淙，至今犹象在眼前。接着，六逸又在贵阳死了。我们在上海同住在一个宿舍里好几年，且在同一个文化机关里同事了好几年。他是那么刚正不阿，而对于朋友们又是那么慈祥纵容，一团和气。他的温和的语笑，如今也还象在眼前晃着。现在，我又在哭济之了！济之死在沈阳，和六逸一样，都是为了穷，为了工作过度而死的！他太太呜咽的说道："他独自个死在那边，没有一个亲人。入殓时不知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好好的成殓？"说着，便大哭起来。我伤心得连泪水也被灼干了，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想起三十年前学生时代终日同在一处的朋友们，经过了这三十年，已经是凋落将尽了。梦良、亦儿、秋白、庐隐早已成古人了。地山、济之又死，怎么不令我们几个活在这苦难的世界上的人兴"人生无常"之恸呢？

我和济之认识最早。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我常常到北京青年会看书。那个小小的图书馆里，有七八个玻璃橱的书，其中以关于社会学的书，及俄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为最多。我最初很喜欢读社会问题的书。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步济时是一位很和

蔼而肯帮助人的好人。他介绍给我看些俄国文学的书。在那里面，有契诃夫的戏曲集和短篇小说集，有安特列夫的戏曲集，托尔斯太的许多小说等。我对之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小小的图书馆成了我常去盘桓的地方。有一位孔先生，不记得他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了，也常去。我们谈得很起劲。他介绍济之给我相识。恰好那时候青年会要办一个学生刊物，便约我和济之几个人来编。同时，还有秋白、菊农、地山几个人，同在这个编委会里。这个刊物定名为《新社会》。我们经常的聚在一起闲谈，很快的便成为极要好的朋友们，几乎天天都见面。我住的地方最狭窄，也最穷。济之和菊农的家，在我们看来，很显得阔气。秋白的环境也不好。他在我们几个人当中，最为老成，而且很富于哲学思想，他读着老子和庄子。地山住在燕大宿舍里，也是我们里的一位老大哥，他有过不少的社会经验，在南洋一带，当过中学教员。我们常常带着好奇心，听他叙述南洋的故事和他自己及他一家在台湾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和他们两个人比起来，济之、菊农和我，简直是还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们。

我们这个集团，很起劲的工作着。我常常很早的起来，从东城步行到琉璃厂附近的一家印刷所里去校对。但过不了几个月，这个刊物便被封闭了，经理某君也被捉去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这是我们遭受到暴力的压迫与摧残。我那个时候，才懂得些世故。济之向来是不大说话的，但那时也很愤慨。我们立刻又计划着出版一个月刊，定名《人道》；在那里，秋白的文章写得最多。但只出版了一期，便因为经济的困难和青年会的怕麻烦，也夭折了。

五四运动暴发了。我们也没有工夫从事于文字工作了。我们这几个人都被选为代表；秋白、济之做了俄专的代表，菊农做

了燕大的代表，我也做了我的学校的代表，我们仍是经常的聚集在一处。我们常常在晚上开会，而且总在教会学校里。一个个的溜进去，开会完了，又一个个的溜出来，还要看看背后有没有人跟踪着。有一次，秋白便被侦探们注意的跟随了好久。

济之虽沉默寡言，处事却极有条理。在那时候，我们对于文学的兴趣突然大炽。我常常带了书到会场里看。济之有一位前辈叶君办了一个《新中国》杂志，需要些文艺的稿子，他和秋白便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我记得他的第一篇译文是托尔斯太的《家庭幸福》。说来很可怜，那时候的俄专，教的是俄文，却从来不讲什么俄国文学。济之、秋白知道译托尔斯太的著作，对于俄国文学的源流，却无书可资参考，便托我在英文书里找这一类的材料替他们做注解。我那时所能得到的，也只是薄薄的一本 Bome Library 的《俄国文学史》而已。我自己也从英文里，重译了一篇俄国小说，登载在《新中国》里。这是我第一次由写稿获得稿费的事。记得那时候够多么高兴！我午餐向来是以烩老饼或云吞当饭的，那一天却破例叫了两个菜，正式吃了一顿白米饭。大约还花不到五毛大洋吧。在我已是十分的豪奢了。以后，又和蒋百里先生见面，替共学社译了不少俄国文学的名著。济之和秋白合译了《托尔斯太短篇小说集》，我译了契诃夫的《樱桃园》，后来，济之又译了《复活》和其他的几部大书。他结婚的时候，便是靠《复活》的稿费补助的。

为了对于文学兴趣的浓厚，我们便商量着组织一个文艺协会。第一次开会便借济之的万宝盖胡同的寓所。到会的有蒋百里、周作人、孙伏园、郭绍虞、地山、秋白、菊农、济之和我，还约上海的沈雁冰，一同是十二个人，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这便是文学研究会的开始。

高梦旦先生到了北平来，我和济之去找他，预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个文学杂志。梦旦先生说，还是把《小说月报》改革一下吧。当时便决定由雁冰接办《小说月报》，而由我负责在北京集稿寄去。这时候，地山第一次用落华生的笔名，写他的小说，济之和秋白也为《小说月报》译些俄国小说。

过了半年多，我毕业了，派到上海来服务。济之也毕业了，被派到外交部工作。不久，他便结婚了。又被派到莫斯科使馆里做事。此后十几年，他总在莫斯科和西比利亚一带做着外交官。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每当他回国的时候，我们总要见面几次，盘桓好几天。他第一次回来时候，和家眷同归；他那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显得更沉着，更沉默寡言。但他虽做着外交官，他的翻译的工作却从未间断过。许多托尔斯太、屠格涅夫的大著作都由他介绍到中国来。

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他自已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便请假回国休养。接着，抗战起来了。他住在上海，几次要到内地去。有一次已经到了香港，因为心脏病复发，不能走，便只好又回到上海来。这七八年，我们总聚会在一处。他还是继续不断的做着翻译的工作。他的负担很重。每天都不能不写个两三千字。又计划着要编一部《中俄字典》。

日寇进占租界时，我离开了家，埋名隐姓的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我们总有半年不曾见面。后来，我又找到了他。我们计划着要译些什么以维持生活。当时，便和开明书店商量，他着手译高尔基的几部小说；杜斯妥夫斯基的《白痴》和《兄弟们》两部大著作，也是他在这时候译成的。后来，又替生活书店译了一部高尔基的小说，《中俄字典》也开始着手编写。他是那么起劲而过度的工作着。

我们常在开明书店见面，常常的以大饼或生煎馒头或烘山芋当午饭。仿佛又恢复了学生时代的生活。在那时候，吃一顿白米饭可真不易！调孚是从家里带了一包炒米粉来，用茶送了下去，勉强的吞咽着当作一顿饭。彼此相顾苦笑。但也并不以为苦。觉得这苦是应该吃的！济之在那时还开了一爿旧书店，这是我替他出的主意。然而，根本不能挣钱，不能补助他的生计。不久，这爿店也便关门了。

他本来很胖。然而最近几年来，大约因为过度工作的结果，显著的瘦了下来。他本来很乐观，而最后，也显得十分忧郁。而工作的重担却总是压住他，一刻也不放松，他的负担实在太重了！

胜利了，我们都很喜悦，他也常常显着笑容，做着种种的梦。过了两个多月，他才由他兄弟式之的介绍，飞到重庆，就了东北的长春铁路理事会的总务处长。他如何能做这么繁琐的工作呢？他不曾回上海，便由重庆直飞到沈阳就任。待遇很菲薄，家用还是不够。他写信来，依然要翻译点什么。去年，他请假回来，我们又重聚了一个多月。他更瘦了。自觉心脏病又严重起来，腿有点肿。我们劝他不要再去了。然而，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可留下他呢？

他在这一个多月的逗留中，总是计划着要译些什么，编些什么。《中俄字典》也依旧继续的编下去，参考书也带去了不少。他走的时候，我因为忙，没有去送他，也没有和他长谈，想不到这一别便永远的见不到他了！

他最后给我的一封信，说起那工作对他的不适宜，想要有机会教书。还谈起他的一位同学韩君死了，留下不少俄文书，遗嘱要卖了维持生活，托我设法。不料，他自己不久也就成了古

人了！

回想到三十年来相处的日子，见到他灵前的白烛的发抖的光焰和他宛然犹在的遗容，心里便透过一阵冷颤。济之便这样的一瞑不视了么？蓝印的讣闻，正放在桌上，翻开了便见到他的遗容，简直如见到他还坐在我客室里谈着似的，然而他却永远不会再见到了！

多少少年时候的朋友们都这样匆匆的了结了他们的一生，没有见到"太平"，没有享受过应该享受的生活，济之便是一个。他们能够死得瞑目么？呜呼！我不忍再写下去了！

三十六年四月三日写

（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文汇报》）

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

听到了李公朴先生的被刺，悲愤无已！正想说几句话，刚摊开了纸，提起笔来，要写下去，早报来了，一翻开来，便触目惊心的读到闻一多先生又在昆明被刺身死的消息！言语文字已不能表达我们的愤怒了！这是什么一个世界！“打”风之后，继之以政治暗杀，显见得手段之日益残酷。凡有点正义感的人，凡肯说几句公平话的人，凡能替老百姓们传达其痛苦的呼吁的人，恐怕都难免有“危险”。然而“暗杀”能够阻止有正义感的人的发言么？“暗杀能够吓得退从事于民众运动或政治工作的人么？”这正如要用武力来解决中国问题一样，明显的是不可能！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凡有坚定的信仰和主张的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们不会怕死贪生。对他们，“暗杀”的阴影，只有更增加其决心与愤怒，丝毫不能摇撼其信仰。正如战争，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绝对不会停步退却的，反因战友的死，而更燃起了向前冲去的勇气。

“打”是恶劣的手段，“暗杀”是更进一步的卑鄙的作风。凡是政治家，必须以堂堂正正之师与人相见，有理论，有主张，尽管说出来，与对手方见个高低，而以“暗杀”来沈默对手方的发言，却是最无聊、最无耻的方法。这不是政治家，这是谋杀犯！以这样的手段来做政治活动简直是自杀！

象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那样的人是“暗杀”不尽的。可悲可

痛的是，他们乃在胜利之后，从背后被人打了几枪而死；他们为呼吁和平而死；他们为不愿意见到兄弟们自相残杀而呼吁不要内战而死；他们手无寸铁，不想拥兵自卫，结果是被"暗杀"，那末，有自卫力量的人，谁还肯放下其自卫的力量呢？

李公朴先生一生致力于民众教育；战前，在上海有过广大的影响。不意，继较场口被打之后，竟以身殉。闻一多先生为一诗人，曾出版过诗集《红烛》和《死水》，在新诗人里是严肃而注重于格律的一位。他从来不问政治。在清华大学教杜诗，教《诗经》，曾经有过不少重要的考证的论文发表。他随学校到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教书。教的还是《诗经》等课程。"民主"的呼号把他从恬静的书室里呼唤出来。他曾为呼吁和平，争取民主，尽了很大的力量。不意，继于李公朴先生之后，他也以身殉国了！尤为惨酷的是，他的公子闻立鹤也中弹五发，伤势严重；胸部左右，各中一弹，大腿中弹三发，一腿已断，能否出险，尚不可知。闻公子并不参加民主运动，而亦遭此横祸，人的生命尚有丝毫的保障么？

他们两位先生为国牺牲，永垂不朽，上海各界正在筹备举行"人民葬"，将有以谋作永久之纪念之举。他们未睹和平统一、民主的中国的建立而死，实死不瞑目。但他们的血，象火种似的，已经深种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胸中，薪尽火传，他们是不怕没有后继者的；后继者们将更多、更多起来。死一李公朴，将更有千万个李公朴继之而起，杀一闻一多，将更有千万个闻一多继之而起。前仆后继，暗杀者其能将四万万五千万爱好和平，主张民主的人民们尽杀之么？

我们悲愤于李、闻二先生的壮烈殉难，我们敬向二先生的遗属致最恳挚的哀悼之意！

但我们于悲愤、哀悼之余，我们不能不对国民们和政府说几句话。

我们呼吁和平，争取民主，全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我们希望看见强盛、民主、和平的中国的实现。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的欲望，也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我们一介书生，手无寸铁，所有的只是口和笔。如果国家升平，民生安定，我们只愿意在书室里做我们所应做的工作，所想做的工作，绝对的没有任何的好心情，从事于任何政治活动。象闻一多先生，其心情想来也是同样的。然而，在这种的政局之下，凡为一个中国国民，如何能够忍心看得下去呢?！作为一个中国的国民，我们不能不出来说几句话，说我们想说的话，应该说的话。在我们觉得，实在是歉愧之至，因为除了口和笔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贡献给国家。然而，即此微薄的呼吁和平而合法的工作，也要遭到横祸，受到暗算，遇到毒手，则实在无话可说了！到了我们不能说话的时候，那末，应该怎样说话，便不问可知了。我们为此危惧！

到底是什么人在做着这种不人道的卑鄙的政治暗杀的事呢？这对于政府是有害无益的。商谈之门，并没有杜绝。打仗的，也还在断断续续的谈着，而呼吁和平，大叫不要打的人们却首先遭到了暗杀，这是什么一种做法呢？主持的人，为何会愚蠢至此呢？为政府计，必须彻底查明主使之人，依法公开审判，依法严加惩办，单是负责治安机关一纸悬赏缉凶的布告是绝对不够的。政府对于昆明负责治安的机关，应该严厉督促其“破案”，务期获到凶手，严查主使之人，并保证以后在任何地方不再有同样的政治暗杀事件发生。同时，对于李、闻二先生的善后，必须负责办理；对于昆明的负责治安者必须加以惩戒；这些，都是“题内文章”，我们不必多说。

我们所悲哀的是，中华民国已经有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了，政治上，却一点进步也没有。舍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方式而不用，而还在用武力，用暗杀来杜绝人民们的呼吁的，这岂复有丝毫清明之气存在！"暗杀"是最下流的手段，凡为光明磊落的人或任何党派都绝对的不会使用这个手段的。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暗杀了陈英士，然而对于国民党的活动和发展，到底有什么阻碍没有？这两个大暗杀案，只增加了人民们对于袁氏政权的厌恶和憎恨，却丝毫不能削减国民党的力量。这不是明显的前车之鉴么？用暴力来企图削弱或扑灭对方的，一定会自食其果。除了招致了人民们的普遍的不平和厌恨之外，任何效果是不会得到的。相反的，反而暴露了这主持政治的谋杀者的胆怯与无知，惶恐与无力。凡有智慧、有力量、有见解、有主张的任何政党或政治家，在有所主张，有所活动时，都是要以正规的政治活动的方法出之的。如果在英国或美国，有某一个政党，胆敢用这种卑怯的暗杀手段，加之于对手方的，立刻，她的政治生命便会寿终正寝，人民们立刻便会群起而攻之，把她驱逐出政治圈子以外去的。我们希望今日的政治，不要在黑暗之上再加上黑暗；不要在武力之上再加上暴力的卑怯的谋杀。且为国家留些体面，为民族存些正气，为社会惜养有用的人才，为自己保有些生机吧。

凡有前途、有活力的政党，绝对的不应该为自己掘坟墓，应该尽量的改变作风，纯然以堂堂正正之师，出与对手方相周旋。凡是民主国家的政党，都是富有竞技者的精神的；胜固可喜，败亦可鉴。心平气和，一心为国。尊重对手方，也便是尊重自己。这些话都是陈腐之极的老生常谈，然而在今日却还是谈不到的起码条件，岂不可悲可叹乎！

要照这样发展下去，"打"之后继之以"杀"，我们实在要为中

国的政局前途哭！难道和平的合法的主张和言论，正义的公平的呼吁，已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了么？难道主张和平的，争取民主的，以合法方式来从事政治活动的，有正义感的，肯出来替受苦难的人民们说几句话，便都要被视为眼中之钉，不除去不快了么？

虽然这谋杀或暗杀事件发生在昆明，受难者是李、闻二先生，然其影响是极大的，其意义是极深刻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是不会允许这种不名誉的政治暗杀事件再度在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种不名誉的政治暗杀事件，在国际上将发生怎样的一种反应啊！我们到底是一个野蛮的黑暗的国家呢，还是一个正向民主道路走去的现代的国家？我们在国际的地位上，已经是一天天的向下走了，如何再能自己再加速度的堕落下去呢？“天助自助者”。象这样的胡闹、胡搞下去，即有“助我者”，恐亦将望望然而去之的吧！

李、闻二先生首先为国牺牲了，为争取民主而以身殉之了，我们国民们必须急起直追，不息不懈，为二先生雪恨，而彻底的查究那些凶手们及其指使的主持的人物，与众共弃之；而为了安慰李闻二先生的在天之灵，我们也将相誓的踏着二先生的血迹前进，决不中途停步。我们相信，民主的、自由的、强盛的中国，早或迟，必定会建立的；在那时候，我们当再以淡酒园蔬，祭告于二先生之灵道：

民主已经争取到了，建国事业正在进行，强盛、自由的中国已在实现了，二先生之目可以瞑矣。

然而，在今日，谁还能息一息肩，松一松前进的脚步呢！我们谨以泪，同时也以汗与血来哀悼壮烈、殉难的李、闻二先生！

三五年七月十七写

（原载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民主》第四十期）

八月十四日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 一清早，便上街买报，赫然大字的标题，证实了昨夜我军与日寇已发生战事的消息。枪声反而沉寂了下来，是为喧哗的市声所遮罩着吧。电话不断的响着，传来了许多可惊愕的故事。许多住在虹口，北四川路一带的朋友们都已脱险出来，遗弃了他们所有的东西。真如学校里的学生们也都已搬了出来。站在天井里，看见东边的天空，密布着浓烟，血红的火焰突突的从黑烟中蜿蜒的升起。什么地方有大火。一股焦味儿随风直飘过来。一片片黑色的纸灰，象黑蝴蝶似的，在天空飞舞着。落下不少在天井泥地上。捡起来看，还温暖着，上面隐隐的有字迹。是教科书的一页，想保存起来，却触手即碎。又是一个电话说，梧州路的开明书店烧了。这些，是他们的书库里的东西么？我和雁冰，望道他们的许多书籍，都寄存在他们那里。大约总也同付一炬了吧。长长叹了一口气，只好置之度外。在这伟大的时候，谁还顾到这些东西的安全与否呢？但也渴望着能在纸灰堆里捡到了我自己藏书的一二页残烬。一片又一片的捡拾着，都不是的，便也不高兴再去捡拾了。这惆怅和留恋啊，难道是书生的结习？

饭后，文化界在九江路有一个会。我午睡一会，已经晚了一点。往东的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已没有了，只好坐了九路公共汽车到外滩。路上的人拥挤不堪，外滩尤多，都站在码头上和道旁，看我们的飞机在炸出云舰。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站在

汇丰银行的铜狮像旁瞧着。眼见我们的飞机一只只的低飞过来，一颗颗的炸弹很悠闲有致的落下去。高射炮和高射机关枪的声音隆隆拍拍的响着。我永远不能忘记这壮烈的一幕！炸弹一跌，水花四溅，站在码头上的拥拥挤挤的人群，顿时扰动。人们纷纷向西逃。我们还从容的在走着，但也感觉到危险。路上已有血淋淋的人坐了车向西去。华懋饭店附近落下了一颗炸弹，听说炸死了不少人。

我们也向西走，到了中汇大楼的时候，听到了一声巨响，西边有浓烟喷起，立在路上踌躇着，结果还是兜了一圈，到了开会的地方，我们立刻决定办《救亡日报》。

会散了时我又坐车到中华学艺社去，我们的学校在那里开会。经过广慈医院的时候，陆续的看到满染着鲜血的大卡车，一车车的运送了受伤的人们到医院去。大门口也坐着躺着不少血淋淋的人。那鲜红的血，那黄油嗞嗞，露在外面的肉，使我难受极了，几乎要闭了眼睛不敢看。这是战争的残酷的第一幕啊。

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天的血的景象。

这是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悲壮而残酷，尽够说明以后八年间的如何浴血抗战的情形。

很巧合，在去年的今天，恰巧是日本宣布投降的一天。这一天是我们苦难的开始，也是我们胜利的日子。

谁想得到，在获得胜利后一年的今天，战争还在国内许多土地上进行着呢？

"战争"实在太"残酷"，太可怕了！诅咒这"战争"！诅咒那些好战者们！

三五年八月十四日写

（原载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文汇报》）

忆六逸先生

谢六逸先生是我们朋友里面的一个被称为"好人"的人，和耿济之先生一样，从来不见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他埋头做事，不说苦、不叹穷、不言劳。凡有朋友们的委托，他无不尽心尽力以赴之。我写《文学大纲》的时候，对于日本文学一部分，简直无从下手，便是由他替我写下来的——关于苏联文学的一部分是由瞿秋白先生写的。但他从来不曾向别人提起过。假如没有他的有力的帮忙，那部书是不会完成的。

他很早的便由故乡贵阳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来做事。我们同事了好几年，也曾一同在一个学校里教过书。我们同住在一处，天天见面，天天同出同入。彼此的心是雪亮的。从来不曾有过芥蒂，也从来不曾有过或轻或重的话语过。彼此皆是二十多岁的人。——我们是同庚——过着很愉快的生活，各有梦想，各有致力的方向，各有自己的工作在做着。六逸专门研究日本文学和文艺批评。关于日本文学的书，他曾写过三部以上。有系统的介绍日本文学的人，恐怕除他之外，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他曾发愿要译紫部式的《源氏物语》，我也极力怂恿他做这个大工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没有动笔。

他和其他的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显得落落寡合。他没有丝毫的门户之见。他其实是外圆而内方的。有所不可，便决不

肯退让一步。他喜欢和谈得来的朋友们在一道，披肝沥胆，无所不谈。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缄口不发一言。

我们那时候，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抽烟。我们常常到小酒馆里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他总是和我们在一道，但他却是滴酒不入的。有一次，我喝了大醉回来，见到天井里的一张藤的躺椅，便倒了下去，沉沉入睡。不知什么时候，被他和地山二人抬到了楼上，代为脱衣盖被。现在，他们二人都已成了故人，我也很少有大醉的时候。想到少年时代的狂浪，能不有“车过腹痛”之感！

我老爱和他开玩笑，他总是笑笑，说道“就算是这样吧。”那可爱的带着贵州腔的官话，仿佛到现在还在耳边响着。然而我们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可爱的声音了！

我们一直同住到我快要结婚的时候，方才因为我的迁居而分开。

那时候，我们那里常来住住的朋友们很多。地山的哥哥敦谷，一位极忠厚而对于艺术极忠心的画家，也住在那儿。滕固从日本回国时，也常在我们这里住。六逸和他们都很合得来。我们都不善于处理日常家务，六逸是负起了经理的责任的。他担任了那些琐屑的事务，毫无怨言，且处理得很有条理。

我的房里，乱糟糟的，书乱堆，画乱挂，但他的房里却收拾得整整有条，火炉架上，还陈列了石膏像之类的东西。

他开始教书了。他对于学生们很和气，很用心的指导他们，从来不曾显出不耐烦的心境过。他的讲义是很有条理的。写成了，就是一部很好的书。他的《日本文学史》，就是以他的讲义为底稿的。他对于学生们的文稿和试卷，也评改得很认真，没有一点麻胡。好些喜欢投稿的学生，往往先把稿子给他评改。但他

却从不迁就他们，从不麻胡的给他们及格的分数。他永远是“外圆内方”的。

曾经有一件怪事，发生过。他在某大学里做某系的主任，教“小说概论”。过了一二年，有一个荒唐透顶的学生，到他家里，求六逸为他写的《小说概论》做一篇序，预备出版。他并没有看书，就写了。后来，那部书出版了，他拿来一看，原来就是他的讲义，差不多一字不易。我们都很生气。但他只是笑笑。不过从此再也不教那门课程了。他虽然是好脾气，对此种欺诈荒唐的行为，自不能不介介于心，他生性忠厚，却从来不曾揭发过。

他教了二十六七年的书，尽心尽责的。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由他主持了很久的时候。在“七·七”的举国抗战开始后，他便全家迁到后方去。总有三十年不曾回到他的故乡了，这是第一次的归去。他出来时是一个人，这一次回去，已经是儿女成群的了。那么远迢迢的路，那么艰难困顿的途程，他和他夫人，携带了自十岁到抱在怀里的几个小娃子们走着，那辛苦是不用说的。

自此一别，便成了永别，再也不会见到他了！胜利之后，许多朋友们都由后方归来了，他的夫人也携带了他的孩子们东归了，但他却永远永远的不再归来了！他的最小的一个孩子，现在已经靠十岁了。

记得我们别离的时候，我到他的寓所里去送别。房里家具凌乱的放着，一个孩子还在喂奶，他还是那么从容徐缓的说道：“明天就要走了。”然而，我们的眼互相的望着，各有说不出的黯然之感。不料此别便是永别！

他从来没有信给我，——仿佛只有过一封信吧，而这信也已抛失了——他知道我的环境的情形，也知道我行踪不定，所以，不便来信，但每封给上海友人的信，给调孚的信，总要问起我来。

他很小心，写信的署名总是用的假名字，提起我来，也用的是假名字。他是十分小心而仔细的。

他到了后方，为了想住在家乡之故，便由复旦而转到大夏大学授课。后来，又在别的大学里兼课，且也在交通书局里担任编辑部的事。贵阳几家报纸的文学副刊，也多半由他负责编辑。他为了生活的清苦，不能不多兼事。而他办事，又是尽心尽力的，不肯麻胡，所以，显得非常的疲劳。体力也日见衰弱下去。

生活的重担，压下去，压下去，一天天的加重，终于把他压倒在地。他没有见到胜利，便死在贵阳。

他素来是乐天的，胖胖的，从来不曾见过他的愤怒。但听说，他在贵阳时，也曾愤怒了好几回。有一次，一个主省政的官吏，下令要全贵阳的人都穿上短衣，不许着长衫。警察在街上，执着剪刀，一见有身穿长衫的人，便将下半截剪了去。这个可笑的人，听说便是下令把四川全省靠背椅的靠背全部锯了去的。六逸愤怒了！他对这幼稚任性，违抗人民自由与法律尊严的命令不断的攻击着。他的论点正确而有力。那个人结果是让步了，取消了那道可笑的命令。六逸其他为了人民而争斗的事，听说还有不少。这愤怒老在烧灼着他的心。靠五十岁的人也没有少年时代的好涵养了。

时代迫着他愤怒、争斗，但同时也迫着他为了生活的重担而穷苦而死。

这不是他一个人所独自走着的路。许多有良心的文人们都走着同样的路。

我们能不为他——他们——而同声一哭么？

三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写

（原载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文讯》七卷第三期）

哭 佩 弦

从抗战以来，接连的有好几位少年时候的朋友去世了。哭地山、哭六逸、哭济之，想不到如今又哭佩弦了。在朋友们中，佩弦的身体算是很结实的。矮矮的个子，方而微圆的脸，不怎么肥胖，但也决不瘦。一眼望过去，便是结结实实的一位学者。说话的声音，徐缓而有力。不多说废话，从不开玩笑；纯然是忠厚而笃实的君子。写信也往往是寥寥的几句，意尽而止。但遇到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却滔滔不绝。他的文章，也是那么的不蔓不枝，恰到好处，增加不了一句，也删节不掉一句。

他做什么事都负责到底。他的《背影》，就可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描写。他的家庭负担不轻，但他全力的负担着，不叹一句苦。他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在南方各地教，在北平教；在中学里教，在大学里教。他从来不肯麻麻胡胡的教过去。每上一堂课，在他是一件大事。尽管教得很熟的教材，但他在上课之前，还须仔细的预备着。一边走上课堂，一边还是十分的紧张。记得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里坐着，见他紧张的在翻书。我问道：

“下一点钟有课么？”

“有的，”他说道，“总得要看看。”

象这样负责的教员，恐怕是不多见的。他写文章时，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写。写得很慢，改了又改，决不肯草率的拿出去发

表。我上半年为《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号向他要稿子，他寄了一篇《好与巧》来；这是一篇结实而用力之作。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一封快信，说，还要修改一下，要我把原稿寄回给他。我寄了回去。不久，修改的稿子来了，增加了不少有力的例证。他就是那末不肯麻麻胡胡的过下去的！

他的主张，向来是老成持重的。

将近二十年了，我们同在北平。有一天，在燕京大学南大地一位友人处晚餐。我们热烈的辩论着"中国字"是不是艺术的问题。向来总是"书画"同称。我却反对这个传统的观念。大家提出了许多意见。有的说，艺术是有个性的；中国字有个性，所以是艺术。又有的说，中国字有组织，有变化，极富于美术的标准。我却极力的反对着他们的主张。我说，中国字有个性，难道别国的字便表现不出个性了么？要说写得美，那末，梵文和蒙古文写得也是十分匀美的。这样的辩论，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临走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还说，他要编一部《中国艺术史》，一定要把中国书法的一部门放进去。我说，如果把"书"也和"画"同样的并列在艺术史里，那末，这部艺术史一定不成其为艺术史的。

当时，有十二个人在座。九个人都反对我的意见。只有冯芝生和我意见全同。佩弦一声也不言语。我问道：

"佩弦，你的主张怎样呢？"

他郑重的说道："我算是半个赞成的吧。说起来，字的确是不应该成为美术。不过，中国的书法，也有他长久的传统的历史。所以，我只赞成一半。"

这场辩论，我至今还鲜明的在眼前。但老成持重，一半和我同调的佩弦却已不在人间，不能再参加那末热烈的争论了。

这样的一位结结实实的人，怎么会刚过五十便去世了呢？——我说“结结实实”，这是我十多年前的印象。在抗战中，我们便没有见过。在抗战中，他从北平随了学校撤退到后方。他跟着学生徒步跑，跑到长沙，又跑到昆明。还照料着学校图书馆里搬出来的几千箱的书籍。这一次的长征，也许使他结结实实的身体开始受了伤。

在昆明联大的时候，他的生活很苦。他的夫人和孩子们都不能在身边，为了经济的拮据，只能让他们住在成都。听说，食米的恶劣，使他开始有了胃病。他是一位有名的衣履不周的教授之一。冬天，没有大衣，把马伕用的毡子裹在身上，就作为大衣；而在夜里，这一条毡子便又作为棉被用。

有人来说，佩弦瘦了，头上也有了白发。我没有想象到佩弦瘦到什么样子；我的印象中，他始终是一位结结实实的矮个子。

胜利以后，大家都复员了，应该可以见到。但他为了经济的关系，径从内地到北平去，并没有经过南方。我始终没有见到瘦了后的佩弦。

在北平，他还是过得很苦。他并没有松下一口气来。

暑假后，是他应该休假的一年。我们都盼望他能够到南边来游一趟。谁知道在假期里他便一瞑不视了呢？我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见到瘦了后的佩弦了！

佩弦虽然在胜利三年后去世，其实他是为抗战而牺牲者之一。那末结结实实的身体，如果不经过抗战的这一个阶段的至穷极苦的生活，他怎么会瘦弱了下去而死了呢？他的致死的病是胃溃疡，与肾脏炎。积年的吃了多沙粒与稗子的配给米，是主要的原因。积年的缺乏营养与过度的工作，使他一病便不起。尽管有许多人发了国难财，胜利财，乃至汉奸们也发了财而消遥法

外，许多瘦子都变成了肥头大脸的胖子，但象佩弦那样的文人、学者与教授，却只是天天的瘦下去，以至于病倒而死。就在胜利后，他们过的还是那末苦难的日子，与可悲愤的生活。

在这个悲愤苦难的时代，连老成持重的佩弦，也会是充满了悲愤的。在报纸上，见到有佩弦签名的有意义的宣言不少。他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给我以时间，我要慢慢的学"。他在走上一条新的路上来了。可惜的是，他正在走着，他的旧伤痕却使他倒了下去。

他花了整整一年工夫，编成《闻一多全集》。他既担任着这一个工作，他便勤勤恳恳的专心一志的负责到底的做着。《闻一多全集》的能够出版，他的力量是最大的；他所费的时间也最多。我们读到他的《闻一多全集》的序，对于他的"不负死友"的精神，该怎样的感动。

地山刚刚走上一条新的路，便死了；如今佩弦又是这样。过了中年的人要蜕变是不容易的。而过了中年的人经过了这十多年的折磨之后，又是多末脆弱啊！佩弦的死，不仅是朋友们该失声痛哭，哭这位忠厚笃实的好友的损失，而且也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的损失，损失了那末一位认真而诚恳的教师，学者与文人！

三七年八月十七日写于上海

（原载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文讯》九卷第三期）

第　二　辑

(1949—1958)

鲁迅——"民族魂"

千千万万的中国儿女们，中国的人民们，带着沉重的心，说不出的悲哀，低着头，排列着整齐严肃的队伍，把鲁迅先生的灵柩送到上海虹桥公墓安葬。这是中国从来未有过的"人民"的葬礼！当鲁迅先生的灵柩徐徐的下降到穴底时，棺上覆以丝绣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四周有低低的啜泣之声。

"民族魂"这三个大字，说明了鲁迅先生的精神，说明他一生为人民奋斗到底的历史。

鲁迅先生是中国民族的最好的儿子之一；他表现了中国民族的最好的一面。他抛弃了传统的封建坏的成分，但保留着中国民族的最可夸耀的精神——所谓浩然之气——还加上为人民服务的新的观点。

他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他是以坚决的反抗封建主义的姿态出现的。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和许多杂感，对于打倒封建思想是具有雷霆万钧的力量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就在那时候开始了。

从此以后，他不断的和封建余孽和买办学者们作争斗。他不断的受迫害，到处的不安于居。但他从来不曾退却过半步。他一点也不妥协。和他同时的人纷纷的落后了，甚至向旧的社会投降了。但他始终如山岳似的屹立着，为无数的青年儿女们奋斗的"旗手"。他这面大旗——"民族魂"始终是拿在手里，不曾

倾斜过。

以中国民族的最可夸耀的精神——浩然之气——来从事于新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便是鲁迅先生的道路，也便是无数的现在知识分子们走的道路。他是属于中国民族的，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的。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够启发了那末多后一代的青年儿女们，之所以能够有那末伟大而深入的影响，便是他这正确的道路的导引力。

他受了无数的冷箭，同时也受了无数的公开的迫害。就在他受着最严重的迫害，隐姓埋名，退居于密的时候，也还有无数的冷箭向他射去。

他对那些或明或暗的敌人们的回击，也是无情的，沉重的。他决不宽恕敌人。他很快的发现了他们，立刻便加以打击，他不姑息以养奸。他揭露了许多伪装的君子，消灭了许多埋伏在左近的敌人。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不能以真名发表任何文字，便用了许多的笔名来写作。当敌人们很快的发现某一个笔名是他的时候，他很快的又改易了一个。他使他们那末狼狈，往往“相惊以伯有”，只要文章稍为写得犀利些，便指指点点的说道：“又是鲁迅写的！”

同时，他的同志爱是无限量的！他爱青年的儿女们。他全心全意的为他们服务。他审查了许多青年们的稿子，他仔仔细细的一字不麻胡的替他们校改译稿。有的时候，还替人家作校对工作。当他最后的一夜，他还在执着笔替别人校改清样。秋白同志的《海上述林》是他一手编的，校的，而且连装潢也都由他设计。这是错字最少的一部书。可见他的认真精神。

他是无处不认真的。他反对“空头文学家”。他是一丝不苟的。他说，“革命是件麻烦的事”，能够克服了种种的大大小小

的“麻烦”，方能真正的从事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有多少的青年儿女们是承继着他的这种精神来为人民服务的。

那末坚定，那末仔细，那末认真，那末一丝不苟，不是“一鼓作气”，而是长期的持久战，这便是鲁迅先生的精神——“民族魂”。

鲁迅先生生活在中国黎明之前的最黑暗的时代。他没有见到中国革命的成功而即一瞑不视。这是中国最大的损失。但冬天来了，春天也不会很远了。鲁迅先生是充分的有这个信心的。他抱着这样的信心而入土。

今日是“东方红，太阳升”了。我们站在阳光满地的新生的中国的土地上，悼念着鲁迅先生。那心情不复是那末沉重了。我们堪以告慰于鲁迅先生，他的那份工作，已得到了最大的成就！千千万万的青年的中国儿女们，正继续着他的精神，为新的中国的建设事业而服务。

建设事业不比革命事业来得简单容易。建设也是件麻烦的事，也是一针一线的艰苦的巨大的工作。正应该继续着鲁迅先生的精神而努力。

（原载一九五〇年十月《人民画报》）

峇厘观舞记

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诗之岛”峇厘，在那里住了八天，欣赏了不少峇厘岛上的艺术，从绘画、木雕刻到舞蹈，尤其以舞蹈看得比较多，南派的、北派的、宫廷的、民间的、古典的、现代的，差不多全都看到过。看到，便不容易忘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峇厘艺术友好访问团到中国来了，特从日记里摘出有关峇厘舞的几段，写成本文，作为介绍也作为欢迎。

又，上次印度尼西亚艺术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时，包括了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地方、各个派别的舞蹈的代表，但独独没有包括峇厘岛的舞蹈在内。这是因为峇厘舞有其特殊的风格，且需要的乐队人数特别多，故有单独进行访问的必要。到捷克斯洛伐克去访问时，也是峇厘艺术团单独去的。

峇厘岛在爪哇岛的东边，隔水可以相望。但风俗人情却相差颇远。峇厘岛自有其不同的宗教（印度教），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好几座神龛，每天都要上供。天气仿佛很润湿。到处都是深浓的绿色。大树蔽天，茂密郁润。石墙和砖块上，全长满了青苔，显出苍老的古气。家家户户都有墙、有大门，这就和中国的住宅有些相似了。说起来，在峇厘，中国的风趣还有不少。在一些庙宇里有中国式的佛像，还流行着中国的铜钱（明万历到同治的最多）。他们用这些铜钱编成神像，还布施到神庙去。所以，我们到峇厘岛去，觉得十分地亲切。

七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在峇厘岛上的南部大城邓巴刹，第一次看到世界著名的峇厘舞蹈。一大群的乐器，分列两厢，乐师们三十多人陆续登场坐下。（一个乐队的乐师们，多者达六十多人，少者也有二十四人。）乐器以大铜锣、球锣和铜的刹龙（Sarun）为主，而以"甘榔"（鼓）为之节，也用上了弦乐的竖琴（很象胡琴）和管乐的箫、笛，不过不是主要的乐器。到了九点钟，海风徐来，夜凉如水，忽听得晴天霹雳似的一声响，金鼓齐鸣，急如骤雨，直震撼得听者们心肺俱为之荡动。"前奏曲"开始了。豪雄刚健，象千百只狮子在同声怒吼，象暴风雨之前，雷电交闪，殷殷轰轰，天空为裂。但渐渐地由急而缓，箫声和刹龙声象在微语，象凉风吹过万松之巅，象清溪流过乱石堆头，细腻到荡人魂魄的地步，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然后，又一声狂响，百乐大鸣。那乐调似乎并不陌生，有好几节简直象中国的吹打细乐。如此地忽高忽低，忽扬忽抑，足足有十多分钟才停止。我们被镇摄得耳无旁听，目不旁视。象这样的打击乐器的演奏，乃是最高级的技术的挥施。有一个聪明的批评家说，这乃是大规模的拆散了的"钢琴"的大合奏。这句"绝妙好辞"的形容的话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嘎木兰"（乐队）说来，的确是当之无愧的。歇息了一会，舞者们登场了。随着"嘎木兰"的乐声，或表演雄武的斗争，或描写抒情的步调，都足令人心醉。二少女演的"甲虫舞"，细致地表现出一对甲虫的恋爱和相依为命的感情。面具舞则紧张曲折，变化多端。杳宛夫人的独舞，尤为光朗明快，充分地显示出峇厘舞的修养深厚而细腻精巧的技术来。一举手，一投足，都具有迷人、动人、感人的力量。那把扇子在她手里是那末灵活地挥动着；那双眼，那头部，那纤纤的双手，是那末美妙地随着乐声而转动着，特别是手部，那动作是无穷尽的繁细，每一指尖的伸屈，都具有其

特殊的意义。她或前、或后、或进、或退，或左旋以翩翔，或右转而急却，诚有宛若游龙，翩若惊鸿之感。这是需要精致的推敲与专心的欣赏的，粗心人不会体会其最细微的美妙处。有人说，峇厘舞脸部没有表情，我们看了查宛夫人那末丰富灵活的表情，便知道那句话是不确的。

二十四日到达"狄打岗加"。沿途海水碧绿，到处是盐场。椰林矗立，若巨人相向而揖。"狄打岗加"是一位逊王的别墅。别墅里有几道喷泉，淙淙地在飞溅着清凉的水珠。泉中蓄有红色鱼，游泳自如，我们就在喷泉旁，坐着看峇厘岛的宫廷舞。这种舞在外间已不多见。舞者都为幼童及幼女，尚需人抱、掖以进。乐队亦是用"嘎木兰"。那位逊王亲自陪着我们。舞者之一，即逊王的七岁孙女。舞技是很工的，疾徐进退，莫不应节。

同日下午，到了"革隆公"，在一个故宫里，看面具舞剧。峇厘岛上的面具，是多种多样的。有戴上了整个面具，不能出声的（以扮王公者为主）；有虽戴了面具，而露出双眼与嘴部来的（象丑角）；有面具的下部，当嘴部的地方，是活动的，能够发言，但有些模糊不清的；有脸的上部露出，仅鼻部和嘴部有半个面具的；也有象中国新年时跳"月明和尚度柳翠"舞里所用的和尚、妇人的面具，整个地套在头上的。所演的故事，有取之于印度两大史诗《摩诃菩拉他》和《拉马耶那》的，也有是演出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故事的。

晚上，在邓巴刹又看了东峇厘舞，比较地现代化，有不戴面具的舞剧、有群舞、有独舞。舞剧除了表演印度史诗的故事和历史故事之外，大都是表演善与恶的斗争的。恶神虽猖獗一时，但善神终于得胜。舞的时候，武功很深，摔交立起，非训练有素的人，必会受伤。其中，以群舞的"蝴蝶舞"最得人赞扬。

二十七日，从邓巴刹动身到新加拉夜（即狮王城）。咖啡树和荔枝树，杂在芭蕉林里，绿意至浓。要经过几座高岭。一路上，风光极为秀丽。远远地见地下有一泓湖水，又经过一座焦黑的寸草不生的火山。最高之地，称为“金打曼尼”，意即极乐世界。过此，即北部峇厘了。省长公署，即设在新加拉夜城。

二十九日晚六时许，在省长公署的前面石廊上，看北峇厘舞蹈的演出。古典舞表情深刻，技术甚高。有演唱“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虽不懂其歌辞，而甚惹乡情。又有八个女舞蹈者和九个男舞蹈者，或坐或立，彼此歌唱着，舞蹈着，“山歌互答”，音节甚为优美。据说，那彼此问答的歌辞里，含有很多幽默和讽刺的漂亮话，但我们是不能了解的了，只能意会其且舞且歌的大意耳。又有东南省蒂汶岛的歌舞，地方的色调很浓厚，也可欣赏吟味。

看了几场的峇厘舞，说不上就懂得其精华所在，但其好处是不会忘记的。虽然相别已经一年多了，但邓巴刹的“嘎木兰”的响声还如在耳边，查宛夫人和其余的舞蹈家们的妙舞清歌，还如在目前。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峇厘岛上的艺人们，全不是职业的。他们是专家，但并不以此为业。象“嘎木兰”的乐队，如要演出，就须事前召集那一批音乐家们凑在一起。临时召集，是办不到的。又象查宛夫人那样的高超的舞蹈家，也还不是职业的，她和她丈夫都是每天要劳动的职工。那一位“嘎木兰”的击鼓者（即领导人），乃是在街头卖咖啡的。不仅舞蹈家、音乐家们如此，就是峇厘岛上的画家们和木雕家们也都是业余的为多。这个“诗之岛”是那样地富于诗意。可以说整个岛乃是一个艺术的涵养地，孕育地。

（原载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记茂物的“总统别墅”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上午，我们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前往茂物的总统别墅访问，并由代表团里的艺术家们作小规模的演出。茂物离雅加达不很远，是一个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的地方。在那里，有一座闻名世界的植物园。总统别墅就位置在植物园里，乃是它的一部分。

汽车在很好的公路上走着。一路上绿树红花，碧草清流，无不引人入胜。走了一个半钟头，越走越高，却不怎么觉得。但空气却渐渐地显得清新，鼻孔里嗅得到一股山地上所特有的花或树的香味。远远地望见一大片绿草成茵的草地，总统别墅到了。常青的高大的树木包绕着大草地的周围，仿佛拱立着在守卫着它似的。树下的草场上有数不清的梅花鹿，或行，或息，全不避人。纯白色的大理石建筑的总统别墅，照耀在太阳光下，显得净洁、庄严、弘伟。红白色的印度尼西亚的国旗，高高地悬挂在旗杆上，迎风飘扬，说明了别墅的主人翁正在那里。一塘池水，盈盈迎人。池上红、白色睡莲正盛放着。

苏加诺总统站在大厅里，和我们亲切地握手。他要猜猜看，能不能在人群里找出来唱《梭罗河》的周碧珍女士，演《霸王别姬》的黄玉华女士和在《盗仙草》中饰白蛇的张美娟女士来。当我向他介绍袁世海先生时，他想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位“袁世凯”，笑着说道：“不是一家吧？”

他接着说道："你们在总统府国家宫的开幕演出，已经轰动了整个印度尼西亚。你们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和光荣，使我自己都愿意变成你们团员的一分子。"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他又道："各地人民都写信给我，要我邀请你们到他们那里作访问演出。这说明了不仅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的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就是全印度尼西亚的人民对你们也都是友好的。"他转过头来问我道："这一次有没有三国戏？"我心里一动，想道："为什么这一次没有带三国戏来呢？"稍顿一下，我答道："因为演员不够，所以演不出三国戏。"他点点头。

进了茶点后，演员们去化装，我们进了后厅，坐在藤椅上看演出。京剧是《庆顶珠》和《泗州城》，舞蹈是"盘子舞"、"红绸舞"和新近才学会的印度尼西亚的"伞舞"。"伞舞"演出时，我们觉得不大纯熟，显得有些生硬。但被观众们的热情的掌声和赞叹声把所有的缺点都淹没了。"怎么这样快就学会了？"苏加诺总统说道："跳得好，跳得好！"

将近下午一时，才演毕。苏加诺总统和其他客人们向我们道别，先后离场。

我们三三两两地到池边，到草地上，到植物园里去游逛。茂物植物园收集热带植物最为丰富。处处是参天大树，处处是未曾前睹的奇花异草，简直是目不暇给。最令人注意的是，每一株大树上，几乎都滋生着形形色色的寄生植物，显得苍古之极。那些寄生的植物，种类多到不可计数，有的是藤类，有的是热带草类，有的还开了花，斑斑点点，把不知名的大树装缀得奇妙异常。各式各样的果子，在争妍斗艳似的悬挂在高高矮矮的树枝上。象大蝴蝶似的花朵，仿佛暂时飞憩在枝头。红色的和黄色的花，长得古古怪怪的，令人惊叹不已。有一种棕榈科的植物，

长着翠绿异常的叶子和朱红得耀目的杆子，那红的绿的颜色，鲜艳可喜到极点，我久久地站在那里，舍不得走开。是我们画家们所作的朱竹么？是用人工把朱漆涂抹上去的么？随地都有奇异的植物在招引着我们。

回到总统别墅的白石阶上，恰好遇苏加诺总统坐着汽车经过，再次的殷勤地招呼着、告别着。

我们在大厅里进午餐。听说山上还有一个植物园，餐后，便乘车向山上走。走了好一会儿，才到一个游泳池。池水清澈极了，泛出浅绿色的光彩来，引诱着人下去游泳。这时，太阳光有些西斜了。我们傍晚还有事，只得匆匆地往雅加达回去。但茂物的景色还老在我们的心头攀绕着。

（原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四日《文汇报》）

轻歌妙舞送黄昏

——观印度卡玛拉姊妹的表演后作

假如有什么好书使你读了一次之后，还想再读两次三次的话，有什么风光明媚的山畔水涯，使你到过一次之后，还想再去两次三次的话，那末，那些好书或那些风景区的确是值得人们吟味和留恋的了，也就是古语所云："好书不厌百回读"之意。我看了印度婆罗多舞舞蹈家卡玛拉姊妹的表演就有这个感觉。我看了一次，又看了一次，但余味无穷，还想再看三次，四次，以至更多次，如果有可能的话。

那些场极高超的艺术的表演，是那末简朴，又是那末丰富多采。舞台上着不得一丁点儿背景、或道具什么的，几千只眼睛只集中在一位或两位的舞蹈者的身上，随着她或她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一扬眉，一转眼的疾如脱兔、宛若游龙的细腻之至，却又是变化无端的动作而移转着，只恐怕疏忽了一个身段，漏掉了一个手势。她们的舞姿，是那末柔媚，却又是那末刚劲；柔若无骨，刚如利剑。也许只有一句话可以描述她们："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不经过"百炼"，怎能如此地颈肩柔转，臂指圆融呢。卡玛拉女士的脸上表情是无穷无尽的，一会儿欢欢喜喜，一瞬之间，又一变而为痛楚凄凉，又一变而为愤怒填胸，你简直有点赶不上她的变化。她的象牙色的十指，会表演出各式各样的姿态。在印度舞蹈艺术里手势的表演本来占很重要的地位。舞蹈家的十指尖

尖，是会说出无穷尽的话语，无穷尽的情意来的。不仅如此，全身的各部分，特别是眉、眼、嘴、唇、面颊、颈、肩、臂、足，无不会说出各式各样的话语和情意的。卡玛拉女士的开合迅速的十指和眉、眼、颈、臂，是成功地而且优雅地达到了印度舞技的高峰了。见到她的一场舞蹈基本动作的表演。表演蜜蜂，仿佛就使观众象听到营营之声，渐飞渐近，绕着香花而转，而憩息了下来。表演双角岐嶷的牡鹿，就使我们见到它的确在惊奔着，双眼是那末恐怯。表演孔雀，就使我们觉得它是悠闲而高贵地在散步，在饮啄，在骄傲地张开锦色斑斓的尾屏。

卡玛拉姊妹是从印度的南部大海港马德拉斯来的。马德拉斯是保存着印度风趣最醇厚的地方，也是印度舞蹈艺术的重要宝库之一。卡玛拉姊妹的婆罗多舞和其他的好些舞蹈都是属于南方一派的。但那不是说，他们就不擅长别的舞蹈了。卡玛拉女士的北方卡塔克舞，是那样地迷人。随着音乐的缓奏，手、足和眼、眉，逐渐舞开了。缓缓地挥着手，缓缓地转着足，铿锵悦耳的脚铃声，有节奏地响着，象天上彩虹似的百褶裙子，也有节奏地时张时合，眉眼之间仿佛含着无限的幽怨。突然地，舞步由缓而疾，乐声也急骤地变快了，表情也顿时紧张起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姿态优美极了，就象一只五色缤纷的蝴蝶，在眼前飞翔着，就象彩色幻变不穷的虹霓在眼前闪耀着。看她那脸部的表情，也便是瞬息万变，和舞蹈的动作紧紧地结合无间，配合得奇妙可喜。

卡玛拉姊妹的每场舞蹈都给予我们以二小时以上的无上的欢愉与欣爱。没有一秒钟容许你转眼他顾。一下子疏忽，或偶然地没有全神贯注的话，便会失去了一段、一节最美妙的柔姿妙态。舞蹈者以整个的身心，整个的感情，整个的灵魂在舞台上舞

着，观众们也必须打叠起全副精神来观看。粗心大意的人是不会充分地欣赏得到其细致优美的好处的，但即使是他们，也绝对不会无动于中，不会不屏息宁神在观看着，而到了红幕垂下时才轻喟一口气的。

乐队只有四个人，一位吹笛，一位击鼓，一位击磬兼歌唱，一位是导演，有时也参加歌唱。人数虽不多，却配合得十分紧凑。假如我们能够听得懂那些歌词，一定会更加感动的，但即使是不懂它们，而这场轻歌妙舞已足够使观众度过一个最有意义和最愉快的黄昏了。

印度这个伟大民族，正和中国民族似的，蕴蓄着的是多大的力量，多末繁赜，多末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的遗产啊！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个世界上最优秀艺术的源泉。

（原载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

赞歌朝霞般的舞蹈

——观印度乌黛·香卡舞蹈团的演出后

桃红色的曙光从东方升起。天空一望皆碧，四散地点缀着浓厚的云块。是一个令人心身俱爽的大好晴天。还未与人见面的太阳光，先染得天上的云块陆离光怪，变幻无穷；这里是一片紫红色，那边是一块鲜红的霞光，再过去又是金黄色的一堆云块，另一边乃是黑黑的一片，边缘上却已被涂上了金红的光彩，象镶上了艳丽异常的花边，衬托着云罅的碧空，益显得逗引人欣悦。把整个天空合起来看，乃是各种各样的光与色彩的奇妙的结合；分开来看，每一片，每一块，每一堆的云层，又各自有其奥妙与变化的特点。这便是灿烂的朝霞，宇宙间的绝妙景色之一。

把这样的光与色彩捕捉入音乐里去的，便会成为一位不朽的作曲家；把这样的奇妙的良晨美景绘写到画幅上的，便会成为一位大画家。但与它最适合、最吻合无间的、最气味相投的，乃是舞蹈家们。舞蹈家们的变幻无常的手舞足蹈，变动迅速的动作，绚丽非凡的服装，最能够具体的形象化的把这样的俪天的朝霞的景色表现出来。在其间，印度的五光十色的舞蹈尤具有那末撼人心腑的魔力。在其间，印度乌黛·香卡舞蹈团尤其能够充分地表现出印度古典舞蹈与民间舞蹈的有机的奇妙的结合，而显示着朝霞般的五色缤纷的奇妙的景色。我们如果赞歌朝霞，便也不能不赞歌这朝霞般的乌黛·香卡舞蹈团。

乌黛·香卡先生今年五十六岁，他已经从事于舞蹈的编导与演出事业整整三十七年。他所编导的各种舞蹈，是古典的，又是民间的，是古老的印度民族的，又是结合着若干现代化的动作。一眼望去，乃是彻头彻尾地印度的，也是彻头彻尾地乌黛·香卡的。就在演出印度古典舞的时候，也浓厚地渗透着乌黛·香卡的气氛。乌黛·香卡的作风自成一派，很壮大的一派。

我们且看乌黛·香卡自己表演的"因陀罗舞"。他把这位至尊无上的神道，人格化了；以既柔且刚，又猛又爱，慈祥如恋子之母亲，勇烈如扑兽的狮王的瞬息百变的舞姿，曲曲传神地表现出这位神道的惊人的力量来。浑身都是劲，浑身都有动作，也就是说浑身都在舞，差不多身上的每一部分的肌肉都在活动着，柔若无骨而刚若"泰山石"。那功力深湛极了，他的"卡尔梯基亚舞"，描写着湿婆神的金儿子卡尔梯基亚在出发斩魔之前，向诸神祷告着；祷告后，就坐着战车出发。他是那么威风凛凛，英姿动人。伴奏的乐声有些特别，金声配着悠扬的笛声，骤听之，大似中国曲调。仔细推敲了之后，颇疑心是取之于印度尼西亚的。乌黛·香卡气魄弘伟，是会不怯于取材于印度本土以外的。

有他领头的许多别的舞蹈，象"锡达塔王子的伟大出家舞"（且举这个舞为例），整个场面全都活了起来。他是那样地善于体会或掌握那位哲人厌弃尘世的心情。脸上的表情和手足的动作都深刻细腻异常，的是入骨三分，赚人酸心落泪。

亚玛娜·香卡是乌黛·香卡的夫人，也是这个舞蹈团的女主角。她的舞技是到家的。象颂神（克里希纳神）的"曼尼普里舞"，就比一般的曼尼普里舞来得丰富。眩目的盛装，多感的脸部，会说话的眉与眼，能传达出心意的迅速地变化着的手势，合拍地响着脚铃的优美地进退着的双足，凑合起来便成为醉人的

美妙的一折上好的舞蹈。她的“克里希南尼舞”，在我所看过的不少次、不少人表演着这个同样的舞里面，她的确是一个杰出者。这舞是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的舞蹈，充分地表现着天人相接的感情，充满了多情善感的妇女们的爱恋与思念。而其实，人格化了的神，也便是有血有肉的人。她在这里，脸上的表情是变化多端的，或喜或愁，若慕若怨，曲尽了深刻的心理描写的能事。她的手势在朗朗地说着话，十指尖尖，忽张忽合，忽伸忽屈，配合着歌者的唱词而迅快地变换着手势。但愿我们能够听得懂那曼声长吟的歌词啊！如果懂得，将更会如何地领会到和同情于她的倾慕之心呢。

几个有亚玛娜·香卡在领头的集体舞，象“阿萨姆舞”，她也表现得很突出。她的舞姿细致曲折，转如回风之舞雪，进似猎狗之扑兔，能够把悲惨的运命和与大自然搏斗的失败，感人地体现在舞台上面。在大自然的残酷的灾害的面前，人类变得如此的嫉妒无情。两条人命被河水冲走了，那消息只是象河水上的涟漪，一转眼就消失了。战胜大自然的灾害和战胜不幸的社会的不平是不可分割的。

舞蹈团演员们表演的“收获舞”，是表现印度农村生活片断的集体舞。农村的男男女女，在收获之后，就是节日了。他们以歌舞来庆祝收获，并以种种舞姿来追忆雨天、播种、收割等等的农家的辛苦。这是一个民间舞，但经过乌黛·香卡的大手笔，成为比较现代化的一个集体舞了。我们在这里闻得出乌黛·香卡的创作的劳动之气息。他改进了民间舞蹈，磨去了其间粗糙的和原始的部分，加入了些适合于现代人的趣味的东西。这样的大气魄、大手笔的改革，很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

“旁遮普”民间舞蹈，也是一个集体舞，也是同样地由乌黛·

香卡改编过的。“改编”耗费了他很大的苦心。但站在吸取印度民间舞蹈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而加以提高，加以改革，加以重行整练过，乃是使印度民间舞蹈能够为现代人，特别是非印度人所能接受、所能欣赏的主要原因。也因此，印度民间舞蹈乃能更广泛地流传于世界各地了。

乌黛·香卡先生的改编与创作的勇气与雄心是令人钦佩的。他的舞蹈团是刻刻在前进，时时在发展。他没有一刻停止过。他自己告诉我说，“也希望在中国学习到些舞蹈。”的确，他不仅吸收了印度的古典的与民间的舞蹈的精华，而且也吸收着印度以外的世界上的好东西。他是那样地博取广收，取精用弘！乃能使他的舞蹈团成为一个整体，——不是零零碎碎的乃是一个完美的整体！象陆离光怪的朝霞似的，是那末令人心醉地出现于舞台上面啊。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深夜记

（原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美的丝织的网

——欢迎乌黛·香卡舞蹈团

如果有什么事物或动作，能够使你全神贯注地屏息地盯视着，一瞬间也不得松劲，偶一旁视，就会是一个损失，使你再也追赶不上那疾驰而飞去的美，那末，这样的事物或动作，一定就会是“美”的自身，就会是运用高超深邃的艺术来表达出群众的喜爱、生活与力量的那种美妙的舞姿与歌声了。

不论是单身一人、或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集体，当他（她）或他们，随着悠扬曲折的乐声，并紧切地、细致地描绘出或雄健、或绮腻、或哀怨、或颂扬、或崇慕的歌声而翩翩起舞的时候，那迅捷若脱兔，或欲疾故缓，似顿实动的舞蹈和抑扬顿挫的乐声和歌声，就会立刻紧紧地抓住了你，抓住了你的双眼，抓住你的全部注意力乃至你的整个心身。

在欣赏印度舞蹈家们的艺术的当儿，每个人几乎都有以上的体会。特别是观看乌黛·香卡舞蹈团的演出，尤其必须心身都凝注在舞台上，偶一疏忽，就是一个不可追悔的懊恼。乌黛·香卡他自己和他的妻子亚玛娜以及其他舞蹈家们，都是技艺异常精练的高超的艺术家，他们的那个团，就象是一面美的丝织的网，那面丝网，编织得那末坚固而紧凑，分开来是一幕幕的舞蹈，合起来却是完整的一部大舞剧；那全体舞蹈家们配合得那末美好，在闪闪地发出耀目的光彩，表露出他们的“文化热望”，他们

的“梦”。他们把整个心身都投入于他们的舞蹈里，每一个动作，一举手，一投足，都施展出了浑身的解数。他们在舞台上，是没一秒钟的迟疑和停顿的，那变化无穷的眼睛，那若颦若语的双眉，那动态多端的脸部，那秀削的双手，那柔软若杨柳枝，刚劲象百炼钢的肢体，那或进或退，从未停止过的脚部，几乎没有一部分不是有精神，有力量，有表情的；他们浑身上下，似乎都会说话，都在表达他们的全部的情绪。

那一面无形的美丽丝织的网，撒布在整个剧院，不管有多少观众，无不会被网住而摆脱不掉，是那样的美，又是那样的变幻无穷，直象无穷尽的放射着的五色缤纷的烟火或活动的画面，谁有狠心忍舍得离开它呢！直到幕布下垂了，还是恋恋地不肯走开。

乌黛·香卡是一位大艺术家，一位大创作家，他耗尽了半生的精力在发掘印度的古典舞蹈，也在发掘印度各地的民间舞蹈。他把印度的“古”与“今”，现实与理想，组织得那末好，编排得那末紧凑，简直成为他自己的一种创造，他是取精用弘的。不论什么题材，包括许多印度山区里的许多少数民族的舞蹈在内，他一发掘出来，就把它们运用到他的作品里来。他的创作乃是一个大熔炉。能把任何种类或式样的东西都随心所欲地变成了他的作品。他对印度的现代舞蹈，贡献是很大的。

他说道：“今天我们感到我应该对公众作更多的贡献；艺术家所能贡献给人民并从人民获得的东西真不少啊！”的确，他和他的团体是在对印度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作出更多更多的贡献的，而且他也不断地从人民那里获得更多更多的东西。这不是艺术家们的明亮的事例么：当你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当你表达人民的生活、力量、进步和创造的精神的时候，你就有了生

活，有了力量，有了进步，有了创造的精神，也只有从人民那里你才能获得你所需求的一切东西。乌黛·香卡的有了创作上的大成功，其关键也就在这里。

乌黛·香卡有一个新的创造，象那样的同样的创造，在别的国家里，似乎还没有出现过，那就是“影子戏”。这种“影子戏”，和我们的“皮影戏”不大相同，它是用活人扮演的。表演的时候，需要很深广的舞台面。舞台前张挂起白色的幕布，舞台的后边使用强烈的灯光，将舞台上演员的动作，都投射影子于幕布之上，当最后表演完毕时，幕布一揭，灯光大亮，舞台上出现了衣冠灿烂、色彩鲜明的一大批演员，顿时令人产生强烈的对照。这是很勇敢的一个创造。我在印度观看过他的“影子戏”的表演，觉得很奇妙，现在，他带到中国来表演的“影子戏”有两个：一个是“罗摩利拉”，取材于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里的一段故事；一个是“佛的一生”，取材于佛本行经，即释迦佛出生、修道及成佛的故事。这两个“影子戏”对我们都不陌生。我相信，我们会喜欢乌黛·香卡的这个新的创造的。

乌黛·香卡说：“我们真诚的相信，我们能够通过艺术彼此接近并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愿望：通过艺术，通过艺术的创造与表演，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彼此接近并联合起来”。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写

（根据清样，此文未发表）

回忆早年的瞿秋白

秋白遇害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在他遇害之前的四五年我们已经不大见面了。偶然见了一面，我也从来不去打听他的住处，甚至有几次在街头遇到了，他戴着鸭舌帽，帽檐低压着眉梢，坐着洋车，疾驰而过，我们只是彼此望了一下，连招呼也不打。

在现在虽然是隔了近二十年，秋白的瘦削而苍白的脸，带着很浓厚的常州口音的谈吐，还是活生生的活在我的心上，活在所有他的朋友们，同志们的心上。

秋白和我的岁数不相上下（他生于一八九九年）。在五四运动的前后，我们都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而他却显得十分的老成持重颇有些老大哥的样子，好些问题，我们不能解决的，总要请教到他。他的筹划和见解都不象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是那么早熟而干练！

他的早年的环境很不好。在北平念书的时候，是寄居在一位他的堂房哥哥的家里。这位哥哥在外交部做一个小官，生活也不怎么充裕。不过，我常到他住的房子里，觉得房子收拾得很干净，明窗净几，笔砚罗列；靠墙摆了一排书架，架上的书，有哲学的，有古文学的，那时，我见了颇觉深奥，有点不容易了解。他还会刻图章，听懂得的人说，他对于刻印的一道，功夫很深。他对于古文学的修养远比我和同时的许多朋友们高深的。

那时，常聚在一起的朋友们，有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秋

白和我，还有济之的弟弟式之等六七人。为了我们全都住在东城，为了兴趣的关系，我们在无形中竟形成了一个集团。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但彼此往返得比同学亲热得多。

我那时也是寄居在叔父的家里，有点象清教徒的样子，不抽烟，不喝酒，生活异常的刻苦，不论多远的路，总是步行，反对坐洋车，绝对的不穿绫着缎，不问冬夏，老是布长衫一袭。秋白、济之他们就显得比我阔绰得多。我记得，秋白那时已经吸上了纸烟，烟瘾很大。手指上都染得黄黄的。也会喝酒了，而且喝得相当的多，酒量很不小。这些，都叫我吃惊而羡慕。我当时觉得，他的生活经验比我是丰富得多了。

北平的青年会会所在东城。我常到会所里去看书——虽然我不是一个会员，更不是一个教徒。秋白、济之他们也常去，地山和世英，因为在盔甲厂燕京大学念书的关系，和青年会的交往，经常是密切的。这时，青年会的干事是一位美国人步济时。他是研究社会学的，思想相当的进步，而且也很喜欢文学。在青年会小小的图书室里，陈列得最多的是俄国文学名著的英文译本和关于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书。我开始接触着托尔斯太、柴霍甫、高尔基几位的小说和剧本。而秋白和济之在俄文专修馆里也正读着托尔斯太和柴霍甫。他们从俄文开始译托尔斯太的短篇小说，我却从英文译本重译柴霍甫的剧本。我们那时候对于俄国文学是那么热烈的向往着，崇拜着，而且是具着那么热烈的介绍翻译的热忱啊！我们第一次得到的稿费，记得都是翻译俄国的作品的稿费。秋白和济之合译了一本《托尔斯太短篇小说集》交给共学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第一部的译本。我编的《俄国戏曲集》，其中有秋白，济之，我自已，还有好几位俄专的同人们所译的剧本，也交给了共学社，不久，也由商务出版了。

青年会想出版一个青年读物，一本周刊，找着我们几个人谈着编辑的事。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秋白、济之、世英、地山和我，共五个人。经理部的事务，由青年会的一位学生干事负责，我负责编辑和校对的事。这周刊，定名为《新社会》。我们经常的讨论着编辑方针；这些会议，在秋白寓所举行的不少。为的是他身体不好，有肺病的征候，而且晚上失眠，早上起不来。我们到了的时候，他每每是还坐在床上，也就拥被而谈，滔滔不绝。他的见解是很正确的。我们不能不细细的倾听他的意见。

后来，《新社会》被北方的军阀封闭了，我们的经理也被捕下狱。幸而，是青年会的刊物，被捕的经理很快的就被释放出来。我们愤慨极了！特别是秋白，主张非再接再励的干下去不可。我们立刻和青年会方面商量着，想要继续再出一种刊物。好容易说动了他们，决定再出一种月刊——为的是，他们怕周刊太尖锐了，不如出月刊——经过了短期的筹备，这个定名为《人道》的月刊第一期出版了。这个《人道》月刊，主要的推动力是秋白。他是那么勇敢而兴奋的工作着。可惜，第二期快要编成，而因为经费来源的关系——主要的还是青年会方面害怕了——竟不能继续的出版下去。

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不是发难者；打"赵家楼"的一幕，我们没有参加。可是，我们都代表着我们的学校参加了学生会。秋白和济之都是俄专的代表。世英是燕大的代表。我是铁路学校的代表。我们是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的。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都很秘密。秋白有一次在路上走着，被暗探跟上了，差一点没被捉去。

李守常先生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秘密的主持着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组织。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们的联合阵线；有共产党、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郭梦良等)、还有我们，秋白和

我是对社会主义有信仰而没有什么组织的人。经常的在北大图书馆和教室里开会。相当的秘密。守常先生尤其谨慎小心。在开会之前，必须到室外巡视一周，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在左近。但这个“会”，很快的就结束了，一来是，为了环境更恶劣下去的关系，二来是，联合阵线显得不太联合，而共产党需要一个更严密的组织。

我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名为“文学研究会”，我们五个人都是发起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秋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到苏联去。北平的晨报社，一个“研究系”的机关报纸，要派遣几位记者到欧洲去。他们决定了派遣俞颂华、李宗武和秋白三位，先到苏联。俞颂华和李宗武二位后来到德国去。秋白始终留在苏联。这次的出国，奠定了秋白的思想路线，也使他成为一位最坚强的共产党的斗士。

他的通讯继续在《晨报》上发表，犀利的笔锋，正确的报导，震撼着当时的读者群。后来集为一本《新俄游记》交给我，作为一本“文学研究会丛书”在商务出版。

他回国以后，行踪就没有一定了；他的《赤都心史》也是“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我记得，这部书还是原稿，不曾在报纸上发表过。那时候，《晨报》上已不登载他的通信了。不久之后，连《赤都心史》和《新俄游记》也都被军阀们禁止发售了。

就在他做着党的工作，而行动相当秘密的时候，他还替我的《俄国文学史》写了最后的关于苏联文学的一章。关于这部分的材料，在那时候，我自己是一点也找不到的。

虽然从此以后，见面的机会极少，也就从此天人永隔，可是他的声音笑貌，一闭眼还是如在目前的。

（原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文汇报》）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瞿秋白同志的早年生活，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当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我和他是比较接近的。他和耿济之同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他的远房叔叔瞿世英和许地山同在汇文大学读书；我则在李阁老胡同的铁路管理学校读书。因为我们全都住在东城根一带，便彼此熟悉了。

秋白同志的早年，因为家庭环境的恶劣，心情是十分灰暗的。懂得“人情世故”也特别早。他的父亲独自住在济南，他的母亲很早的去世了，死的情形很悲惨。“一家星散，东飘西零。”他和两个弟弟住在北京叔伯哥哥瞿纯白家里，还有两弟一妹则住在杭州他的伯父家里。纯白先生我见到好几次。他是一位好好先生，那时在外交部做一个科员，收入微薄，但负担很重。秋白兄弟三人住在他家里，很得到他的照料。我记得，秋白独自住一个屋子，屋子里有书桌，书架，收拾得干干净净。秋白在我们几个朋友里面，是有“少年老成”之称的。许地山、耿济之、瞿世英和我的年龄都比他大。地山在入大学之前，还曾“饱经世故”，到过南洋，做过教师。但比起秋白来，似乎阅历都没有秋白深。秋白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够得上是“老大哥”。他说的话，出的主意，都成熟、深入、有打算、有远见。他的中国书念得很多，并大量的刻苦的读着哲学书。对于“老”“庄”特殊有研究。我那时只读些刘知几《史通》，章实斋《文史通义》之类的书，见解很幼稚，

对于他的博学和思想的深刻是十二分的佩服的。有许多事，都要去请教他。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北京的大学生全都卷入这个大运动中了。它象一声大霹雳似的，震撼醒了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的青年学生，以至工人和中年的知识分子。山洪暴发了。由于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的影响，中国走上新的革命的道路了。这个开始，这个以反帝的爱国运动开始的学生运动，在实际上已经是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的序曲。而且，实际上的领导者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秋白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个大运动中，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和态度，也不是自始至终完全一致的。我们有辩论，有斗争，有说服，有打击，有协商，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复杂而严肃的。其中也显得出有“封建性”的“门户”，象在“学生联合会”里，北京大学和高师就是两“派”。不过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却是以万钧之力领导着大家向前走，总的方向和总的口号是一致的，是能泯灭了一切不同的意见的。我们几个人代表的都是小单位，而且在那些单位里，做工作十分困难，群众意见多，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主要的原因是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因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的天才，越到后来，我们的活动越困难，北大、高师都无法开会了，只好到东城根的“汇文”去开。开的时候，老在夜间。悄悄的个别的溜进来开会。散了会之后，也一个个的悄悄的溜出去。军阀的走狗们变得更狡猾了，说不定就埋伏在附近，叫一声你的名字，如果回头一答

应，就会被他们捉去。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已经捉了好几个人。秋白是很机警的，曾经被一个走狗追踪了半天，跟上了电车，又跟上了人力车，但他转弯抹角的兜圈子走，终于甩掉了那个狗子。自此之后，秋白的行动显得更小心了。有时，总是我们三两个人一同走，以便彼此有照应。

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秋白、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济之偶然翻译出一二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出来，大家都很喜悦它们。但那时，他们对于俄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不知道的，对于托尔斯泰和其他作家生平传记，也是知道得很少。因为"俄专"里是不教授这些课程的。

我受了他们两人的影响，也要找些俄国作家们的小说、戏剧来读。我看不懂俄文，只好找些英译本的俄国作品来读。在北京，那时很少有公立图书馆或私人藏这一类的书。恰巧在某一天，我认识了一位孔君，他在青年会做学习干事，约我去青年会玩玩。在那里，我看到了两个玻璃橱，橱里装满了英文本的小说、戏曲、诗歌，特别是英译本的俄国作家，象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足足摆满了一橱。我高兴得很，便设法向他们借几本来读，贪婪的读着。那时青年会想出版一本专给青年阅读的杂志，约了我们几个人做编辑。我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出一个周刊，是八开本的十六页，定名《新社会》。孔君负责做经理，我负责集稿并校对。我跑印刷所，也经常跑到秋白、济之、地山、世英的家里去取稿。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

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

“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

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他的国文根底好，——在学校里他的国文得过一百零五分——写的白话文，“文言”气息很重，有时，用的典故，我还不大懂得。可惜《新社会》如今是一本也找不到了。我想不起来，当时写的都是些什么题目的文章。但我们所写的开头还谈些青年修养，介绍些科学常识；到了后来，却完全鼓吹起社会改造、家庭革命，向当时的统治者直接进攻了。《新社会》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队伍里的一支勇敢的尖兵队。远到四川、两广、东北等地，都有我们的读者。秋白的尖利异常的正面攻击、或明讽暗刺的文章是《新社会》里最有分量的。

象这样的刊物，当然不多久就受到统治的军阀的注意与取缔了。警察局把经理孔君抓了去，坐了好几个月的牢。《新社会》就此停刊。但我们很愤慨，要斗争到底，努力说服青年会，继续出版一种刊物。秋白表现了最积极的斗争精神。等到孔君出狱，我们已商量好要出版一种“月刊”定名为《人道》，写稿和编辑的人还和《新社会》相同。在写稿的态度和观点上，却有了些进步。

不过，当我们编辑《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时，在编辑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争论的，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的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有的还觉得他的议

论"过激"。我则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而看的书却以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为多，因此，就受了他们的影响，而主张什么"人道主义"。《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明的。但他并没有提出别的名称出来，大家也都赞成我的意见，当即定名为《人道》。

《人道》月刊只出版了第一期。第二期已经编好，而且"目录"预告也刊出了，但青年会方面却有了种种的推托，借个题目，主要是说经费没有了，干脆停刊。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象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秋白他们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克雷洛夫的寓言，其中有关于作家的介绍，就是由我从那本小书里抄译出来的。我当时曾写信给在日本的田汉同志，希望他能介绍些俄国文学史给我们。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秋白和济之合译了一本《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济之和我译了契诃夫的《海鸥》、《樱桃园》等十种剧本，编为《俄罗斯戏曲集》，还有其他的若干俄国文学的中译本，也都交给这个"丛书"的编辑部，交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

大概因为这个因缘，北京晨报社要派三位记者到苏联去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就选上了秋白同志。还有两位，是俞颂华和李宗武。记得我们很兴奋的送他上火车，他也很愉快的象新生了似的踏上了远远的征途。

我们几乎不断的读着他的游记和通信，那些充满了热情和同情的报道，令无数的读者们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我相信，那影响是很大的。后来，这些报道集成了两部书《新俄游记》(今收入《瞿秋白文集》第一卷，恢复了原名《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今收入《瞿秋白文集》第一卷)，由我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里，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隔了不久，因为反动派的干涉，《赤都心史》就首先不出卖，《新俄游记》继之也绝版不印了。

他回国之后，我们在上海见面了。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坚定的信仰，他已从学生时代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成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了。他已经冲破墨漆漆的黑暗，受到红光的照射，摆脱了一切过去的负担，成为走在战斗最前列的最勇敢的战士之一了。我没有和他细谈，我还是一个朦朦胧胧的“向往者”，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走到最前列去。他那时，还抽出时间来，写作或翻译文学作品。当我编译一本《俄国文学史略》的时候，其中最后的一章第十四章“劳农俄国的新作家”就是他替我写的。他还有一篇介绍新俄文学的作品：《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也刊登在《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六号(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出版)上。他还写了很多篇短文，篇篇都是针对着当时受着帝国主义买办胡适等人的影响的文坛进军的；这些短文，象尖锐的匕首似的，直刺中他们的要害之处，及时的、深刻的揭发了他们的不可告人的藏在假面具之后的狰狞的面目。他的这些短文，后来

集成为《乱弹及其他》出版。

过了不久，秋白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行踪就更加秘密起来，从此我们很少见面。

最后一次见面，我还记得，是在上海宝山路上。我从工厂里放工回家，在这条路上步行着，他坐在人力车上，头戴一顶打鸟帽，低低的压在额前。我们彼此互望了一眼，但并没有点头打招呼。从此就成了人天之隔。今年离开秋白同志就义，已经二十周年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已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中国已经是一个红光遍地的自由、独立、繁荣、幸福的国家。秋白同志一生为之奋斗以至于牺牲了自己生命的理想是实现了！我们在幸福里永远纪念着他，这个卓越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最好的最勇敢的战士之一——秋白同志！

一九五五年六月五日写

（原载一九五五年《新观察》第十二期）

悼王统照先生

我刚从国外回来，就听到了王统照先生的噩耗。这个不幸而令人悲伤的消息使我沉默了好几天。我写不出一个字来哀悼他。无言的悲戚不是平常的人对于最沉重的哀悼之感的一般的表现么？等到心境比较安静下来的时候，一桩桩、一件件的回忆就都涌现在心头了。一个平常的小事，足以令你突然的感泣起来。一件当时看来很平凡的无足轻重的谈话，这时都会叫你追想起来，心肠绞痛。四十年来的交情是不平常的。常常有三五年或七八年不相见了，却彼此相信得过，彼此知道是在工作着，在努力着，在不辜负彼此的期待而向着正确的光明的道路上走着。

王统照先生是一位恳挚坦率的人；他有时很沉默，但实在是很喜欢谈话的，而他的话永远是那样的亲切而动人！如今仿佛还在耳边响着他的一句接连一句的迅速而略有模糊的口音，然而我们却再也听不到他那熟悉的声音了！凡是和他熟悉的人，想到这里能不啜泣么？

他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最前线。那时他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一同编辑了《曙光》月刊，而瞿秋白、耿济之和我等，那时候也正在编着《新社会》旬刊。我们开始认识，并立即成为很好的朋友。《小说月报》由茅盾同志和我主编的时候，他是很热心支持它的

一位作家。他在《小说月报》上写了不少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具有特殊的风格，表现出"五四"时代所共有的反抗的精神，同时却加上了他自己的婉曲而沉郁的情绪。是的，他的情绪一直是婉曲而沉郁的。他比我只大一岁，但他显得比我老成得多，也显得比我早衰。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说着"老话"。

在上海编辑《文学》的时候，好象是他一生里最为怫郁的时代，他要应付一切琐碎的编辑事务，还要准备着敌人们的不意的袭击。编辑部有一个铁门，那门是常常拉上，而且加了锁的。他的生活也很困苦，收入戋戋，常和我们一同吃着烘山芋当一顿午饭，就在这样困难的时期，他对他所负责的编辑工作是坚持到底的，是一丝不苟地担任起全部责任。但他的心境似乎有些颓唐，或衰老。他老是说着他山东老家的故事，老是说着他先代的许多遗闻轶事。我们那时在私下就说他道："剑三老了！"的确，他似乎是比我，或年龄相仿佛的朋友们老得多。他很瘦弱，常常咳嗽，却诊查不出有什么病。他开始有些气喘，晚上失眠，有时，要坐到天明，因为一躺下去就会喘得利害。我们都为他的身体担心，劝他戒酒戒烟。他一边抽烟，一边呛着，实在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我在上海编写《中国版画史》，先成"图录"若干册，"史"却一字未曾动笔，不过那篇"长序"倒早写成了。王统照先生的字是写得很劲秀的，一手褚河南，深得其神髓，在今日的"书家"里，他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位。但他从来不自己吹嘘，所以，知道他会"写字"的人很少。我却把那篇"长序"托他替我写了。足足有一万多字，他整整的花了一个暑假的工夫才写成，写了四十页，首尾如一，无一划败笔。有二十多年了，他这篇手写的序却未曾印出，虽然还保存在我的书箱里，却已为恶鼠咬得只剩下一半。

我找了出来看，不能不内疚于心！幸亏他的妙迹我们还有一篇可见，那就是鲁迅和我重印的《十竹斋笺谱》后面所附的我的一篇跋，有十多页，就是出于他的手笔。再版本的《十竹斋笺谱》，把这篇跋拼合成为二页，用木刻印出，颇失去他的丰韵。原本的《十竹斋笺谱》附的是珂罗版印的大字原页，可惜跋里有“痛饮黄龙”的话，在敌伪时期大都被惧祸者撕拆下去了。

表面看起来，王统照先生是随和得很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般的。他和谁也没有争吵过。但他是“有所不为”的！他是内方外圆的，其实，固执得很。对于不义正的事，他从来不肯应付，或敷衍一下。他嫉恶如仇。他从来没有向任何罪恶的力量低过头，不问是敌伪时期的坏蛋们，或国民党的反动派。他在山东大学做教授的时候，乃是一盏明灯，照耀着学生们向光明大路走去。他是“有所为”的！无论在这个时期或在上海编辑《文学》的时期，他都是真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他知道只有和党走一条路，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才能够走上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他是认真的。凡是从事于任何一件工作，他都是认真负责到底的。就是在他很忧郁的时候，他也从来不放弃了他自己的任务。只要他答应你做那一件事，他就会用全副精神全副力量来办好它的。象上面所讲的在上海编辑《文学》的事就是如此。他在山东大学教书的时候，他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他对学生们是那样地喜爱，又是那样地导引着，恨不得把全身的本领，或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他们。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教导他们如何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上去。

当在全国解放的时候，他在山东是很活跃的。他顿时年轻

起来，再也不说什么“老话”了。他领导着山东省文化事业。他和党的领导同志们相处得融洽无间。他的身体很衰弱，喘哮病也没有好，有时，还更加剧，但他的精神却是异常焕发，和在解放前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他不再沉郁悲愤了。他以满身的热力，从事于他所负担的工作。他更加认真负责了。只有一个遗憾：他的身体太坏了，有时不得不被强迫地休息若干时期。他自己经常地抱歉，说，自己的工作做得太少了，党对于他照顾得太多、太好了。只要是他的体力之所及，他总是要尽力于他所应做的工作的。我去年到了济南，他就力疾地出来招待，到处陪同着我参观、访问。我看着他的衰弱的身体，要依靠着手杖走路的情形，心里十分的难过，坚决的辞谢了他的相伴，他却始终地坚持下去了。我私下还在想：一同走走也好，可以多谈谈话。其实，在那时候“谈话”对于他已是一种负担了。有一次，上了千佛山。他停留在山脚下的茶馆里，说道：“我实在走不上去，就在这茶馆里坐着等候你们罢。”我顿时警觉着：他是衰老了，他的身体是太不行了。但想不出办法来怎样地去让他根治那致命的哮喘病。有一天，我对他说道：

“到南方去治疗，也许会好的。”

他答道：“是要去的，只是放不开工作。”

我应该责备我自己，那时候并没有下决心立即使他有机会到南方去治疗。就这样拖延下去，他的病情是一天天地严重了。我们总以为这是“老病”，没有什么危险的。他自己常说，“一到了冬天，病就要大发了，”但也没想到要转地疗养。

今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到了北京。等到我在第二天到他的座位上找他时，却是空着，他已经进了医院。我一直没有时间到医院去看望他，只是通过几次信。老想等空闲了

些，就去探望他，却又怕见了面，多谈几句话伤害他的病情和静养。就此忍耐住了不去看他。他还买了一本纪念册子，要茅盾、圣陶、老舍、克家和我题些字在上面。我们都写了送还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出了医院，回到济南去。我竟没有去送他。

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热情充溢的歌颂十月革命节的长诗，我心里很高兴，觉得他的病是已经大好了，他的坚定的意志，似乎已克服了顽固的病魔。象这样的豪迈而具有积极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颂歌，是非有健全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写不出来的。他既写出了这样的颂歌，可见他逐渐走向健康的路上来了。听说，他还有两篇性质相同的诗歌，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但我没有读到，古语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只是消极的一句话。王统照先生是远在解放之前就已经"闻道"的。在解放之后，他仿佛年轻了多少年，正在积极地为人民办事，却不幸死了。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闻道"的同志，不仅仅是在友情上哀悼他而已，实在也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界和中国人民的失去了他而惋惜不已！象他这样的一位成熟的老作家正在挥笔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正在积极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而突然地停止了他的响亮的歌声，那个损失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坛和中国人民的！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写

（原载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人民文学》第一期）

欢迎缅甸文化代表团

我们热诚地欢迎缅甸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们欢迎他们来看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后的新中国；欢迎他们来看新中国人民的愉快生活和各种活动；欢迎他们来看站立起来了的新中国人民怎样勤劳勇敢地从事于经济的和文化的建设事业；欢迎他们来看新中国的艺术和伟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之间，有悠久而深厚的友谊。中、缅两国的文化，特别在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方面，有很多的共同点；我们相信，两国的文化是长久地互相影响着的。我们对于缅甸文化感到亲切；缅甸人民对于中国文化也一定会感到亲切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缅两国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文化方面所受的损害尤为严重。我们看到仰光大学的大礼堂的被炸毁，图书、仪器等设备的被掠夺，被破坏，看到缅甸故都曼特里的重大损失，特别是皇城内的弘伟壮丽的故宫的被全部炸掉，只剩下一堆堆的废瓦颓垣，便感到满腔的愤恨。在中国，被这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所破坏、所掠夺的情形，也同样的惨重。许多学校，许多学术机关和许多伟大的民族文化遗产，都遭受难以形容的破坏。因之，对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中、缅两国的人民是同样地怀着惨痛的回忆和深切的愤恨的；对于防止帝国主义者的挑拨战争的举动，对于保卫亚洲和

平，保卫世界和平，是同样地具有决心的。

我们需要和平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求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彼此尊重。但为了保卫和平，我们勇敢地迎击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和侵略行为。

我们在缅甸访问的时候，受到缅甸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殷勤的招待。我们看到许多新的事物和许多名胜古迹；接触了许多缅甸文化界的人士和专家们，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我们至今心里还感到温暖和愉快。我们忘不掉那短短的二十天在仰光，在东枝，在高乐，在曼特里的生活。为了建设我们新的国家，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中、缅两国文化界的人士和专家们应该亲切地联系着。我们的友谊是在发展，是在更亲切地发展着。

我们相信，缅甸文化代表团在这次访问新中国的首都和各地区，看到新中国人民的生活，看到古老的名胜古迹，看到新中国的生气勃勃的建设事业，结识许多中国文化界的朋友之后，一定会在中、缅两国的文化联系和两国文化界人士们的友谊上，有很大的发展的。

我们热诚地欢迎缅甸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

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原载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长　安　行

住的地方，恰好在开"陕西省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碰到了不少位在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先进工作者的代表们，个个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看得出是蕴蓄着无限的信心与决心，蕴蓄着无穷的克服任何困难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是一日千里地在进展着，眼看见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大西安城，一个空前的宏大的工业城市。灰色的破落的西安，将一去不复返。我想，明年今天再来时，将很难认识现在的街道形式了。许多久住在这个古城里的朋友们和我一同出城一趟，便说："变得多了。已经连道路也认不出来了。前几个月来时，哪里有那末多的建筑物！新房子叫人连方向也辨不清了。"的确，这是最年轻的工业城市，就建筑在一座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城市的基础上。

说起长安，谁不联想到秦皇、汉武来，谁不联想起汉唐盛世来，谁不联想到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就在这里写出他们的不朽的大作品来，谁不联想到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来，他们的许多伟大的诗篇就在这里吟成的。站在少陵原上的杜公祠远眺樊川，一水如带，绕着以浓绿浅绿的麦苗和红馥馥的正大放着的杏花，组成绝大的一幅锦绣的高高低低的大原野，那里就是韦曲、杜曲的所在，也就是一个大学的新址的所在。杜甫的家宅还有痕迹可找到么？每一寸土，每一个清池的遗迹，都可以有它们诗般地美丽的故事给人传诵。相隔不太远的地方，就是蓝田

县，就是辋川，也就是有名的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所留恋久住的地方，就是有名的辋川图，和裴迪联吟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地方。从少陵原再过去，就是兴教寺的所在了。那是三藏法师玄奘的埋骨之地，一座高塔建筑在他的墓地上，旁有二塔，较小，那是他的大弟子圆测和窥基的墓塔；关于窥基曾流传过很美丽而凄恻的一段故事。这个地方的风景很好，远望终南山白云封绕，唐代的诗人们曾经产生出许多诗的想象来。

站在长安城的中心——钟楼的最高层上，向北看是大冢累累的高原。刘邦、吕雉的坟，以及他们的子孙的坟都在那里，晓雾初消的时候，构成了一幅象烽火台密布似的沧荒的奇景。向南向东望，是烟囱林立，扑扑突突地尽往天空上吐烟，仿佛蕴蓄着无限的热与力；就在那儿，十分重要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相当完整地被保存着。再向东望，隐隐约约地可指出骊山的影子来；秦始皇帝就埋身其下。华清池依旧是最好的温泉之一。七日七夕，唐明皇和杨贵妃站在那里私誓"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长生殿也就在那里。向南望，双塔屹立，尖细若春笋的是小雁塔，壮崛而稳坐在那里似的是大雁塔。终南山在依稀仿佛之间。新建筑的密密层层的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密布在那里。向西望，那就是周文王、武王的奠立帝国的根据地，丰京和镐京遗址所在地。灵台和灵囿的残迹还可寻找呢。读着《诗经》，读着《孟子》，不禁神往于这些古老的地方了。就在这些最古老的地方，新的建筑物和工厂，纷纷地被布置在丰水的两岸。还可望到汉代的昆明池，大的石雕的牛郎、织女像还站在那里，隔着水遥遥相望呢，——当地称为石公、石婆，并各有庙。

没有一个城市比之今天的西安更为显著地揉合着"古"与"今"的了。在没有一寸土没有历史的古老文化的基础上，建立

起了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和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的长安城，毫无疑问地，将比汉、唐盛世的长安城，更加扩大，更加繁华。点缀在这个新的工业大城市里的是处处都可遇到的赫赫有名的名胜古迹和古墓葬、古文化遗址。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起，中国历史的整整大半部，是在这个大都城里演出的。它就是历史的本身，就是历史的具体例证，这些，将永远不会没灭。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都知道将怎样保护自己的光荣的古老的文化和其遗存物。在林林总总的大工厂附近，在大的研究机构和学校的左右，有一处两处甚至许多处的古迹名胜或古墓葬或古代文化遗址，将相得益彰，而绝对不会显得有什么“不调和”。他们在休假日，将成群结队地去参观半坡村的仰韶遗址，那是四千多年以前的原始社会人民的居住区域。他们看到那些圆形的、方形的住宅，葬小孩子的瓮棺。他们看到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怎样在红色陶器的上面，画出活泼泼两条鱼在张开大嘴追逐着，画出几只鹿在飞奔着，画出一个圆圆的大脸，却在双耳之旁加画了两条小鱼，仿佛要钻进人的耳朵里去。他们看到那时候人民所用的钓鱼钩、鱼叉、鱼网坠。他们会想象得到：在那个时候，半坡这地方是多水的，多鱼的——那时候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但似以捕鱼为副业。他们看到骨制的鱼钩，已经发明了“倒钩”，会惊诧于那时的人民的智慧的高超的。他们将远足旅行到汉武帝的茂陵去。在那里，会看见围绕着那个大土台，有多少赫赫的名臣、名将的墓。霍去病、卫青、霍光都埋葬在那里，还有李夫人的墓也紧挨着。在那里，还可以检拾得到汉砖、汉瓦的残片。霍去病墓的石刻，正确地明白地代表了汉武帝那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艺术创作。现存着十一个石刻，除了两个鱼的雕刻——似是建筑的附属物——还在墓顶上外，其他九个石刻都已经盖了游廊，好

好地保护起来。谁看了卧牛和卧马，特别是那一匹后腿卧地而前蹄挣扎着将起立的马，能不为其“力”与“威”震慑住呢！“马踏匈奴像”是那样的真实。一个胡人在马腹下挣扎着，手执着弓和箭，圆睁双眼，简直无用武之地，而那匹马却威武而沉着地、坚定勇猛地站着不动。那块“熊抱子”的石头，虽只是线刻，而不曾透雕，但也能把子母熊的感情表达出来。那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雕刻家们的作品，是和希腊、罗马的雕刻不同的，是别具一种民族风格，是世界上最高超的艺术品之一部分。谁能为这些石刻写几部大书出来呢？有机会站在那里，带着崇高的欣赏之心，默默地端详着它们的人们，是幸福的！他们还将到华清池去，过个十分愉快的休沐日。他们还将到唐高宗的乾陵去，欣赏盛唐时代的石刻，一整列的石人、石马，一对驼鸟、一对飞马，还有拱手而立的许多酋长、番王的石像（可惜都缺了头），都值得看了又看，看个心满意足。长安城的内外，是有那末多的名胜古迹，足资流连，足以考古，足以证史的地方啊。一时是诉说不尽的。韦曲、杜曲、王曲以及曲江池、樊川等古人游乐之地，今天只要稍加疏浚，也就可以成为十分漂亮的人民公园。我想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弘伟而美丽的大公园在长安城南出现的。“古”与“今”，古老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结合得如此的巧妙，如此的吻合无间，正足以表现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不仅西安市是如此，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城市也都是同样地把“古”与“今”结合起来的，而西安市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值得特别提起的，一个典型的好例子。

（原载一九五七年《政协会刊》第一期）

春风满洛城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午夜，我从西安到了洛阳。这个城市也是很古老的，又是很年轻的。工厂林立在桃红柳绿的春天的田野里。还有更多的工厂在动土，在建筑。但古老的埋藏在地下的都市也都陆续地被翻掘出来。从周代的王城，汉代的东都，直到诗人白居易、历史学家司马光他们的遗迹，全都值得我们的向往和注意。这个古城的东郊，是白马寺的所在地，那是相传为汉明帝时代，白马驮经，从印度把佛教经典初次输入中国时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佛教寺院。今天，山门的两座穹形门洞，其上嵌着不少块汉代的石刻(是取当地出土的汉代石刻而加以利用的，据说明朝人所为)，其四围墙角，也多半使用汉砖、汉石砌成。可以说是世界上十分阔绰的一个寺院了。寺内古松苍翠，至少已有三五百年的寿命。大殿里的几尊古佛、菩萨的塑像，古雅美丽，当是元代或明初之物，甚至可能是辽、金的遗制。再往东走，乃是李密城，即金村遗址所在地，在那里曾出土了七十多块古空心墓砖，五十年前曾经震撼了一世耳目。那扑扑地向天惊飞的鸿雁，那且嗅且搜索地、威猛而稳慎地前进捕捉什么的猎狗，那执杖前行的老人，那手执竹简而趋的学者，那相遇而揖的两个行人，都将二千多年前的艺术家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力，活泼泼地重现于我们的眼前。这全部墓砖，现在陈列于加拿大的博物院里。但我们是永远地不会忘记它们的。还有好些绝精绝美的战国时代

的金银镶嵌（即金银错）的铜器，特别是那面人兽相搏的古铜镜，成为世界上任何博物院的骄傲。可惜，包括那面古镜在内，绝大多数都不在国内。

除了帝国主义者们长久地在洛阳掠夺出土古物之外，解放后的几年之内，才开始做着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一个"无牛眠之地"的几千年的古墓葬、古遗址的累积地。单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就发现了六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一千七百三十八座已经加以发掘。古遗址也已发现了两处。所得的古文物，从仰韶时期的彩陶，龙山时期的黑陶，到汉代的大量遗物，成为临时博物馆，周公庙里的辉煌的陈列品，吸引了许多游人的注意与赞叹。

我走在大道上，春风吹拂着，太阳晒得很暖和，就看见工人们在使用"洛阳铲"钻探古墓。就在那大道上，发现了一个汉代的砖墓和一个较小的土墓，我都跳下去考察一番。在农民们打井挖渠的时候，也出现了不少古墓。在新开辟的金矿公路上，有一个大汉墓，中有壁画，还保存得不坏。我也去看过。在新鲜的春天的气息里，嗅得到古代的泥土的香味。但随地有古墓的事实却引起了从事建设工作的担心。有一个干部宿舍，把两个床陷落到地下的古墓中去了，幸未伤人。新建的水塔，倾斜得很利害。压路机掉落到七米多深的大墓里去。有此种种经验教训，建设部门才知道非清理好地下的古墓葬，便不能在地上进行建设，因之，也便加强了和考古部门、文化部门的合作，因此，便处处出现了"洛阳铲"的钻探队。这是完全必要的。不清理好地下的，便不能建设好地上的。这道理已经是建设部门所"家喻户晓"的了。但有不相信这道理，一意孤行，鲁莽从事的，没有不出乱子。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那些地方工业系统的"打包厂""砖瓦

厂”“纺纱厂”等等。

在周公庙看到的好东西多极了，也精彩极了，往往是前所未见的。象一面出土于唐墓的嵌螺钿的平托镜，那镜背上的图画，精丽工致的程度，令人心动魄荡。可以说是一幅“夜宴图”。月在天空，树上有凤凰，有鹦鹉，树下有池，池上有一对鸳鸯，相逐而行。还有两位老者，席地而座，一弹阮咸，一持杯欲饮，一双鬟侍立于后。这面古镜远比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同类的唐代物为精美。

二十八日，到龙门去。这是值得在那里停留十月、八月，或一年、两年的时光，应该写出几本乃至几十本的专书来的一个伟大的古代艺术宝库。这里只能简单地说一下。龙门的佛像多被帝国主义者们盗去。但存在于各洞里的大小佛像，仍有二万尊以上。西山区以潜溪洞、新洞、宾阳三洞、双窑南北洞、万佛洞、老龙洞、莲花洞、破窟、奉先寺、药方洞及古阳洞为最著。宾阳洞被剜斫下去，盗运出国的两方著名的浮雕，即北魏时代的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斧凿的遗痕犹在，令人见之，悲愤不已！那些保存下来的石雕刻，表现了从北魏到唐代的各时期的雕刻家们最精心雕斲出来的伟大的精美的艺术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最辉煌的若干篇页。我站在若干大佛像、小佛像的前面，细细地欣赏着，只感到时间太短促了。有人在搭木架，以石膏传摹若干代表作下来。但愿有一个时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也能看到这些最好的中国雕刻的石膏复制的代表作品。

经过一座横跨于伊水上的草桥（这草桥到了水大时就被冲断，东西山的交通也就中断了），到了东山区。以擂鼓台、四方千佛洞为最著。十多尊的罗汉像，神情活泼极了，在国内许多泥塑木雕的罗汉像里，这里所有的，是最古老的，也是最庄严美妙的。

东山区的石洞，中多空无所有，破坏最甚。有几个石灰窑，在万佛沟里烧石灰。幸及早予以制止，免于全毁。

东山的高处是香山寺，现已改为某干部疗养院。徒然破坏了这个重要的名胜古迹，而绝对解决不了疗养院的房屋问题。且山高招风，交通时断，实也不适宜于做疗养地。在山上走了一段路，到了诗人白居易的墓地。墓顶还有纸钱在飘扬。清明才过，白氏子孙住在山下者，刚来上过坟（听说他们年年都上山上坟）。黄澄澄的将落的夕阳，照在黄澄澄的墓土上，站在那里，不禁涌起了一缕凄楚的情思。

二十九日，去访问东汉时代的太学遗址。这座太学，在其最盛时代，曾经有六万多学生在那里上学。到今天为止，恐怕世界上还没有比它规模更弘伟的一座大学。但这遗址，知道的人却不多。我们渡洛河，过枣园，沿途打听，将近二小时，才到达朱圪塔村。一路上时见地面有烟雾似的尘气上升，飞扫而过。有人说，这就是庄子所谓"野马也，尘埃也"的"野马"。一位李老者引导我们到遗址去。显著地可看出是一大片较高的地面。许多农民正在辛勤地打井。我问他们："有发现石经的碎片么？"他们说："近半年来已不大出了。"他们人人都知道"石经"，发现有一、二个字的碎块就可以卖钱。过去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农闲的时候就去挖地寻"经"。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时，在黄氏墓地上出土过晋咸宁四年（公元二七八年）的"皇帝重临辟雍碑"。李老者领我们到这坟地上去看。他说，还有石经的碑座散在各村呢。我们在朱圪塔村见到一座，在大郊村见到三座。这些碑座底宽二尺三寸四，长三尺六寸，厚一尺九分。有中缝，深三寸，宽五寸又二分之一。此当是汉三体石经的碑座，应予以保护保管。"辟雍碑"也在大郊村，侧卧于地。我找了村长来，要他好好

地保护这座碑，并建筑一座草屋于碑上。

下午，到倒塌掉的砖瓦厂去查勘。在这个砖瓦厂的范围里，周、汉、宋墓密布，一受大批的砖瓦的巨大重量的压力，即纷纷下陷，以至停工不用。大洞深陷的大周墓和弃塌的窑穴，互相交错着。见之触目惊心。这是“古”与“今”同受其祸的盲目地动土的活生生的大榜样。

入邙山，登其峰，见处处白纸乱飞，皆是清明时节，子孙们来上坟的余迹。坟上套坟，不知有几许历代的名人杰士，美女才子，埋身于此。有大冢隆起于远处，有如一个大平台，乃是一座汉帝的陵墓。邙山西起潼关，东到郑州，南北阔达四十里，直到黄河边上。山上均是大大小小的古今墓葬。北邙山在洛阳之北，乃是百年来有名的出土陶俑和其他古器物的所在地。大部分精美的古代艺术品都已出国。发掘之惨，旷古未闻。解放后，此风才泯绝。

洛阳市的建设规划，即如何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进行新的大规模的建设，不破坏或少破坏古墓葬和古代遗址，并如何好好地保护它们，使在崭新的林立的工厂当中，保存着特出的非保存不可的古墓葬和古代遗址的问题，正在研究讨论中。正象西安市相同，“新”和“老”，“古”和“今”，在洛阳市也一定会结合得十分好的。

龙门石窟，必须坚决地大力地加以保护。有三个大问题，必须尽快地予以解决。一、龙门煤厂，在西山区石窟附近开采，必须立即制止。绝对地要防护龙门石窟的安全和完整。这事，市委会已经注意到，并筹划到了。二、龙门石窟的洞前大车路，要予以改道。否则，各洞里常会有人在内住憩，很难防止其破坏或污损。这条改道的大车路，也已在计划中。又，河水常常要漫涨

到这条大车路和下层的石洞里去，为害甚大。应该乘此修路的时机，于河边加筑石坝。三、各洞窟之间，应该开凿道路互相通联。山上并要建筑石墙，以堵住山洪、雨水的流下；奉先寺尤须急速修整，以防大佛像的继续风裂。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共同加紧进行的。东、西山区仅靠草桥交通，也是很不方便的。已毁了的桥梁，应该早日修复。

（原载一九五七年《政协会刊》第二期）

郑州，殷的故城

郑州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也是河南省的政治中心。自从河南省人民委员会由开封迁移到郑州以后，这个又古老、又先进的城市就开始大兴土木。在处处破土动工的当儿，发现了不少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特别以殷代的遗存物为最多。二里岗是新建筑的重点地区，建筑任务，急如星火。曾在那里发现一片有字的牛骨，接着又发现了殷代的烧瓦器的窑址，炼铜和制造青铜器的工场，接着又发现了殷代的制造骨器的工场。二里岗这个没没无闻的地方，顿时变得举世皆知。当时我们曾使用了一部分专家的力量，到那里从事发掘工作。但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建筑工程也随着在填土砌墙。没能坚决地把那些在学术研究上有重要价值的殷代遗址保存下来，只是把现场情况做了模型，并把遗存物全部取了出来而已。这是科学界的一个绝大损失！至于发现的殷代的大批墓葬，则更是随着这个城市的建设的发展，而即时发掘，即时填坑。

过了不久，更重要的消息来了，说是发现了殷代的城墙。这个远古的城墙遗址是相当于荷马史诗所歌咏的特洛伊古城的，是相当于古印度的摩亨杰达罗遗址的。在中国，恐怕是一座最古老的城墙的遗存了。是这个大消息，引动我到郑州去。

三月三十日上午，从洛阳到了郑州。下午，就偕同陈建中同志等，到白家庄看那个殷代的城墙。这座城墙曾被白家庄作为

寨墙的一部分，原来展开得很远，乃是一个可测知的三千多年前的大城市。但后来经过取土或拆毁，现在只保存着几十丈长的两段。就在那末一眼所及的古城址上，看到了那夯土堆砌得层次分明的城墙，每个夯眼（即打夯时的遗痕）都十分的明显。有一个特点，那夯眼很小，比起西安汉城的夯眼来，显得小得多了。可肯定地是属于更早的时代的遗迹。城墙之上，有若干殷代的墓葬，打穿了城头。可见这城墙乃是殷代的，甚至是更早期的。在那个遗址里，古代陶片俯拾皆是。龙山期的陶片也出土得不少。曾经出土过属于龙山期的一个瓦鬲，陶质薄而精致，有柄，有流。在殷代遗址里，也发现过同类型的陶器。这个遗址的时代问题，值得更加仔细的探索。但至晚是属于殷代的遗存，那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在这座古老的城墙的四周走着，又走上这座古城的城头。太阳光很大，但并不猛烈，天气很令人觉得愉快。时时俯下身去，捡拾些破碎的古陶片。我们决定：这一部分的城墙，绝对地不能允许有任何的破坏了，应该立即设法，积极地、周到地保护起来。

为什么郑州这个地方会有那末重要的殷代的文化遗址和大批殷代墓葬呢？在古书上没有提到过这个地方是殷代的故城。只知道郑州是"管城"故城。周初管叔封于此。《史记·殷本纪》说，周武王灭殷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同书《周本纪》也说，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又说："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当时周武王封管

叔、蔡叔时，一定是就殷故地封之的，故有“相禄父治殷”之语。今郑州既为“管城”故城，也就是管叔“相禄父治殷”之地，可见郑州乃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殷城。我们在郑州发现了许多殷代的文化遗存，是不足怪的。

接着到郑州文物清理队，看他们的陈列室和仓库。他们在短短的清理工作时间里，就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殷代的墓葬，战国到唐、宋的墓葬也发掘、清理了不少。在他们的院子里，就堆存了不少大的空心墓砖，有的是从战国墓里得到的。砖上的图案，以几何文的为最多，但也有人物图像和建筑图样的。

最重要的是殷代的种种遗存物。殷代的冶铜设备和遗址的模型，使我们看了益感到把这末重要的殷代冶铜工场毁坏了，实在是一件莫大的遗憾。制骨器的工场，也只是存留了些骨器的原料和半成品而已。骨器的原料，分为人骨、鹿骨、牛骨，各放一处，不相掺杂，且也已把可用的材料拣选齐整。象这样的大作坊，如果不是属于一座大城市，便不可能存在的。还见到一只殷代陶虎，也是极不多见的。在殷城附近，曾掘出了殉葬的犬坑九个，每坑里，少者有犬十余只，多者有犬三、四十只。可能有大墓在其附近。一只犬架上还附着金片若干，这是唯一的可见的犬身上的饰物。用犬作殉葬的墓葬，在安阳也有发现。可见这是殷代的风俗之一。

在清理队附近有一座宋代墓葬，遗存物已空，而墓的建筑却还保存得很好，可作为宋墓建筑的标本。在这一带地区，也有殷代的文化遗址。不能再听任破坏下去了。要坚决地予以保护。不可一掘就算了事。

三十一日上午九时，冒着蒙蒙细雨，到铭功路（杜岗）工地看刚发掘、清理出来的几个殷代墓葬。就在大路之傍，就在立将填

坑平土、进行建筑的工区。一个是孩子的墓，一个是成人的墓。二墓的人架均在。成人的骷髅头傍，还放着一只碧玉簪。有两个墓已经清理完毕，遗存物和人架都已取出。在一个墓里得到过青铜器(小鼎?)，墓的下面，发现有殉葬的犬架。这里也发现过殷代人民的居住区，还有窖址，但全都在急急忙忙的配合基建的工程里给"平整"掉了。那个地区将建筑一所中学。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而毁坏掉可以作为下一代教育的具体生动的历史、文化资料，这是合理的么？至于为了建筑一所饭店，一个招待所，一座办公大楼，甚至为了盖某一个机构的厨房，而大量毁坏了殷代文化遗址、居住遗址，乃至极为珍贵的殷代的制造骨器工场、冶铜工场，也岂是合理的么？不可能再在别的地方见到或得到的比较完整的殷代冶铜工场，制造骨器工场，如今是永远地消失无踪了！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这一个时代，从地面上消失了去！这悲愤岂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我站在这个殷代的文化遗址上，心里感到辛辣，感到痛苦，眼眶边酸溜溜地象要落下泪来。只怪我们没有坚决地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只怪我们过于迁就那些过分强调不大重要的基建工程的重要性，而过分轻视或蔑视先民的文化遗存物的人的主张！所有造成这种不文明的毁坏，我们是至少要负一半以上的责任。为什么斗争性不强呢？为什么不执法如山呢？为什么不耐心用力，多做些教育说服工作呢？

有了这样的一场惨痛入骨的经验，遇事便不应该再那末胡涂地迁就下去了。

就在大道傍，有新建的一座人民公园，规模很大。这个地区也便是殷代文化遗址的一部分。据说是为了保护这遗址，建筑公园是再保险不过的，因为不进行基建，不盖房子，不大动土(即使动土，也不会很深)，遗址当然会保存得住。但我一走进这所

公园的大门，就知道有些不大对头，满不是那末一回事。有好些清理队工作人员，搭盖了田野工作时所用的几座篷帐，在那里紧张地工作着。此时，雨点大了起来，淅淅沥沥地有点象秋天的萧索之感。他们不能继续在工地上工作，都躲到篷帐里来。我们也在一座篷帐里休息着。

“有什么新发现的东西么？”陪伴着我们的赵君问道。

“又清理了几座殷代墓，出土了不少东西，”一个人指着堆在傍边的陶器等等说道。

我的心情就同天气般的阴暗。原来这个公园，动员了青年人，在挖一个“青年湖”。好大的一片湖，也就正在这殷代的文化遗址和墓葬的所在地方，而清理队的工作人员们便不得不移到这里，配合挖湖工作的进行，而急急忙忙地在发掘、在清理着。所谓建了公园便会保护得好，便不会破坏的话，也便成了“托辞”或“遁辞”。

开元寺的遗址，现在成了郑州市医院的分院。我们看见在这个医院的院子里，还危立着两个经幢。一个是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八四六年）所立的道教经幢，上面刻的是“度人经”。象这样的道教经幢，在全国是很少见的。会昌灭法，不知毁坏了多少佛教艺术的精英，却只留下了这个道教经幢，作为活生生的见证，可叹也！另有一座尊胜经幢，是石晋天福五年（公元九四〇年）所立的。这座经幢上所刻的飞天及其他浮雕，都很精采。我们说：“这两个经幢都很重要，要好好保护着。”医院里的人点点头。

晚上，和陈局长们谈保护河南省和郑州市文物古迹事，谈得很多。我们有信心和决心要做好这个保护工作。

郑州是有关古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必须更加仔细，更加

谨慎小心地从事基建和考古发掘工作，不能再有任何粗率的破坏行为了！

（原载一九五七年《政协会刊》第三期）

金梁桥外月如霜

汴梁是开封的古称。宋时，也叫做东京。有一部《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代的开封的社会生活，甚为生动；还有一卷有名的古画，叫做《清明上河图》，为宋代大画家张择端画的，很长，从城外画到城里，把那时候的封建社会生活里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等的情况，都收摄在那弘丽大画卷里了。宋人平话，常讲到这个繁华的都市。《水浒传》里也常提到开封府。“包公”的故事，也常在这里发生。明朝初年，有一位藩王（周宪王）名叫朱有燉的，写了不少剧本，民间常常搬演他们。所以李梦阳曾有诗道：“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这是一个多么为历代诗人和艺术家所向往、所歌颂的一个繁华的都市啊。今天虽然已经不再是一个首都，甚至不再是一个省会，但那股诱惑人的劲儿还是存在的，它还是叫我们不能不去访问，不能不在那里留恋忘返。假如我们有时间到大相国寺遛遛，我们还能够依稀仿佛地看得出旧日的繁华面目来的。它还是一个市场，但已经不再是北宋时代的大相国寺了。它正处在新和旧之间。旧的已经死了，新的正在诞生。“农业合作化运动”展览，正在大雄宝殿里展出。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旧的东西，正象钟楼、鼓楼和其他建筑物似的，有的已经湮灭不见，有的快要塌倒。新的大相国寺，就将要在这个破落的旧址上建立起来。

新的开封，新的汴梁，象许多别的古老的都市似的，是新

生了。

我于四月一日中午到了开封。第一件事就是到省博物馆参观。它是出土文物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大博物馆之一。其陈列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布置的。原始社会部分和奴隶社会部分，和别的博物馆没有什么不同，但陈列品却丰富异常。仰韶文化的遗址和安阳的殷代文化遗址都就在河南省里。不仅解放前的出土物还有不少保存着，而且解放后更有许多新的发现。封建社会部分，不分朝代，而分为生产工具、农业、手工业、阶级对比、文化艺术等类。这完全是新的有创造性的陈列布置。工作人员们内部就有了不少争论。在夕阳斜照里，为了此事，开过一个座谈会，我认为：我国封建社会为期甚长，变化很多，这种"总结式"的陈列方法，的确值得慎重考虑。但既已摆出来了，也不妨暂时成为一个类型，作为讨论的资料，他们也同意我的这个意见。这个博物馆更吸引人的，乃是从汲县、辉县、新郑、安阳等地出土的青铜器。辉县出土的东西，乃是前所未见的，破碎的很多，尚未整修好。修复后陈列出来，一定会使社会上震动一下子的。两廊陈列着石刻、石像及墓志等，蔚成巨观。说是"小碑林"，其实，这碑林并不小。有魏三体石经、宋石经、北魏石棺、隋造像碑及墓志八百多方（均嵌于墙上）。最可注意的是汉代黄肠石有四十多方，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值得深入的研究。石雕像美极了，汉唐的陶俑也有极好的，令人徘徊不忍离开。也有伪品掺杂其间，但那是旧存的东西。如果把真伪好坏分别明白，这个博物馆的辉煌的光彩，是决不下于西安的碑林与陕西省博物馆的。出馆后，曾到旧书店转了一下，简直一无所有，只购得汲县志一函。

晚上，在工人俱乐部看豫剧《春香传》。开封原是歌舞的产生地之一，宋代的"瓦子"里出现了不少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玩

意儿，特别是“杂剧”、“平话”、“诸宫调”等等，都是开天辟地之作，影响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者极深且远。至今，在大相国寺还有不少艺人仍在弹唱、演奏着。豫剧乃是地方剧里流传最广的剧种之一。它吸收了各个剧种的长处、好处，而以其特有的曼声的歌调融化之，使其完全适合于自己的需要，决不显得格格不入。《春香传》的题材是取之于朝鲜人民所创作的剧本的，但演起来却宛然是道地的豫剧。这个剧种是有其广阔的前途的。就在这里，演着这个《春香传》，不正在表示出“齐唱宪王新乐府”的汴梁城的飞跃地在前进，在更勇敢地发扬其传统的歌舞的光辉么？

第二天一早，就到铁塔去。周密《癸辛杂识》说：“光教寺在汴城东北角，俗呼为上方寺，有琉璃塔十三层。”李濂《汴京遗迹志》云：“宋仁宗庆历中，开宝寺灵威塔毁，乃于上方院建镔色琉璃砖塔，八角，十三层，高三百六十尺，俗称铁塔寺。”这个塔靠近城墙边，坚实雄健地矗立在大空地上。塔的上层有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炮火所中的大弹孔的痕迹，但并没有影响这铁塔的坚厚与稳定感。这当是今所知的最早的一座以琉璃砖建成的大建筑物。那琉璃砖至今还坚实异常，琉璃釉作深褐色，故远远地望去，象是铁质的。塔旁，有知止亭，亭中立着一尊铜制的接引佛，重约一吨，是明代的作品，很端庄、静定。

继到龙亭。这龙亭，在解放后已经修整一新。北宋的繁华的东都，其遗存物殆只有这个龙亭了。阶石及亭基均甚古老，非宋代以后物。四面都是水，仿佛令人有到了中南海及北海之感。当是汴京的内苑的一部分吧。亭前，有二水池，相传一为杨府，一为潘府，二家相仇不已。元剧里有《谢金吾诈拆天风府》，即演杨家被奸臣王钦若指使谢金吾拆毁天风府的故事。难道这里就是天风府的遗址所在？又有《杨六郎调兵破天阵》、《焦光赞

活拿萧天佑》等剧。明代有《杨家府演义》，详述杨府诸将的忠义英勇和潘仁美的屡次加以陷害之事。不知怎样，二家府邸均下陷为池了。杨府遗址，尚留下一个铁座，相传是招集将士之物。这个故事并无任何根据，这二池明明是属于宫苑里的。但“杨家将”的故事深入人心，所以传说得津津有味。据说，大相国寺有一位老说书的人，他说“杨家将”，能够说到第十二代。龙亭左右，将辟为一个大公园，风景很秀丽，正是劳动人民的大好的休憩、游览的地方。

继到山西会馆，象是关帝庙改建的。那个建筑物很奇特，时代不过一二百年，但其中作为建筑装饰的木刻和砖刻却繁缛细致之极。在中原地带，象这样的砖术雕刻，十分少见。又到河南烟厂，看繁塔。这个塔的形状十分古怪，大塔只有三层（不象是塔基），在第三层上，又建造了一个小塔，十分地不相称。我怀疑：在建造大塔时，造到第三层，经费就没有了，或因什么事变，竟中止继续造下去。后来的人，就在这上面，草草地造成了另一个小塔以完全这个“功德”。从来没有见到过另一座和它形制相类的塔。

相距繁塔不远处，有古吹台，这台在农学院内，风景极好。《汴京遗迹志》云：“相传汉之鼓吹台，一名梁台，一名云台，俗呼为二姑台。今改为禹王台，祀禹于其上，两庑祀古之善治水者，为卫河患也。”今此祠已不可见，但登吹台远望，汴梁城是历历在目。

赶着到大相国寺一游。正有新兴的气象。旧的封建遗存物死去了，属于人民的大市场正在兴起，那繁华的景象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

（原载一九五七年《政协会刊》第五期）

石　湖

前年从太湖里的洞庭东山回到苏州时，曾经过石湖。坐的是一只小火轮，一眨眼间，船由窄窄的小水口进入了另一个湖。那湖要比太湖小得多了，湖上到处插着蟹簖和围着菱田。他们告诉我："这里就是石湖。"我跃然的站起来，在船头东张西望的，想尽量地吸取石湖的胜景。见到湖心有一个小岛，岛上还残留着东倒西歪的许多太湖石。我想："这不是一座古老的园林的遗迹么？"

是的，整个石湖原来就是一座大的园林。在离今八百多年前，这里就是南宋初期的一位诗人范成大（1126--1193）的园林。他和陆游、杨万里同被称为南宋三大诗人。成大因为住在这里，就自号石湖居士，"石湖"因之而大为著名于世。杨万里说："公之别墅曰石湖，山水之胜，东南绝境也。"我们很向往于石湖，就是为了读过范成大的关于石湖的诗。"石湖"和范成大结成了这样的不可分的关系，正象陶渊明的"栗里"，王维的"辋川"一样，人以地名，同时，地也以人显了。成大的《石湖居士诗集》，吴郡顾氏刻的本子（1688年刻），凡三十四卷，其中歌咏石湖的风土人情的诗篇很不少。他是一位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田园诗人，继承了陶渊明、王维的优良传统，描写着八百多年前的农民的辛勤的生活。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就是淳熙丙午（1186年）在石湖写出的，在那里，充溢着江南的田园情趣，象读米芾和他

的儿子米友仁所作的山水，满纸上是云气水意，是江南的润湿之感，是平易近人的熟悉的湖田农作和养蚕、织丝的活计，他写道：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农村里是不会有一个“闲人”存在的，包括孩子们在内。

垂成穑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
笺诉天公休掠剩，半偿私债半输官。

他是同情于农民的被剥削的痛苦的。更有连田也没有得种的人，那就格外的困苦了。

采菱辛苦废犁钼，血指流丹鬼质枯。
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他住在石湖上，就爱上那里的风土，也爱上那里的农民，而对于他们的痛苦，表示同情。后来，在明朝弘治间（1488—1505），有莫旦的，曾写了一部《石湖志》，却只是夸耀着莫家的地主们的豪华的生活，全无意义。至今，在石湖上莫氏的遗迹已经一无所存，问人，也都不知道，是“身与名俱朽”的了。但范成大的名字却人人都晓得。

去年春天，我又到了洞庭东山。这次是走陆路的，在一年时间里，当地的农民已经把通往苏州的公路修好了。东山的一个农业合作社里的人，曾经在前年告诉过我：

“我们要修汽车路，通到苏州，要迎接拖拉机。”

果然，这条公路修好了，如今到东山去，不需要走水路，更不需要花上一天两天的时间了，只要两小时不到，就可以从苏州直

达洞庭东山。我们就走这条公路，到了石湖。我们远远地望见了渺茫的湖水，安静地躺在那里，似乎水波不兴，万籁皆寂。渐渐地走近了，湖山的胜处也就渐渐地豁露出来。有一座破旧的老屋，总有三进深，首先唤起我们注意。前厅还相当完整，但后边却很破旧，屋顶已经可看见青天了，碎瓦破砖，抛得满地。墙垣也塌颓了一半。这就是范成大的祠堂。墙壁上还嵌着他写的《四时田园杂兴》的石刻，但已经不是全部了。我们在湖边走着，在不高的山上走着。四周的风物秀隽异常。满盈盈的湖水一直溢拍到脚边，却又温柔地退回去了，象慈母抚拍着将睡未睡的婴儿似的，它轻轻地抚拍着石岸。水里的碎磁片清晰可见。小小的鱼儿，还有顽健的小虾儿，都在眼前游来蹦去。登上了山巅，可望见更远的太湖。太湖里点点风帆，历历可数。太阳光照在粼粼的湖水上面，闪耀着金光，就象无数的鱼儿在一刹那之间，齐翻着身。绿色的田野里，夹杂着黄色的菜花田和紫色的苜蓿田，锦绣般地展开在脚下。

这里的湖水，滋育着附近地区的桑麻和水稻，还大有鱼虾之利。劳动人民是喜爱它的，看重它的。

“正在准备把这一带全都绿化了，已经栽下不少树苗了。”陪伴着我们的一位苏州市园林处的负责人说道。

果然有不少各式各样的矮树，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地栽种着。不出十年，这里将是一个很幽深新洁的山林了。他说道：“园林处有一个计划，要把整个石湖区修整一番，成为一座公园。”当然，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东山一带已将成为上海一带的工人的疗养区，这座石湖公园是有必要建设起来的。

他又说道：“我们要好好地保护这一带的名胜古迹，范石湖的祠堂也要修整一下。有了那个有名的诗人的遗迹，石湖不是

更加显得美丽了么？”

事隔一年多，不知石湖公园的建设已经开始了没有？我相信，正象苏州——洞庭东山之间的公路一般，勤劳勇敢的苏州市的人民一定会把石湖公园建筑得异常漂亮，引人入胜，来迎接工农阶级的劳动模范的游览和休养的。

（原载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

移山填海话厦门

这是"旧"话了，但还值得重提。

几年前曾到过厦门。那时厦门还是一个海岛，从集美到厦门去，一定要乘帆船或小汽轮。我在小汽轮上，望着前面一重山、一重山的无穷尽的小山岛，耸峙于碧澄澄的海水之上，恰巧那天没有风，连小波浪也不曾在潾潾地跳跃着，太阳光照射在绿水上，燠暖而作油光，是仙境似的为无数小岛屿所围绕的内海。小汽轮在海面上象滑冰似的走着。但有一件事使我们觉得很诧异。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帆船停在这内海的当中呢？不象是渔船，也不象是远海的归帆。总有一二百只的数目，当然也不是为了避风，问问同行的本地人。他脸上闪耀着喜悦的光亮，微笑的说道：

"你们还不知道么？厦门将不再是一个岛屿了，她将和大陆连接了起来。我们将在集美和厦门之间建筑一道长堤，走火车，也走汽车。过个三两年，你们再来的时候，就可以乘火车或汽车来了。这些帆船都是运载石料，倾倒于那里的海中，作为这道长堤的基石的。"

"这有可能么？"我心里有些怀疑，这不象小说里写的樊梨花移山倒海的故事么？一面问他道："这个填海的大工程有把握么？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当然有把握。我们准备削平三四座山，用山石来填平这一

段预备筑堤的海水。现在已在积极进行着了，并且已经削平一座山。每天总有二百只以上的帆船，从那边把石块运载到这里来。”他一面说，一面指着道：“你们看，那边船上的人不是在把石块倒在海里么？”

果然的，在那边密集着的帆船上，有无数的人在搬运着大大小小的石块，往海水里抛下。无数只手，无数块山石，在不停的倾抛着。“精卫填海”，只是寓言。想不到如今是竟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的事迹了。

到了厦门，觉得街道整洁，沿街的房子，以洋式的为多。公园是一座很幽深的园林。在那里，有一座很大的文化馆，外表是宫殿式的建筑。我所见到过的文化馆，恐怕要算这一座是最漂亮的了。可惜内部正在整理，没法进去参观。

“厦门大学”是一所著名的南方的大学，就建筑在海边。站在海边就可以隐隐约约地望得见尚为敌人所占领的大小金门岛。奇怪的是，一点战争的气氛也没有。我们看不出她是坐落在国防最前线。“弦歌之声”不绝，教职员们和学生们完全按时工作，按时上课，和内地的任何大学没有什么不同。更奇怪的是，这所大学，那时正在大兴土木，建筑一座可以容纳五千多人的大礼堂；还在建筑一个大运动场，它的露天的四周的圆座，足足可以坐上观众近五万人。那气魄是够弘大的。

说起闽南人的弘伟的气魄来，从泉州的洛阳桥开始，就能够看得出。洛阳桥本名万安桥，落成于北宋仁宗时代，离今已有九百年了。蔡襄的《万安桥记》说：这桥始建于皇祐五年（1053）四月，落成于嘉祐四年（1059）十二月。桥长凡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这九百年前所建筑的石桥，桥基还很稳固。被敌人炸毁的一段，已用木板补好，照样能够通车。我们走过这座著

名的桥梁就想起几百年前的工程师们具有怎样的高度的设计能力，能够在昼夜为海潮所泛滥的水面上，架起这座长及三华里的石桥来。后来越向南走，就知道象这样长到四五华里的石桥，在闽南是不足为奇的。在一个地区，在海湾之上，我们的先人们就建造了一座大石桥，象在弧形的弓上，安上一根直弦，使走路坐车的人少走了不少弯路。那座桥本来可以走吉普车，但为了安全起见，已经禁止通车。汽车都要沿着海边的公路走，不走那座长桥了。而那条海边公路足足有三十公里长。我们之中，有几个人奋勇地步行从桥上走过，而我们则坐了汽车沿海边公路走。几乎是同时到达目的地。由此可见那座石桥是如何的"便捷"了。

"厦大"还在建筑着物理楼之类的。他们有充分的信心，知道师生们虽身处于国防最前线，却是安如泰山。他们相信我们的国防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威力，丝毫也没有任何的担心受怕之感。不仅大学的师生们有这样的感觉，整个厦门市的人民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恐慌。有一天傍晚，我们在中山路上闲步。防空的警报响了。市民们仍是安闲地走着，并不急急地想回家。街上的电灯照样地亮着，热闹的市容，一点也没有减色。我们有点不解了，就去问一家店铺里的伙计：

"警报响了，你们为什么还不关上电灯？"

他徐缓地答道："这是常有的事。对面的飞机起飞了，我们就响起警报来。但根本上不用去理会他们，他们是不敢飞过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不关灯，还是照样地做买卖。"

是的，我们的强大无匹的国防力量是足以保卫着人民的安全的！在国防前线上，特别的看得出我们人民是怎样地爱戴和信赖我们的解放军。有一个故事，流传得很广。解放军在某山

区挖壕沟。但在那里，老百姓已种下了不少白薯。军士们怕把那些白薯搞坏了，连忙代为掘起，移种到附近的山坡上去。第二天，老百姓上山一看，他们的白薯已经搬了家。这是有名的“白薯搬家”的故事。不，这不是“故事”，乃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实事。

我们在厦门住了好几天。除了工作之外，还能有时间到几个名胜古迹的地方去游览。那里的名胜“南普陀寺”，就在厦门的附近的五峰山上。

我们登上了五峰山顶，心旷神怡地恣意吸取着四周的风景。海水是那末无穷的广大、深远，它拥抱着大大小小的无数的岛屿，白色的浪沫在澎澎湃湃地有节奏而徐缓地扑向海边的赭苍色的古老的岩石上来，仿佛是摔碎在岩下，却又象是有节奏而徐缓地引退了。这时，有微风在吹拂着。白色的帆船在安稳地驶进或驶出港口。绿水和青山在这里是最和谐地构成了不止一幅两幅的好图画。是那样地山环水抱的海湾。是那样地轻云微罩，白波细跳的水面。是那样地重重叠叠的山峰，一层又一层的显露地雄峙于海上。是那样地象南方所特有的润湿温暖的山水画。我们想，在晚霞斑斓的夕阳西下的时候，或在曙红色的黎明带着紫黑色的云片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或是银白色的月亮朦朦胧胧地映照在这平静的夜的海湾上的时候，或那样地蒙蒙细雨，象轻烟薄雾似的笼罩着这些海上的群峰的时候．那些景色的变幻，是更会十分迷人的。就在这晴天白日的时候，我们也为这四围的风光所沉醉而舍不得下山。

这里的物产丰富极了，特别是香蕉，整年地都有得卖。家家有一株或好几株的墨绿色的荔枝树或龙眼树，就象北京那里家家有棵枣子树似的。不时的有暗暗的浓香，扑鼻而来，那不是月

桂花——在那里，桂花是四季皆开放着的，故名月桂——就是香橼花在喷射出它的香气来。在那里，几乎没有冬气。许许多多的花卉，此开彼谢，从没有停止过“花朝”。元人张养浩有诗道：“山无高下皆行水，树不秋冬尽放花”，正道着这里的特色。

是这样仙岛似的厦门岛，而如今却已经不再是一个岛屿，而是和大陆连接在一起了。从今年的元旦起，鹰厦铁路已经可以运载旅客了。移山填海的大工程，不再是幻想，不再是空想，而已是活生生的现实了！再要到厦门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乘坐着火车直达厦门港了。这样弘伟的建设，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会有可能实现。我们正在做着许许多多前人从未做过的大事业。这一番移山填海的足以使洛阳桥或其他的那些闽南的大石桥都暗然无色的大工程，就是空前的建设事业之一。洛阳桥的故事，已成为“神话”，已播为戏曲。这远远地超过洛阳桥的移山填海的海上长堤的故事，难道不会也变成了现代的“传说”，而被写入诗歌、小说和戏曲里去？

（原载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春天在呼唤

一大早就听见炮仗的声音，劈劈拍拍地在大门外响着。这欢乐的呼唤，是唤起了潜伏的春天，也是唤起了亿万人民的起来更加起劲地干活的信号。炮仗的火药味儿是够刺激的，带给人们一股说不出的既愉快又振奋的劲头。震撼人心的霹雳般的响声，使孩子们掩着双耳又喜又惊地在尖叫。一切都是春天将要到来的征兆。

冬天的太阳光特别和暖，田野的空气显得特别新鲜。千千万万的人，从东方刚露出桃红色的曙光的火苗儿，就纷纷地起来下地了。他们在紧张地兴修水库、开沟、挖渠、打井、积肥，要把千千万万亩的旱田化为水田，要和大自然争个胜负，把世世代代，自有人类以来，吃尽无量数的苦头的涝、旱和虫灾，一下子扫除干净。“人定可以胜天”这句话，在这个大时代里是可以实现的了。

有句老话“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是走在时间的前头了。不仅是，“一年之计在于冬”。而且是，“一年之计在于秋”。

农民热火朝天地在秋收一完毕，就不曾歇一口气地继续地赶作着田间的活计。翻地，积肥，开沟，挖渠，打井，修建着大、中、小型的水库，都已经在秋收刚完的时候就开始动手了。“秋收冬藏”是句过时的话了。如今，即在秋、冬二季，也是农村里十分忙碌的时候　农民兄弟们正和工人兄弟们在竞赛，全都鼓足了

干劲，一刻也不曾让时间从指缝里滑溜过去。他们现在是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了。封建时代的“农历”和规律，在社会主义里是完全不合用的了。一切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生产服务。秋天和冬天打破“常规”的忙碌，不仅为了“春耕”做好准备工作，而且，也是为了世世代代的农业生产准备更好的条件而努力着。

今年的春耕，有了去年的秋冬二季的准备工作，包括积肥和兴修水利在内，条件是大为不同了。社会主义本来是革命嘛。农业生产也是同样地要来一个革命。向来不能种水稻的地方，如今也种上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向来是一带荒山，一片草原，一区洼地，如今是要变成碧油油的田地和水果累累，压弯树枝的果园地带了。向来是黄沙蔽天，白霜满地的塞北，如今是，将要使之成为“杂花生树”春水潾潾的江南了。

这个春天，是好一个愉快而热烈的春天呀！是打破一切常规的春天。是从旧式的农业生产走向新的科学的农业生产的开始。是“人定胜天”，是打破大自然的束缚与限制的开始。

将怎样描绘这样的一幅“春景”呢？

将怎样叙状大自然的古老面貌的“改头换面”的经过呢？

弘伟的场面就将在江南开始了，也就将在黄河南北开始了，也就将在塞北漠南等等地区开始了。

千千万万的人，掮着锄头，赶着牛群和马匹，走向广漠无边的田野，在晨曦的柔光之下，一齐动手，播种的播种，插秧的插秧。千千万万的人，象一个人似的，在辛劳地工作着，人们在齐声地唱着“青年突击队”的歌，歌声高响入云，把几万年来就飞集在新翻过的田地上啄食虫儿的乌鸦都吓得远走高逃了。这弘壮的歌声，这社会主义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农民的内心的感情与欢乐。这就是解放了的生产力的伟大的表现；这就是无穷大的人

民的"原子能"的解放！

人们浑身是劲，浑身是力。是无穷尽的光与热的放射，是无比光辉的集体力量的显示。不管冬天是多末寒冷，是零下二十度还是更冷的天气吧，人们还是照旧地辛劳地下地干活。人们所放射出来的光与热，把严寒赶跑了。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出现在从来不曾有过的大时代里。到了春天，这股不可测知的力量就要更加巨大了。

这一声声的炮仗的响亮的呼唤，就是春的呼唤，就是无穷大的解放了的人民的力量的呼唤。

街树的枝头上已经泛出了隐隐的绿意。黑色的和黄色的田野上，一堆堆的积放着肥料。只等待到地上开了冻，春耕就要开始了。

春天在呼唤着呢。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晨写

（原载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苏州赞歌

苏州这个天堂似的好地方，只要你逛过一次，你就会永远地爱上了它，会久久地想念着它。它是典型的一个江南的城市，是水乡，又是鱼米之乡。

春天的时候，一大片的开着紫花的苜蓿田，夹杂着一块块的娇黄色的油菜花儿的田，还有一望无际的嫩绿可喜的刚刚插好稻秧儿的水田，那色彩本身，就是一幅秀丽无边的绝大的天然的图案画。谁不喜爱这表现着春天的烂缦而又娇嫩的颜色呢？很象维纳丝刚从海水泡沫儿里生了出来，一双眼睛还朦朦忪忪地带着惶惑之意①。它就是春天她自己！田埂上还开放着各色各样小花朵，白色的，黄色的，还有粉红色的，深红色的。清澈的春水，顺着大渠小沟，哈哈地流着。小鸟儿在叫着。合作社的男女社员们，一大早就肩负着锄头，手拿着小筐子下田去了。他们彼此在竞赛着。"青年突击队"歌，高响入云。他们把春天变得更活跃又有精神了。

千万盆的茉莉花、代代花和玫瑰花都已从玻璃房里搬出来，在花田里竞媚斗艳，老远地，就嗅到那喷射出来的清馨的香味儿。站在虎丘山的大石块上，望着桃红柳绿的山景，望着更远的

---

① 维纳丝是希腊罗马神话里的爱神，她是从海的浪沫里产生出来的，意大利画家 S·BOTTCELLI 画的一幅《维纳丝的诞生》，就表现出她刚出生时的双眼的朦忪惶惑之感。

五色斑斓的田野和躺在太阳光底下放亮光的湖泊和小河流。天气老是润滋滋地，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一阵春雨，在云端飘洒下来。

走在留园、西园一带的石塘上，望着运河的流水，嘴里吟着："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足旁有一大块深绿色的菜园，正开着紫中透黑的蚕豆花儿，那不时钻入鼻孔的菜花香，夹杂着泥土气味，甜甜地象要醉人。在西园的略带野趣和荒凉味儿的后花园里，有游人们在等候着大癞头鼋在池塘里出现。留园的引人入胜的园景，吸引着更多的外地的客人们。还有城里的许多花园，个个有特色，够你逛个一天半天的，狮子林的假山洞，钻得你不禁嘻嘻哈哈地大惊小怪起来。拙政园不再是几十间东倒西歪的老屋和千百株将枯未倒的老树，显得凄凉暗淡的园林了，它成为精神百倍的大好的游逛的地方。汪氏义庄就剩下靠北面的一带假山和几间房子了，但还别有风趣的吸引着游人们，它们活象是小摆设，不，它们并不小；它们乃是模拟着名山大川而缩小之于寻丈之地的。这显出了我们老祖先们怎样地喜爱自然，又怎样地能够把自然缩小了搬运到家园里来。从一扇小窗里望过去，不是有几棵碧绿的芭蕉树，一峰玲珑剔透的太湖石，还有小小的几株花木么？那就显得那个屋角勃勃地有生趣、有远趣起来。无梁殿是一座很坚实的古建筑。沧浪亭就在水边，具有渺荡的深趣。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图"和"舆地图"就放在孔庙里。许多的记载织工们斗争的石碑，也在玄妙观等处发现。这些美好的园林，和重要的古迹名胜，不仅供应了苏州市人民自己和它四乡的工农兵的享用和游逛，而且，更重要的是给予江南一带的特别是大上海市的工农民以惊喜，以舒畅，以闲憩的休息和快乐。苏州人和扬州人所擅长培植的小盆景，这些苏州市的大大

小小的园林，就活象是一座座的大盆景。

苏州不完全是一个游逛的、休息的城市。它有长久的斗争的历史。苏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的手工业城市。织坊老早就成立了，织工们的斗争史值得写成厚厚的几本书。“吴侬软语”的苏州人民，看起来好象很温和，但往往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勇猛无前，坚忍不屈。它那里产生了不少民族英雄，革命烈士以至劳动模范，他们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是十分地感动人的。

苏州城外有一座寒山寺，那是以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著名的。清初诗人王渔洋，就为了要题一首诗在这寺的山门上，半夜里坐船赶到那里，在山门上用墨笔写了诗，然后就下船离开了，连大殿也没进。到了今天，还有不少人慕名而去到那里。有一口大钟，但已经不是原来的那口钟了，听说原来的钟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盗去的，下落不明。如今，这座本来荒凉不堪的寺院，变成了很华美。有一座盘梯的楼，很精致，是从城里一个旧家搬来的，包括搬运、重建、修整、油漆等等费用，只花上五千元。苏州人民就是会那末勤俭起家的。听说那些美丽的园林，也都是花了不多的钱而都收拾得“有声有色”，漂漂亮亮。

苏州的许多工艺美术品，特别是刺绣、云锦等等，乃是国家的光荣，也是国家的财富。它的农业的成就，乃是属于全国高产地区，供给着许多城市，其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乃是值得推广的。

苏州城和苏州人民是勤俭的，谦虚的，温暖的，却又是那末可喜可爱。凡是到过那里一次的人，准保不会忘了它。

（原载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装帧设计：洹　舟

书　号：10019·3515
定　价：1.10 元